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研究

——觀念、類型與文類源流的探討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Concept and Genealogy

趙偵宇

Chen-Yu Chao

指導教授：黃美娥博士

Advisor: Mei-E Huang,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February 201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研究——觀念、類型與文類源流的探討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Concept,
and Genealogy

本論文係趙偵宇君（學號 R00145002）在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3 年 2 月 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趙偵宇

（指導教授）

陳當益

柯慶明

所長：

洪淑苓

序言

散文研究無非是一條少有人行跡的道路，還記得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曾這麼對我說過，走上這樣的道路，若不是能夠成為極有成就的學者，則易變成默默無名之徒。老師的話不無道理：少有人跡，一路上的感受興懷，也就鮮有人知。但倘若能在一塊荒地莽原成功披荊斬棘，挖掘打磨出一顆稀有的寶石，其光芒自然耀眼並將受人矚目。只是未來如何，尚未可知，能做的、能把握的是選擇之後去愛去承擔，雖然偶爾也會遙望山頂，但更重要的是此刻腳下的每一個步伐。散文之為文學研究，正猶如文學作為人生的一種選擇，既不熱鬧，亦非主流。然而熱鬧與荒涼從不是自己抉擇時的判準，只是喜愛，只是興趣在此，只是人生的方向在眾多影響與作用之下終於還是指向了這裡。是故無悔，是故孤獨而能自在，艱辛卻又時常感受喜悅。

感謝引領我走向文學之路並時常給予支援關愛的簡嬪老師，是您讓我得以一窺文學之奧妙深刻且見識到文學之多采與璀璨。感謝為我開啟研究之門並嚴格而慈愛地訓練我的李惠綿老師，是您為我奠定學術與做人之基礎，使我一路受用無窮。感謝帶我進入臺灣文學研究並始終對我包容理解的黃美娥老師，您發揮了「指導」的真諦，在我遭逢學術與生活的困頓、危機與錯誤之際，總是諄諄教誨並適時提供了化解的溫和力量。感謝柯慶明老師與陳萬益老師，相識之前，為素未謀面的我慨然相助，相識之後，則宛若連綿高山一般一路守護。感謝臺大中文系方介老師、李隆獻老師、李錫鎮老師、曹淑娟老師、劉少雄老師……，感謝臺大臺文所楊秀芳老師、郭玉雯老師、洪淑苓老師、梅家玲老師、張文薰老師、蘇碩斌老師，老師們自是大家門派，而我在門下歷練學習，雖無法精通各家路數，但至少今後每一招每一式背後都各有章法，反覆練習與轉化吸收之後，亦能往更精深博通之處邁進。

感謝中文系張怡茵助教、楊國寬助教、唐鳳禎助教、朱靜怡助教，臺文所趙詠萱助教、黃婉華助教、何祺婷助教、陳怡燕助教、張琬琳助教，在求學及研究生活中的諸多瑣碎、繁雜、駁亂的事務，是因為你們的不厭其煩與默默付出才得以紓解暢通，但你們往往是論文謝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請容我在此表達謝意與敬意。

感謝臺文所的哥兒們蔡栢傑、邱懋景、蔣闊宇與林莊周，你們都是一群低調耕耘卻又才華洋溢的「爺們」，在此花花浮誇之世，在除了偽善還是偽善的人際網絡之中，我慶幸認識你們，而得以感受到人之為人的真誠與良善。另一群重要而真誠的人是陳楨、吳佳穎、林安琪與彭玉萍，感謝妳們一路以來的情義相挺與理解的話語和眼神。感謝林以衡、石廷宇與王俐茹，展現了身為學長姐的各項關懷與威能。此外，在本論文英文摘要的撰寫之中給予大力幫忙的張傲紅學長以及我的高中死黨詹家安先生，在此亦一併致上謝忱。最後感謝我生命中那一些不用具名因為已經心靈相通的知己好友，以及我的至親家人在我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生命之中，無私永恆的付出與支持。

はしがき

嵐のような日々を過ごした。学業、仕事、研究を重ねる日々はとても充実していたが、常に挫折、困難な状況、他人からの無理難題などと向き合っ、一つ一つ解決していかなければ、前に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た。そして、次から次へと新たな波が立つ。更に厄介な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あった。自分が時間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のか、それとも自分が時間に追いかけているのか、もはや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いた。それに人生の試練は止まらないのだ。自分の体の健康と心の強さを問い合せる日々は、まさに嵐のような日々であった。ほぼ毎日研究している自分は、まさに「嵐を呼ぶ男」だ。

なので、研究生生活は人生の航海だと思った。そして、航海は一人の力だけで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大した成果を残せたか分からないが、自分は嵐と向き合っ、波を乗り越えてここまで来れたのは色々な方々のお蔭だ。この場をもって心からの感謝の気持ちを申し上げたいと存じます。東京大学の藤井省三先生と京都大学の川合康三先生、日本大学の山口守先生、三人の先生がたには台湾へ来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感謝いたします。先生方のもとで学んで、知識力の増進だけではなく、先生がたの人間として大きさと暖かさを感じました。藤井先生と一緒に山中湖で船をこいだこと、川合先生と研究室でいろいろお話したこと、山口先生との毎週の弁当会など、すべてが自分の大切な思い出だ。先生方から色んなことを教えて頂きました。これから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致します。神戸大学の緒方康先生、日本大学の紅野謙介先生、金子明雄先生、三沢真美恵先生、広島大学の三木直大先生、横浜国立大学の垂水千恵先生、白水紀子先生、大妻女子大学の赤松美和子先生、ブランダイス大学のマシュー・フレリー先生、短い時間でしたが、貴重な時間を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台湾大学の池田晶子先生、張鈞竹先生、永漢塾の先生方、長澤まさみさんをはじめ、柴咲コウさん、小泉今日子さんなどの日本芸能界の皆さんからは、日本語を勉強させて頂きました。

そして、札幌の横山家と大阪の青木家の皆さん、自分が日本へ行ったとき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見知らぬ自分に対して、日本人の親切と優しさ、日本食の美味しさ、日本の観光魅力など、体験させて頂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横山真理子さん、自分の最初の言語交換の相手はあなたでよかったです。あの頃色んなことを交流できて、本当に楽しかったです。明田川聡士さん、よく考えてみると、俺達はもう古い付き合いですね。この記念すべき友情を続けましょう。八木はるなさん、言語交換のことについて、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最後は市川譽恵さん、最後の最後まで、自分の日本語の文章を直してくれて、とても感謝します。

日本人の皆さんに対して、感謝の気持ちを込めて、この文を書き上げました。皆さんが自分のことを支えて来たからこそ、今の自分が居るのです。自分はいつか本当の「嵐を呼ぶ男」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ます。

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研究對象及課題，建構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當中的現代散文觀念與類型論述，並與臺灣戰後被營造出來的「美文傳統」進行研究對話，重探臺灣現代散文史的典律問題，嘗試讓過去以來較不受到學界矚目的「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重返臺灣現代散文史中的源流位置，並指出該課題之研究潛力與重要性。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概述研究動機、目的與意義，以及相關研究範疇、材料與方法，並回顧前行研究以及進行論文章節架構的說明。第二章處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當中的現代散文觀念，一方面探知時人如何思考散文之為文類，一方面則是藉由散文觀的考察梳理出日治散文的多元承繼脈絡，分別彰顯出臺灣本地古典散文、五四現代散文，以及日本近現代隨筆觀的影響，並藉此與由「美文傳統」所帶來的「五四源流論」對話。第三章處理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類型論議題，先對前行研究的諸多分類方向進行整理討論之後，再回歸文學史現場，以當時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以及散文名稱為材料，歸納出二十餘種散文類型並予以討論，同時透過類型論的建構，釐清當時對於散文的認知。第四章與第五章正式進入對於文本的討論，首先第四章探討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日文隨筆創作，該議題是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研究中最為缺乏的部分，故本章從基本概述做起，探討當時在臺日人日文隨筆作者群、發表場域與書寫題材的多元豐富性，並佐以個案研究，以青木繁（1893-1985）這位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作者為討論對象，指出當時在臺日人日文隨筆的創作成就，並連結青木繁與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等人，以自然書寫為線索，找出日治與戰後散文牽連對話的可能性。第五章則是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非美文」傳統，並專注於與戰後「美文傳統」在風格及題材上具有高度差異性的周定山散文作品以及在《臺灣民報》所發表的諸多「問題散文」，前者筆鋒尖銳著稱，其文多充滿批判與戰鬥精神，與溫柔婉約的「美文」相當不同。後者多以臺灣社會為主要書寫關懷，且作者汎及一般民眾，寫出社會百姓的問題與心聲，與重視作者私我內心世界的「美文」則又大異其趣。最後，由於戰後美文作家多為女性，於是亦以女性散文為研究脈絡，從場域變遷、範式轉移等角度，再次考察臺灣現代散文的典律問題。第六章結論為整本論文做出總結，帶出筆者的研究期許以及希冀後續研究能夠予以指正並推進該領域研究之意。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現代散文、散文觀念、散文類型、臺灣現代散文源流、青木繁、美文傳統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and genealogy of the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In the past,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as a research topic always had been ignored. To build up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is topic, I t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genre of prose at that tim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tries to re-examine the tradition of poetic prose after War World II to reconstruct the Genealogy of prose in Taiw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sections. The motivation, purpose, significance, areas, material, and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are included in the introduction. In Chapter 2,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s of prose research, I try to find out the pluralistic context of the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The concept of the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was influenced by the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May 4th literature, and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Chapter 3 processes the mode issue by generaliz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name of columns of magazines and the titles of prose works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We can find out more than twenty modes of prose at that time. In other words, we can find out more than twenty ways about how prose was recognized at that time. Chapter 4 and 5 are text analysis. Chapter 4 tries to examine the prose works by the Japanese authors who lived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and then conducts the case study. A very important author called Sigeru Aoki (1893-1985) composed a lot of prose works and had high writing consciousness of prose. The prose of Sigeru Aoki is nature writing; it is as important as Tadao Kano’s works. Chapter 5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 of non-poetic prose in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especially the Jou Ding Shan’s prose works and the prose works published in the “TAIWAN MINPAO”. These prose works were very critical and aggressive; it cared about the community too. These work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of poetic prose which is soft and focuses on the author’s inner world only. Because most authors of poetic prose after War World II were women, this chapter also compares the Female prose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Taiwan and that after War World II. In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and passion should be contributed to the prose study, especially the pros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I will devote my time and my whole heart in this 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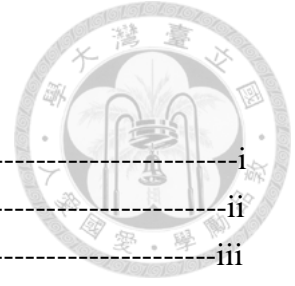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Modern Prose, The Concept of Prose, The Mode of Prose, The Genealogy of Prose in Taiwan Literature, Sigeru-Aoki, The Tradition of the Poetic Prose.

論文凡例



- 一、論文中以□代表難以辨認或是無法判別的字。
- 二、文中引用或是強調的部分採取「」符號，然而倘若直接引自簡體字書或是某些特定書籍，則保留原書“”或是『』的使用方式。
- 三、論文中所有引用的中國簡體字一律改成臺灣正體字型。
- 四、字體的古今變異盡量遵循原版印刷，如着、叙、够等字倘若於引用時出現則維持原樣，不改為現今流通的著、敘、夠等字體。
- 五、日文漢字的部分也採用原有的字體，如「随筆」、「文学」等等，引用時不改為「隨筆」、「文學」等中文漢字字體。
- 六、引用日文的部分一律由筆者自行翻譯成中文面貌，倘若已有翻譯本，則以該翻譯本為主。惟若干註腳的日文篇名、書名則保持原狀。
- 七、引文當中原有的註腳編號則予以取消不引。
- 八、所引用的文章，若為僅存欄位或是文章內標題的情形，或是為了要特別突出該欄位、標題時，不以〈〉標誌而採用「」符號。
- 九、引用文獻中的蕃人、祖國等詞雖在字義使用上滲透進過多意識形態、霸權思維，但為了尊重歷史材料原貌，不予更改，但不代表本論文的論述立場。
- 十、引文中的〔案：〕即本論文筆者之案註，非原引文之內容。
- 十一、本論文中所引用的文獻資料，於首次出現時會加註出版資訊（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時間），之後為避免繁瑣，僅保留作者或編者名以及篇章或書目名稱，出版資訊則予以省略。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序言	ii
はしがき	iii
論文摘要	iv
Abstract	v
論文凡例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意義	1
第二節 研究範疇、材料與方法	8
第三節 研究回顧	10
第四節 章節架構	17
第二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觀念的多元承繼	23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古典散文觀及其現代肆應	25
第二節 五四現代散文觀及其影響	38
第三節 日本近現代隨筆觀及其影響	52
第三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的評析與重探	65
第一節 現有分類評析	69
第二節 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分類與當時的散文認識	78
第四章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的文類源流意義與作家個案舉隅	93
第一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創作概述	94
第二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個案研究：青木繁的自然書寫	100
第五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非美文」傳統	122
第一節 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精神	124
第二節 書寫社會、民眾之聲：《臺灣民報》「問題散文」	138
第三節 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	155
第六章 結論	173
參考文獻	177
附錄一	193
附錄二	21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目的與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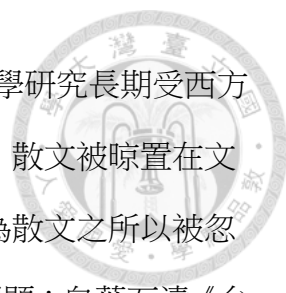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題，即是試圖從二大方向來與文學史以及現有的散文研究成果對話。首先是一個時代的考察。日治時期作為臺灣新文學的起點，小說、戲劇、新詩、散文的創作繁花盛開，然而過去以來，無論是採取文本分析、作家研究、作品議題研究、文學史研究，或是運用西方理論進行批評等，臺灣文學界對於日治時期文學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小說，新詩其次，散文則極少受到關注。¹綜觀現有文學史論述，日治時期文學其實可說就是一部小說史。然而事實上，現今為人所知的日治新文學大家，如賴和、楊逵、龍瑛宗、張文環等人，小說之外，都有散文的創作。不僅如此，在報紙、雜誌上，還有更多尚未為人所研究的散文作者與作品，書寫語言共涵蓋日文、臺灣話文、中國白話文，作家群橫跨臺日，數量遠遠超過小說作者。因而研究日治時期文學，實不可不注意散文作為一種當時重要文類所開創出來的文學風景。

然而，散文研究的缺乏不僅僅是日治時期獨有的狀況，在五〇年代反共文學，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七〇年代鄉土運動，八、九〇年代所謂後現代式、眾聲喧嘩式的創作……等等以十年為期的文學史斷代討論中，亦難見散文論述的身影。²截至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散文研究者都會在論文中感嘆或是檢討臺灣現代散文研究嚴重缺乏的問題，這種表述已經成為各個散文研究者的研究慣例。³換言之，只要研究散文，就會注意到散文在臺文學界的邊緣位置。

¹至於戲劇，則因留存的文本甚少，情況較為特別。

²如陳芳明即稱散文「在文學史上所得到的關切與評價卻完全不成比例。」陳芳明，〈以擦亮每一顆文字刷新歷史——《九十三年散文選》序〉，陳芳明主編《九十三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頁11。

³如游喚就曾經指出散文研究上「質」的不足，使得有志之士，每每高聲疾呼散文研究的不足。可參考游喚、徐華中編著，《現代散文精讀·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7。又如正中書局出版《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之際，共分文學理論、文學現象、小說批評、新



研究者最常提出的看法便是散文理論的不足，⁴由於臺灣文學研究長期受西方理論影響，且西方的文學、文化理論大多適用於小說的情況下，散文被晾置在文學史的邊緣以致少人注意，自是理所當然。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散文之所以被忽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此原因關乎到臺灣文學史建構的問題；自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出版以來，即確立了臺灣文學建立主體性，不再附屬於中國文學之一支的文學史建構，而以日治時期作為臺灣新文學濫觴的這點已被之後的文學史家如彭瑞金、陳芳明等人所承繼發揚。從日治接續到戰後的文學史縱深，已是大部分臺灣的文學史作者以及文學研究者的共識。談及小說，則有賴和、楊逵等開創者，言至新詩，則可以追溯到楊華、水蔭萍等作家，然而倘若將焦點轉移至散文，則可以發現非但日治與戰後的散文關係面目不明，就連日治時期本身的散文創作，文學史家亦少有論述。因此這當中就存在著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當小說、新詩從日治接續到戰後的源流已然確定，散文這一條文學史的傳承脈絡卻遲遲未被建構完成。

因此，本論文論述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議題，背後的問題意識即與此息息相關。

參考討論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在戰後的文學選本、論述、文學史中缺席的文學典律議題的相關論文，⁵可以發現文學史典律的「選或不選」直接牽涉到的是「留或不留」以及曝光與否的問題，長期缺少文學選本、論述、文學史等典律載體的

詩批評、散文批評五卷，每一卷的編者都大嘆篇幅嚴重不足而有遺珠之憾，唯散文批評卷例外，編者何寄澎甚至對於散文相關研究的薄弱，感到「幾乎不能接受」。參鄭明嫻，〈總序〉，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台北：正中書局，1993），頁8；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導論》，頁22。

⁴余光中就曾指出「評論家面對本色天真的散文，似乎無技可施，甚至不值得細究。何況學府出身的評論家大半師承西方評論的當紅顯學，西方既然漠視散文，則學徒的工具箱裏恐怕也難找應付散文的工具吧。」余光中，〈總序〉，張曉風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1989~2003 散文卷（一）》，（臺北：九歌出版社，2003），頁4。鍾怡雯亦謂「散文研究的最大困境來自理論的匱乏。」鍾怡雯，《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自序》（臺北：聯合文學，2004），頁5。

⁵趙偵宇，〈選本、論述、文學史：日治時期現代散文戰後典律的待形成〉，第五屆臺大、清大臺文所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宣讀論文（臺灣大學臺文所主辦、清華大學臺文所協辦，2012.05.26-27）。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自然難以作為臺灣現代散文的源流而被承認。那麼，在過去的論述中，臺灣現代散文從何而來？

以鄭明嫻、楊牧等人說法為代表的現代散文源流論，長期主導了散文學界對於臺灣現代散文來源的看法。⁶他們的意見或有不同，但大抵的論述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慣於將臺灣現代散文直接上繼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散文成就。在這樣的論述脈絡中，臺灣的現代散文系譜⁷於1949年以前是周作人、徐志摩、林語堂等人的五四散文，1949年以後則是延續五四餘緒的大批美文作家如張秀亞、艾雯、蘇雪林、琦君等人。於是，不但戰後初期（1945-1949）的散文創作現象被忽略，洪炎秋、葉榮鐘等在戰後持續創作散文的臺灣本土作家亦不被列入脈絡之中⁸，而日治時期整個時代客觀存在著的一段散文史更是無見其蹤影。倘若我們以中國與臺灣的地理位置作為脈絡的圖式，那麼長期以來臺灣現代散文都被框範於這一條從五四到臺灣戰後的曲折脈絡當中，而從臺灣本地的文學史出發，自日治到戰後的散文直線發展脈絡，遲至臺灣文學研究已經日益發達的今日都尚未有個清楚的面貌。


然而筆者並不是反對從五四承接而來的散文發展脈絡，而是認為當我們要認真梳理臺灣現代散文的源流時，那麼我們理應找出更多的可能來源；更何況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絕對是一條不容被忽視的源流，且當小說、新詩早已確定其日治系譜，則散文的日治源流建構更是當務之急。

誠如前述，大部分有心致力於散文研究的論者，都會注意到散文在整體文學史中的困境，例如專攻臺灣女性散文的張瑞芬，即在這樣的問題基礎上開創了當

⁶可參考鄭明嫻，《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楊牧，《失去的樂土》（臺北：洪範書店，2002）。本論文於之後的「研究回顧與討論」，會再進行較詳細的論述。

⁷需要說明的是，因時代限制或是論述需求，在這些學者的論述中，討論的多是「現代散文」或是「中國現代散文」，而鮮少會是「臺灣現代散文」。故此處以「臺灣『的』現代散文」稱之，暫且作為一種概述。

⁸關於臺灣戰後省籍本土作家的散文書寫，可參考彭玉萍的研究。彭玉萍，《見證者的散文詩學——省籍作家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代臺灣女性散文史的新路，⁹試圖為散文在文學史研究中搶下一席之地。而本論文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則是一方面注意到了散文研究在整體當中的困境問題，另一方面卻也要與五〇年代以降的美文傳統對話。前者是散文與小說、新詩之間的問題，後者則是散文內部與散文研究建構的問題。單就臺灣戰後的散文創作情形而言，隨著「美文傳統」論述之興起，張秀亞與艾雯等人的地位也隨之被抬高，甚至被視作臺灣散文長流之發端。¹⁰然而「美文傳統」與這一批女性作家的代表性、重要性則值得存疑。若初步以戰後文學選本進行觀察，如齊邦媛《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選入林語堂、梁實秋、梁容若、琦君、思果、吳魯芹、王鼎鈞、鍾梅音、陳之藩、余光中、顏元叔、張拓蕪、梅濟民、趙雲、張健、亮軒、李藍、楊牧等人，¹¹巨人出版社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則是選入梁實秋、張秀亞、周棄子、梁容若、陳香梅、王怡之、林語堂、鍾梅音、姚一葦、段永瀾、徐鍾佩、劉咸思、吳魯芹、思果、季薇、林海音、葉曼、艾雯、琦君、陳之藩、蕭白、畢璞、沉瓔、李樂薇、司馬中原、楊喚、王絜菴、胡品清、殷穎等作家，¹²可以發現女性美文作家的名字確實出現在這些名單當中，然而卻絕對不是唯一的存在，因而其「傳統」性實頗有問題。也因此倘若提倡「美文傳統」，則其「傳統」所造成的遮蔽性問題則不得不令人加以反思，只不過注意到這部分的論者目前仍屬少數，而這也體現本論文寫作的動機與目的所在——與文學史對話，更與現有的散文研究成果對話。¹³


⁹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¹⁰如陳芳明便認為艾雯的「全部文字總結了台灣文學史的漂亮翻轉，她是散文長流的起點，也是抒情傳統的開端。」陳芳明，〈艾雯和戰後台灣散文長流〉，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1》（臺北：朱恬恬，2012），頁 10。

¹¹齊邦媛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北：爾雅，1984）。

¹²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散文》（台北：巨人，1972）。

¹³也因此這邊存在著一個需要澄清的重要問題，筆者所謂的戰後「美文傳統」是指「美文」做為一種「傳統」的典律性格，並非流於預先設定臺灣戰後現代散文的全部作品皆是單一「美文」，而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則具有多樣化性質的散文，因此兩相比較之下，必定是日治優於戰後的簡單推論。筆者想要說明的是，「美文」在戰後做為一種「傳統」所產生的遮蔽性，戰後自然存在著諸多「非美文」，只不過沒有被標榜為現代散文的傳統。而日治時期由於沒有特定的書寫範式被標榜、操作成「傳統」，故若將日治時期視作臺灣現代散文的源流，也就是臺灣現代散文的「傳統」的話，就可以更加彰顯出「美文」做為「傳統」的單一性。其次，「美文傳統」的存在值得以多種不同的角度予以對話，以戰後的「非美文」做為質疑戰後「美文」的方法論途徑，也就是採取共時性的研究



問題回到對於臺灣現代散文源流的思考，可以發現，晚近的研究者開始不滿意於臺灣現代散文僅有中國五四新文學承繼的說法，紛紛提出理應重視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聲音。¹⁴以向陽為例，他更是強調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特殊之處就是不同於戰後以抒情美文為主的書寫現象，而是有許多具有「剛強、批判、思辨以及從知識與實踐出發的作品」。¹⁵倘若暫且先簡單劃分，將臺灣現代散文的創作分成溫柔抒情的軟式散文，與剛強批判的硬派散文的話，那麼臺灣散文研究長期缺乏的就是對於硬派散文的關注與討論，亦即「非美文」的創作範式未能形成散文的「傳統」。即便是主張臺灣現代散文源流是從五四新文學而來的論者，他們也鮮少，甚至不提魯迅雜文的對臺影響作用。魯迅雜文可說是剛強硬派散文的代表，但魯迅在戰後被國民政府妖魔化，成為言說談論的禁忌，故雖然五四時期小品文與雜文之間相互檢討、攻擊，並各自形成重要的散文文類之一支，五〇年代張秀亞等人所繼承的五四散文卻只有以周作人等人為代表的小品文，而雜文一脈如同斷流。¹⁶戰後，雖然亦有雜文、知性散文或是各種方塊文章的出現，但卻找不到可以被安置的源流脈絡，也因而更被研究者所忽略。戰後的臺灣散文研究，對於軟式散文的討論也遠遠多於硬式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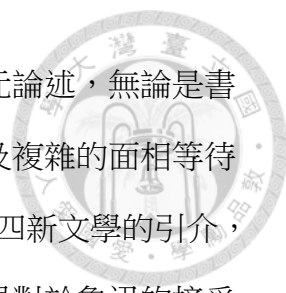
然而日治時期卻正好相反，個人抒情的軟式散文固亦有之，但剛強的硬派散文才是這時期現代散文的大宗以及主要特色，以日治時期現代散文來與戰後的美文傳統對話，勢必能撞擊出相當精彩的火花。更重要的是，建構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研究並以此形成對話之後，能夠藉此重構臺灣現代散文源流的討論。五四源

對照的話，亦是相當具有積極性意義的研究方法。只不過，本論文主要的研究關懷主要是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身上，「美文傳統」是研究上的時而潛在、時而顯在的對話者，主要是採取偏向歷時性的考察對比，並限於時間、精力與篇幅，無法同時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研究。畢竟本論文仍是以「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主要的研究關懷，而以與「美文傳統」的對話為輔助。

¹⁴如陳建忠、向陽、張瑞芬、陳芳明等人。

¹⁵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第一部）》（臺北：聯合文學，2006），頁 21。

¹⁶這當中亦存在一個文學史論述上的弔詭，1941 年上海被日軍攻佔之後，周作人便成為了「淪陷區」作家，政治上並不正確，然而卻在戰後成為臺灣美文傳統的始祖。這與後來張秀亞等人對周作人的推崇以及論述不無關係，從王鈺婷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張秀亞取周作人散文沖淡的襟懷、閒適的態度這一面，「政治正確」地回到國民黨官方民族主義的中心。可參考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79。




流與「美文傳統」相輔相成之下，將臺灣現代散文源流導向一元論述，無論是書寫範式、文學史位置，抑或是實際的影響過程，實有更加細部及複雜的面相等待深掘。日治時期除了臺灣本地的書寫脈絡之外，報刊雜誌對於五四新文學的引介，已可視作為一種「五四影響論」的濫觴，又由於當時臺灣文學界對於魯迅的接受度，讓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五四脈絡」較之戰後更加豐富，不僅如此，日治時期尚可以理出臺灣本地古典散文的轉化脈絡，以及日本近現代隨筆的影響，使得當時散文同時存在諸多「非美文」傳統，以關懷社會問題、人民百姓為主的硬派散文，即是當中之例，此外，日治散文亦不缺乏軟性的抒情作品，因此在書寫範式上日治的現代散文「傳統」亦比戰後「美文傳統」更加豐富。¹⁷這些使得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文學史位置實不容再受臺文學界的忽視。

誠如上述，除了日治臺灣以及五四中國的散文脈絡之外，不可不考慮的還有日本文學的隨筆所帶來的影響。日治時期的散文創作，在語言運用及作者群上都相當多元而豐富，臺日作家所創作的日文隨筆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然而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特別是在臺日人書寫的作品，卻很少有研究者進行探索，¹⁸一方面是日本的文學研究本身亦缺乏隨筆研究，遑論其研究觸角會涉及殖民地時期日人在臺作品；至於臺灣文學的研究者，縱使是專論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論文，日治時期日本人的日文隨筆亦不在其論述視野當中。¹⁹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建構，亦相當必要，本論文將會鎖定日治時期在臺日文隨筆進行概述，並以青木繁這位隨筆作

¹⁷關於以上，感謝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范銘如老師在「台湾文学における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および日本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橫濱國立大學，2014.01.24)工作坊上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王惠珍老師對於筆者在研究操作上的理解與支持。

¹⁸在強調臺灣文學史邊界擴大的此際，筆者亦傾向採取較具包容性的加法研究。事實上，西川滿、濱田隼雄等在臺日人作家，甚至以佐藤春夫的旅臺日人作家，都已經放置在臺灣文學史的論述視野當中，不應使用嚴厲的後殖民史觀，徹底去除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作家。以筆者所要研究的在臺日人日文隨筆作者而言，他們都是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並以臺灣作為書寫的主要關懷對象的隨筆作者，毋須因為他們的血統身分或是書寫語言便予以排除。反而是因為加入了這批在臺日人日文的隨筆作者，原本就頗為豐富的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才會顯得更加豐富。

¹⁹可參考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清華大學中文系，1994.11.25-27)。此篇論文目前仍是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研究者最重要的參考論文。承蒙清華大學臺文所陳萬益教授慨贈影本，謹此致謝。找尋論文的過程另外麻煩了論文作者東海大學歷史系許文雄教授、臺大臺文所黃美娥教授、師大國文系范宜如教授，在此一併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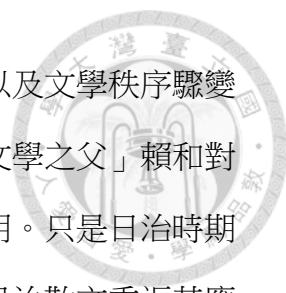
者進行為個案研究。青木繁是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中非文學專業的隨筆作者，然而卻發表了大量隨筆作品，出版隨筆集，並極其罕見表達了自己的隨筆觀、森林文藝觀，以及對於隨筆創作的執著。其次，臺灣的自然寫作論者大多認為臺灣的自然書寫始於 1980 年代，然而事實上日治時期即有許多具有專業科學知識的日人作者寫作以自然為題的隨筆，例如以鹿野忠雄為代表的紀行文學，除此之外，作為日治時期新竹州林務課長的青木繁，也以臺灣的山林為主要的書寫對象，留下數量頗豐的隨筆作品。透過日治與戰後自然書寫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這也是隨著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研究建構，所能帶出的與戰後散文的研究對話。

論者曾謂，臺灣的現代散文研究如同「一片等待開拓的莽林」²⁰、「一片尚未十分開發的沃土」²¹或是「一片還未被全部穿越的富麗大陸」²²，而綜合本章上述，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實是臺灣、中國、日本三大散文源流的匯集之所，因此是莽林與大陸的深處美地，但在研究上卻相當乏人問津，因此是臺灣現代散文研究中更加需要有人開拓及穿越的富饒沃土。同時，在臺灣文學史邊界不斷擴大，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正在蓬勃發展的此刻，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能夠帶出的豐富對話實有相當的重要性，畢竟這是以往較不曾受到矚目的文類研究方面的補足。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散文觀為何？受到五四、日本，甚至是臺灣古典散文哪些影響？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有哪些類型？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日文隨筆情況為何？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作家？日治時期以書寫社會人民為主題，以剛強為風格的硬派散文，又如何讓我們對現今的美文傳統進行反思？上述種種，都是筆者藉由思考臺灣現代散文源流，以及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試圖提出並回應的研究問題。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本論文雖將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視作「傳統」與「源流」，乃是因為以臺灣本地的文學史脈絡時間點作為考量，而並非指涉日治散文確切影響了戰後散文之意，一方面創作的影響關係極其複雜，需要另外

²⁰鍾怡雯，〈我的追尋之路〉，《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臺北：聯合文學，2004）

²¹鄭明嫻，《現代散文欣賞·代序》（臺北：東大圖書，2007），頁 2。

²²陳芳明，〈以擦亮每一顆文字刷新歷史——《九十三年散文選》序〉，陳芳明主編《九十三年散文選》，頁 19。




的專門討論。另一方面，臺灣的日治與戰後文學因為政權轉移以及文學秩序驟變之故，二者之間的聯繫遭逢很大的斷裂影響，即便是「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對臺灣戰後新文學是否真有「文學之父」的高度實際影響亦難判明。只是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確實是當時文學史的重要組成，本論文的目的即是讓日治散文重返其應有的文學史位置與評價。

第二節、研究範疇、材料與方法

本論文聚焦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討論，但限於篇幅與精力，勢必無法全面性地處理這個領域的各個面向。因此，本論文採取策略性的研究方法切入問題點，為了回應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故特別將焦點放置在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文類觀、類型論，以及文類源流上。對於文類觀的考察，可以發現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文類觀的多元承繼情形，至少可以梳理出臺灣古典散文、五四現代散文、日本近現代隨筆三條脈絡，藉此與散文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五四源流論」進行對話。至於類型論方面，則是要藉由日治散文類型論的建構，讓日治散文認識論得到進一步的增進。要建構日治散文研究，不可或缺的認知前提便是日治散文的整體面貌，藉由分類研究，則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中輪廓。最後則是文類源流的探討方面，側重以文本分析的研究建構來與美文傳統對話，故研究範疇即涵蓋尚未為人所關注的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作者的日文隨筆，以及與軟式的美文做為鮮明對比，並能夠充分展現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特色的硬派散文。因此鎖定與以關懷社會人民，筆鋒充滿戰鬥與批判性格的周定山散文，以及刊載許多書寫社會問題的散文的《臺灣民報》系列。此外，由於戰後美文作家多為女性，故針對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女性美文的比較討論，亦能符合本論文問題意識，與美文傳統進行積極對話。

研究材料的部分，則主要分成二個方面，一是散文文本的研究，以及論述散文的各種評論文字。文本方面，全以日治時期在臺灣發表的現代散文為論述對象，



日本人寫作的日文隨筆的部分，將以關鍵字「隨筆」、「漫筆」以及「隨想」等等在《臺灣日日新報》與《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資料庫進行檢索，並根據檢索結果，針對刊有較多隨筆作品的刊物進行翻閱，以找出不在「隨筆」欄、「隨想」欄刊載，但實則為隨筆的文本。除此之外，為因應個案研究，故本論文另外亦會參照前述的整理結果，聚焦於青木繁這個重要的隨筆作者，並隨著個案研究，一併參照青木繁的數本個人著作，如《森林生活者の手記》、《山·林·人》等等。

至於日治時期以中國白話文或參雜著臺灣話文所寫作的現代散文，作家全集、作品集（如《賴和全集》、《周定山作品選集》等等）之外，亦參考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所列篇目。此外，《臺灣民報》系列亦是當時散文發表的重要刊物，而因為《臺灣民報》未設散文欄，故不採關鍵字檢索，而是改以地毯式的翻查。最後，陳萬益選編的《國民文選·散文卷 I》以及向陽主編的《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第一部）》，亦是散文文本研究部分的重要參考。

另，論述散文的各種相關評論文字方面，主要將研究日治時期散文觀的視野放在《風月報》、《全臺文》，以及黃英哲主編的《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四冊上面，以進行地毯式的檢索與分析。此外，亦會參照蘭亭書店所出版的《中國現代散文理論》，來做為研究五四散文觀的材料。

最後是研究方法的整體說明。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包含史料研究以及報刊研究，以上述的研究材料為範圍，進行相關研究文獻的搜羅與爬梳，以歸納法分析文獻材料。在文類觀的探究上，採取比較的方式，先論述日治時期臺灣本地的古典散文觀，以及五四文學與日本文學的散文觀，梳理清楚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各種可能的承繼脈絡，藉以釐清當中的多元繼承關係。次析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觀，這部分會先評析現有的許達然與陳建忠的散文分類方式，之後則進到文學現場，以日治時期報刊雜誌的散文欄位進行檢索分析，整理出當時的分類情形，促進日治散文類型論與認識論的發展，提供未來在構思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時的基礎資源。在處理完散文觀與類型的部分之後，接著以文本分析進行實際的




討論與研究建構。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日文隨筆的部分先以概述的方式對治時期日文隨筆進行整理，再深入進行個案研究，並以自然書寫為線索，找出串連日治與戰後散文的可能。最後則是藉由日治時期剛強硬派散文以及女性散文作家作品的研究勾勒，開展出與戰後美文傳統的積極對話。綜上，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按循問題意識而生，一方面直接建立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相關研究，一方面亦與戰後美文傳統進行對話，二者相輔相成，建立增加了對話的豐富度，對話也強化了建立的意義性，因此著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之間的特出性與差異性，在有限的論述篇幅中，揀選特定的研究視角與討論文本達成最有效率的研究對話與建構工程，每一個章節之間並不是採取一種互為有機體的方式進行緊密的連結，而是都由特定的研究關懷所產生出的操作策略所建構，如第二章帶出的是日治散文構成的多元面貌，第三章是藉由類型論勾勒當時的散文認知，第四章則是特別著重在現有研究成果中特別缺乏的日文隨筆部分，以青木繁為例，筆者並非斷定他便是最有代表性的日人隨筆作者因而進行研究，而是認為透過青木繁的自然書寫，可以讓日治與戰後的散文進行對話。第五章亦著重在散文研究中較為缺乏的「非美文」研究，因此以批判性及社會性鮮明的周定山與《臺灣民報》散文為例進行討論，女性散文的部分，同樣是有與戰後女性美文對話的考量。也因此本論文並非以日治散文的「全貌」進行研究，而是藉由特定的一些研究關懷點進入該議題的討論。

第三節、研究回顧

一、臺灣現代散文源流相關前行研究

(一)、歷來說法



對於臺灣現代散文乃是由「五四→臺灣戰後」的承繼脈絡，以楊牧與鄭明嫻的說法最為典型的代表。²³楊牧將散文分成小品、記述、寓言、抒情、議論、說理、雜文七個品類，並分別以五四散文家周作人、夏丏尊、許地山、徐志摩、林語堂、胡適、魯迅為各個品類的典型人物，且在議論與說理之後，以臺灣的散文作者為例，為每個品類拉出了傳承的系譜，使得「五四→臺灣戰後」如此之承繼脈絡在有實際案例的支持下顯得更具說服力，並且點明「現代散文的發軔，應當就在二十世紀的初葉，五四運動和白話文倡議前後數年之間，所以至少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了」²⁴。至於鄭明嫻雖然沒有明確建立此脈絡系譜，但其現代散文的相關研究正是體現了這一種看法，²⁵亦曾於其著作《現代散文》中自言：「本書『現代散文』名義涵蓋的範圍依臺灣慣例，指五四運動迄今的白話散文」²⁶，由此更可知歷來的散文研究，對於從中國五四到臺灣戰後的論述，已經成了一種「臺灣慣例」。

（二）、晚近檢討

對於這樣的看法，晚近出現了不少檢討的聲音，如林耀德早在 1995 年發難質疑：「是否臺灣半世紀以降的散文創作，只能置放在五四以降的大傳統中？」²⁷之後諸如陳芳明、張瑞芬、向陽、陳萬益、陳建忠等人也都抱持著類似的意見。陳芳明與張瑞芬在論述臺灣現代散文源流時，傾向於將五四與日治並舉，前者以散文風格為線索，後者則從散文書寫語言以及文體使用的層面切入。²⁸向陽也指出由於日治散文所帶出的散文傳統，「多的是剛強、批判、思辨以及從知識與實踐出發

²³楊牧，《失去的樂土》；鄭明嫻，《現代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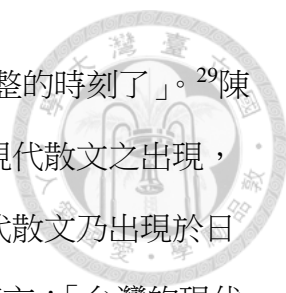
²⁴楊牧，《失去的樂土》，頁 106。

²⁵例如明明是要談臺灣的現代散文中的感性散文，卻上接漢代司馬遷、唐宋八大家、五四新文學至臺灣近幾十年來的創作現象為一討論脈絡。鄭明嫻，《現代散文》，頁 11。

²⁶鄭明嫻，《現代散文》，頁 2。

²⁷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臺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11 卷 12 期（1995），頁 148—157。

²⁸陳芳明，〈以擦亮每一顆文字刷新歷史——《九十三年散文選》序〉，陳芳明主編《九十三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頁 11。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頁 33。



的作品」，故認為歷來的散文源流說法「說不定也到了有必要調整的時刻了」。²⁹陳建忠亦主張臺灣日治時期固有的散文傳統的說法，認為「台灣現代散文之出現，更直接相關的是其特殊的時代與文學語境，也就是說，台灣現代散文乃出現於日本殖民時期，有其具備獨特風貌的散文傳統。」³⁰而陳萬益更直言：「台灣的現代散文——相對於古典的文言文，使用接近口頭語言的白話——大概在一九二〇年左右產生。」³¹且依照陳萬益編選的《國民文選》所選擇的戰前作家只有日治作家而無五四作家的標準來看，他更是只強調了日治時期這一個脈絡。本論文接受晚近對於臺灣現代散文源流的說法，並進一步予以擴充，涵蓋臺灣、中國五四、日本三大脈絡，並認為日治時期亦是這三大散文脈絡的匯合之所在，本論文對此將會深入說明。

二、美文傳統、五〇年代散文書寫相關前行研究

關於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的個別討論為數眾多，然而專以五〇年代的散文書寫現象以及從之發展的美文傳統的前行研究，則可以許珮馨《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³²、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³³、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³⁴為代表。

許珮馨《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將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定義成「閩秀散文」，並將各家的閩秀散文，如琦君、張秀亞、艾雯、徐鍾珮等人的作品進行分別與比較，並且說明女作家們的各自出身以及與五四散文家的承繼關係，將「五四→臺灣戰後」的小品美文系譜拉得相當清楚。承繼關係之外，張瑞芬《臺灣當

²⁹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第一部）》，頁 20-21。


³⁰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頁 193。

³¹陳萬益選編，《國民文選·散文卷 I》（臺北：玉山社，2004），頁 11。

³²許珮馨，《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³³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³⁴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



代女性散文史論》則是以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為首，專論臺灣半世紀（1949-2005）的女性散文史。在許珮馨的論文可以看到五〇年代散文書寫的承繼性，在張瑞芬的討論中則是能夠見到五〇年代散文書寫向下發展的清楚脈絡。就五〇年代散文書寫來說，張瑞芬論述了女性所寫作的美文之書寫美學、創作位置以及文學史意義，有意與男性霸權，並以小說為主的文學史觀來作積極的對話。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一文，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她點出了看似與國民政府反共抗俄的意識形態無關的美文書寫，為何能夠蓬勃發展並且廣受歡迎的原因。王鈺婷認為美文也是一種被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所發明的傳統，而之所以選擇美文，其實背後與官方的意識形態有潛在的協力關係。王鈺婷並且指出，五〇年代被發明的美文，其來源其實是五四傳統的選擇性傳承，僅選擇了五四文學當中不具攻擊性和顛覆性的作品，而構成之後主流美學的基調。以上，三位論者所建構的戰後美文研究，將如何與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進行對話，是本論文的關心所在。此外，三位論者不約而同地皆將臺灣女性散文史操作成以五〇年代為濫觴的論述，也是筆者要以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為對話的前行研究對象。

三、日治時期散文作家作品相關前行研究

（一）、文學史著作

此部分先以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這三本相關著作，觀察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在臺灣文學史當中被論述的情形。

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是臺灣文學史的開山之作，此書將日治臺灣新文學分成三個階段，搖籃期、成熟期、戰爭期，其中搖籃期便是以賴和的散文〈無

題〉為結束，認為這篇散文「預告了台灣新文學界的開花結果的日子將會到來」、「有濃厚的現代人意識的陰翳」³⁵。然而賴和的另外一篇著名的散文〈前進〉，在書中卻只被與小說〈一桿「稱仔」〉、〈蛇先生〉等同列為經典之作，不見討論。而除了賴和之外，葉石濤所討論的有關日治時期的散文比例甚少，主要仍是以小說為重。

同樣的論述情形亦見於《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彭瑞金認為：

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家幾乎沒有一位和政治運動撇得清關係……最重要的是幾乎沒有一篇作品能脫離跳開這個大運動的軌跡。小說如是，詩、散文、戲劇，甚至文藝理論都在運動的氛圍之中。³⁶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彭瑞金並沒有忽略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存在，然而書中多是小說作品的討論，散文則不為重視。

前述被葉石濤一筆帶過的賴和〈前進〉，陳芳明歷時十二年寫成的《台灣新文學史》，則仔細分析了這篇作品的修辭技巧、意象使用、文章結構、文字節奏，認為〈前進〉「使用白話文的成熟程度，幾乎不是同時代作家所能望其項背。即使將之置放在同時期中國新文學作家之中，也是毫不遜色」，又說文章「那種奔馳放膽的想像，簡直可以睥睨同時期的任何華文作家」，³⁷給予了此篇高度的評價。陳芳明認為賴和能夠被尊崇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不是偶然，「無論是從小說、散文、詩的各種文體來看，賴和的地位都是非常傑出的」、「如果說，日據時期沒有賴和，就沒有現代小說、現代散文的出現，這應是不致過於誇張的說法。」³⁸然而，書中所討論的日治時期文學，仍以小說、新詩為重，散文的部分除了賴和以外就幾乎不見討論。

³⁵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頁 34。

³⁶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頁 17。

³⁷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 81、82。

³⁸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84、87



(二)、單篇論文

截至目前為止，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仍是此領域最重要的參考論文，不但討論的文本眾多，包含的面相亦相當廣泛。這篇論文是從「散文語言問題談到問題散文，後略述社會觀察、人生探索、本地外地經驗，個己情愫、他人生活和女性散文。」³⁹散文語言包括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日文等等，語言問題之後，也就是從問題散文開始，許達然談的是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類型問題，並援引 Raymond Williams 的感覺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指出日治散文無論是在語言使用或是內容題材上都貼合時代氛圍，並反映當時社會情境。這一方面示範了如何使用西方文學文化理論來作散文研究，另一方面，對比被認為僅書寫作者內心世界，與社會脫節的戰後美文，這正突出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反映時代的一大特色。許達然並認為日治時期寫得最好的一篇散文是賴和的〈前進〉，並在文中專論賴和的散文成就，是一篇既有概述又有個案研究的散文論文。

至於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是繼〈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之後另一篇重要的日治散文論文。陳建忠以許達然的研究為基礎，藉由賴和散文的個案研究，進一步深化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貼合時代、社會的論點。有意思的地方是，陳建忠藉由日治散文與小說、新詩的比較，提出了下列的觀點：

台灣散文的較大開創應該還是「抒情傳統」的建立，因為小說與新詩在反殖民的旗幟下都有較偏知性的傾向，習慣關於反殖民議題的『大敘述』的書寫（雖然台灣論述基本上是被壓抑的）；散文則因為較為「個人化」與具有「隨意性」，無形中可以看到作者較為抒情、私密的一面。⁴⁰

³⁹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

⁴⁰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7。



所謂的「開創」是建立在共時性觀察上的說法，但放在歷時性的散文研究上也相當具有議題性。此處的「抒情傳統」如何與王鈺婷指出的五〇年代散文的「抒情傳統」來並置思考？這牽涉到的是散文觀念與創作美學的問題，那麼，與戰後的對話之外，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抒情」，其「傳統」又為何？是來自五四文學、日本文學或是臺灣古典散文？這些問題亦會一併放置到本論文第二章來作處理。

四、山岳紀行文學、自然寫作相關前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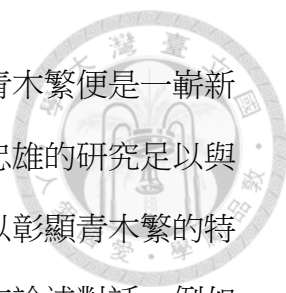
由於本論文注意到在臺日本作家的散文創作，故也會對此議題的相關研究進行考察。這部分的相關研究多以當時的臺灣山岳紀行文學為主，而學界目前對於這塊領域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鹿野忠雄身上，如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寫〉、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林瑾君《鹿野忠雄の台湾山岳行脚：高校と大学時代の高山紀行文を中心に》。吳福助是第一個站在文學立場，徹底剖析鹿野忠雄寫作技巧的學者，⁴¹將論述焦點集中在《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登山者人物心理刻劃。吳福助並且認為《山、雲與蕃人》提供了一個起點，期待建構出完整的「臺灣自然生態文學史」。⁴²高麗靜的碩士論文則是吳福助論文的深化，討論《山、雲與蕃人》的成書背景、科學紀錄、文學技巧、原住民書寫、生態保育意識等等。⁴³至於林瑾君則將論述視野擴大到鹿野忠雄的整個生平事蹟與寫作，自台北高等學校時期談到現今日本國內與鹿野研究相關的機構。⁴⁴而設若學界將在臺日人所寫作

⁴¹楊南郡，〈特約討論〉，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頁 89。

⁴²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同上註，頁 82。

⁴³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5）。

⁴⁴林瑾君，《鹿野忠雄の台湾山岳行脚：高校と大学時代の高山紀行文を中心に》（私立東吳大學日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品納入臺灣自然生態文學史之脈絡來談，則本論文所要處理的青木繁便是一嶄新的個案，目前尚無人進行作家作品研究，但是前行者對於鹿野忠雄的研究足以與青木繁的各種自然寫作（包含高山紀行散文）進行比較分析，以彰顯青木繁的特色，並豐富日治時期自然寫作的相關研究，來與戰後的自然寫作論述對話，例如簡義明《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以 1981~1997 為範圍》⁴⁵與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都認為臺灣的自然寫作／書寫大致是從八〇年代始。而以吳明益為例，他將鹿野忠雄等人的作品列入「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⁴⁶，這涉及到的是自然寫作的定義問題，當論者以八〇年代以後的自然寫作為標準，即容易將八〇年代以前的相關作品視為「前史」；但在此，本論文則取吳福助的說法，「臺灣自然生態文學史」的脈絡應該拉得更早更長更為完整，因此本論文將青木繁及鹿野忠雄等紀行文學作家視作臺灣自然寫作的「先聲」，用意即如同吳福助所謂的「起點」，並以此為一證，建構從日治到戰後的散文脈絡。

第四節、章節架構

本論文共以六個章節構成，除第一章緒論與第六章結論外，茲將各章列舉及概要說明如下：

第二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觀念的承繼與發展

第一節 日治時期臺灣古典、現代散文觀

第二節 五四現代散文觀及其影響

第三節 日本近現代隨筆觀及其影響

⁴⁵簡義明，《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以 1981~1997 為範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⁴⁶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臺北：夏日出版社，2011），頁 177-186。



第三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的重探與剖析

第一節 現有分類評析

第二節 日治報刊雜誌的散文欄位分類

第四章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的文類源流意義

第一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創作概述

第二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個案研究：青木繁的自然書寫

第五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非美文」傳統


第一節 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精神

第二節 書寫社會、民眾之聲：《臺灣民報》「問題散文」

第三節 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文學史斷裂

在第一章緒論提出本論文問題意識以及相關研究範疇、方法、前行回顧之後，即分別從文類觀、類型、源流意義三個大項著手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並時以戰後「美文傳統」為論文間接或直接的對話者。首先，第二章要分析的是日治時期的文藝評論對於散文的討論，藉以釐清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散文觀念之可能承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主要的可能來源有三，一是日治時期臺灣本身的古典散文觀，二是中國五四新文學的散文觀，第三則是日本近現代的隨筆觀。臺灣本地的古典散文在文學史順序上直接接續了現代散文，且由於臺灣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以及舊文人與新文人之間在當時並非截然二分的存在，若干古典文學更可被視為現代文學出現前的過渡寫作。⁴⁷因此，古典文人的散文、隨筆觀念，是否有能

⁴⁷此一觀點可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



促成現代散文觀念轉化生成的資源，是這一章節所要觀察之處。其次，五四的散文混有明清小品以及西洋 Essay 的影響，各式各樣的散文創作輩出，各家對於散文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散文」作為一種整體的概念，諸如周作人、郁達夫、魯迅、葉聖陶、朱自清、唐弢……都曾為之定義，甚或相互批評。且同樣是「散文」，談「美文」者有之、談「小品」者有之、談「絮語散文」者有之、談「雜文」者有之、談「隨筆」者有之，而談「散文」者有之，對於散文的討論可謂百家爭鳴。本論文則是要重新思考五四對於臺灣現代散文的影響，側重於實際的影響接受，故會先理出「小品文」與「雜文」這二個五四思考現代散文的最主要思路，並以徐坤泉、周定山為例，指出相較於戰後，日治時期對於五四的較為多元的接受。

另一個需要對照的重點則是日本的近現代散文觀念，在日本文學當中，「散文」通常不作為一種文類命名，而是指涉一種「非韻文」的概念，故而包含小說等文類。作為一種文類名稱的是「隨筆」，日治時期有大量在臺日人創作隨筆，他們的散文觀自不會從五四而來，而是承繼其自身的日本文學隨筆的傳統，故則這部分的討論相當重要，有助於思考臺灣現代散文在五四之外的另一重要脈絡。

在進行散文的觀念探討之後，本論文第三章嘗試重探與剖析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類型論問題。王鈺婷曾經指出散文因為類型鬆散而造成難以定位的困擾，⁴⁸游喚亦認為散文的分類是無止境、無可規範的，⁴⁹但事實上，無論是研究戰後或是日治的散文論者，都常以分類作為研究方法之一。如許達然就將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分成問題散文、社會觀察、人生探索、本地外地經驗，個己情愫、他人生活，和女性散文幾個大類。⁵⁰陳建忠則是分成論述散文、知性散文、抒情散文、雜感、雜文、隨筆等幾個項目。⁵¹本論文將實際進入二人的分類研究中，並更進一步為二人論文中所呈現的各種可能的日治散文類型進行分類，大致可整理出「語言類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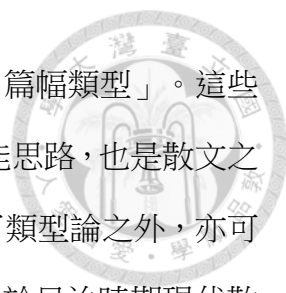
北：麥田出版社，2004)。

⁴⁸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頁 16。

⁴⁹楊錦郁紀錄，〈「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之五〉，《文訊》第 32 期（1987.10），頁 148。

⁵⁰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


⁵¹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6-197。



能類型」、「內容類型」、「表現類型」、「作者類型」以及「篇幅類型」。這些類型是許達然與陳建忠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指出的可能思路，也是散文之為散文，在其文類特質上所表現出來的幾個重要面相，因此除了類型論之外，亦可以視作是增進了日治散文認識論的研究成果。只不過如果要將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認識輪廓予以勾勒得更為清楚的話，當時的散文作者、雜誌編輯等等是如何為散文分類的這一點亦相當重要。故本論文第三章除了討論現有研究分類之外，並側重於觀察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相關的散文欄位，試圖回歸文學史現場，整理出當時的分類情況，以求做為臺灣現代散文源流之一的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分類能夠因此而面目更加清晰，提供未來在思索日治散文分類時的基礎資源。

本論文自第四章開始進入正式的文本分析研究。第一節先針對前行研究者較少涉及的日治時期日文隨筆進行綜觀概述，日治時期的日文隨筆寫作群龐大，橫跨臺日，但本章因限於篇幅，以及考量到日人作者的日文隨筆至今仍未為人所關注的這一點，故選擇以在臺日人的隨筆作品討論為主。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日文隨筆創作，其特色是有很多非文學專業的作者，以《臺灣日日新報》的檢索結果為例，作家之外，執筆者尚有民俗學者、林務課長、醫學博士、理學博士、農業大學教授、公學校學生、臺大文政學部講師、商工獎勵館長、商人、臺北二中教諭、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劇作家、警務局保安課翻譯官、童謠詩人、臺北帝大教授、文藝家、辯護士（律師）、臺北帝大圖書館司書官、米國領事館通譯官、獸醫、畫家、高等法院覆審部部長、實業家、電力會社電器部長、音樂家、郵便局局長、軍人等等。這麼多的作者身分隨之帶出及反映的是寫作題材的多元以及發表場域的豐富，這是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不同於當時小說、新詩的特殊之處，不僅過去討論在臺日人的文學研究未曾注意，即便是放在整個臺灣現代散文史來看，也是相當特別的。

第二節則是進行個案研究。在眾多的隨筆作者當中選擇青木繁，是因為他是這一群隨筆作者中，創作數量較多的一位，並且具有高度的隨筆創作自覺，不但




多在《台灣日日新報》以及各期刊發表隨筆，並且結集出版，共有《森林生活者の手記》、《山·林·人》等書。青木繁為森林學專家，曾經擔任過臺北帝大農林部助教授以及新竹州林務課長，是當時臺灣山林的第一線人物。業餘之時書寫大量隨筆，主要是他對山林的觀察以及自然的體悟，亦留下書寫原住民的文字以及山岳紀行散文，可與當時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等人的紀行文學做一參照，並可結合來談日治時期自然書寫的議題，足以與戰後散文的自然書寫對話。青木繁另著有〈森林文藝に就て〉這一篇論文，討論森林文藝的議題。青木繁對於自然文藝的創作與論述並行，且如今尚未為臺文學界所知，故有其研究的必要性與價值性。

本論文第五章試圖與現階段學界論臺灣散文發展時所側重的美文傳統開展積極的對話，對於個人的、抒情的，或是閨秀的女性散文在散文史中所形成的美文傳統，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加入能夠重構臺灣現代散文的類型版圖以及對於書寫範式的討論，也能夠幫助重新思考臺灣散文的「傳統」，亦即文學史典律的問題。

五〇年代的美文作家僅繼承了五四散文的小品一支，對於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脈絡則予以棄絕，這不僅是影響論的問題，更是書寫範式的典律選擇。易言之，臺灣戰後的美文傳統排除了不抒情、不婉約的「非美文」。然而，「非美文」正是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一大傳統。本章即以日治時期散文當中與「美文傳統」較具有分辨差異性的「非美文」傳統進行探討，以「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性格」、「書寫社會、關懷現實：《臺灣民報》散文」、「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文學史斷裂」三小節，彰顯建構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非美文」性格。

第一節討論周定山的散文。周定山的散文充滿戰鬥與批判的精神，是日治時期的「非美文」傳統中相當典型的作家，針對當時影響臺灣社會甚深的「階級」與「迷信」問題，周定山有深刻的觀察與體認，並藉由散文予以強力批判。第二節則是處理在《臺灣民報》系列刊載的散文，這些散文不以抒發自我情感為主調，而將關懷的眼光放到臺灣社會上，對於社會現實有同情而深刻的觀察，涉世、入



世的成分相當高，且數量龐大，是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書寫主流與特色之一。其次，《臺灣民報》並不僅刊載為社會民眾發聲的散文，「不平鳴」專欄的設立也使得一般民眾能以散文為自己或是自己所關心在意的切身問題予以發聲，使得書寫社會的日治散文因此更有意義。

第三節則將研究視角轉向日治時期的女性散文，從日治到戰後，臺灣文學產生劇烈的秩序變化與典律重組，原有的殖民地文學受到中國文學強勢引進的衝擊，彼此之間的連結、斷裂與嫁接關係，相當耐人尋味。就女性散文的脈絡而言，這樣的文學史關係是「斷裂」的，本章節即以「文學場域」與「書寫範式」作為研究路徑，針對二造之間的「斷裂」進行考察，並論證在場域變遷與範式轉移的情況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實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而在文學史銜接上產生了斷裂。然而，「斷裂」一方面象徵二造關係，另一方面卻亦意味著二造之存有，因而斷裂的意義並不只在斷裂。筆者透過斷裂試圖彰顯出的是本論文嘗試建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之文學史位置，並因此促進臺灣現代散文典律重構的潛在用意。

第二章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觀念的多元承繼



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於 1920 年代左右出現，這與臺灣新文學運動開始運作的時間點相吻合，甚至還可能是在諸多文類中最先轉化成形的一支。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生，首先來自於有識之士的提倡，如陳炳堃〈文學與職務〉、甘文芳〈實社會と文學〉、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等等，皆是處在臺灣新文學發端的重要篇章，而這些篇章自然是以散文的形式書寫而成的。在文學改革意見的主張抑或是理論的提倡上，能夠直接表情達意、議論說明的散文，在書寫直覺上是最會被率先採用的文類。

然而，這些觸發臺灣新文學的相關言論，也往往會被牽連出一條五四的影響脈絡，「形塑了臺灣新文學是在受到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刺激影響後才真正產生的主要解釋框架」。⁵²如黃得時便指出黃朝琴與黃呈聰是在考察中國、目睹五四運動之後，才寫下〈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漢文改革論〉二篇文章，以此說明五四對於臺灣新文學的影響。⁵³只不過，臺灣文學當中的五四影響程度仍有待商榷，⁵⁴五四也不應且不會是臺灣新文學上承下啟的唯一脈絡。黃得時〈五四與臺灣新文學〉一文雖以五四影響論為主題，卻不忘於文末註明「臺灣新文學的源流有二：一是來自祖國的五四運動，一是來自日本的現代文學」。⁵⁵五四對於臺灣新文學的刺激與影響雖是事實，但影響程度的多寡卻是隨著論述的需求與目的而改變

⁵²黃美娥，〈迎向現代——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一八九五—一九二四）〉，《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32。

⁵³黃得時，〈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頁 573-574。

⁵⁴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60。

⁵⁵黃得時，〈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頁 576。

的。易言之，五四影響論是論述策略及操作的問題，而不是真實存在與否的問題。有鑑於此，筆者在藉由現代散文觀念的討論，構思形成臺灣現代散文源流的日治時期的可能承繼脈絡時，便不被固有的五四框架所限，而是試圖彰顯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多元／多源性格。

其實由上述提及的數篇提倡新文學的篇章，便可以體察出一元論框架的詮釋性問題。以黃呈聰黃朝琴為例，二人雖受到五四刺激，但是二人皆是留日背景，訪中行程僅是一段短暫的遊覽經驗，〈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漢文改革論〉也皆在日本書寫與發表。⁵⁶而甘文芳〈實社會と文學〉則是用日文寫成。至於，時間最早的〈文學與職務〉及同年發表的〈日用文鼓吹論〉則以文言文體書寫而成，以古典的形式承載新的言論主張。日治時期，尤其是新文學的成立初期，勢必是一個混雜而多元的年代，不同的論者挾其不同的文化資源投入臺灣新文學的創造，實難被一元論述所壟斷，而現代散文的誕生在這樣的衝擊下亦可理出複雜的承繼管道。誠如黃得時的意見，考察日治新文學的源流時，除了五四新文學之外，日本新文學的影響亦難以忽略，畢竟，存在著大量日文作品的日治臺灣文學，若僅上承五四脈絡，未免是牽強之舉。此外，黃美娥的研究也提醒了學界，過去思考臺灣文學史時易被忽略或是被打壓的臺灣古典文學，實是不可或缺的文學史重要組成；臺灣在邁入新文學的過程中，舊文學的肆應、轉變及催化作用實難以抹滅。⁵⁷而散文之為文類，即在古典文學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古典散文觀的面貌如何？與時俱進來到現代之後，是否能提供轉化生成為現代散文的資源？是筆者關注的重點之一。又由於臺灣古典在時間空間上才真正符合本地文學史的發展時序，故是本節首要論述的對象，其次才是進到五四現代散文觀的討論。對此，筆者擬先釐清「雜文」與「小品文」在文類名稱與實際應用上的複雜現象，連帶指出五四現代散文觀的三大路線，之後再藉由徐坤泉與周定山等人的討論，探討五四對

⁵⁶黃得時，〈五四對臺灣文學的影響〉，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頁 614。

⁵⁷對此，請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一書詳盡而包含面極廣的討論。



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觀的可能影響。最後則是處理日本近現代隨筆觀，以及日本近現代文類觀當中的隨筆位置，藉此與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特別是日本語文學當中所呈現的隨筆觀做一參照。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本章雖以「散文觀」為題，但由於時代用法不同，「散文」或為「古文」、或為「隨筆」、或為「小品」、或為「雜文」，⁵⁸在不同的語境脈絡中所呈顯的文類名稱便不盡相同，當中有一些複雜的面貌，但以「散文」的觀點出發，這些稱謂及其相關討論，卻都不失為一種對於「散文」的想法，這些情形在以下各節的討論中亦會加以說明。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古典散文觀及其現代肆應

本節以《全臺文》的整理文獻為主要的論述材料，探討自清代至日治時期古典文學中的散文觀。只是必須要先說明的是，在這一段期間內，古典文人對於「散文」的討論多以「古文」或是「文」做為認知、指涉該文類的名稱，⁵⁹偶或提及「散文」。關於這一點，吳子光的二則文論可供參考：

余閱有正味齋全集，亦惟詩及駢體文為最工，若古文則寥寥罕觀焉。甚矣，兼才之難也。⁶⁰

文體惟書為最古。徐伯魯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有辭

⁵⁸「散文」做為該文類的定稱，應要等到戰後才慢慢確立下來，根據許達然的研究，日治時期雖然也有「散文」的用法，但大部分以「隨筆」及「小品」居多。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4。而五四時期則主要是「小品」與「雜文」的論爭，散文一詞亦尚未具有較為完整的統稱性。至於日本文學則多以「隨筆」稱之，偶有「小品」或是「雜文」的用法。對此，本章第二、三節會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⁵⁹這部分可舉例者甚多，如「述言初學古文於梅崖先生，而得其矜慎，然所志在力行，所為文獨本于學術之正。」謝金鑾，〈官志齋文鈔序〉，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臺中，文叢閣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 79。

⁶⁰吳子光，〈附論文數則〉，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頁 18。

令、議論二體，夫辭令即駢文是也，議論即散文是也。⁶¹



在〈附論文數則〉中，「古文」的出現是相對於詩及駢體文而論的，而在〈書上〉當中，「散文」亦是相對於駢文而出現。就一般而言，在字詞的比類上，「古文」較之「散文」多了一分載道的意味，但在此處，「古文」與「散文」基本上是同樣的意義，指涉相對於韻文或是注重句式排比對偶的駢體文的一種文類。然而，吳子光的文論所觸及到的是一種藉由相對概念而生的文類義界，而不是對於古文／散文應該如何、可以如何、實是如何等等的看法，換言之，並非是一種散文觀的體現。縱觀《全臺文》中收錄的文本資料，臺灣文人在論述古典散文觀時，主要仍是使用「古文」或「文」，而罕用「散文」進行討論。

在清代臺灣文學中，有關於古典散文觀的討論並不多見，但謝金鑾與鄭兼才二人分別有論，恰恰勾勒出了臺灣古典散文觀的二個重要面相：

夫文者，性行之著也，而學輔焉。故論其本，則性行優者，文從而優；性行絀者，文從以絀……觀其文其人，如見其性情，志趨可識也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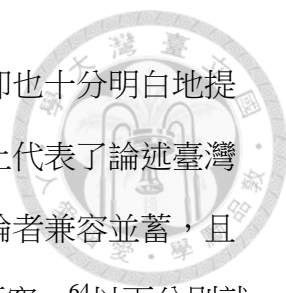
文上者載道，次載事⁶³

若據謝金鑾的意見，所謂「文」者乃是作者性行的反應，而作者本身的學力亦可以對作者的「文」有所幫助。作者性情的優劣，則會影響到文章的好壞，而反過來思考，讀者亦可藉由該文得知作者的性情與志趣。謝金鑾在此利用作者的創作、作品的呈現、讀者的閱讀，這三個構成「文學」的重要因素來討論古典散文觀，主張「人」與「文」之間的密切關聯。而觀諸「故論其本」一句，謝金鑾甚至認

⁶¹吳子光，〈書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頁19。

⁶²謝金鑾，〈官志齋文鈔序〉，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頁79。

⁶³鄭兼才，〈宜居集自序〉，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冊，頁3。



定那就是古典散文的核心本質。至於鄭兼才的意見雖然簡單，卻也十分明白地提倡了「文以載道」的觀念。謝金鑾與鄭兼才二人的說法，基本上代表了論述臺灣古典散文觀的二條思路，這二條思路並非全然無有交集，有些論者兼容並蓄，且察其底蘊，散文應該反映作者個人或是必須載道，或許並不相衝突。⁶⁴以下分別就更多的文本材料進行討論。

上引謝金鑾的看法中，「學」亦是足以影響「文」之一環，這是因為倘若強調「文」由「人」所造，因此反映人之性情，那麼人之所以為人，自然也包含了其人的學問、學力、學識等等，故而「學」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況且，下筆為文，動用的是心思腦力，倘若學力甚低，自難成章。這個觀點一直到日治時期仍然有所延續，如陳景初便言「夫文之優劣，半由學力，半由天資。才高者易於馳騁，學淺者莫測津涯」。⁶⁵只不過，謝金鑾與陳景初的說法所側重者有所不同，前者雖然提到「而學輔焉」，但仍將重點放在人的「性行」，而後者則是聚焦於作者運筆行文的「才資」。然而，無論是「性行」或是「才資」，二者在思考散文時，重視的都是作者個人，「性行」與「才資」僅是體現了組成「個人」的不同面相。

由於「文」的優劣好壞，受到作者「性行」或「才資」的限制，故而可以推論每一個不同的作者個體寫出的散文便各異其趣。事實上，這樣的想法連帶產生出的影響是，臺灣古典文人對於散文獨特性的重視：

文章須自成一家風骨，前人有是說。夫文推韓、詩推杜，固也。然使執筆時，無刻無一韓一杜留于心目中，將置己身何地？是尚足與言家數耶！⁶⁶

關於這一點，上述吳子光「文章須自成一家風骨」一句便表達得相當清楚。所謂「文推韓、詩推杜」，意指作者需要有鑑賞的眼光，懂得在散文或詩歌創作的領域

⁶⁴有關古文言志與載道的交融，可參考柯慶明的討論。柯慶明，〈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二版），頁 351-375。

⁶⁵陳景初，〈崇文社文集序（六）〉，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 13。

⁶⁶吳子光，〈附論文數則〉，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頁 17。

中，誰才是真正的大家，除此之外，亦蘊含推崇尊敬，甚至是學習效仿的意味。只是，等到真正執筆為文之際，卻不可時時存效仿之意、處處步前人文思。既然散文是作者個人的體現，那麼個體的特別性，亦是創作散文的要求，倘若「己身」不存，沒有作者個人的獨創性，「一家風骨」也就無從樹立。同樣的，盧芳型亦認為「欲以己之文，摹他人之文，而去文又愈遠耳」⁶⁷，倘若沒有「己」的獨特性，遑論「一家風骨」，就連「文」也可以說是不成立的。而類似的觀點，亦可見於吳德功〈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一文：

夫為文之道，雖不拘成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⁶⁸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一句典出《周易·繫辭》，吳德功在此用來指涉「為文之道」。散文在形式上並無要求，不存在句式、韻律的規則，故而沒有「成法」。因此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散文因無規則可循，反而難作。吳德功此言，背後體現的亦是「文」與「人」之間的密切性。吳子光與盧芳型強調「文」若要足以成為一家風骨，足以成為「文」，那麼作者「個人」的獨特性就相當重要。吳德功則是主張為「文」之道，亦是要憑靠各「人」的領會。在這樣的說法下，「人」（作者）即是「文」（作品）成敗與否，甚至是成立與否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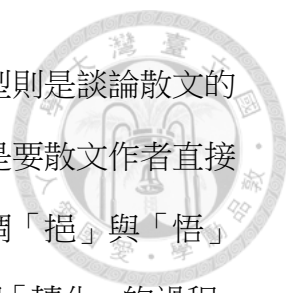
針對「文」與「人」之間的關係，盧芳型〈文論〉的另一則說法亦相當值得注意：

世聞〔案：疑為「世間」之誤〕無處非文章，而在吾有物可以挹之。舞劍悟書、擊竹悟道、見兔悟卦，彼所得豈在劍與竹、與兔哉？⁶⁹

⁶⁷盧芳型，〈文論〉，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頁197。

⁶⁸吳德功，〈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七冊，頁79。

⁶⁹盧芳型，〈文論〉，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頁197。



吳子光論述散文的獨創性，吳德功討論散文的寫作方法，盧芳型則是談論散文的內容與書寫對象。世間萬物，自然皆可入文，然而盧芳型卻不是要散文作者直接搬移使用，而是以透過劍、竹、兔而能悟書、道、卦為喻，強調「挹」與「悟」的重要性，認為散文作者將世間萬物做為文章題材時，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在此，「挹」可以視作轉化的動作本身，而「悟」即是形容轉化成功的狀態。而世間萬物如何能夠轉化為文？即是需要透過作者「吾」的中介。可以說，盧芳型藉由散文書寫對象的討論，同時也強化了在散文創作中，作者個人的重要性。⁷⁰

以上是針對「觀其文其人，如見其性情」之古典散文觀的討論，就筆者的觀察來說，對於這一個面相的討論，在數量上而言，並不亞於「文以載道」的部分。又通常提出「人」與「文」之間具有密切關係的散文觀的論者，並不會在刻意強調「文以載道」的部分，但這並不代表二者是不能兼容的。事實上，在黃溥造對於「文」的討論中，這二個面相就是同時出現的：

人以情理立言，因事百變，故觀於其文，而人之心象印焉。

故夫文章者，政治得失之林，教化之隆污繫焉。⁷¹

觀於其文，而能得知其人心象，這一點即是散文是作者個人反映的立論。而文章之所以能夠與政治得失、教化隆污息息相關，即反映了論者將「文」與「道」結合而觀的思想。因此，散文是作者個人的呈顯，而作者個人以及文章所彰顯出的思想體系，則又不妨是符合「道」的標準的。

在談論臺灣古典散文中「文以載道」的散文觀時，則亦須借鏡始於中國唐代

⁷⁰除了上述諸例，日治時期來臺活動的著名日本漢文人中村櫻溪，在談論自身散文創作時，亦認為其文足以反映其人：「然生遭太平之運，優游消磨，以此為命，喜怒窘窮，憂悲愉佚，無聊不平，大率假此以發焉。心血所注，何遽忍棄，非敢曰傳之天下後世，亦徒言其志耳。不知我者，固笑無愚矣。有知我者，其或哀於吾言於歟」。中村櫻溪，〈自題文卷〉，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十四冊，頁 150。

⁷¹黃溥造，〈崇文社文集序（四）〉，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 10。

的古文運動，根據上述吳子光所提出的「文推韓」一語，便可知臺灣文人創作的古文，所尊崇的典律範式即是推行古文運動的韓愈等人，吳德功亦云「今世之言古文者，以唐宋八大家為法瓊乎，尚矣」。⁷²韓愈、柳宗元等人之所以提倡「古文」，便是要維護「道統」，其實際內容為何？即是排斥佛老，重建儒學的正統地位。⁷³故「道」者，「儒」也；「道統」者，儒家正統也。關於這一點，吳子光〈附論文數則〉一文中亦有類似的論述：

予性近香山一派，愛佛而不佞佛，偶涉莊老家言，見其詞旨，元遠不落功利，恆蹊是之取爾，亦由結習使然。或作小文猶可，若論文章正軌，自有吾儒真風格存焉，奚煩問道於盲夫也。⁷⁴

韓、柳等人的基本立場雖然排斥佛老，但其思想觀念並非對佛老採取全然拒絕的態度，在老莊思想方面，以韓愈的〈天說〉為例，誠如柯慶明所言，該文「在基本觀念上近於《莊子》〈應帝王〉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⁷⁵至於佛教方面，田啟文借用清代王葆心《古文辭通義》的說法，指出韓愈〈羅池廟碑〉、〈與大顛書〉等文亦以雜入佛家之說。⁷⁶簡言之，在正統是儒學的前提下，佛老思想並非完全不可接受的存在。吳子光的立場，也近似這樣的態度。吳子光雖然表明愛佛，其思想體系亦有老莊的參雜，但是佛老思想僅能應用在吳子光所謂的「小文」身上，真正佔有正統地位的仍是儒家思想，一句「若論文章正軌，自有吾儒真風格存焉」，便將其立場表露無遺。「吾儒」意指吳子光本人的思想認同，而稱呼有「吾儒真風格」的文章才算是「正軌」，正是代表了吳子光「文以載道」的儒家正統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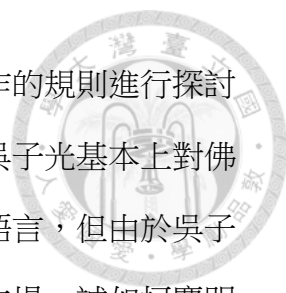
⁷²吳德功，〈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七冊，頁 79。

⁷³柯慶明，〈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中國文學的美感》，頁 351。

⁷⁴吳子光，〈附論文數則〉，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頁 15。

⁷⁵柯慶明，〈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中國文學的美感》，頁 358。

⁷⁶田啟文，〈吳子光古文理論析〉，《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43。



吳子光〈附論文數則〉是一篇針對前人加諸於古典散文寫作的規則進行探討的文章，當中有一條便是反省所謂「禪語不能入文」的限制。吳子光基本上對佛老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認為在「小文」中不妨有些佛老的思想語言，但由於吳子光本身仍是儒家基底，故最後仍回到道統（儒）即文統的基本立場。誠如柯慶明的意見，唐代的古文運動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試圖讓儒家恢復正統的文化重整運動。⁷⁷當正統受到動搖，當文已不能載道，古文運動或是「文以載道」的主張才會應運而生。吳子光的討論是在一個特定的框架下產生的，而非遭逢時代動盪的反應，「文以載道」的散文觀，如鄭兼才的論述方式，基本上是將此觀念認定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在邁入西學東漸，由前現代轉向現代的時代驟變之前，「文以載道」都是不辯自明的存在，可以說是一種既有的觀念與文論套語。也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臺灣古典文人對「文以載道」討論得最為熱烈的時候，便是舊學已逐漸顯露弊端，古典文學秩序受到新文學的挑戰，而日本殖民政府又挾帶西方現代性衝擊而來的日治時期。

最早站在臺灣文學改革立場的前鋒雖屬陳炳、黃朝琴等人，但實際上貢獻最多言論、引發最多爭議的則屬張我軍。張我軍的文學主張，除了提倡捨文言而就白話的文體改革之外，主要是要拆下「舊文學的殿堂」⁷⁸，以「舊文學」作為主要的抨擊對象。然而，張我軍所謂的「舊文學」主要是指漢詩：

臺灣為甚麼詩社那麼多？應之者說：因為詩人太多。為什麼詩人那麼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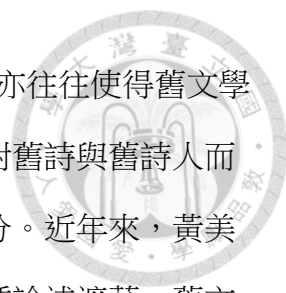
應之者說：因為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所以會詩人滿市井。⁷⁹

誠如翁聖峯之所言，日治時期臺灣舊文人存在的諸多弊端確是事實，但卻也僅是

⁷⁷柯慶明，〈從韓柳文論唐代古文運動的美學意義〉，《中國文學的美感》，頁 351。

⁷⁸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2 號，1925.01.11。

⁷⁹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2 號，1925.01.11。



整體古典文學當中的一部份，而非全貌。⁸⁰新舊文學的二元論，亦往往使得舊文學被打成鐵板一塊，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如張我軍基本上是針對舊詩與舊詩人而發論，而舊詩並不同於舊文學，而即便是舊詩，也有好壞之分。近年來，黃美娥、翁聖峯等人的著作，已經提醒新舊二元論所可能造成的種種論述遮蔽，舊文學內部的情形，理應得到更為細緻的梳理。⁸¹張我軍的意見，目的是要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而就舊文學陣營⁸²的有識之士而言，他們也相當清楚舊文學的弊端與可能面臨的挑戰，但他們的做法是試圖清除舊文學內部的毒瘤，而不是直接將古典完全從臺灣文學中排除，而以一個新的新文學來取代。值得注意的是，舊文學內部的毒瘤清除工程，便與「文以載道」的古典散文觀頗有關聯。


臺灣古典文人對於舊文學弊病的認知與張我軍有相同之處，也就是臺灣的部分舊詩與舊詩人確實對臺灣的古典文學來說是個需要改革的問題，王則修對於舊詩與舊詩人的檢討意見可為當中代表，故節錄文章雖長，茲援引如下：

嗚呼處今之世。漢學廢矣。詩學興矣。青年俊秀。多潛心於詩學之一道。而忽略於文學之一端。是豈以文為不足重。而詩為不可輕乎。抑或以文非面壁九年。不能領悟。而詩只學千百首。即可染翰操觚耶。若然是舍其難。而圖其易矣。天下惟畏難者。最不可以圖功。區區於沈約韻學之小道。而未深窺夫韓柳歐蘇之大文。撰一詩詞。學一歌曲。便翹翹然自號詩翁詩伯。及試之以作文論說。則味焉而未之聞。嘗見有詩吟李杜。詞學元白。而於箋牒簡要。語多費解。無論焉哉乎也。未能穩押得來。即反正開合。亦未能操縱如意。問其詩。則頗工也。觀其文。則甚拙也。誦其詩。則居然風雅士也。讀其文。則不啻迂腐儒也。詩與文前後若出兩人。蓋詩易而文難。

⁸⁰翁聖峯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5。

⁸¹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及翁聖峯《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二書。

⁸²此處是一個權宜的說法。



詩小而文大。詩僅五言七言。文則長篇大篇。詩之道。可解以老嫗。文之道。難精乎嘗宿。所以後學俊士。皆涉獵於詩歌。以為入門之捷徑。彼其意。蓋謂當今科舉已廢。文章可束諸高閣。而揚風扞雅。尚可歌詠昇平也。擊鉢聯吟。尚可謳歌盛世也。殊不知工於詩者。第以適性言情。工於文者。可以著書立說。善於詩者。僅為吟風弄月之用。善於文者。且為講道論德之資。況詩易流於蕩。風流才子。多釀孽債之憂。文則出以莊。學士文人。多守禮義之域。詩之不敌夫文也。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試觀古來風人騷客。有誰列入儒林傳乎。理學名儒。有誰屏諸門牆外乎。可知詩以言志。總屬小技雕蟲。文以載道。不愧朝陽鳴鳳。⁸³

早在張我軍撰文抨擊「詩翁詩伯」數年之前，⁸⁴王則修就已經對舊詩、舊詩人發起了改革之聲。首先，王則修所提的「漢學」、「詩學」、「文學」三者之間的辯證相當值得玩味。從「是豈以文為不足重。而詩為不可輕乎」一句可以判斷，王則修所謂的「文學」不是一種包含詩、小說、散文等等的統籌概念，亦非是做傳統「文化」的同義指涉，乃是指相對於詩的古文之學。可以這麼說，「漢學」才是王則修對於「古典文學」，甚至是擴及到「傳統文化」的總稱，而「漢學」之下，而又分成「詩學」（詩之學）與「文學」（文之學）。在「漢學廢矣」之際，「詩學」如何能夠興盛？「詩學」之所以興盛，乃是因為時人認為學詩較於學文簡單，「所以後學俊士。皆涉獵於詩歌。以為入門之捷徑」，所謂「入門」，即入古典文學之門。對此，心水亦云：

改隸後。新學諸少年受三部新報所鼓吹。喜學韻語近體詩。多能口占而成。遂致全島吟社林立。遐陬僻壤。多聞苦吟聲也。詩之一道。於此可推極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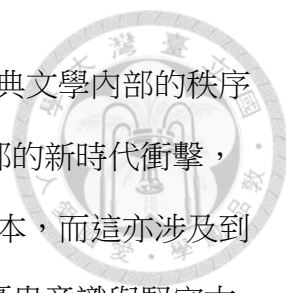
⁸³王則修，〈詩與文孰重論〉，《臺灣文藝叢誌》第1年第12號，1919.12.30。

⁸⁴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第2卷第7號，1924.04.21。



「多能口占而成」實點出了「詩學興矣」的盛況，既然日治時期古典詩學如此發達，則又為何「漢學」會面臨存廢的危機呢？根據王則修的論述，答案很明顯地是因為「詩學」的興盛，反而造成了「文學」的凋敝。新學諸少年也好，後學俊士也罷，年輕一代的古典文人，皆以容易入門的舊詩為馬首是瞻，並且可以說是放棄了對於古典散文的創作學習，一窩蜂投向了舊詩的寫作，這就導致了王則修文中所述，臺灣古典文人能詩不能文的現象。「漢學」當中的詩文專擅比例過於懸殊，已經不僅是詩工文拙的問題，還進一步造成「人」的差異。「誦其詩。則居然風雅士也。讀其文。則不啻迂腐儒也。詩與文前後若出兩人」的差異，應非作者本人存在多重人格，並且與其說是作品反映論失效，不如說是因為古典文人對於詩文的掌握、專精度相差太大所造成的表現差異。事實上，詩文創作孰難孰易，實難定論。王則修等人所論，僅是就當時臺灣古典文壇的狀況而論。倘若古典詩歌已如王則修所謂「撰一詩詞。學一歌曲。便詡詡然自號詩翁詩伯」的情況，那麼這些詩翁詩伯能掌握多少創作詩歌的手法技能則實可存疑。倘若僅是模仿前人套語，或是依照格律而制式地填鴨字句，那麼詩歌的文字所呈顯出來的，自然不是作者內在學問涵養、性情修為的反映。這也莫怪這些作者在寫作無規則可循、無韻律可套字詞的古典散文時，其依照詩歌格式所塑造出來的風雅士表象，就會被實際的迂腐儒底質所摧毀。有鑑於此，王則修便力陳舊詩之弊，而鼓吹時人致力於古典散文的創作。而「文」何處優於詩？其中一點是「著書立說」。而「著書立說」的目的正是在於「講道論德」，且從「講道論德」的文人「多守禮義之域」的這一點來看，也多少體現了散文反映作者個人的看法。較之於終歸「雕蟲小技」的「詩」，「文」之所以能夠被推舉到「朝陽鳴鳳」的位置，正是因為「文以載道」之故。

⁸⁵心水，〈臺灣文藝叢誌發刊序〉，《臺灣文藝叢誌》第1年第2號，1919.02.10。



王則修標榜「文以載道」，排斥舊詩流弊的言論，可視為古典文學內部的秩序重整。而除了內部的問題之外，日治臺灣古典文學還更面臨外部的新時代衝擊，於此，「文以載道」的觀念再一次扮演起重振消頹漢學的重要資本，而這亦涉及到古典散文觀在新時代中的肆變。面對改變，有些文人難免生起憂患意識與堅守古典傳統之心，如連橫對於日治時期漢文的寫作語言便有所批判：

漢文不可不讀，而字義尤不可不知。而今日之臺灣之漢文，非驢非馬，莫名其妙。如酒饌也，而曰「御馳走」；支票也，而曰「小切手」。使非稍知日語者閱之將不知其所謂。故臺灣今日之漢文，可謂極弊。⁸⁶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日文成為了官方語言，再加上漢字的共享現象，日文漢字詞彙介入了臺灣人創作的語言系統，使得殖民地臺灣的漢文產生了語言混生的現象，⁸⁷可以說這也使得古典散文的創作在最基礎的語言運用上發生了改變。面對語言的衝擊，憂心的亦不只連橫一人，如許子文亦云「然則民國之白話文，俄邦之惡文化，而臺灣仍一片之淨土者，崇文社之功也」。⁸⁸連橫在意的是日文漢字詞對臺灣漢文寫作造成的衝擊，而許子文則是將民國以來的白話文視作威脅，「淨土」一詞，即強烈暗示了守成禦外的立場。

只不過，許子文再怎麼認為崇文社創造了語言運用上的「淨土」，新時代的來臨畢竟是事實，文人無法忽略時代與文學的新變，故許子文回到了尊孔的立場去應對：

由假想的而入抽象的，由抽象的而進科學的，而思想又變矣，而文勢又變矣……徵文者之苦心，固以維持孔教也，著作者之銳意，亦以維持孔教也。

⁸⁶連橫，〈詩薈餘墨〉，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十八冊，頁351。

⁸⁷陳培豐將當時臺灣的混語現象稱為「殖民地漢文」。關於這一部分的詳細討論，可參考陳培豐，《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⁸⁸許子文，〈崇文社文集序（二）〉，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5。

蓋東洋文化之發源，漢族學藝之遺產，孔教之一定成規也。現在潮流之化合，未來思想之前提，孔教之無邊變法也。⁸⁹



許子文認為崇文社的徵文者與撰文者的用意同為維持孔教，其目的是因應「孔教」現代潮流的變化與未來思想的到來。然而，思想與「文」的改變確是事實，而為了增強「文」所負載的「孔教」之有效性，許子文便提出了「孔教」的「無邊變法」來對抗如此之驟變。在此，「文」與「道」（孔教）的結合亦得到了強化。類似的思維方式亦可見於王學潛的討論：

古文亦好，白話文亦好，毋相攻擊，總以不離聖道為依歸。⁹⁰


筆者所謂類似，乃是指許子文與王學潛皆認為孔教／聖道是文人的核心價值，無論世間如何變異，皆有「道」作為最後的依歸。然而，許、王二人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待白話文的態度，前者視白話文為可能污染古典漢文淨土的存在，後者則並不排斥白話文，理由可推斷是作者相信即便是白話「文」，其核心的部分仍是與古文相通，亦即相信「文以載道」的觀念能由以文言書寫的古典散文跨到以白話創作的現代散文。

根據上述的討論，臺灣古典文人提倡「文以載道」的散文觀，是源自於古典文學內部重整的需要，以及藉之抵擋外來的新時代衝擊，除此之外，是否尚有其他原因？傳統的儒道，在已逐漸邁入現代社會的日治時期，是否具有積極性的作用？對此，陳錫如為崇文社文集所寫的序言，相當值得參考：

慨自歐風西至，美雨東來，騰湧潮流，滄桑變幻。習異學者自詡文明，守

⁸⁹許子文，〈崇文社文集序（二）〉，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3-4。

⁹⁰王學潛，〈崇文社文集序（三）〉，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9。



漢學者貽譏頑固，思想惡化，趨向歧途，無惑乎世風不古而道德淪亡，人倫有乖而心術敗壞也。彰化諸君子有見及此，為維持世道，思為補救人心計，且為異學爭鳴，防為漢學重興冀，爰創立一崇文社，按期徵課……其每期所徵之論文，皆屬當世之時事、人生之要圖，為我臺所宜設施，島民所宜勸勉者。就其事以陳其情，補其偏而救其弊，何利可興，何害宜除，綱張目舉，剴切詳明，其有裨於政治也不尠，其有益於民生也孔多。而其於綱常名教、忠孝節義之大端，則尤多所闡發焉。於以知是集之刊行，可以挽世風之日下，可以救道德之陵夷，且可以正人倫之紊常，心術之邪僻⁹¹

在陳錫如的立論中，也存在著「綱常名教、忠孝節義」與「歐風西至、美雨東來」對立的思維圖式，然而崇文社徵文，卻非以對抗新思潮為最主要目的。就陳錫如的論述而言，歐風美雨破壞了社會舊有的道德體系，導致「世風不古」且「人倫有乖」，無論是「人心」或是「社會」都隨著這股新浪潮而產生了弊端，故則「綱常名教、忠孝節義」是為了挽救世風、修復道德、扶正人倫、導正心術而服務的，有益於政治，亦有助於「民生」。「文以載道」是古典文人對於新世代的思索之後再次提出的散文觀，而其最終關懷是要落實在人民與社會身上。這樣的散文觀，不限於古典，亦可適用於現代。並且，臺灣的新文學家有不少人具有豐富古典學養，這樣的散文觀是否也會對他們造成影響？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不僅寫作古典散文，且家中藏有《崇文社文集》，⁹²同時更是崇文社的贊助者之一。⁹³倘若賴和不認同崇文社的理念作為，又怎會贊助支持？由此觀之賴和的現代散文，其散文當中所呈顯的社會時代感，⁹⁴以及其名篇〈前進〉⁹⁵使用黑暗來形容自身所

⁹¹陳錫如，〈崇文社文集序（一）〉，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1。

⁹²賴和所藏書目，可參考《賴和全集》的整理。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雜卷》（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307。

⁹³有關崇文社的贊助者，可參考黃臥松的整理。王臥松〔案：疑為「黃臥松」誤〕，〈崇文社百期文集序（三）〉，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頁19。

⁹⁴關於賴和散文中的時代感，可參考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1-226。



處時代與社會的散文筆法，⁹⁶或許並不全然來自於五四新文學的影響，臺灣本地的古典散文觀當中，隨著「文以載道」而來的對於社會以及人民的關心，很可能就是轉化生成為賴和現代散文創作的文學養分之一。

第二節 五四現代散文觀及其影響

雖然說以往論者多重視五四新文學對於日治臺灣新文學的觸發，但基本上這樣的影響論是就整體而論的，單就散文而言，則是側重五四對臺灣戰後美文的影響。誠如本文緒論，臺灣戰後「美文傳統」與散文的五四源流論緊密結合，普遍認定張秀亞、艾雯等典型的美文作家，有其五四之傳承，如痙弦便直指「把美文這支快要熄滅的火把帶到臺灣的，是張秀亞」。⁹⁷此類的論述方式，強化了五四影響論的重要性，卻也同時體現出關乎於散文範式與典律的問題；筆者所謂的「五四影響論」尚不是一個精確的說法，應使用「五四美文影響論」才恰恰表現了臺灣現代散文中與「美文傳統」具有強烈連帶關係的「五四脈絡」體質。⁹⁸但其實縱觀五四時期，對於「散文」作為一種「新文學」、「現代文學」的文類，具有相當多歧異、複雜的要求、規定與認知，「美文」僅是當中一個討論項目，若以朱自清〈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來看，「美文傳統」所要求的「抒情」，尚不在其「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

⁹⁵賴和，〈前進〉，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卷》，頁 249-253。

⁹⁶「為什麼賴和要動用那麼多的文字來形容黑暗呢？原因是不難明白的，他要說的便是他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頁 81。

⁹⁷痙弦，〈張秀亞，臺灣婦女寫作的燃燈人——從早期學思生活的發軔到「美文」創作版圖的完成〉，張秀亞著、封德屏主編，《張秀亞全集 2【散文卷·一】》（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頁 19。

⁹⁸舉例來說，臺灣於戰後初期對於魯迅實有一股傳播與接受的熱潮，魯迅的雜文理念亦隨之傳入，如黎笏，〈論雜文〉，《閩台日報》，1948.10.01 第四版。但經過國民政府「妖魔化」魯迅以及「美文傳統」的典律的揀擇洗刷後，至少在現代散文的研究中，「五四」實僅是「五四美文」的代名詞。如周麗麗就稱魯迅「捨正途不為，致力於雜文的寫作，而給了現代散文致命傷」。周麗麗，《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頁 3。而楊牧列舉五四名家所開創出的七類散文，並論述各類的在臺系譜，唯亦捨去胡適的說理散文與魯迅的雜文不論。楊牧，〈散文之為文類〉，《失去的樂土》（臺北：洪範書店，2002）。可以說由於張秀亞等人極端推崇周作人，而蘇雪林等人又大力抨擊魯迅，使得五四散文在戰後臺灣散文典律中僅被標榜出美文一支。

種種對於散文表現的認知範圍當中。⁹⁹即便是周作人的〈美文〉，他所指認的「美文」，亦「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且「很多兩者夾雜的」，¹⁰⁰亦即非限定僅能抒情。而透過王鈺婷的研究，更可以明白「抒情美文」其實是有一個受到國民政府介入戰後文學場域，以及讀者市場品味的要求下所產出的生成情境。¹⁰¹

五四時期的現代散文觀，其實遠比「抒情」加上「美文」雙重限制下的「美文傳統」要寬廣得多，本節試圖談出五四現代散文觀的複雜性與豐富度，最後再指出受過五四文學影響的臺灣日治文學作者，如何傳播、介紹五四的散文觀念進入臺灣的文學環境之中。

對於五四現代散文而言，魯迅與周作人兄弟是二大備受尊崇的標竿，如郁達夫就稱「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¹⁰²，而魯迅所提倡的「雜文」與周作人所書寫的「小品文」，亦為五四現代散文指出了二條主要的發展道路。然而，這並不代表魯迅僅處理「雜文」，而周作人只負責「小品文」，¹⁰³事實上，二個人也分別對於「雜文」與「小品文」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如針對「雜文」與「雜文」作者，魯迅曾謂：

「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¹⁰⁴

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

⁹⁹朱自清，〈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臺北：蘭亭書店，1986），頁 361。

¹⁰⁰周作人，〈美文〉，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23。

¹⁰¹王鈺婷，〈第三章「政治駕馭」與「市場主導」下女性抒情散文之生產機制〉，《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頁 87-137。

¹⁰²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416。

¹⁰³關於魯迅的「小品文」以及周作人的「雜文」創作，可參考林非的討論。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¹⁰⁴魯迅，〈做“雜文”也不易〉，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205。

是攻守的手足。¹⁰⁵



而曾經出版《藥堂雜文》¹⁰⁶的周作人，除了寫作「雜文」之外，亦曾討論「雜文」：

所寫的文章裏邊並無什麼重要的意思，只是隨時想到的話，寫了出來，也不知道是什麼體制，依照古文辭類纂來分，應當歸到那一類裏才好，把剪好的幾篇文章拏來審查，只覺得性質夾雜得很，所以姑且稱之為雜文。世間或許別有所謂雜文，定有一種特別的界說，我所說的乃是另外一類，蓋實在是說文體思想很夾雜的，如字的一種雜文章而已。¹⁰⁷

周作人很明顯地意識到自己所談的「雜文」與世間別有所謂「雜文」的分別，而後者應是指涉魯迅等人所提倡的「雜文」。然而，魯迅「雜文」未必就是「雜文」正統，周作人所談的「雜文」也未必因其「夾雜」的性質就不值一顧，相反的，魯迅也主張「雜文」若按編年來分類，則「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¹⁰⁸與周作人的「夾雜」一說十分相近，只不過魯迅強調「雜文」與「雜文」作者對抗社會陰暗的戰鬥性格，而周作人卻沒有如此之主張。周作人是將論述的重點放在「雜」字身上：

寫雜文的要點第一思想宜雜，即不可執一……所謂白話即是藍青官話，原是南腔北調的，以聽得懂寫得出為標準，並無一定形式，結果變成一種夾雜的語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賤詞固可，說是褒詞亦無不可，他的真相本來就是如此。現今寫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這種文體，至少不可

¹⁰⁵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199。

¹⁰⁶周作人，《藥堂雜文》（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

¹⁰⁷周作人，〈雜文的路〉，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9（1944-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422。

¹⁰⁸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199。

嫌他雜，最好還希望能夠發揮他的雜。¹⁰⁹



不但文章思想要「雜」，就連語言使用也希望盡量發揮「雜」的性質，周作人論「雜文」可謂極往「雜」處說。而就強調語言的「夾雜」這點來說，周作人對於「雜文」的要求以及他對「小品文」的界定，其實並無太大的差異：

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份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各盡其地安排起，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¹¹⁰

雖然在〈雜文的路〉當中，周作人談述的是「南腔北調」的方言，而此處論及「小品文」則除了方言之外，還加入了歐化語、古文等份子，然而，「雜」糅的精神卻是不變的。在此，可以說周作人於書寫語言上，對於「雜文」或是「小品文」的要求基本上是一樣的。只不過，周作人在此處亦表明他對於「小品文」的規範在於能夠有耐讀的味道與雅緻，與魯迅的文類要求頗為不同，魯迅認為小品文應「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麼雅」。¹¹¹

周作人〈雜文的路〉不談戰鬥雜文，專談「雜文」之「雜」，而魯迅的〈小品文的危機〉，則反對小品文之「雅」，直指小品文成為供人把玩摩娑的「小擺設」，並且「走到了危機」，於是魯迅進一步指出了「小品文」如何開出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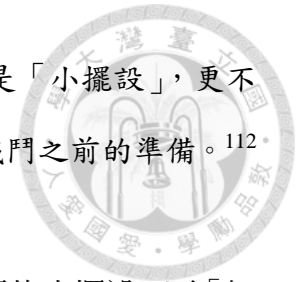
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

¹⁰⁹周作人，〈雜文的路〉，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 9（1944-1949）》，頁 426。

¹¹⁰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388-389。

¹¹¹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95。

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¹¹²



「小品文」必須戰鬥，必須是「匕首」與「投槍」，而不能是無用的小擺設。而「匕首」或是「投槍」的形容，已經成為修飾魯迅戰鬥散文風格的常用概念，無論是中國抑或是臺灣的論者皆然。如吳興人即指出「集納在《偽自由書》和《花邊文學》的雜文，都是一把把鋒利的匕首，直接向那個黑暗社會的心臟刺去」，¹¹³而林瑞明亦在其論述中直稱「魯迅「匕首式」的雜文」。¹¹⁴無論何者，皆是慣於將「匕首」與「雜文」直接連結，彷彿「戰鬥」是「雜文」的專利。然而，就魯迅自身的話語使用脈絡而言，「匕首」反而是他對於「小品文」的文類要求，而不是專指「雜文」。只不過，雖然「小品文」於「殺出血路」之外，亦有給人「愉快與休息」的特質，但無論如何，魯迅對於「小品文」的最終要求仍在於「戰鬥」，與他對「雜文」的要求可說是如出一轍。

綜上，「魯迅＝雜文＝戰鬥」／「周作人＝小品文＝雅緻」的分法，實是處理五四現代散文時阻礙思考「散文」複雜度的二元思維，「雜文」與「小品文」並非壁壘分明的文類，就以魯迅與周作人為例，他們並非是堅守「雜文」或是「小品文」的陣營，而是將二者一併思考，且不會因為是「雜文」或是「小品文」就提出不一樣的美學要求或是文類規範，這顯示出無論是魯迅抑或是周作人，其實都是以「雜文」或是「小品文」為例，提出自己對於「散文」的主張。易言之，「雜文」與「小品文」在魯迅與周作人的論述中所各自呈現的二種路線，其實正反映出五四文人對於現代散文的二種主要的文類要求。¹¹⁵倘若過度執著在文類名詞的

¹¹²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96-97。

¹¹³吳興人，《中國雜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636。

¹¹⁴林瑞明，〈魯迅與賴和〉，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9），頁 87。

¹¹⁵當時對於「散文」作為一個文類的討論仍相當複雜，每個論者使用的名詞也不盡相同，應關專文處理，在此簡單論述。以「雜文」與「小品文」為例，如伯翰就指出「其他的雜感小評之類，就已經被我們的批評家另起了名兒，名之曰雜文，以表示其不是小品正格。」但傅東華則認為『『小品文』只是「雜文」中的一個特別類型」。前者是呈現出以「小品文」為尊，而將雜文視作被排除於

使用上，強調「雜文」與「小品文」的差異，則很可能會喪失了觀照整體的研究視野，亦易使人多有疑惑，如《文藝知識》雜誌的編者就曾提出「通常所謂散文、小品文、雜文，它們究竟有些什麼區別？」的疑問，而藉由葉聖陶、唐弢的回答，則有助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葉聖陶先生答文

一、現在有散文、小品文、雜文等不同的名稱，似乎搭起一副文藝架子的歸入散文一類，寫些小感想小景物的歸入小品文一類，現實性較強的歸入雜文一類。其實，如果不用這個觀點來區分，除去小說、詩歌、戲劇之外，都是散文。¹¹⁶

……

唐弢先生答文


一、依我看：散文、小品文、雜文其實是三位一體的。精密地說，所謂雜文和小品文，無非是一種文體——也就是我們所指的散文的兩面，彼此之間，並非真有什麼不同的。閑散飄逸、偏於抒情味的是小品文，凌厲削拔、富於戰鬥性的是雜文。這是一般的意見，泥於習俗，未必可為分類的根據。¹¹⁷

葉聖陶與唐弢的答覆，於細部認知上略有差異，但他們談論的對象都是當時對於「散文」、「雜文」與「小品文」的看法。在葉聖陶的談述脈絡中，「散文」、「雜文」、「小品文」各自是一文類，但葉聖陶認為其實不必要予以細分，三者以一個較大

「小品文」之外的文類。後者則強調文類之間的從屬關係，將「小品文」視作「雜文」之一支。是故，五四時期對於「雜文」與「小品文」並沒有一定、絕對的定義，每個人在使用相同的文類名詞時，懷抱的是不同的概念。或者反過來說，也可能是使用著不同名詞，卻有相近的概念。伯翰，〈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126。傅東華，〈為小品文祝福〉，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131。

¹¹⁶葉聖陶、朱自清、唐弢，〈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編者問八題〉，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187-188。

¹¹⁷葉聖陶、朱自清、唐弢，〈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編者問八題〉，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190。



「散文」予以統括即可。而唐弢則未將「散文」（較小意義上的）當作「散文」（較大意義上）的一個支類來談，但認為「雜文」與「小品文」是「散文」的一體之兩面的說法，也顯示在唐弢的認知當中，也將「雜文」與「小品文」視作五四「散文」的二十大性格；並且，他也認為將「雜文」與「小品文」之間「並非真有什麼不同」，亦即不必為細部的文類名稱所限。

本節在討論五四現代散文觀時，無論是「雜文」、「小品文」，或是「散文」、「隨筆」¹¹⁸等等，都傾向於將相關論述看作是對於「散文」之為文類的討論，是針對「散文」而發的文類要求與美學規範，即便論者心目中對於「散文」文類底下的支類，如「雜文」、「小品文」等等有確切的認知與針對性，但側重於某一支類，也代表論者在五四眾多的散文路線中，贊同當中某一特定的規範，即顯示出該論者對於「散文」的文類要求。¹¹⁹

至於，在「雅緻」、「閑散飄逸、偏於抒情味」以及「凌厲削拔、富於戰鬥性」、「現實性」此二大路線之下／之外，尚有一些歧異、複雜的美學規範，只不過，本節的重點仍在於五四的現代散文觀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又有哪些傳播及影響的可能，是故接下來將在五四時期眾多對於「散文」應有與已有的規範要求中，揀選出與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對於五四散文的接受較有關係的部分，展開討論。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環境中，思考現代散文作為一種文類，並予以直接討論的篇章並不多，引介五四散文觀的文章亦相對缺乏。雖然觀察早期的《臺灣民報》已可發現五四新文學思想的滲入，如張我軍等人即扮演了傳播介紹的角色。只不過，這些文章都較側重於如何從文言文體到白話文體的轉化，¹²⁰就文類而言，

¹¹⁸在林慧文的討論脈絡中，隨筆即小品文、小品文即隨筆，如「這種文章有些人叫做『小品文』，也有人叫做『隨筆』，我們常常見到『散文小品』或『散文隨筆』聯用的字眼。」林慧文，〈現代散文的道路〉，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429。

¹¹⁹當然，一一處理「雜文」、「小品文」、「散文」、「隨筆」的異同、淵源及各時代、場域的使用方式亦是相當重要的，只不過限於論文篇幅及框架，此處不側重於該問題。

¹²⁰除了第一節所提到的篇章之外，尚有張我軍，〈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6 號，1925.02.21 等文。

也較重視詩與小說的發展。¹²¹這個現象也可以從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一文中得到映證。張我軍提出了一份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書單，共可分十一類，分別是文學史、文學原理、藝術論、術藝史〔案：應為「藝術史」之誤〕、美學、文法、新詩集、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翻譯、雜誌。可以發現，書單分類中有新詩、長短篇小說，但就是缺乏散文。雖然文章後面有補充《胡適文存》、《陳獨秀文存》二書，但這二本書列在「此外」，並無分類，也許是希望讀者當散文集讀，但也很可能是當新文學的理論思想叢書來讀，針對這一點，張我軍並無說明。但至少，在十一類書單當中獨缺散文一類的這一點是確定的。暫且不論五四對於日治臺灣文學的影響程度，但集合上述這些現象卻可以說明一件事情，至少就文類觀的觀點來看，新詩、小說與散文三者的輸出與接受是失衡的，在《臺灣民報》引介五四新文學的知識份子普遍對散文缺乏重視，可以說在五四階段對於散文討論得如火如荼的論述現象，並沒有在日治臺灣得到相對應的介紹與再現，就文類觀的影響論而言，散文應是不如五四的新詩與小說對當時臺灣新文學造成的刺激與衝擊。¹²²

只不過，缺乏並不表示全然無有，在少數的篇章之中，徐坤泉以「老徐」為筆名，在《風月報》上發表的〈再談「小品文」〉一文便頗具代表性。徐坤泉曾經擔任《臺灣新民報》及《風月報》的主編，分別在雅俗文學場域中曾佔有一定程度的發聲權，¹²³且於任職《臺灣新民報》時期就已經開始寫作、提倡小品文，¹²⁴而

¹²¹張我軍，〈詩體的解放〉，《臺灣民報》第3卷第7號，1925.03.01。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臺灣民報》第2卷第17號，1924.09.11。此外，《臺灣民報》學藝欄上雖有一篇〈論散文與自由詩〉，但該文主要是針對新詩是否應該押韻而論，散文僅是討論的參照對象。未標著者，〈論散文與自由詩（一）〉，《臺灣民報》第329號，1930.09.06。未標著者，〈論散文與自由詩（二）〉，《臺灣民報》第331號，1930.09.20。

¹²²是故，雖然朱雙一曾經嘗試以散文作為方法論，證成中國文學與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之間強烈的連帶關係，但就實際的傳播接受情形來看，在五四新文學對於臺灣新文學的影響當中，散文實是相當薄弱的一環。藉此，朱雙一所試圖證成的「巨大、深遠、歷久不衰」的影響關係，事實上是很有反思的必要。朱雙一的論點引自朱雙一，〈魯迅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散文創作的影響〉，《魯迅研究》1991第3期，1991.10.26，頁29-33。

¹²³有關徐坤泉的生平以及對其參與報刊主編活動情形的討論，可參考徐意裁，《現代文明的交混性格——徐坤泉及其小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¹²⁴老徐，〈再談「小品文」〉，《風月報》第60期，1938.03.01。

他亦藉由刊載在《風月報》卷頭語的〈再談「小品文」〉一文，闡明他的文學立場以及在他主編之下的《風月報》的收稿標準：



在我們臺灣的文壇上、小品文是很少的、許多人都抱著一種『非大塊文章』、長篇大論是不足見世的、這樣的見解、是錯誤的、其實好的文章是不在長的……我希望會員諸君、今後對於本報的投稿、無論詩文、都該檢討一些、否則編者老實愛莫能助、只好棄之籠裡、本報乃純文藝的刊物、非含有真實文藝的原稿者、絕對不取！否則本報將變為一部『歌功頌德經』、諸君原諒！

編者在此、再要提倡小品文、因為小品文的功效是勝過大品文的……我希望全島的文學青年、能努力試寫小品文、對本報多々投稿、用平淡的話語、包藏着深刻的意味¹²⁵

徐坤泉認為當下的臺灣文人喜作所謂的「大塊文章」，然而揭其本質，這些「大品文」¹²⁶大部分都是拿來歌功頌德、互拍馬屁用的，故他提倡「小品文」的用意，實有反抗清理的意味。在徐坤泉的主導下，今後《風月報》對於長久以來的寫作風氣下產生的「大品文」將要「棄之籠裡」。這表示徐坤泉對於「小品文」的提倡不僅是一種鼓勵性質，甚至是有明白訂定投稿規則，強調倘若不符規定便是「絕對不取」的威脅性質。這或多或少會對於《風月報》所代表的古典、通俗場域起上作用，亦即會讓徐坤泉所提倡的「小品文」對於日治臺灣的現代散文創作觀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徐坤泉在上海的就學經驗，使得他有直接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的管道與機會，如他便曾如此自述：

¹²⁵老徐，〈再談「小品文」〉，《風月報》第60期，1938.03.01。

¹²⁶「大品文」的稱法並非由徐坤泉所創，如聶紺弩於1935年即曾使用「大品文」一詞，亦是作為「小品文」的對比，具有諷刺作用。聶紺弩，〈我對於小品文的意見〉，王景科編著，《中國現代散文小品理論研究十六講》（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頁180-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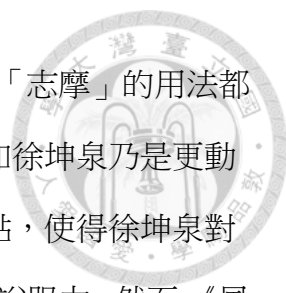
記得我是在上海學生的時代、最愛讀中國徐志摩的新詩和小品、志摩的作風可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流麗輕脆、雖說是白話、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々の成分、足以引車賣漿之途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可是後來志摩死了、其他如適之仲甫一派的小品、文雖說清新明白、但長於說理講學、有時覺得硬性太過、好像西派〔案：為「西瓜」誤〕之有口皆甜、而半伯〔案：為「平伯」誤〕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小品文的功用、確々實々是最惹人爭賞的¹²⁷

據此，可見徐坤泉對於五四現代散文的創作現象並不陌生，且看似能夠了解不同作家的風格，甚至能為風格近似的作家分門別類，且有自己的閱讀喜好，不忘批評胡適（適之）、陳獨秀（仲甫）、俞平伯、馮文炳（廢名）等人所書寫的小品風格。然而，倘若將上引文字與周作人於 1932 年發表的〈志摩紀念〉進行比較，則會發現此段論述並非徐坤泉自行閱讀消化五四散文作品所得出的結果，亦即他對於「小品文」的知識系統，並非是直接憑藉自我的閱讀經驗所累積建構而成的：

志摩死了，這樣精妙的文章再也沒有人能做了……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並不小，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說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¹²⁸

¹²⁷老徐，〈再談「小品文」〉，《風月報》第 60 期，1938.03.01。

¹²⁸周作人，〈志摩紀念〉，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 6（1932-1935）》，頁 813-814。



兩段文字極其酷似，就連直接稱呼陳獨秀為「仲甫」、徐志摩為「志摩」的用法都一模一樣，甚至是「志摩死了」的口氣也可說是直接搬用，可知徐坤泉乃是更動原文字句，改用周作人文章而得其論述。幾乎是直接抄用的這點，使得徐坤泉對於「小品文」的提倡似乎欠缺了自我知識系統的建構所能帶來的說服力。然而，《風月報》的讀者不一定如同徐坤泉一般具有豐富的中國經驗，對於中國文壇不一定熟悉，即便是掌握中國文壇現狀的讀者，具有看穿徐坤泉這段論述其實是抄襲周作人而來的能力，也不至於破壞隨著〈再談「小品文」〉而來的相關五四散文觀的影響效力。毋寧說這使得周作人原本的論述意見，在稍微改動字句的情況下，原原本本地傳進了當時臺灣的文學環境當中。在散文語言上，徐坤泉帶進了「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々の成分、足以引車賣漿之途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而不僅是限於雅文字、古文體的開放觀念。而在寫作風格方面，也引介了「流麗輕脆」、「清新明白」，至於「說理講學」，則又是相對於抒情的另一種「硬性」風格的展現。

而早在〈再談「小品文」〉之前，徐坤泉於1937年出版的《暗礁》〈自叙〉中，就已引介了五四文人的散文觀：

胡適氏曾說：『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小品文」，這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錢謙吾氏也這樣說過：『我們仔細讀一篇小品文，我們可以洞見作者是怎样的一個人，他的人格動靜描寫在裡面，他的人格聲音歌奏在裏面，他的人格色彩渲染在裏面¹²⁹

徐坤泉在此處引用的錢謙吾的說法，體現的其實是五四文人對於現代散文的重要

¹²⁹徐坤泉，〈自叙〉，《暗礁》（高雄：慶芳書局，1954）。《暗礁》原於1937年由臺灣新民報社出版，此處引用的是慶芳書局的版本，於文末亦有註明該自叙作於民國廿六年四月十四日。



觀念，也就是「個人的文學」的提倡以及「個性」的體現：

小品文則又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裡，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¹³⁰

五四運動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代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徵，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裡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¹³¹

現代散文中蘊含的「個人」與「個性」的特質，是周作人與郁達夫都相當重視的一個層面，徐坤泉的文章便承載了這個重要的五四散文觀，傳遞進日治臺灣文學之中。而透過這段〈自叙〉的引文也可以發現，〈再談「小品文」〉當中「用平淡的話語、包藏着深刻的意味」一句，也是化自胡適「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而來。綜上，可知徐坤泉藉由直接引用與間接改用的方式，將五四現代散文觀引介進入臺灣文學之中，使得五四散文觀成為了臺灣文人徐坤泉在臺灣本地討論現代散文的一個重要的論述資本。

除了徐坤泉之外，探索日治臺灣現代散文觀對於五四現代散文觀的接受時，周定山亦是重要的討論對象。周定山在〈也是隨筆〉當中有三處提到魯迅：

「世上如果還有想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¹³²

¹³⁰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386-387。

¹³¹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402。

¹³²周定山，〈也是隨筆（一）〉，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魯迅先生眼裡的叭兒狗、封建思想、民族性；吳稚暉先生口中的漆黑一團、打倒、放屁放屁；郭沫若先生筆下的亡命反正、紅皮書，據說是文壇的清道夫、檢溫器。¹³³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¹³⁴

周定山的旅中經驗豐富，¹³⁵對五四新文學的情況應不陌生，上述的引文，則反映出他對於五四的選擇性。易言之，他看重文學的現實批判面，故傾心於魯迅勇於將個人投身社會，正視社會問題並予以批判的主張。然而上引接近於一種人生觀，可說是周定山對於五四文學思想的引介，真正要與現代散文觀較有關聯的則屬〈草包 ABC〉當中的言論，而施懿琳亦曾藉由這段言論來論證周定山的文學創作觀：

文章的定義，似乎都是意志的吐納，理智的表現，情感的發洩，思想的影跡……這些歸納起來，就成了藝術家的自由王國，精神欣慰的象牙塔，兒童醉心的樂園！據說，要用生命源泉的血和淚噴湧出來的結晶，所以，像洪水烈火般的來得有勁有神！異常親切、動容、感奮！能夠使讀者具有很深刻的印像的魔力，才得容易換了不少的眼淚和同情。這種富於吸引力的文章，大抵就說為不朽的傑作罷？！¹³⁶

據此，施懿琳認為周定山的創作觀如下：


頁 119-120。

¹³³周定山，〈也是隨筆（三）〉，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26。

¹³⁴周定山，〈也是隨筆（四）〉，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27。

¹³⁵周定山的生平與旅中經驗，可參考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 14。

¹³⁶周定山，〈草包 ABC〉，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86。



他認為文學創作是在心靈世界的映顯，乃源於作家心之所不容己的自然吐露。當創作的欲望鼓動時，就如同滔滔洪水，熊熊烈火，無法扼抑。因為是血和淚的結晶，所以能夠深深地打動讀者的心靈，引起他們的共鳴。大凡偉大的著作，幾乎都具有這樣的特質。¹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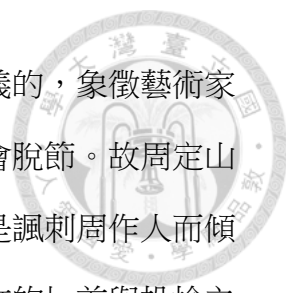
在此，筆者要提出與施懿琳的見解不同的看法。「精神欣慰的象牙塔」，似乎不是一個具有褒義的字句，再加上藝術家「生命源泉的血和淚」竟然「容易換了不少的眼淚和同情」，當中不免流露出一種反諷的意味。「文章的定義，似乎都是意志的吐納，理智的表現，情感的發洩，思想的影跡」一句也值得深究，「似乎」一詞表示這並非是周定山對於文章的確切定義，且有一種聽說得來的感覺，或許代表世間對於文章的看法。而所謂「意志的吐納，理智的表現，情感的發洩，思想的影跡」則其實相當接近周作人所說的「浸在自己的性情裡，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的散文定義，散文表現的其實自己的性情，重視「個人」與「個性」，而不是去正視、批判社會。而倘若將上引周定山的文字，放在整篇文章的脈絡來看，則更顯出整段文字反諷的意圖：

西哲的個人主義，單把老死不相往來的毒瓦斯，就擊得粉碎了！那班優遊暇預的詩人，都在高頌「自家打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亙古傑作！¹³⁸

在文章的一開頭，周定山就迎頭痛擊了所謂的個人主義，此處的「亙古傑作」無疑是一記反諷，而稱呼藝術家們的「不朽的傑作」又何嘗不是？既是如此，純粹屬於藝術家「意志的吐納，理智的表現，情感的發洩，思想的影跡」的文章，又

¹³⁷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頁 16-17。

¹³⁸周定山，〈草包 ABC〉，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83。



怎會成為周定山認可讚頌的對象？故「象牙塔」的形容是有意義的，象徵藝術家在自己的「自由王國」與「樂園」中欣慰地過活，然而卻與社會脫節。故周定山對於「文章」的討論，若借鏡於五四現代散文的二大路線，即是諷刺周作人而傾心魯迅，批判強調「個人」與「個性」的散文觀，而選擇了散文的匕首與投槍之路。事實上，就周定山實際的散文創作而言，他也實踐了此一具有批判與戰鬥精神的文學觀，這個部分將於本論文第五章再詳論。


由魯迅與周作人所開創提倡的散文二大路線，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中分別可以找到予以接收並傳播的周定山與徐坤泉，這也是向陽所說的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特徵，也就是「剛強、批判、思辨以及從知識和實踐出發」與「個人小我性靈的獨抒」共存的情形，這並不僅體現於實際的散文創作，在散文觀方面，亦有實際的映證，而五四時期現代散文觀的影響，也確實是當中建構形成的因素之一。相對於戰後「美文傳統」，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對於五四的接受，對於散文觀的拓展，都是較為豐富而開放的。

第三節 日本近現代隨筆觀及其影響

本節在進入日本近代隨筆觀的討論之前，首先要針對「近現代」與「隨筆」略作說明。共享漢字的臺灣、日本與中國三地都有「現代文學」一詞，然而在「現代」文學的定義、認知與使用上卻略有差別，如趙京華翻譯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一書，¹³⁹在日文語境中，原書名卻是《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¹⁴⁰臺灣與中國較少使用所謂的「近代文學」一詞來描繪受到西方現代性、現代文學等衝擊之後所產生的「現代文學」，大部分直接採用「現代文學」來指稱。然而在日本文學語境的使用當中，則多是以「近代文學」作為此概念的指稱詞，同時也有

¹³⁹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二版）。

¹⁴⁰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講談社，1980）。



學者再進一步劃分出「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儘管對於確切劃分「近代」、「現代」的文學史仍多有爭論，且因研究需要，對於文學史的區分粗細亦不相同。然而大致說來，「近代文學」始於明治維新，而「現代文學」的義界，則有自 1920 年代（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或是要等到 1945 戰後才開始的說法。¹⁴¹是故，若要探究日本隨筆觀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影響，日本學界對於「近代」與「現代」的定義值得參考，只不過確切的定義爭論並非本節討論的重點，故使用「近現代」一詞來表示，大致指涉至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至日治結束的 1940 年代。

至於，為何採取日本近代「隨筆」而非「散文」用法的這一點，則亦有必要說明。在日本文學的脈絡中，「散文」是一種極其寬泛的概括用法，「隨筆」才有作為一個文類的特定指稱性質。根據針原孝之對於「散文」的描述，「散文」是相對於「韻文」的存在，在韻律形式及節奏上並無任何限制。這樣說來，「散文」其實就是所有非韻文詩歌的文類總稱，包含了小說、戲曲（詩劇除外）、隨筆、日記、紀行、論文等等。¹⁴²姑且先不論「論文」一類，已經先行將詩歌韻文排除在外的日本「散文」，若再將小說、戲曲劃分在外，其實就已經很接近在臺灣文學脈絡中一般對於「散文」的定義：

現代散文經常處身於一種殘留的文類。也就是，把小說、詩、戲劇等各種已具備完整要件的文類別除之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¹⁴³

排除詩歌、小說、戲曲之後的日本「散文」，剩下隨筆、日記與紀行，這三者應當

¹⁴¹根據〈日本近代文學史・概說〉一文，從 1868 年明治維新以後至今，被稱作廣義的「近代」，該文收錄於三好行雄、山本健吉、吉田精一編，《日本文学史辞典・近現代編》（東京：角川書店，1987），頁 8-18。然而，該書又將日本近代文學史以昭和為界分成前後期，而在近代文學史的後期中，又以 1955 年為「現代文學」的起點。〈日本近代文學史・概說〉一文也提到近代文學史亦可以以明治、大正、昭和再進行區分。同樣的，在小田切秀雄編著的《日本文学史》亦是以明治作為「近代文學」的起點，而以日本敗戰或是昭和初年（1920 年代）

¹⁴²針原孝之，〈第四章 日本文学の形態と様式〉，阿部正路、上坂信男、神作光一、寺本直彦編，《日本文学概論》（東京：右文書院，1995，第九版），頁 56。

¹⁴³鄭明姍，《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頁 6。



如何考量？關於這點，筆者欲參考吉田精一的說法。吉田精一是在日本學界中，少數自平安時代《枕草子》開始，至近現代隨筆皆有研究的學者。關於日記的部分，吉田精一是如此表述的：

倘若作家有出版全集的話，作家的日記通常會收錄在隨筆一類，而被認為是隨筆的一種。

……

就自我內在真實的告白這一點來說，日記真的可以說是隨筆的一種。倘若作者擁有優秀的才能，即便是平凡的日常紀錄，也足以成為第一流的隨筆。¹⁴⁴

吉田精一認為，隨筆雖然不必然要書寫自我對於個人生活告白或是反省，且也並非說全然不能虛構，但是跟其他文類相比，隨筆確實是比較能夠體現作者真誠的氣息與思考方式，¹⁴⁵而在書寫時難以判斷是否有預設讀者以及是否全然真實的日記亦是如此。其次，參考吉田精一對於江戶時期隨筆的分類，也可以發現日記與紀行都是隨筆底下的一類。¹⁴⁶筆者認為，日記與紀行可以說都是以隨筆來表現特定內容（日常生活、見聞遊歷）而產生的文類，要各自細分的話當然可以循其脈絡而論，但此處筆者傾向以隨筆來予以統稱。此外，雖然日本現代文學當中亦有「小品」這樣的文類，如夏目漱石的〈永日小品〉¹⁴⁷，志賀直哉的〈動物小品〉、芥川龍之介的〈東京小品〉¹⁴⁸等等，但是「小品」作為日本「散文」之一類在內

¹⁴⁴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東京：桜楓社，1989，二刷），頁41、43。引文由筆者節譯。

¹⁴⁵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9。

¹⁴⁶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79-81。雖然說江戶時代雖未邁入日本近代文學的範疇，但由於所謂的「分類」畢竟是一種權宜性的研究策略（詳本論文第三章的討論），吉田精一對於「近世」（江戶時代）隨筆的分類標準，並不能說就不適用於「近代」。事實上，吉田精一等人對於隨筆的分期雖有清楚的分別與認知，但是談論大概念之下的隨筆時，仍是揉合所有時代一同來談的。

¹⁴⁷夏目漱石，〈永日小品〉，夏目漱石著、小森陽一編，《作家の隨想5 夏目漱石》（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頁92-155。

¹⁴⁸志賀直哉，〈動物小品〉、芥川龍之介〈東京小品〉，川端康成編《日本隨筆・隨想集》（東京：平



容風格上流動性極高，不限於隨筆一格，而是橫跨了隨筆、小說、散文詩等範疇。¹⁴⁹是故在諸多考量下，本節即以日本近現代「隨筆」命名。

思考日本近現代隨筆觀，廚川白村的名著《象牙の塔を出て》(出了象牙之塔)一書當中對於 essay 的討論，可說是相當具有代表性。只不過，essay 與隨筆二者之間是否有所分別，則是要先釐清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可以從廚川白村的討論中尋求解釋：

有人譯 essay 為『隨筆』，但也不對。德川時代的隨筆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記，或是炫學家的研究斷片那樣的東西，不過現今的學徒所謂 Arbeit〔案：指勞動〕之小者罷了。¹⁵⁰

在此，廚川白村反對將「essay」翻譯成「隨筆」，然而此處的「隨筆」卻是一個限定意義的用法，指涉德川時代由博雅先生或炫學家的札記或研究斷片，並非是對於「隨筆」概念的全然否定。這一點，由接下去的討論便可辨明：

在日本文學上，倘說清少納言的枕草紙〔案：應為「枕草子」誤〕稍稍近之，則一到兼好法師的徒然草，就不妨說是儼然的 essay 了。¹⁵¹

在日本文學史中，《枕草子》與《徒然草》被譽為日本隨筆的雙壁，¹⁵²在日本隨筆當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自是「隨筆」無疑。也因此，essay 與隨筆之間應當有很高的相連性，只是廚川白村排除了隨筆裡面的部分性質（札記與研究斷片）。

凡社，1971，18版），頁116-119、208-213。

¹⁴⁹參考岡保生，「小品文」詞條，《日本大百科全書》，Shogakukan Inc.，JapanKnowledge 資料庫，<htt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最後檢索日期：2014.01.07。

¹⁵⁰廚川白村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13卷·出了象牙之塔》（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164。

¹⁵¹廚川白村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13卷·出了象牙之塔》，頁167。

¹⁵²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74。

普遍說來，essay 作為一種文類，在日本語境之中即是以隨筆之意而被使用。¹⁵³對於日本文學來說，無論是從名稱或是觀念來看，essay 無非是自西洋文學引進而來的新文類，在日本文學當中要找一個可以相對應的文類，那便是隨筆。故而廚川白村所討論的 essay，即可視作他對日本近現代隨筆觀的思考，而這樣的思考有沿襲亦有變革，《枕草子》與《徒然草》是尋找沿襲的例證，札記與研究斷片則就是思考變革的對話者。

吉田精一已經注意到，討論廚川白村的 essay 論點時，作為 *essai*（法文，即英文 *essay*）宗師的法國作家 Michel de Montaigne（蒙田）本身對於 *essai* 創作的想法是相當重要的，二者可以互相參照。¹⁵⁴廚川白村對於 essay 的主張，其實與蒙田的想法多有映合：

讀者啊，這是一部真誠的書。一開頭就提醒你，我沒有預設什麼目標，純然是居家的私語。我決不曾有任何普濟天下與追求榮名的考慮。我的才分得不到這樣一個目的。只是寄語親朋好友作為處世之道而已……我願意大家看到的是處於日常自然狀態的蒙田，樸實無華，不要心計：因為我要講述的是我。我的缺點，還有我幼稚的表現，讓人看來一目了然，盡量做到不冒犯公眾的原則。¹⁵⁵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不至於頭痛為度的道理罷。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罷，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

¹⁵³平野和彥，「エッセイ」詞條，《日本大百科全書》，Shogakukan Inc.，JapanKnowledge 資料庫，<htt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最後檢索日期：2014.01.07。

¹⁵⁴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1-13。

¹⁵⁵米歇爾·德·蒙田著、馬振騁譯，《蒙田隨筆全集第 1 卷·致讀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頁 38。

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和追懷，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托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

在 essay，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采濃厚地表現出來。¹⁵⁶

廚川白村這段知名的隨筆定義，其特色就在於將一種抽象的文類定義用實際的例子予以具象化，因此相當簡明易懂。而藉由上引兩相對讀的方式，則可以發現廚川白村與蒙田的想法其實相當接近，可以視作對於蒙田的進一步闡發。蒙田認為自己的 *essai* 篇章「純然是居家的私語」，針對這一點，廚川白村以冬天坐暖爐旁的安樂椅，夏天披衣喝茶與友人談話，為蒙田的 *essai* 主張創造出了具體的例子。而「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背後反映的則是蒙田所調的「日常自然狀態」與「樸實無華，不要心計」，亦即隨筆、*essai* 之為文類，強調是無須刻意造假做作的「真誠」書寫。而縱觀蒙田的 *essai* 著作，多充滿對於人生的哲理性思辨，可說是映合了他在〈致讀者〉中所說的「處世之道」，關於這一點，廚川白村亦多有闡明。除此之外，蒙田最為強調的莫過於 *essai* 反映了蒙田之為蒙田的特質，蒙田的隨筆是蒙田這個人的展現，可以說這就是隨筆的核心價值，而廚川白村當然掌握到了這一點，所以才主張「在 *essay*，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采濃厚地表現出來」。易言之，人即為文，文即為人，隨筆是作者人格性情的反映。

平安時代的《枕草子》表達了女性作者的感覺心緒，¹⁵⁷江戶時代的《徒然草》則是一部作者書寫人生的思索之作，¹⁵⁸一則以情，一則以思，相同的是隨筆與作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而至近代，廚川白村引進西方 *essay* 為隨筆再次定調，剔除了隨筆當中「非個人」的性質（如札記與研究斷片），而保留並增強了「個人」的部

¹⁵⁶廚川白村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 13 卷·出了象牙之塔》，頁 164-165。

¹⁵⁷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65。

¹⁵⁸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78-79。



分。此外，透過鶴見祐輔對於隨筆的觀察，亦可發現他與廚川白村的想法相當接近：

人的真實的姿態，是顯現於日常不經意的片言只句之中的。威爾遜之真的為人，較之在他的教令、演說、論文上，一定是他的家庭內的閑談中更明顯。其次，表現着他的，大概要算他時時在美國有名的大雜誌上發表的隨筆了罷。¹⁵⁹

同樣的，鶴見祐輔亦認為隨筆表現了作者的為人與真實姿態。可以說，廚川白村等人勾勒出了日本近現代隨筆觀的核心特質，並試圖為之定調，造成的後續影響也十分廣泛而深遠。就日本的文學脈絡而言，如此之隨筆觀並不僅停留在 1920 年代，¹⁶⁰而是繼續向下傳承。¹⁶¹而就魯迅翻譯了廚川白村與鶴見祐輔這二部著作的這個簡單觀察來說，日本的近現代隨筆觀亦即影響了五四的現代散文觀。¹⁶²至於本節接下來則是將聚焦於日本近現代隨筆觀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觀的影響。

根據工藤貴正的研究，張我軍在《臺灣民報》引介了廚川白村的著作，計有《文芸思潮史》、《近代文学十講》、《苦悶的象徵》、《近代の恋愛觀》四書，¹⁶³但似乎當中沒有刊載關於 essay 重要論述的《出了象牙之塔》。而雖然鶴見祐輔《思想·山水·人物》出版不久，1925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新刊紹介」便向臺灣的讀

¹⁵⁹ 鶴見祐輔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 13 卷·思想·山水·人物》，頁 407。

¹⁶⁰ 《出了象牙之塔》與《思想·山水·人物》原著分別出版於 1920 年與 1924 年。

¹⁶¹ 吉田精一在撰寫《隨筆的世界》的時候，亦是將「個人」作為「隨筆」的整體特質來說，而非僅限於 1920 年代。此外，岡村繁在評論日加田誠《洛神賦——中國文學論文與隨筆》一書時，亦採取了與鶴見祐輔相似的論述方式：「這一篇隨筆與論文又有不同的意味，自然地流露出作為人的先生的耐人尋味的風格，常常使讀者入迷。」將隨筆與論文區分，彰顯了隨筆對於作者個性的展現。岡村繁，〈讀日加田誠著《洛神賦——中國文學論文與隨筆》〉，岡村繁著、俞慰慈、俞慰剛、盛勤譯，《岡村繁全集，第拾卷，隨想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68-69。

¹⁶² 關於這一點，岳凱華、盧付林二人有較詳盡的討論。岳凱華、盧付林，〈日本隨筆與中國現代散文的走向〉，《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 年 6 月第 2 期，頁 106-111。

¹⁶³ 工藤貴正，《中国語における厨川白村現象》（京都：思文閣出版，2010），頁 244-245。

者介紹了這一本新書，¹⁶⁴但實際上的接受程度則仍有待查明。雖說如此，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仍確實有龐大的日文隨筆的創作現象，¹⁶⁵這些創作者不一定會對隨筆之為文類進行思考，因此直接援引廚川白村等人的主張的機會亦不多，也因此缺乏一種「直接」的影響證據。只不過，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文隨筆，特別是由來臺日人所創作的隨筆，其文類觀念的淵源，應與日本近現代文學本身有較大且直接的關係，而較難放進臺灣古典或是五四的脈絡思考，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即便沒有援用廚川白村或是鶴見祐輔，在少數思索自身隨筆創作的論述中，卻仍然可以發現在臺的日文隨筆作者，把握住了日本近現代隨筆觀的核心特質，如青木繁曾云：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我用我的筆，一字一字將我的心的跳動寫下，連綴成文，換言之，那即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將我的文章公正地予以批評的這件事，就等同於是將我，將我的心予以理解的行為。¹⁶⁶

青木繁在臺出版第一本隨筆集《森林生活者の手記》，¹⁶⁷並陸陸續續在臺發表隨筆，是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的日文隨筆作者。¹⁶⁸上引文字是在《森林生活者の手記》出版受到熱烈迴響之後的作者回應。青木繁認為隨筆書寫的是自己的心，因而隨筆成為自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青木繁甚至提及了讀者對於自身隨筆的批評，即等同於對作者我的理解，將隨筆的個人性，放到了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連結去思考。此番言論，與廚川白村等人的主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將思考觸及讀者層面，更為加強了隨筆即是作者個人反映的文類特質。除此之外，從外部思考隨筆的文類地位，亦有助於我們釐清日本近現代文學對日治臺灣散文觀的影響關

¹⁶⁴《臺灣日日新報》3版，1925.02.20，。

¹⁶⁵此部分將於第四章討論。

¹⁶⁶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8.02。引文由筆者節譯。

¹⁶⁷青木繁，《森林生活者の手記》。

¹⁶⁸有關青木繁其人其文，將於第四章詳論。



係。

吉田精一指出，日本文學進入昭和時期之後，因為報刊雜誌與活字印刷的普及，使得非文學專業的人士執筆的機會變多，產生出較之以往更盛的隨筆創作現象與作者群，這一批作者運用個人的感覺、知識、經驗等等投身隨筆創作，開創了所謂的「隨筆時代」。¹⁶⁹而和田利夫則是更進一步深掘「隨筆時代」的繁盛及其消頹，指出眾人皆可投身創作隨筆後所產生的可能問題。¹⁷⁰1935、1937年，三木清與中野重治分別提出了反省「隨筆時代」的聲音：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隨筆時代……只要是有點知名的人物，無論是誰都可以寫出像是隨筆的東西……隨筆如此之流行，究竟能對我國隨筆文學的發達做出多少貢獻則是一個問題，而確切可以說的是，隨筆流行的現象是與思想彈壓一同產生的。¹⁷¹

眼下日本文壇處在流行隨筆的狀態。從某個角度說是值得慶賀的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令人遺憾的事。在現今隨筆流行現象的背後，蘊含著國民大眾意氣消沉的因素。國民大眾與所謂的文學代言者，在追求某件事物上感到疲倦，或是其追求被無可奈何地打斷，結果導致他們逃向溫柔的隨筆之道，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¹⁷²

三木清所謂的「思想彈壓」，與中野重治所說的對於事物的追求被打斷，應可做某種

¹⁶⁹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06。

¹⁷⁰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 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 7 日記・隨筆・記録》（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頁 278-299。

¹⁷¹三木清，〈隨筆時代〉，《讀賣新聞》夕刊「一日一題」，1935.09.03。此處轉引自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 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 7 日記・隨筆・記録》，頁 288。引文由筆者節譯。

¹⁷²中野重治，〈隨筆厭惡〉，《雜記帳》第 2 卷第 7 號，1937.08。此處轉引自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 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 7 日記・隨筆・記録》，頁 293。引文由筆者節譯。

程度上的牽連。但在此，比起隨筆流行的原因，筆者透過此二人的言論想指出的是隨筆流行所一併帶來的反省之聲，畢竟這樣的反省很可能會影響到隨筆的文類地位，中野重治甚至以「隨筆厭惡」做為該言論的文題，表明自己不想書寫隨筆的意願。¹⁷³除了覺得隨筆誰都可以寫，或是做為逃避使用的認知之外，當時隨筆也被認為是作家進入文壇的預備工作，或老朽文士的收留之處，¹⁷⁴易言之，是一種不被重視的文類，是離開文學主流的文類¹⁷⁵。事實上，日本邁入近代文學之後便抬高了小說的文類地位，如柄谷行人就說得相當直接：

在日俄戰爭之後的日本，這些則被看成了所謂“純文學”。“純文學”者即“小說”。也就是說，小說以外的文類都被當成了“不純”。¹⁷⁶

鈴木貞美在論述《小說神髓》一書對文學一詞的使用時，也引用了坪內逍遙對於小說文章技法的看法：

逍遙在這裡論述：與“論文”、“記事文”、“歷史文”、“問答文”相比較，需要“千變萬化的文體”的小說文章，才可以說是文章中的文章。這裡的“文章”就是所謂文章技法的意思。¹⁷⁷

坪內逍遙出版的《小說神髓》一書不僅是自文體、文章技法方面抬高小說的文類

¹⁷³中野重治，〈隨筆厭惡〉，《雜記帳》第2卷第7號，1937.08。此處轉引自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7 日記・隨筆・記録》，頁293。

¹⁷⁴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7 日記・隨筆・記録》，頁284。

¹⁷⁵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講座7 日記・隨筆・記録》，頁283。

¹⁷⁶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183。

¹⁷⁷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175-176。

位置，更是以小說（此處專指私小說）為中心來思考日本近代的歷史觀，¹⁷⁸而《小說神髓》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其影響之深遠亦可想見。

從上述的種種討論可以得知，縱然隨筆有廚川白村的加持，得到了文類觀的確定，但在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中，小說才是論者主要關心之所在，隨筆頗遭批判抑或是不被重視。而此類側重於小說而非隨筆的文類觀也造成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在臺灣的日文語境中亦是用隨筆稱之）在臺灣的日本語文學當中實是不受重視的：

另外我覺得多刊登一些文藝新聞或隨筆之類的作品，使雜誌內容變化多端、生動出色，是很好的。¹⁷⁹

《臺日》與《日報》也刊登內地作家的隨筆等作品。而《南報》則除了文藝作品之外，也刊登雜文，因此或許不能稱之為純粹的文藝欄。¹⁸⁰

雜文亦是隨筆的另外一種稱法，¹⁸¹而根據上引可以發現，隨筆之為文類，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當中被視作是增添刊物趣味的文類，含有隨筆的文藝欄也因此不再「純粹」，可說是與上引柄谷行人的說法遙相呼應。此外，在綜評各種文類時，日治時期臺灣的評論家們，亦時常忽略隨筆的存在，列舉二例以做參考：

文藝的地盤從此喪失其在社會上共通的廣泛而健全的價值，不只是分裂得慘不忍睹，連文藝內部本身，在俳句、短歌、詩、小說之間，也各自四分

¹⁷⁸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頁 263。

¹⁷⁹宇津木智等，〈臺灣文學界總檢討座談會〉，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臺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254。

¹⁸⁰柳川浪花，〈寂寥的昭和十二年的本島文藝界〉，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頁 314。

¹⁸¹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 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學協會編，《日本文學講座 7 日記・隨筆・記錄》，頁 278。



應該由臺灣文學奉公會來編輯一本……亦即可稱之為文學奉公會的小說、詩、評論、劇作等各部門的機關誌的綜合文藝雜誌¹⁸³

島田謹二與西川滿等人，作為在臺日人日文作家、評論家，在日治臺灣文學當中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藉由他們的討論，很明顯地可以看到隨筆在諸多文類中缺席的情形。隨筆既然如此不受重視，而隨筆家就更不用說，觀察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組成，亦可說是缺乏了隨筆家的存在。¹⁸⁴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較不重視隨筆，此文類觀與重視散文的臺灣古典文學與中國五四文學皆不相同，乃是受日本近現代文學影響的結果。

小結

就筆者目前閱讀所及，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當中討論現代散文觀的篇章在數量上相當有限。就文類的側重比例而言，以《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一套四冊做一個簡單的觀察，很明顯地是小說佔走了大部分的篇幅，散文批評相當缺乏，楊雲萍更直指「在世間文藝評論家的眼裏，可能沒有隨筆的存在」。¹⁸⁵只不過，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界當中，人們是如何思考散文的，確實是令人相當好奇的問題。這個問題受限於文獻史料的缺乏而無法直接進行討論，故筆者採取另一種研

¹⁸²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關於在臺灣的文學〉，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91。

¹⁸³西川滿，「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西川滿等著，〈吾輩的主張〉，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429。

¹⁸⁴如「一直以來，彼此缺乏交流相知的機會，始終只是遠遠的互相觀望著學者、小說家、詩人、歌人、俳人，在這次會議中能夠認同彼此是決戰文學同志的事實。」有學者、小說家、詩人等等，就是不見隨筆家。齋藤勇等，〈吾輩的主張〉，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444。

¹⁸⁵楊雲萍，〈臺灣文藝界這一年〉，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490。

究方式來處理。影響論的問題，就是筆者找到的著手點。

現代散文無疑是臺灣新文學的一部份，而臺灣新文學又常被操作成是受了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才產生的。但倘若以現代散文為例，並以現代散文觀作為研究線索，則根據本節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影響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觀的生成來源至少有三，一是臺灣本地的古典文學脈絡，二是五四新文學脈絡，三是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脈絡，則不僅限於五四一格。其次，就文類的基本特質而言，散文究竟是作者言志抒情的產物，抑或得遵從關懷社會、積極入世的要求？換言之，散文究竟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對於這二個大方向，臺灣古典文學與五四新文學都有積極的討論，而日本近現代文學則是注重前者的文類特質。是故，當一個日治臺灣作家寫出深具「個人」或是「社會」特質的現代散文作品時，是否仍要按照以往一元論的說法將其風格直接接向五四脈絡？根據本節的討論，筆者認為這個答案會是否定的。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觀，具有多元承繼的影響脈絡，而設若逆向思考，當我們在探究這些背後的承繼淵源時，那麼也其實正是在釐清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觀的可能面貌。



第三章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的評析與重探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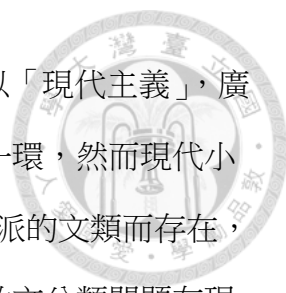
散文的分類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困惑著研究者的問題，也引起不少研究者的質疑，¹⁸⁶然而研究現代散文，似乎很難完全迴避這個分類的問題。對此，臺灣現代散文的知名研究者鄭明嫻，便洋洋灑灑地處理了現代散文的類型問題，最後竟成《現代散文類型論》¹⁸⁷一書，可知該問題的可討論度與重要性。然而，「散文的分類是否有其必要？」、「散文又當如何分類？」等問題卻又是在分類問題之前，不得不先處理的難題。以小說為例，綜觀一部臺灣文學史，至少可以找出寫實小說、反共小說、現代主義小說、鄉土小說等等小說類型，而這些冠在「小說」前面的各種分類，卻難以逐一應用在散文身上。現代小說的分類從何而來？基本上是隨著文學史上的創作美學觀、創作主義論而出現。無論是先有作品，隨後開創出文學創作與研究風潮，抑或是文壇上的特殊條件，使得創作往某一特定方向發展，都可以歸結到文學史的流變與小說息息相關的這一點上來，也可以說，小說的流變史，幾乎就等同於整體文學史的流變史。至於擔當如此之角色的為何是小說而非散文？我們可以從齊邦媛與陳芳明的論述中尋求此問題的解答。誠如齊邦媛所言，「散文不標榜主義，也甚少公開討論自己的技巧，對世事興衰、文壇風暴亦少有戲劇性反映」¹⁸⁸，這樣的觀點是就散文自身立場而言；至於陳芳明所謂「在一般人眼中，散文是旁枝末節，是副產品，是其他文類的餘脈，彷彿不值得全心投入」¹⁸⁹的說法，則是站在散文外部體察散文的處境。無論是在散文內部或外部視

¹⁸⁶如王鈺婷就曾經指出散文因為類型鬆散而造成難以定位的困擾，而游喚亦認為散文的分類是無止境、無可規範的。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楊錦郁紀錄，〈「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之五〉，《文訊》第32期（1987.10），頁148。

¹⁸⁷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

¹⁸⁸齊邦媛，〈四十年來台灣文學〉，邵玉銘、張寶琴、痲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5），頁21。

¹⁸⁹陳芳明，〈典範的追求——楊牧散文與台灣抒情傳統〉，《典範的追求》（臺北：聯合文學，1994），



之，散文與文學思潮與任何派別主義似乎都是脫節的。比方說以「現代主義」，廣義的現代散文，與現代小說、現代詩無異，都是現代文學內的一環，然而現代小說與現代詩皆另含有其狹義指涉，乃是作為表現現代主義、現代派的文類而存在，然而卻缺乏以「現代散文」指稱「現代主義散文」的用法，是散文分類問題在現代文學中藉由文類比較之後可以得知的困境。現代小說因為與各種主義保有最為密切的關係，所以小說研究者似乎不必過度操心小說分類的問題，因為在某某主義下的，便是某某小說。缺乏此項文類特質的現代散文，在分類上，自然多了一層難度。


其次是散文內部的發展史問題。就如同楊牧所指出的，「散文之為文類(literary genre)，只有漢文學傳統中才看得出它最顯著的重要性」。¹⁹⁰古典散文的應用層面十分廣泛，四部當中，不僅是集部存有大量散文經典，其他經史子三部又多以用散文寫成。再加上唐宋八大家對於古文的提倡，清代又有桐城派繼承，而明清一代小品一格亦蔚然成觀。諸多因素，都使得散文之為文類，在古典文學之中顯得相當重要，與作為「其他文類的餘脈」或是「非詩也非小說的殘餘物」¹⁹¹的現代散文相較，二者的文類地位猶如雲泥之別。也因此，研究者在思考現代散文的分類時，也不免會回過頭去參照古典散文的分類。然而，回溯古典的脈絡去尋求散文分類的參考時，卻又會遭逢到新的難題。鄭明嫻在建立自己的《現代散文類型論》之前，頗為仔細地爬梳過各家的散文分類主張，當中亦將古典散文的分類列入討論項目之中，但卻認為古典散文的分類並不適用於現代散文，主要的理由是鄭明嫻認為「古時對於文章的界定極為寬廣，因此文章的類別相當繁瑣，並不適合現代散文分類的參考。」又雖然「晚明小品所具有的文學素質較接近現代散文，現代散文，其分類仍嫌蕪雜」。¹⁹²鄭明嫻所謂的「文學素質」究指為何值得考慮，

頁 205。

¹⁹⁰楊牧，〈散文之為文類〉，《失去的樂土》（臺北：洪範書店，2002），頁 103。

¹⁹¹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鑰——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 12 期，1995.10，頁 148。

¹⁹²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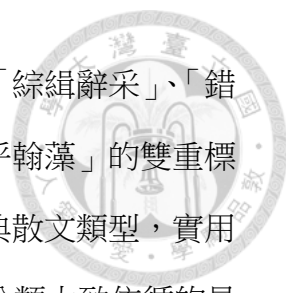
從「文章的界定極為寬廣」推測，鄭明娉或許認為古典的散文定義擴及了「文學」以外的範疇，因此不具備有現代散文中的「文學素質」。古典散文的確是具有多方面的實用性質，但事實上實用性質卻不一定會與文學性質相互衝突。以蕭統所編撰的《昭明文選》為例，作為中國第一本最早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的分類極其詳盡，此書共有六十卷，¹⁹³分別是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與祭文。除卻詩、騷等文類，《昭明文選》為古典散文劃出了五十餘種分類，其中如上書、墓誌、祭文等等，大部分是都是具有實用性質的文類。而再觀《文選·序》，則可以得知蕭統的選文標準：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¹⁹⁴

《文選·序》特別說明了之所以不選擇經史子三部的原因，其中，蕭統認為思想類的文章「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亦即缺乏文字運用上的經營，故而不選，

¹⁹³原書三十卷，後唐朝李善為之注，離成六十卷。

¹⁹⁴蕭統，《文選·序》，參考「中國基本古籍庫」的版本，斷句為筆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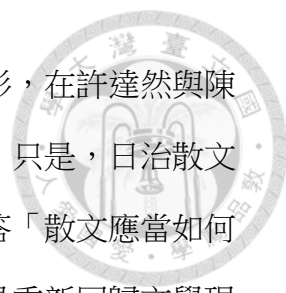


可看出蕭統對於文學藝術性的重視。在同一套標準之下，能夠「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的讚論與序述，一舉達到了「事出於深思」與「義歸乎翰藻」的雙重標準，自然便納入了《昭明文選》的選編之列。可見，這一些古典散文類型，實用歸實用，卻不缺少文藝上的表現要求。¹⁹⁵只不過，蕭統的散文分類大致依循的是文學功能的標準，每一種文類在古典社會當中有個別所屬的應用層面，但當社會體質已由古典邁入現代，再加上以文取士的單一功名進路亦已消失，散文的地位不再，同時散文的應用性也不再如此廣泛，是故確實是很難將古典散文的分類一套入現代散文的範疇。

只不過，蕭統《昭明文選》至少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散文確確實實是可以分類的，不用依照任何流派或是主義，就散文之為文類的各種內部性質面相本身，就可以找到分類的準則。實際上，從鄭明嫻的前行研究整理以及她對現代散文類型論的開拓便可以發現現代散文分類的多重樣貌。然而，倘若以本論文的研究立場出發除了散文是否可以分類之外，現有的散文類型論當中還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研究問題，以鄭明嫻為例，由於她贊同臺灣現代散文的五四源流論，導致她所謂的「現代散文」或是「現代散文類型」徹底缺乏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存在，而這個問題並不僅是鄭明嫻一人的問題，而可以說是體現在大多數現代散文研究者的身上。然而，這問題也同時反映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的迫切必要性與學術上的對話潛力。就筆者目前所見，有關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分類，僅許達然與陳建忠二人的研究較有深入性的涉及。在此，重新回到筆者一開始提及的二個問題：散文的分類是否有其必要？散文又當如何分類？倘若以目前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研究進行思考，那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則絕對是肯定的。散文分類的必要性不僅僅侷限於提供整理、研究的方便，¹⁹⁶對於不太為人所熟悉的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而言，類型論的提出更是有促進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認識論的幫助。

¹⁹⁵當然，自不是所有的這些散文類型都能夠「義歸乎翰藻」，不屬於這類的也就不在《昭明文選》的選錄範圍之列。

¹⁹⁶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33。



怎麼分類，就代表論者對於這一個時期、這一個文類的認知情形，在許達然與陳建忠的拓展下，已慢慢建立起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的規模。只是，日治散文這塊研究莽原尚存在許多待開發之處，本節的討論，將試圖回答「散文應當如何分類」的問題，首先針對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評述，接下來則是重新回歸文學現場，整理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的現代散文欄位，探究並組構日治臺灣文學的散文類型論與認識論。


第一節 現有分類評析

許達然的〈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一文，整體說來是一篇以散文類型論為研究主軸的論文，藉由對各式散文類型的討論，為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勾勒出大致的面貌。於論文第一段，許達然便帶出該文的主要討論架構：

本文簡述台灣 1920—1945 年中文和日文白話散文。先從散文語言問題談到問題散文，後略述社會觀察、人生探索、本地外地經驗，個己情愫、他人生活，和女性散文。¹⁹⁷

許達然在此所提到的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散文分類，筆者逐一循其論述順考察之後，發現論文中提到的可能類型其實超過許達然在這邊所提到的，對此，以下便一一加以討論。許達然最先提到的項目是「散文語言問題」，這一個項目雖然不是文類名稱，但卻也可以從當中延伸出對於散文類型的探討。因為不僅是散文可以分類，「散文的分類」也可以分類，例如將古典散文分成召、令、檄，或是祭文等等的分法，便是注重散文的實用與應用性格，屬於「功能類型」的法。筆者認為，許達然的「散文語言問題」，涉及到的則是「語言類型」的分法。

¹⁹⁷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



根據許達然的論述，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寫作語言共計「母語」、「中文」、「日文」三種。¹⁹⁸基本上，許達然對散文的日文寫作語言並沒有多談，主要是以陳沂、黃朝琴、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張我軍的言論，簡述臺灣人對於白話文與中國白話文的提倡，接著再述及黃石輝及郭秋生等人的臺灣話文主張，同時一併引用林瑞明的說法，認為「台灣大多數作家已無愧地和賴和一樣以『辛苦磨鍊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¹⁹⁹寫作了」²⁰⁰，略為帶到了當時在散文創作上的混語現象。只不過，許達然畢竟是以「語言問題」，而不是以「語言類型」作為該部分主要的討論對象，故沒有實際的作品分析，然而可以說大致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語言類型」畫了一個雛形：從他的討論中可以初步分為四類，臺灣話文散文、中國白話文散文、日文散文，以及混語散文。

接在「散文語言問題」之後的是「問題散文」，自此開始許達然正式進入了對於日治散文類型的討論。何謂「問題散文」？許達然如此定義：

散文最直接的表達是論述，都是作者執意影響聽者和讀者的。巴赫金認為至少有兩種論述：「權威論述」(authoritarian discourse)和「內涵說服論述」(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權威論述」要人服從，沒有想像的空間，和政權及制度連在一起；人們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拒絕。「內涵說服論述」把自己的話跟別人的混合在一起，有時代和現時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台灣作家否定外來的殖民權威論述以及在本地的守舊權威論述，而從事內涵說服論述。在這些有時代性格的內涵說服論述中，探討最多的也是社會、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我把這種散文叫做「問題散文」。「問題」(problematic)這裡不是阿爾杜塞所指的規範人們思考自成體系的架構，而指影響社會、

¹⁹⁸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3。

¹⁹⁹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63-64。

²⁰⁰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3。

政治、生活概括性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中心包括殖民統治和文化。²⁰¹

據此可知，「問題散文」作為散文的一種類型至少包含了二種層面，一是功能的，二是內容的。在功能方面又可細分成幾個細項：「問題散文」是要用來（一）、論述，（二）、影響讀者，（三）、表現時代感與現時感，（四）、抗拒殖民與本地守舊的權威論述，（五）、探討社會、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至於內容方面，即是指該類散文表現了有關於社會、政治與思想基本問題的內容。易言之，「問題散文」即是「功能類型」與「內容類型」的綜合，但前者的特質較多也較為明顯。此外，除了「功能」與「內容」之外，許達然所謂的論述其實很接近古典散文中的「論」與「說」，也可以視作是一種「文學表現」（議論表現的文字），在這邊姑且稱之為「表現類型」，而「表現類型」很多時候會與「功能類型」重疊，較難做出一個確切的定位。以論述來說，「論述」本身就是一種文學「表現」，但同時又可以達成影響讀者或是抗拒權威的種種「功能」。在「問題散文」之後的討論中，又可以分出「諷刺散文」、「嚴肅散文」與「抒情散文」等類型，²⁰²但許達然對於這些類型的「功能」層面論述不像「問題散文」一般具體而完整，故以下將這些類型權宜性地歸類為「表現類型」。²⁰³

有關「諷刺散文」的部分，許達然認為「如果我們『散文地』想，我們就會懷疑我們的生活能夠有一個有系統的模式。豈止懷疑，還要諷刺所不同意的」²⁰⁴，而日治時期多稱「散文」為「隨筆」，而「隨筆」最大的招數就是諷刺。²⁰⁵有關「嚴肅散文」的部分，許達然則是提到江文也的〈作曲的美學的觀察〉是一篇談藝術的嚴肅文章，而林秋梧以嚴肅中帶有輕鬆的筆法談論佛教，張深切與楊草仙則是


²⁰¹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4。

²⁰²此外尚有「幽默散文」或是「閒話散文」等等，但許達然對於這些部分的討論甚少，故此處暫且不論。

²⁰³要特別說明的是，在許達然的論文中，並沒有這種確定的類型名詞出現，這些「○○」散文都是由筆者整理並自行命名的文類名稱。

²⁰⁴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5。

²⁰⁵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5。



嚴肅地談戰爭及勞工的問題。而最嚴肅的散文則是檢討臺灣人的性格，如蔣渭水、莊泗筌、陳虛谷、徐坤泉、張文環等人的散文作品，皆可歸諸此類。²⁰⁶至於「抒情散文」的部分，許達然指出「散文在日據台灣，除了論述外，隨筆抒情，無所不至」，並且認為「散文不抒發感情和思想就輸給詩和小說了」²⁰⁷如翁鬧的〈歌時計〉，在「思念時，異鄉的音樂鐘也響著和從前的調子一樣的老歌。回憶委婉動人，有著抒情的苦澀和哀愁」。²⁰⁸另外，「抒情」亦常與「沉思」結合，對此，許達然便舉了陳逢源、蘇維霖、董祐峰、夢湘、廖漢臣、邱炳南、張冬芳等人的散文為例來進行說明。²⁰⁹綜此，「諷刺」、「嚴肅」與「抒情」這三類看似不歸屬在許達然於論文開頭所述的「社會觀察、人生探索、本地外地經驗，個己情愫、他人生活，和女性散文」數類當中，但是實際上如「抒情」一類便與許達然所謂的「個己情愫」甚有關聯，只是論述的角度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分類情形，這也顯示了散文類型之間不必然因為性質的不同就全然無有交集，甚至有些時候「功能」、「表現」與「內容」等類型的重疊性甚高，但這卻也不代表就可以因此就不談類型之間的分梳，主要仍是要看論述者所側重的部分為何，如「個人情愫」的部分應歸於「內容類型」，但若就文學表現手法來看，無疑就是抒情的「表現類型」。

接下來則是進到許達然在其論文開頭特別標舉出來的幾個類型，也就是「內容類型」的討論。首先是「社會觀察」。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當中有不少是以臺灣社會作為書寫的內容，也多以社會問題為主，考察這些散文，亦可以得知當時臺灣社會之群相。如陳虛谷寫拜金主義，黃得時揭露社會的不公、禮教的虛偽與文學的反動，周定山寫舊文人的腐敗與弊端等等。²¹⁰「人生探索」的部分涉及的層面較雜，如徐坤泉〈雨與人生〉提到「天且不稱人意，何況做個人，當然是更不能稱人意」呈顯了人生的無奈，而張我軍探討人的生死，蔣渭水則談人的欲望，龍


²⁰⁶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9-21。

²⁰⁷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9。

²⁰⁸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9。

²⁰⁹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9-31。

²¹⁰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6-17。



瑛宗〈時間的嬉戲〉則進到人的意識層面，討論人對於時間的感覺。²¹¹「本地外地經驗」類型的散文，則是以地方、空間為主要的書寫內容。「本地」方面，如劉克鵬寫〈台灣八景〉（八仙山、鵝鑾鼻、太魯閣、淡水、壽山、阿里山、基隆港、日月潭），張星建寫阿里山，周金波寫基隆，石暘睢寫安平，菊仙寫霧社，龍瑛宗寫花蓮與新竹北埔。「外地」方面，郭明昆與張我軍寫北京，丘念台與吳濁流則是寫南京，雞籠生寫上海，翁鬧與吳新榮寫東京，還有黃朝琴書寫馬來半島。²¹²「個人情愫」類的散文，多以表現作者個人的種種情思為主，如蘇維霖寫自己的瘋狂，董祐峰寫自己的愛情，廖漢臣寫自己的淒涼，邱炳南寫自己的慵散等等。²¹³「他人生活」的部分，則是散文作者將書寫的觸角從自己伸及他人，如施乾寫〈乞丐底問題〉，SM生寫〈可憐的老車夫〉，黃師樵寫臺共人物，楊朝枝寫貧人與富人的差距，吳新榮寫自己的亡妻，楊逵則是書寫賴和。²¹⁴最後是「女性散文」的類型，這個類型頗有特殊之處，在內容上，確實是以女性為書寫對象，然而許達然所謂的「女性散文」是指「日據台灣女性用散文寫出她們的情境和觀點」，不僅涉及「內容」，更關係到「作者身分」。據此延伸而出，「作者類型」應也是一種散文類型的分法。「女性散文」的部分，則有林雙隨、黃璞君、張淚痕、楊千鶴、黃鳳姿等作者，呈顯出對於女性社會地位、受教權、女性心緒、女性觀察等等方面的投入與關心。²¹⁵綜上，可以從許達然的研究中化整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可能類型：「語言類型」、「功能類型」、「內容類型」、「表現類型」與「作者類型」；散文不必因循文學史的流派主義走才能分類，透過許達然的論文，我們便能得知散文可以如何依照其內部特質的各個面相來進行類型論的建構。

接續於許達然之後，另一位對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卓有貢獻的研究者是陳建忠，前者是日治散文的綜論，後者則是針對賴和這一個個案的專論。只是，陳建忠這

²¹¹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8-19。

²¹²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5-28。

²¹³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9-30。

²¹⁴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31-32。

²¹⁵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34-37。




一篇〈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雖然是單一作家作品的探討，但於前言仍然先做日治散文的概述，並在許達然的研究基礎上，延伸出另一套類型論的可能，以下便專門針對這個部分進行討論。

上述許達然以「散文最直接的表達是論述」來表述的「問題散文」，作為一種散文類型，包含了「功能」與「內容」層面。而包含二種特質也就代表在類型命名與歸屬的考量上有二個選擇：「論述散文」與「問題散文」。「論述」接近「功能」層面，意指該散文類型主要用來論述；「問題」接近「內容」層面，亦即該散文類型的書寫內容以社會、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為主。或許是因為要與之後表現「內容類型」的諸多散文類型，如「社會觀察、人生探索、本地外地經驗，個己情愫、他人生活，和女性散文」接軌，所以許達然對這類散文的命名也就側重於其「內容」性質，故以「問題散文」名之。然而，許達然與陳建忠二人的論文架構不同，思考的方式也略有差異，故陳建忠重視該類散文「功能」層面，傾向於使用「論述散文」命名：

許達然認為，日據時期存在許多探討社會、政治、思想等基本問題的散文，他引用巴赫金的理論說明，這些散文是為了否定外來的殖民以及本地的守舊權威論述（authoritarian discourse）而發展出來的內涵說服論述（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因此許達然把它們稱為「問題散文」（problematic prose）。如果以較明顯的例子來說，《台灣民報》系列的「社說」或類似的論述應該就是問題散文，但這類我稱為「論述散文」（discursive prose）的「散文」，似乎是偏重在思想與政治、社會問題上的，文學似非所重；雖說好的論述推理自有其「藝術」主焉，但我仍傾向將之放在「論述」一類來討論較為恰如其分。²¹⁶

²¹⁶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6。



陳建忠並未說明「文學似非所重」的這類散文要稱為「論述散文」而不是「問題散文」的必要性，但筆者認為，對於「論述」與「問題」的選擇，即代表對於「功能」與「內容」的不同側重。事實上，如同筆者於上述所申明過的，不同的散文類型之間絕非截然二分的存在，也可以說，依照論述需要或是行文筆法，對於同一批散文類型概念的認知很可能會出現流動的情形，就如同陳建忠順著上引文脈引出他對「知性散文」的分類概念時所提到的：

不過這類問題散文如果把它視之為白話文運動過程中，一種接近散文文學的演練，則許多以思考時代問題，不出之以論述的形式，又不乏文學技巧的散文，就可以用「知性散文」(intellectual prose)來做描述。當中，像蔣渭水描寫「治警事件」的〈入獄日記〉就是。²¹⁷

相當有意思的是，上引二段文字其實是接續在一起的，陳建忠剛提到要將許達然的「問題散文」改稱為「論述散文」，在此處卻又使用「這類問題散文」的用法。「論述散文」與「問題散文」之間並非前後矛盾，主要是此處陳建忠以「問題」作為脈絡，要帶出同樣是以思考時代「問題」為主的知性散文，在筆法的調整上，則就回到「問題散文」的稱法。而透過上引可以得知，在「論述散文」之後，陳建忠所提到的第二個散文類型便是「知性散文」。「知性散文」可以視作「論述散文」的「文學改良版」，也就是雖然以「問題」為主題，但較諸「論述散文」更為側重文學性，因此行文不乏文學技巧的散文。同時，既然名為「知性散文」，此類散文也多少帶有「知性」的成分，如陳建忠就援引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對於林獻堂〈環球遊記〉的評價，認為〈環球遊記〉「為台灣帶來很多歐美最新的見聞，知性的味道強烈，是一篇很好的散文」。²¹⁸可以說，「知性」與散文「內容」

²¹⁷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6。

²¹⁸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相關（歐美最新的見聞），但亦與「表現」手法不無關係，若要為「知性散文」這一類型分類，「內容」與「表現」類型二者都可以選擇。而從上引「論述的形式」一句，也可以說「論述散文」一類除了是「功能類型」之外，也不妨視作具有重視文學形式表現特質的「表現類型」。

在處理完「論述散文」與「知性散文」之後，陳建忠接下去提出「抒情散文」的概念：

台灣散文較大的開創應該還是「抒情傳統」的建立，因為小說與新詩在反殖民的旗幟下都有較偏知性的傾向，習慣關於反殖民議題的「大敘述」的書寫（雖然台灣論述基本上是被壓抑的）；散文則因為較為「個人化」與具有「隨意性」，無形中可以看到作者較為抒情、私密的一面，「小我」書寫反倒豐富台灣新文學的面貌，所以偏於抒發感懷的「抒情散文」（lyric or emotive prose）就成為另一類重要的散文。當然，「知性散文」當中未必沒有個人感懷，但作者的重點卻沒有放在經營描寫感情一面；就像抒情散文未必沒有個人的知性思考，但其表現方式則又不是在經營說理。²¹⁹


陳建忠所謂的臺灣散文的「抒情傳統」，不是中國古典的抒情傳統，²²⁰亦非周作人所謂可以抒情的美文，或是戰後以抒情為基調的美文傳統，更非王德威試圖轉化引渡的現代抒情傳統。²²¹陳建忠在檢討臺灣散文源流論時，即反映出他對「臺灣散文」自身脈絡的強調，而此處陳建忠雖然並沒有特別說明，但「抒情傳統」作為一個詞彙或是方法論概念本身即具有一定程度的「中國」意味，故陳建忠在運用「抒情傳統」一詞時即刻意不從任何「傳統」的脈絡來說，而是來自於一種對

集》，頁 196-197。

²¹⁹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7。

²²⁰有關於中國古典抒情傳統的討論，可參考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²²¹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於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狀況的把握，並透過與小說、新詩的比較，突出散文的抒情特質。筆者推測陳建忠的論述邏輯並簡而言之如下：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散文當中的一類是以抒發作者個人感懷為主要取向，此類便稱「抒情散文」，而這類「抒情散文」寫在日治時期，亦即臺灣新文學的發端，也是臺灣現代散文的發端，故而具備了「傳統」的位置。²²²此外，陳建忠在引文當中亦提及「抒情」與「知性」之間可能互涉的問題，當一篇散文二者皆具，則在實際的歸類上，陳建忠認為可依照該文該作者較為側重何者而進行選擇。而由於陳建忠在「抒情散文」的這部分提到「經營描寫」與「表現方式」等問題，故其論文所述之「抒情散文」應是側重在「表現」的層面。

最後，陳建忠的類型論涉及「雜感」、「雜文」與「隨筆」：

當然，有許多散文並無法遽然以知性或抒情來分類，它們在篇幅上都顯得較為短小，感性知性並包，實際上較屬於「雜感」、「雜文」、「隨筆」。周定山的〈一吼居談屑〉（1931）共十五則，正是名符其實的寫些身邊瑣事，有讀書心得、時事批判、生活心得。²²³

換言之，由於這類「雜感」、「雜文」與「隨筆」在「表現」上是感性知性並包，在「內容」又涉及各種層面，因此無法遽然分類。但「雜感」、「雜文」與「隨筆」的共同特色是篇幅短小，「篇幅」因而就可以成為分類的另一種標準，在此姑且以「篇幅類型」名之。

與許達然相較，陳建忠的論文明顯更具有對於散文類型論，以及藉由類型論產生研究對話的意識，他認為「上述許多類型散文，可以說是挑戰了傳統古文的典律，除了在形式上取法西方隨筆散文的自由特點外，也更具有現代意識與感

²²²至於日治散文的「抒情傳統」要如何與戰後抒情美文相連結比較？本論文於第五章第三節處理楊千鶴與張秀亞散文抒情方式的部分，會稍微觸及這個議題。

²²³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7。

性」。²²⁴即與「古典」對話，並與「西方」及「現代」做出連結。是故散文的分類是否有其必要的問題，透過陳建忠的研究應可以得到更為肯定的答案。而無論是許達然或是陳建忠，都針對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應當如何分類的問題，示範了一次回答的可能方式。

第二節 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分類與當時的散文認識

許達然與陳建忠二人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建立了不少類型，若再次為這些類型進行分類的話，則大致可以統整出「語言類型」、「功能類型」、「內容類型」、「表現類型」、「作者類型」以及「篇幅類型」，每一種類型即代表一種散文的內部特質，也代表一種論者思考散文的進入方式。只是，除了後世研究者的整理歸類之外，筆者亦相當好奇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分類是如何被時人所思考、所認識的？雖然就筆者目前觀察所及，日治時期如同許達然與陳建忠一般直接為散文進行整理歸類工作的論者相當缺乏，但還是可以透過當時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來觸碰到這個散文認識論的問題。誠如上述，筆者認為分類對於認識日治散文有很大的幫助，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屬於當時文學現場的分類實例，整理這些欄位名稱，也不失為增進對於日治散文的一種認識。另一方面，由於許達然與陳建忠的日治散文研究乃是以臺灣人作者書寫的散文為主，未曾涵蓋在臺日本人作家的散文，而在當時雜誌刊物多由日本人所主導的情況下，考察日治時期雜誌刊物（含臺人日人作品）中的散文欄位，則又可以填補在散文分類方面，許、陳二人因研究視野所產生的可能不足之處。以下，筆者將利用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資料庫進行檢索，根據檢索結果盡可能地找出當時候雜誌刊物的各種散文欄位名，並且列舉出具有相關散文專欄名的刊物名稱²²⁵：

²²⁴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郭懿雯編，《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8。

²²⁵以下皆是在該資料庫專以「專欄名稱(hd)」進行關鍵字搜尋的結果。



(一)、隨筆：POTABIN、THE FORMOSA、UTOPIA、凡聖、南の十字星、南音、厚生事業の友、台灣佛化、台灣刑務月報、專賣通信、文藝台灣、新竹州時報、旅と運輸、星座、未完成、民眾法律、水利協會報、理蕃の友、社會事業の友、臺南州自動車協會、臺日グラフ、臺法月報、臺灣之產業組合、臺灣公論、臺灣刑務月報、臺灣婦人界、臺灣教育、臺灣產業組合時報、臺灣畜産會會報、臺灣自動車界、臺灣藝術、臺灣警察時報、臺灣運輸月報、諸羅、諸羅城址、陽光、高雄州時報、高雄時報。(共 38 種，585 筆)

(二)、隨想：なみき、台新、台灣食糧經濟新聞、新竹州時報、旅と運輸、臺灣之產業組合、臺灣公論、臺灣婦人界、臺灣教育、臺灣文學、臺灣產業組合時報、臺灣畜産會會報、臺灣藝術、臺灣警察時報、部報。(共 15 種，158 筆)

(三)、感想：人形、新竹州時報、社會事業の友、糖業、臺灣公論、臺灣婦人界、臺灣教育、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報、部報。(共 10 種，113 筆)

(四)、漫錄：五十會、法政公論、臺法月報、臺灣、臺灣文藝、臺灣經濟雜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關、財海。(共 9 種，930 筆)

(五)、漫筆：旅と運輸、演藝とキネマ、社會事業の友、糖業、臺灣刑務月報、臺灣水産雜誌、臺灣自動車界。(共 7 種，175 筆)

(六)、小品：POTABIN、なみき、人形、婦人と家庭、新竹州時報、臺灣日日寫真画報、臺灣刑務月報。(共 7 種，12 筆)



- (七)、散文：なみき、紅塵、臺灣文學、臺灣警察時報、諸羅城趾。(共 5 種，30 筆)
- (八)、紀行：臺灣教育、臺灣水產雜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諸羅。(共 4 種，60 筆)
- (九)、漫語：短歌雜誌原生林、臺法月報、臺灣刑務月報、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共 4 種，44 筆)
- (十)、日記：厚生事業之友、新竹州時報、社會事業の友、臺灣婦人界。(共 4 種，8 筆)
- (十一)、雜錄：林學季報シルビア、臺法月報²²⁶、臺灣之產業組合。(共 3 種)²²⁷
- (十二)、短文：紅塵、臺灣刑務月報、臺灣愛國婦人。(共 3 種，96 筆)
- (十三)、隨感：新竹州時報、旅と運輸、臺灣產業組合時報。(共 3 種，36 筆)
- (十四)、書簡：短歌雜誌原生林、紅塵。(共 2 種，15 筆)
- (十五)、漫言：臺灣協會會報、臺灣自動車界。(共 2 種，7 筆)
- (十六)、放言：臺灣警察時報。(共 1 種，19 筆)

²²⁶《臺法月報》中〈女囚物語〉、〈天賦惡性論(四)〉、〈旅行日記より(一)〉三文所屬於「雜錄」一欄，惟「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誤植為「雜談」，在此予以說明。

²²⁷大部分的「雜錄」很多是法規、契約、研究論文等等，屬於這些部分的已先大致濾除，故此項亦不列檢索筆數。



(十七)、漫文：臺灣水產雜誌。(共 1 種，6 筆)

(十八)、雜談：民眾法律。(共 1 種，2 筆)

(十九)、偶感：新竹州時報。(共 1 種，1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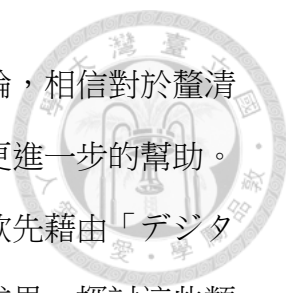
根據日治時期雜誌刊物散文欄位的檢索結果，大致可以整理上述十九類散文欄位名，而這十九種名稱欄位名稱，在日治時期的使用方式中不一定僅限於欄位本身，亦可以作為散文的題目。比方說以「隨筆」為例，諸如寺井春夫〈隨筆〉²²⁸、磯部茂雄〈隨筆〉²²⁹等等，就是直接以「隨筆」作為文章題名，而如小林敏郎〈田莊隨筆〉²³⁰、林定〈山中隨筆〉²³¹等等，則是以該散文的內容主題再加上「隨筆」二字來創造題名。也因此，上述的括號中種數、筆數僅供大致上的參考，因為有些期刊沒有隨筆欄，但卻刊載「隨筆」作品，因此實際上的數量會超過上述所統計的。此外，還有一些散文分類的名稱不在專欄名出現，而在題名出現，如「雜筆」、「放話」、「偶語」、「筆に任せて」、「雜感」、「雜記」、「手記」、「雜文」等等，若將這些名稱也放進散文類型名稱來計算，那麼在數量上就超過了二十五種以上。誠如筆者上述所言，對於散文名稱的命名，背後所反映的即是對於散文的想像與認知，而散文名稱的眾多，亦表示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認識既是豐富的，但同時也是混亂的，而不像戰後一般慣以「散文」進行統稱。對於臺灣現代散文史而言，日治時期是一個類型多元混雜的階段，但同時也可能是最具有類型論研究潛力的時期。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當中，存在這二十餘種散文類型，換言之，就可以說因此存在了認知散文的二十餘種方式，由於缺乏直接的史料論證，這二十餘種類型

²²⁸寺井春夫，〈隨筆〉，《臺灣建築會誌》，第 3 輯第 1 號，1931.01。

²²⁹磯部茂雄，〈隨筆〉，《樂友》第 2 期，1938.12.26。

²³⁰小林敏郎，〈田莊隨筆〉，《海響》第 3 卷第 9 期，1935.09.30。

²³¹林定，〈山中隨筆〉，《久須乃木》，第 10 期，1939.08.05。



或許無法一一討論明白，但筆者仍然嘗試運用現有材料予以討論，相信對於釐清目前為止仍然有待繼續建構的日治散文類型論與認識論，會有更進一步的幫助。而在將這二十餘種類型名稱視作散文類型予以討論之前，筆者欲先藉由「デジタル大辞泉」與「日本国語大辞典」二大日本辭書資料庫的檢索成果，探討這些類型原有的詞語名稱概念：

(一)、隨筆：將自己的見聞、體驗、感覺等等，以自由的形式隨筆而致的文章。

(二)、隨想：想到什麼就整理寫下來的文章。

(三)、感想：心中所感覺到、所想到的。

(四)、漫錄：不帶任何目的書寫記錄下來的文章。

(五)、漫筆：想到什麼就隨意寫下來的文章。

(六)、小品：將日常生活中所見事物，用類似素描的筆法予以描寫的文章，或是整理偶發的感想而成的精巧短文。

(七)、散文：不依照韻律或是固定形式的一般文章。

(八)、紀行：將旅行中的體驗、見聞、感想等等貫串起來書寫的文章。

(九)、漫語：與「漫言」同。



- (十)、日記：每天發生的事情或是感想的記錄。
- (十一)、雜錄：諸多事情的隨意書寫、記錄。
- (十二)、短文：短小的文章。
- (十三)、隨感：時而獲得的感想。
- (十四)、書簡：信、書狀。
- (十五)、漫言：沒有經過深刻思慮的發言。
- (十六)、放言：不考慮對他人的影響等等，想到什麼就說出口。
- (十七)、漫文：將想到的事情寫下來，沒經過整理的文章。
- (十八)、雜談：輕鬆地述說各式各樣的內容。
- (十九)、偶感：不經意在心中浮現的感想。
- (二十)、雜筆：書寫雜而多的事情的文章。
- (二十一)、放話：〔案：查無結果，應與「放言」相近〕
- (二十二)、偶語：與他人之對話。



(二十三)、筆に任せて：〔案：即日文「隨筆」的白話解釋〕

(二十四)、雜感：雜而多的感想。沒有經過整理，維持想到時原樣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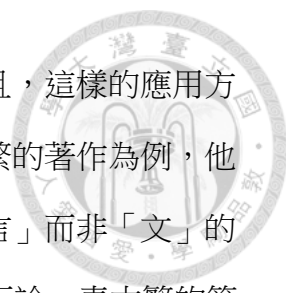
(二十六)、雜記：寫下各式各樣的事情的文章。

(二十六)、手記：根據自身的經驗、感想所寫下的文章。

(二十七)、雜文：沒有經過統整的文章，或是指非專業性的，輕鬆隨意寫成的文章。²³²

綜覽上述二十七種詞語解釋，可以發現並不是每一個詞語都確切地指涉一種散文類型，除了隨筆、隨想、漫錄、漫筆、小品、散文、雜錄、短文、漫文、紀行、日記、書簡之外，其他諸如感想、隨感、漫語、漫言、放言、雜談、雜筆、放話、偶語、雜感、雜記等詞語，基本上是描述一種情形、狀態、概念，抑或是代表一種表述、書寫的動作，又如漫語、漫言、雜筆、雜記等詞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動詞，而非一個安穩固定的名詞。只不過，倘若不以如此嚴謹的角度觀之，我們也可以說這二十七種名稱全部都代表一種概念，一種對於書寫以及對於散文的概念。實際上，這二十七種名稱本是由筆者自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或是散文題名整理而來，在當時的文學現場，這些名稱無論原來是動詞或是名詞，無論是已經確切指涉為一種散文文類，或是僅是一種情形、狀態、概念，皆已被當時視作為散文類型的命名方式。又由於這些名稱背後所反映了書寫、散文概念，也

²³²以上二十七種的詞語解釋，皆由筆者自「デジタル大辞泉」或「日本国語大辞典」檢索選譯得來，Shogakukan Inc.，JapanKnowledge 資料庫，<htt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最後檢索日期：2014.01.23。



因此可以說是當時散文作者對於「散文」的二十餘種認知。並且，這樣的應用方式並不僅侷限於單篇散文作品，以當時在臺日人隨筆作者青木繁的著作為例，他便使用「放言」這樣一個描述狀態的，且甚至在概念是接近「言」而非「文」的詞語，來為自己的散文集《山人放言》命名。²³³若就該書題名而論，青木繁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森林生活者の手記》，而被視作《森林生活者の手記》第二部的《山人放言》，題名的「山人」應與「森林生活者」同義。而透過二書前言的作者自敘，可以觀察到青木繁選用「手記」與「放言」這二種散文文類名稱之概念，與他的散文集性質相當符合：

在這本書當中，著者〔案：即青木繁本人〕寫下了於大正五年自離開札幌的求學生涯後的森林生活，主要是以山或是樹為對象，寫出像是感想、思念、追憶那樣的事情。²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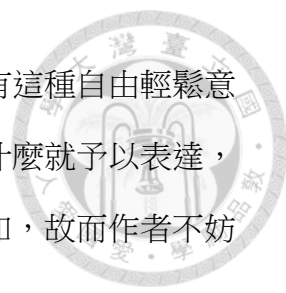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山人放言》就是「山人放言」的意思，是我的森林生活的一次里程碑。樹木的精靈怎麼看待，並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²³⁵

上述二十七種詞語名稱雖然有些是解釋是大致重合的，但大部分的文類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特性，手記既然是「根據自身的經驗、感想所寫下的文章」，也就是比起其它文類更加強調作者本人經驗的重要性，故青木繁選擇《森林生活者の手記》來為該書命名就相當合適。本論文第四章將會提及，青木繁一生中最為精華的青壯年時期都奉獻給了臺灣的山林，誠然不愧「森林生活者」之名，其散文基於作者自身豐富而長久的山林經驗，相當符合「手記」一詞的定義。至於「放言」的定義則是「不考慮對他人的影響等等，想到什麼就說出口」，而青木繁認為「樹木

²³³青木繁，《山人放言》（東京：三浦書店，1929）。

²³⁴青木繁，《森林生活者の手記》（臺北：船橋寬一，1926），未標頁數。引文由筆者節譯。

²³⁵青木繁，《山人放言》，頁2。引文由筆者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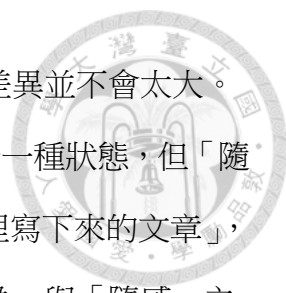


的精靈怎麼看待，並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的態度，則相當具有這種自由輕鬆意味。面對山林，青木繁的行文態度頗為自在，想說什麼、想寫什麼就予以表達，因為木靈對自身寫出來的文章想法會是如何，實際上也無從得知，故而作者不妨就「放言」。

此外，雖然無法考察日治時期每一個散文作者在使用各自的文類名稱時所懷抱的標準，但從青木繁自敘中「《山人放言》就是「山人放言」的意思」一語，可以想像當時的散文作者雖然一方面會選擇較為符合自己文章意圖的名稱概念來運用，但另一方面這樣的選用也可能是相當直覺性的、不具有什麼嚴格的文類規範標準的選擇，也因此像是「放言」這樣的一個比較接近某一情形狀態，而非描述一種固定文類定義的詞語，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散文概念，而被用來當作某一散文文類的名稱。除此之外，感想、隨感、漫語、漫言、雜談、雜筆、放話、偶語、雜感、雜記等詞語，應亦是相同的情形。放話雖然查無解釋，但「言」和「語」意近，借用漫語與漫言即是相同意思的這一點來說，放話應可作放言解。放言、放話、漫語、漫言這四類加上雜談一類基本上性質相近，言、語、談三組字詞，分別搭配上放、漫、雜等概念，表示一種輕鬆的表述方式，只是「放」更強調脫口而出的性質，「漫」則強調散漫或是隨意的感覺，「雜」則是側重於數量上的多與紛雜。作者對這些字詞的感受與認知，也勢必會影響其選用時的「直覺」。至於感想、隨感、雜感三類則是另一組相近的概念，感想指的是人的「感」覺與「想法」，隨感與偶感則更為相近，都強調一種感想的偶發性。偶語則較為特別，「偶」並非做「偶然」、「偶發」解，而是有匹對、相對之意，突出敘述者的聆聽對象，但這並不一定指涉散文作者於行文中必須要營造「你」與「我」的對話，²³⁶而是將聆聽對象視作讀者，因此是散文中的敘述者我對於讀者的「偶語」。

以上是針對在辭書解釋中尚未形成一種散文文類概念，但確切可以做為散文文類名稱的詞語之論述。從某方面來說，這些詞語也不妨視作形成固定文類名稱


²³⁶如對山樓〈偶語〉一文，就沒有採取這種方式。對山樓，〈偶語〉，《臺關》第3期，1906.07.01。



指涉前的過渡狀態，畢竟這些「待形成」與「已形成」之間的差異並不會太大。以感想、隨感、雜感一類來說，三者辭書的解釋上都只是指涉一種狀態，但「隨想」一類，卻已經具有了固定的文類定義，指涉「想到什麼就整理寫下來的文章」，「隨想」應可視作由「感想」一詞加上「隨」的概念而來的詞彙，與「隨感」之間概念應無過多差異。由筆者上述對於日治期刊中的散文欄位整理結果來看，之所以「隨想」能成為正式的文類名稱，而「隨感」還尚待成形，理由可能是因為二者在使用者數量上的差距，「隨想」的 15 種 158 筆，確實是多於「隨感」的 3 種 36 筆，也多於「感想」的 10 種 113 筆。²³⁷一個詞語要形成確切的文類名稱，會有眾多複雜的因素需要考慮，也需要更多歷時與共時的考察與佐證，筆者在這邊只是想要說明雖然在辭書的定義中，上述二十七種詞語雖並非全然都是文類名稱的指涉，但在實際的文學現場上都是被作為文類名稱而使用，「待形成」與「已形成」之間的差異，可能亦不會太大。

關於「已形成」的部分，除了剛才已經提及的「隨想」之外，尚有隨筆、漫錄、漫筆、小品、散文、雜錄、漫文、雜筆、雜記、紀行、日記、書簡等類。在這當中，雜錄、雜筆、雜記三類頗為相近，都是針對散文書寫內容的「雜」與「多」的性質而論。除了「雜」之外，名稱帶有「漫」字性質亦有不少，如漫筆便與漫文一類相近，皆是強調內容的自由，想到什麼都可以寫下的特質。此外亦不重視經營，不但內容不須刻意整理，筆調亦可以隨意而致，正是發揮了「漫」字含意，而與上述隨想一類含有「整理」性質的意涵相異。有趣的是，漫筆與漫文的「漫」，與雜文的「雜」在此頗有相通之處，因為雜文是指「沒有經過統整的文章，或是指非專業性的，輕鬆隨意寫成的文章」，亦顯出了此類散文在內容與筆調上的自由。至於漫錄的「漫」字指涉則略有不同，此類側重的是散文書寫的目的性，可用「漫無目的」來簡而言之，代表書寫目的的不受限制。

²³⁷當然，數量的多寡是思考詞語概念是否成形為文類名稱的可能因素，而非絕對的條件。而日本文學本身的情況如何，也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相對於「隨」、「雜」、「漫」等類型的隨意與自由，有一類的散文則較為注重文章經營，此類即為小品，小品的定義是「將日常生活中所見事物，用類似素描的筆法予以描寫的文章，或是整理偶發的感想而成的精巧短文」，是一個不僅在筆法上，並且在內容上都頗為注重的一種文類。「精巧」二字亦概括了小品對於文字精密度，還有章句組成，以及文章體裁上的經營要求。不過，從上述的定義中，可以得知小品其實也可以算是短文當中的一類，而短文一類的性質，即是望文生義便可以得出的「短小的文章」。這類散文的性質包括廣泛，只要是在篇幅體製上符合「短小」規格的文章即可。至於，究竟何種標準才能算是短小？日治時期雜誌《紅塵》在「作品募集」上的規定，可以提供一種參考。該刊在「募集作品種目」中即有短文一項，所徵稿的短文包括「小品文、はかき文²³⁸等」，至於字數則規定在「二十二字詰三十行以內」²³⁹，換算成實際字數即為 660 個字以內。只不過，「短小」畢竟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光是呈現短文字數，對於「短小」的說明仍稍微欠缺說服力，但倘若將短文與散文相較，即可理解「短小」之概念。《紅塵》對於「散文」徵稿的字數限制則是「二十二字詰百行以內」，以短文的三十行來相較，確實可以對「短小」的概念較有掌握。至於「散文」作為散文之一類，²⁴⁰則意指「不依照韻律或是固定形式的一般文章」²⁴¹，乃是標舉出相對於韻文等類型的概念，著重在散文不受韻律或是任何形式限制的這一點。


在諸多的日治時期散文類型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非隨筆一類莫屬，在數量上可謂壓倒性地超出其他類型甚多。換言之，在所有的散文類型當中，隨筆是最

²³⁸はかき（はがき）即明信片之意，はかき文指的是像明信片一樣短小的文章，這一種文類亦可視為散文的類型之一，特別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還有「はがき隨筆」專欄，著名作者如金關丈夫、黃鳳姿、龍瑛宗、張文環等人都曾在該專欄發表過文章。はがき一般即為明信片之意，可以歸於書簡類，將「はがき」跟「隨筆」結合，則是《臺灣日日新報》特有的設計，未在當時其它的雜誌刊物上見到，《紅塵》的徵文雖然有提到「はかき文」，但觀其目次及欄位，似乎沒有特別的「はかき文」一欄，而以「短文」統稱之。而本節基本上以「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為檢索，故未將此類放到上述的二十七種之中，但はかき文確實可以視作一種散文類型，在此特別說明。

²³⁹《紅塵》第 1 期，1915.06.01。

²⁴⁰日本文學當中的「散文」概念有廣有狹，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的討論。

²⁴¹雖然《紅塵》對於「散文」的字數有所規定，然而就雜誌的頁數篇幅而言，字數的規定是必須的。散文畢竟是自由的散行文字，較之注重字句的精緻程度詩歌俳句一類，確實是有字數限制的必要。




多作者選擇的文類，隨筆的性質意涵，因而也是最被大部分的作者所接受的散文定義。思考當中的原因，除了應與隨筆本來作為就是做為日本文學的代表文類之一，²⁴²而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又深受日本文學影響有關之外，相信與隨筆「將自己的見聞、體驗、感覺等等，以自由的形式隨筆而致的文章」的定義本身亦不無關係。隨筆不像小品一樣對於散文的筆法、內容、題材等層面有經營上的要求，而無論是在內容也好、形式也罷，都採開放、自由形式的標準，完全符合「隨筆」或「隨筆而致」的詞語意涵。日治時期的隨筆作者身分從文學的專業領域擴及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²⁴³這些非文學專業的執筆者，當他們要進到散文創作的領域，「隨筆」的文類名稱暗示性，以及於實際內容及形式上皆開放自由而不受限制的性質，會成為最多作者選擇的一個文類，自然是不難理解的。²⁴⁴最後，則尚有紀行、日記與書簡。這三種文類都是具有特定內容或是形式的散文文類，就紀行而言，其性質意涵與隨筆十分相像，只不過將體驗、見聞、感想等等限定在與旅行相關的內容。同樣的，日記也是特定內容的散文文類，以每天發生的事情或是感想為主，在形式上，則有受到日期時間的規範。至於書簡一類，內容方面沒有規定，只不過此類散文需要以書信形式構成。

根據筆者一路討論下來，可以發現這二十七種散文文類或多或少都擁有自己的文類特色，也都各自代表了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對於散文在內容、形式、篇幅、體裁……上的諸多想像與認識，尤其是每一種分類之間的差異並不太特別明顯，代表當時的散文作者或是刊物編輯對於散文整體面相的認識與想像，以及各種細類之間的文學分工皆相當細緻。只不過，誠如筆者上面所述，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認識論既是豐富的，但同時也可以說是混亂的。對於散文的想像與認識雖然

²⁴²「總之相較之下，像日本這樣擁有長遠的隨筆文學歷史，創作出大量作品，並且始終具有能夠對之品鑑賞味的國民的國家，在世界各國中是沒有的。借用當時的流行語來說的話，或許是可以這樣稱呼的：『隨筆，這個深具日本性的事物』」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0。

²⁴³關於這一點，本論文第四章將會有所討論。

²⁴⁴比方說，《臺灣警察時報》的「讀者心血號投稿規定」所刊載的徵稿文字就特別向投稿者說明了該刊物的隨筆欄是「對於誌友諸君來說最為自由的活動舞臺」。《臺灣警察時報》第 10 號，1930.05.15。



細緻，但這卻是綜觀全體之後才能得出的結論，從單一或是個別部分的刊物觀之，各種散文文類之間則可能具有複雜的從屬關係，文類與文類之間也常被視作同樣，或是可以混用、替換的名稱概念。此外，合用文類名稱的情形亦不少見。在文類的從屬關係上，如《財海》的漫錄專欄收錄了蝸生的〈鸞鳩漫筆〉²⁴⁵，《五十會》的漫錄專欄則同時收錄了冷飯小僧的〈小僧放言〉與山石正文的〈方圓漫筆〉²⁴⁶，《臺灣鐵道》的雜錄專欄收錄了靜濤生的〈日記の一節〉²⁴⁷，《臺灣之產業組合》則收錄了青陵的〈蘭陽三郡紀行記〉²⁴⁸等等。而在替換、混用的情形方面，以《臺灣警察時報》的徵稿為例，該刊在第4號是徵求以下的文類：小論文、小說、物語、散文、長詩、漢字〔案：應為「漢詩」誤〕、短歌、俳句、川柳、俚謠、民謠、笑話、漫話、寫真。²⁴⁹而在第10號則是徵求論文、小說、物語、隨筆、長詩、漢詩、短歌、俳句、川柳、俚謠、民謠、笑話、漫話、寫真。²⁵⁰二相對照之下，便可以發現除了小論文與論文之間的差異外，這二期所徵稿的文類都是一樣的，惟散文這一類型替換成了隨筆。就順序而言，第10期的隨筆與第4期的散文順序是一樣的，皆在物語之後、長詩之前。而就徵稿篇幅而言，第4期的散文與第10期的隨筆同是一千字以內，一人限定二篇。是故，對於《臺灣警察時報》的編輯者來說，散文與隨筆基本上同樣的文類概念，彼此之間因而可以替換，二期的徵稿也因此產生了名稱混用的情形。至於合用文類名稱的情形更是經常出現，如《臺灣警察時報》的「隨筆散文」欄²⁵¹，《臺灣鐵道》上火牛子的〈隨感隨筆〉²⁵²，《第一教育》上永溪生的〈隨感雜錄〉²⁵³，《臺灣公論》上的「紀行漫文」欄²⁵⁴等等。就雜誌欄位而言，二個文類名稱的合用，尚有可能是代表該欄接受該二種類型的

²⁴⁵蝸生，〈鸞鳩漫筆〉，《財海》第29期，1908.10.05。

²⁴⁶冷飯小僧，〈小僧放言〉；山石正文，〈方圓漫筆〉，《五十會》第12期，1935.12.25。

²⁴⁷靜濤生，〈日記の一節〉，《臺灣鐵道》第43期，1916.01.01。

²⁴⁸青陵，〈蘭陽三郡紀行記〉，《臺灣之產業組合》第21期，出版年不詳。

²⁴⁹《臺灣警察時報》第4號，1930.0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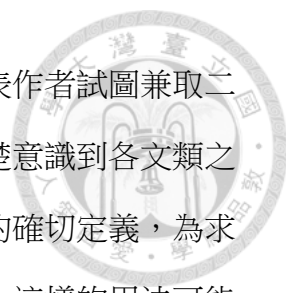
²⁵⁰《臺灣警察時報》第10號，1930.05.15。

²⁵¹《臺灣警察時報》第216號，1933.11.01。

²⁵²火牛子，〈隨感隨筆〉，《臺灣鐵道》第86期，1919.08.01。

²⁵³永溪生，〈隨感雜錄〉，《第一教育》第3卷第6期，1924.06.30。


²⁵⁴《臺灣公論》第3卷1期，1938.01.01。



投稿，但倘若就單篇文章來說，這一種名稱合用的情形，即代表作者試圖兼取二種文類特質來定義自己的散文，就積極面來看，可能是作者清楚意識到各文類之間的分際，但若就消極面視之，也有可能是作者並不清楚文類的確切定義，為求心安，故而並列二種文類，盡量求得面面俱到。然而無論如何，這樣的用法可能讓文章的定調變得清楚，但在各個文類間的差異情形已經頗為微妙的情況下，合用的文章題名也有可能造成讀者在理解上的混淆。

小結

由於研究成果的缺乏，使得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整體樣貌長期處在一片渾沌之中，以此就現階段而言，散文類型論的建構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促進認識論的增長。許達然與陳建忠的研究，舉出了不少分類，並實際對作品實例展開了討論，不但展現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分類可能，也可說是為後人開出了數條建構日治散文類型論的可能道路。而若再針對許達然與陳建忠所提出的各種散文分類進行「散文類型的分類」的話，那麼則可以歸類出「語言類型」、「功能類型」、「內容類型」、「表現類型」、「作者類型」以及「篇幅類型」等數種可行的散文分類方式。這些類型包含了大部份探究日治散文類型論的研究視角與思考途徑，對日治時期現代散文而言，在類型論，乃至於認識論方面，皆是重要的學術成績。只不過，倘若回歸文學現場，則可以發現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本身對於散文的認知與分類則較少在二人的研究中呈現，並且又由於二人的論文主要是以臺灣人作者所書寫的散文作品為研究範疇，另一批數量龐多的在臺日人散文作品則被忽略，是故本章於第一節進行完對於許達然、陳建忠二人的類型論評析之後，接著第二節便以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的散文欄位以及作品題名為材料，整理出二十餘種當時的散文類型，並認為當中同時反映了日治散文作者或是刊物編輯對於散文的二十餘種認知，於是嘗試對於當時散文類型論的既豐富又混亂的樣態予以更進一步的討論，



也試圖藉由類型論的建構，再為日治散文的認識盡一份心力。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無論是筆者從許達然、陳建忠的論文中所整理出來的各種散文類型，或是自日治文學現場還原的諸多散文類型，彼此之間皆不是涇渭分明的關係，且經常存在著重疊與交混的情形，然而這正也體現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豐富度，這些混雜的分類也可能因此產生出新的類型；再加上仍未被許達然、陳建忠以及筆者所論述的類型亦有可能存在。以上種種，在在顯示出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日後的研究潛力與發展可能。

第四章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的文類源流意義



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相關研究當中最為缺乏者，應屬當時之日文隨筆。追究遠因在於散文研究在小說研究長期佔據學界版圖情況下缺乏，散文研究當中又受美文傳統以及「五四→臺灣戰後」源流說的影響，使得日治時期現代散文不受重視。而以近因來看，則是學界未注意到當時在臺日人即有大批隨筆創作。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研究，以及日文隨筆不為人所關注，則反過來思考，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研究建構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建構之後的發展性，都不容忽視。

而除了日文隨筆使還未被挖掘之外，筆者認為，造成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研究極其缺乏的原因，也與日治時期對於文類的重視程度不同有極大的關係。小說自是目前學界研究的最大宗，當時無論是日文／漢文、雅正／通俗、新／舊等領域的分野，小說創作都極其可觀。以日文創作為例，就作者與發表場域來說，龍瑛宗、西川滿、張文環、濱田隼雄等小說家都是當時文壇之佼佼者，主要的文學刊物諸如《文藝臺灣》、《臺灣文藝》等等也都是由這些人所創辦，刊載的主要也是小說作品。縱使這些作者皆有寫作隨筆，但在質或量上都遠比不上小說，他們時常討論或是致力經營的，也從不是隨筆而是小說。如同許達然所說的，當時的文學創作者，執意於小說，隨意寫散文。²⁵⁵賴和、楊守愚等人的新文學雅正漢文小說，或是魏清德、謝雪漁等人的舊文學通俗漢文小說，以及吳漫沙、徐坤泉等人的新文學通俗漢文小說，都是此一文類的代表。賴和更被推崇為臺灣新文學之父，而通俗小說無論新舊皆廣受歡迎，現今更逐漸受到研究者所重視。²⁵⁶除了小說，詩之為文類在當時亦為大宗，根據黃美娥的研究，舊詩（古典漢詩）是日治時期

²⁵⁵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4。

²⁵⁶這方面可參考黃美娥、林以衡、呂淳鈺、蔡佩玲、王俐茹、王品涵等人的研究。


文學創作當中數量最為龐大的，²⁵⁷諸如張我軍、楊華等人亦以中國白話文寫作新詩，楊熾昌、西川滿等人則以日文創作新詩，除此之外，更有大量的日文短歌、俳句在《あらたま》《ゆうかり》等雜誌上刊載。因此以文類來說，臺灣文學研究者最重視小說，其次便是詩了。

散文方面，則亦有古典漢文散文與現代散文之分別，現代散文當中，又可分為漢文白話散文以及日文白話散文。在臺灣文學本身的脈絡而言，自明清以降，到日治時期的古典漢文散文自有其脈絡可循，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也頗為可觀。²⁵⁸漢文白話散文方面，則是少數的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研究當中較受到關注的部分，相較之下，日文白話散文，也就是本章所要討論的日文隨筆，則仍乏人問津。就以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一文來說，也只有涉及到臺灣人寫的日文隨筆，日本人作者的日文隨筆則不見討論。倘若我們根據現今的文學史著作以及文學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勾勒上述關於日治時期小說、詩，以及部分散文的面貌，那麼我們對於日治時期的日文隨筆則充滿未知。在臺灣文學史邊界逐漸擴大，西川滿、濱田隼雄等在臺日人，甚至是佐藤春夫等旅臺日人都已放進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予以討論的現況下，這一批為數可觀的日文隨筆，理應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注意日治時期日文隨筆，有哪些作者進行創作？發表在哪些地方？書寫什麼內容？這些基本的問題，是建構此領域研究的第一步。故本章第一節便從作者群、發表場域、書寫題材三方面對日治時期日文隨筆進行概述。至於第二節則是在概述之後以青木繁這位作者進行個案研究，試圖為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研究建立起基礎。

第一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創作概述

²⁵⁷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

²⁵⁸臺灣古典散文的研究，可參考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與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學生書局，2009）等書。



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特色之一即是作為寫作語言的日文，但也因為如此，長久以來被排除在以「五四→臺灣戰後」為源流論主導的臺灣現代散文研究之外。然而，如今要對臺灣現代散文源流論開展新的對話，以日文寫作的日治時期日文隨筆，就是極其重要的對話對象與例證。日本以及臺灣的作者在臺灣這片土地共同投入創作，產生出大量的隨筆作品，且這一批作品不受五四影響，而是與日本文學的淵源較深。然而現階段研究仍對此一領域充滿未知，是散文史上相當大的空白，當我們要貫串 1920 年以降的臺灣現代散文史，²⁵⁹日治時期的作家群、發表場域、書寫題材則值得我們觀察，這也能夠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戰後散文的一些特定書寫現象，如女性作家的出現、自然寫作的興起、美文作為散文主流傳統等等，在爬梳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並勾勒出其輪廓之後，原先的定論將受到挑戰，散文史的版圖亦會重新更動。

一、作者群

根據吉田精一的研究，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的隨筆共可粗分作三類，一是作家（小說家）隨筆，二是詩人隨筆，三則為評論家、學者所書寫的文章。吉田精一提到，在這個時期一般社會人士的隨筆尚屬少數，多由專門的作家、詩人所創作，再來就是一些學者以及評論家。²⁶⁰然而，自昭和時代以降（1926~1989），這種情況則有了很大的變化。日本隨筆在昭和時期蓬勃發展的現象，是千百年來所未曾見，於是吉田精一將昭和時代稱作「隨筆時代」。²⁶¹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廣義的文藝趣味不再只限於狹窄的圈子而向社會展開，報紙、雜誌等傳播事業興盛，以及活字印刷變得自由等等，於是使得專門的文士之外的社會人士的執筆機會增多。並且在邁入現代社會之後，社會的組織變得愈來愈複雜，各方面的

²⁵⁹臺灣現代散文史是由 1920 年代以降的說法，請參考陳萬益選編，《國民文選·散文卷 I》，頁 11。

²⁶⁰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96-106

²⁶¹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06。

常識之需求愈來愈大，於是對於各個領域人士的感覺、知識、經驗等也就有所需求。²⁶²對比臺灣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形。臺灣當時的活字印刷以及大眾傳媒的自由度都不比日本內地，²⁶³但因為日本殖民統治同時也帶進了「殖民現代性」，²⁶⁴進而將臺灣從一個前現代社會打造成了現代社會；再加上從日本來了很多各方面各領域的現代社會人士進駐／入住臺灣，使得臺灣的日文隨筆發展具有與日本近似的條件，而事實上，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確有相當龐大的作者群，且大部分都並非是專業的文學作家。

相較於小說或是新詩，作為散文類的隨筆，是一種平易近人的文類，且自由的形式、語言、風格本是隨筆的性質。當各個領域的社會人士需要並想要表達他們的感覺、知識、經驗之時，比較不會選擇必須「執意」創作的小說、新詩，而自然是會選擇「隨意」即可書寫的隨筆。²⁶⁵以「隨筆」為關鍵字，檢索《臺灣日日新報》便可以管窺這一批龐大作者群的組成面貌。舉凡醫學博士、理學博士、農業大學教授、公學校學生、臺大文政學部講師、商工獎勵館長、商人、臺北二中教諭、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劇作家、警務局保安課翻譯官、童謠詩人、臺北帝大教授、文藝家、律師、臺北帝大圖書館司書官、米國領事館通譯官、獸醫、畫家、高等法院覆審部部長、實業家、電力會社電器部長、音樂家、郵便局局長、軍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專長領域，經驗興趣等等，書寫隨筆作品。以共時性的觀察來說，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其他文類，諸如小說、新詩等等，其作者群都遠遠不及隨筆作者群來得可觀。這至少形成了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二個特色，一是相較於小說、新詩，隨筆由於具有來自各行各業的作者，整體來說，隨筆之為文類的社會參與度比其他文類高出甚多，隨筆不是文壇、文學界、象牙塔內的產物，雖然不至於人人（包括無產階級）皆有參與，但相對來說，作者群的豐富帶

²⁶²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06。

²⁶³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的活字印刷與傳媒，可參考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新聞學研究》第 109 期（2011）。

²⁶⁴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的「殖民現代性」，可參考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²⁶⁵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4。

出的是創作題材與視角的多元。誠如許達然認為散文是社會的鏡子，²⁶⁶而雖然小說、新詩未必就不是社會的鏡子，但由於社會高度地投入隨筆創作，也使得這一個文類鏡子的角度多、視野大，亦將文學與社會的距離拉得更近。

第二個特色即是非專業作家的出現，帶出的是與美文傳統的對話。五〇年代的美文作家大部分是「主婦作家」，²⁶⁷也就是身兼主婦與作家兩種身分，但這與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情況則略有不同。五〇年代的主婦作家們，確確實實是在文學史上以「散文家」的身分被認知、認同的，諸如張秀亞、艾雯、琦君等人，更是著作等身，結集出版了許多散文集。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作者群則有所不同，他們可能身兼學院教授與隨筆作者二個身分，但他們的主要身分是前者，而不是作為一位「隨筆家」被世間或是評論界認同²⁶⁸，大部分的作者也沒有成為「隨筆家」的意思，散見於報刊雜誌的隨筆作品，也僅有少數結集出版，如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陳逢源《感想集 雨窓墨滴》、龍瑛宗《孤独な蠹魚》、金閔丈夫《胡人の匂ひ》、丸井妙子《たゝかひの蔭に》等等。²⁶⁹這也使得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當中極少存在「美文」，因為隨筆作為業餘時間「隨意」的創作，對於文字鍛鍊、字句經營、段落安排等等，不如當時的小說家、詩人，也不如戰後的美文作家們的謹慎認真，因此，依各自的專業所寫作出來的日文隨筆，知性風格的散文多，抒情典雅的美文則較少，這是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基本情態。故而美文實則是戰後才被發明的「傳統」，倘若要談臺灣現代散文史的「傳統」，那應該將時間點拉至比戰後更早的日治時期，便可以發現被美文傳統所排斥的各種「非美文」，其實才是臺灣現代散文的傳統。而本章專論日人日文隨筆的部分，具有戰鬥及批判風格的散文則留待本論文第五章再詳加論述。

²⁶⁶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21。

²⁶⁷關於主婦作家的說法，可參考許珮馨，《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與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

²⁶⁸檢索「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可以發現，「隨筆家」只有兩條項目，「小說家」則為數眾多。顯然當時還沒有什麼「隨筆家」出現。

²⁶⁹可參考河原功編，《台灣隨筆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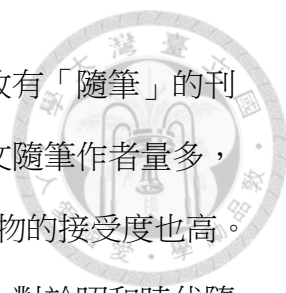
二、發表場域與書寫題材

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作者群龐大，作者身分多元的特色，其實也相合於隨筆的發表場域與書寫題材的豐富性。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主要散見於當時的報刊雜誌，以「隨筆」為關鍵字檢索相關資料庫，可以發現大量隨筆作品的存在。例如漢珍版《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中，有 592 筆關於「隨筆」的項目。而在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當中，則有 2185 筆。雖然筆數並不代表實際的發表數量，實際上不以隨筆標註為題名或專欄名，但確實為隨筆作品的文章會比檢索結果所呈現得更多，但檢索出來的結果亦可以作為一個參照。以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為例，可以藉此比較隨筆與小說在發表場域數量上的差異。在本論文的「附錄一」中，筆者以較為精準的檢索方式，也就是將檢索條件限制在「題名」以及「專欄名」，並以「隨筆」、「漫筆」²⁷⁰、「小說」為關鍵字，檢索刊物數量，得到了以下六組結果：

- (一)、日文隨筆（以關鍵字「隨筆」進行題名搜索）：65
- (二)、日文隨筆（以關鍵字「漫筆」進行題名搜索）：50
- (三)、日文小說（以關鍵字「小說」進行題名搜索）：40
- (四)、日文隨筆（以關鍵字「隨筆」進行專欄名搜索）：37
- (五)、日文隨筆（以關鍵字「漫筆」進行專欄名搜索）：7
- (六)、日文小說（以關鍵字「小說」進行專欄名搜索）：28

檢索的詳細情形請參照「附錄一」的整理，就以上六組結果來說，刊載以「隨筆」、「漫筆」為題名的作品的刊物，比起「小說」的檢索結果遠遠多出 25 及 10 種；

²⁷⁰隨筆是該文類的總稱，其他諸如漫筆、雜記、漫錄、閑話、漫語、筆記、獨語等等，都可以用來稱呼此一文類。參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7-8。而此處挑選較具代表性的隨筆、漫筆進行檢索。



專欄名方面，收有以漫筆為專欄名的作品的刊物雖然較少，但收有「隨筆」的刊物亦高出收有「小說」的刊物 9 種。換言之，由於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作者量多，書寫題材豐富，創作視角亦廣，加上寫作的自由度較高，故而刊物的接受度也高。使得各形各色的刊物都願意刊載隨筆作品，而借鏡上述吉田精一對於昭和時代隨筆的說法，社會愈趨複雜的結構，加上大眾傳播的風行，而有多種刊物的產生，故而這些刊物也會需要這些隨筆作品，以上這些因素皆讓隨筆比小說有更多數、多元的發表場域。

至於這些刊載隨筆的刊物共可分成哪些性質？也是需要釐清的問題。根據「附錄一」的整理，可以大致歸類出以下幾項：郵務、文藝、稅關、佛教、刑務、經濟、書誌、專賣、戰爭宣傳、旅行、運輸、水利、演藝、社會事業、糖業、法律、農業、林業、產業組合、山岳、建築、教育、水產、消防、自動車、地方自治、警務、通信、鐵道、礦業、財務、同人俱樂部、樟腦、海務、醫學、神道教、基督教、社會教育、理蕃、女性、餐飲、文化、菸草……換言之，除了純粹的文藝雜誌之外，刊載有日文隨筆的日治刊物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種層面。

各行各業的作者，各形各色的刊物，幾乎也就直接等於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書寫觸角涉及了當時社會各個層面，書寫題材之廣泛可想而知。關於日治時期日文隨筆書寫之題材，本文在第三章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當中予以探究與分析，本章第二節進行的是日治時期日文隨筆的個案研究，也就是青木繁這一位隨筆作者，做為日治時期臺灣的森林學專家，青木繁在繁忙工作時間之外書寫有關臺灣山林與自然的隨筆，並將作品發表在《臺灣山林會報》、《臺灣の山林》、《新高阿里山》、《臺灣山岳》等刊物上，作者、作品、發表場域都以山林自然為線索而串連在一起，且質與量俱可觀，而本論文亦欲藉此個案在臺灣散文的自然寫作層面上，思考日治與戰後散文結合討論的問題。

第二節 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個案研究：青木繁的自然書寫²⁷¹



青木繁這個名字在臺文學界仍然陌生，但他是日治時期森林學、林業、樟腦種植與製造的重要人物，如楊騏駿《日治前期臺灣樟腦業的發展-以產銷為中心的觀察(1895-1918)》²⁷²、張雅錦《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²⁷³、曾台甫《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²⁷⁴、陳德仁《臺灣大學實驗林沙里仙區楠櫛林帶臺灣赤楊林族群結構之研究》²⁷⁵、吳明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1921-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系譜為中心》²⁷⁶、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等相關領域的學位論文，都曾經論及或是引用青木繁的著作。李文良更曾經提及青木繁與奧田彥、田中長三郎三人分別是帝國大學中林業、農業與園藝部門的代表性人物。²⁷⁷然而，在臺灣文學的研究中，唯有在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以及江明慧《觀光·凝視·阿里山：以日治時期臺灣漢詩文與圖像為分析場域》二本學位論文當中有出現青木繁的名字，但前者只是引了青木繁《新高山のしをり》來製作當時新高山的登山口行徑路線表，²⁷⁸後者則僅引用青木繁《阿里山所感》來說明阿里山

²⁷¹本節能夠完成要感謝中興大學圖書館校史組黃文彥先生幫忙查詢青木繁生平資料，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文良教授告知相關文獻之館藏，北海道大學大學文書館山本美穗子女士無償提供大量青木繁的相關書籍史料，國東市役所秘書廣報課田川幸伸先生協助找尋青木繁家人的聯絡方式，新店劉愛珠女士分享青木繁擔任新竹州林務課長時期的事蹟，以及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市川譽惠同學協助修改筆者往來的日文信件。最後，對於青木弘先生親切告知其父親的生平事蹟，並提供珍貴的照片與資料，致上誠摯謝忱。此外，本節曾以「垂直臺灣、森林禮讚與蕃山印象：青木繁（1893-1985）自然書寫研究」為名發表於「2013 第十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感謝大會提供機會及評論人給予的意見啟發。

²⁷²楊騏駿，《日治前期臺灣樟腦業的發展-以產銷為中心的觀察(1895-1918)》(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²⁷³張雅錦，《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²⁷⁴曾台甫，《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2010)。

²⁷⁵陳德仁，《臺灣大學實驗林沙里仙區楠櫛林帶臺灣赤楊林族群結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研究所，2005)。

²⁷⁶吳明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1921-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系譜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5)。

²⁷⁷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271。

²⁷⁸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03。



在當時之所以被稱為「林業村」的起源。²⁷⁹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研究者關注青木繁的隨筆創作，其生平梗概亦不甚明朗，然則根據筆者的整理，青木繁除了有大量關於日治臺灣林業的論文之外，於日治時期共發表了 120 篇左右的隨筆（少許篇章重複，請參考附錄二），其中大多數以臺灣的山林自然為寫作題材，知性色彩濃厚的隨筆有之，善盡描寫抒發情感的隨筆亦有之。除此之外，亦將其隨筆結集，在臺北、東京等地出版，著作常見於當時報刊雜誌之新刊介紹。不但其第一本隨筆著作《森林生活者の手記》出版後廣受好評，青木繁的隨筆亦被時人讚譽為「立於森林文藝門內的一家之言」。²⁸⁰故無論是在質或量上，青木繁的隨筆作品皆相當可觀。過去以來，談到日治時期的自然寫作，幾乎就直接等同於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等人紀行文學，藉由青木繁這個個案開發，不但可以找出不同於鹿野忠雄等人的自然書寫樣態，更可以藉此擴充日治時期自然書寫的研究範疇，還原日治時期自然書寫在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並與戰後自然書寫之研究做積極的學術對話。

一、青木繁與臺灣山林


臺灣以令人感謝的山姿態存在著的這一點，的確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大部分的島民都居住在平地，也沒有進行垂直式的旅行，那便是不明瞭垂直臺灣的真正價值。²⁸¹

臺灣是受群山環抱的島嶼，從平原到高山，海拔的高低造成氣候條件的不同，讓臺灣這塊土地擁有林相植被的豐富變化。歷來有許多作家觀察、行走、生活、

²⁷⁹江明慧，《觀光・凝視・阿里山：以日治時期臺灣漢詩文與圖像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 21。

²⁸⁰未標著者，「圖書紹介 青木繁「山人放言」」，《臺灣山岳彙報》第 1 卷第 5 期（臺北：臺灣山岳會，1929），頁 37。

²⁸¹青木繁，〈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本節所引述的青木繁的文字，皆由筆者所譯，避免繁瑣，以下不再特別加註說明。




感悟於臺灣山岳自然當中，留下了質量俱可觀的文學作品。自然書寫因而成為了臺灣文學當中重要的範疇。青木繁（1893-1985），一位 1916 年來臺的日本人，長期活躍於臺灣的山林之中，為臺灣留下了大量的隨筆作品；其隨筆大部份書寫他對臺灣山林的深深熱愛，並描繪出臺灣山林的動人之處。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自然書寫方面，誠如吳福助所指出的，日本領臺之際，有許多日本人深受臺灣山林所吸引，深入踏查之後留下了許多紀行著作，如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鳥居龍藏《探險臺灣》、森丑之助《生蕃行腳》、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田中熏《臺灣的山與蕃人》等等。²⁸²就文體而言，這些著作是學術報告，但同時也可以視作紀行散文，因而以文學的視角來看，日治時期的這一批作家作品，實是臺灣自然書寫史中重要的一環。只不過，除了這些作者以外，無論是在學術史或是文學史中，日治時期都還有許多名字等待後人挖掘出土，如吳永華就曾經下過扎實的考證工夫，讓當時幾位為臺灣貢獻良多的日本植物學者如金平亮三、佐佐木舜一等人重新為世人所認識。²⁸³筆者則是在偶然之間，於日治報刊雜誌上發現了青木繁，察其作品質量，理應亦可成為臺灣學術史（特別是森林研究這一塊）以及文學史當中值得予以重視的一個嶄新個案。

青木繁，1893 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大分縣國東町。1913 年 3 月畢業於私立東京中學。1916 年 7 月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札幌農科大學林學實科，同年 9 月來臺，於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工作。同年 12 月短暫從軍一年。1918 年擔任專賣局坪林樟林作業所主任、魚池樟林作業所主任。1921 年轉任到臺北州工作。1923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助理教授，1932 年升任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任大學教職期間，與「蓬萊米之父」磯永吉為同事，曾開授「造林學及實習」、「森林保護學」、「熱帶林業論」、「林學大意」、「造園學」、

²⁸²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頁 56。

²⁸³吳永華，《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7）。



「林學特別演習」、「森林法規」、「林學苗圃」等課程。²⁸⁴1936年離開學院，1937年被任命為專賣局技師，兼任玉里樟腦試驗廠長，亦兼任於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技師，負責樟腦生產、樟樹造林之業務。1938年轉任臺中州地方技師，兼任臺中州林業試驗廠長。1941年前往海南島任職於海南警備府，從事林業觀察與研究。1943年回到臺灣，擔任新竹州林務課長，並兼任新竹州林業試驗廠長，活躍於當時林業的第一線。1945年住家受到空襲，所有財產付之一炬。在臺期間亦為臺灣山岳會理事，經常從事登山活動，除此之外，亦喜愛尺八之吹奏，上山時亦會隨身攜帶尺八。日本戰敗後，作為技術人員曾被國民政府徵用，但因為語言問題以及次子驟逝等因素，1946年4月返回日本九州，擔任國東農業高等學校講師、國東町農業協同組合長、大分地方裁判所調停委員、縣勢振興審議會委員等職。1951年當選大分縣議會議員，1958年當選國東町長。此外，亦長期擔任大分縣林業技術普及協會理事，大分縣港灣協會、土地改良協會、森林審議會等理事或委員職務。青木繁在臺期間即提倡健康飲食，回日本後擔任大分玄米自然食研究所所長，長期推廣食用無農藥蔬菜以及糙米，於1985年以93歲高齡辭世。²⁸⁵

學術著作方面，青木繁著有《臺灣林業上的基礎知識》、《臺灣林政問題三題》等書，他在臺灣森林研究上的貢獻，並非筆者專業，待有關領域學者探究。本節處理的是青木繁以臺灣山林或是原住民為主題的自然書寫之隨筆作品。1916年青木繁大學畢業來臺之後，除了短暫的從軍經驗，始終與臺灣的山林有很深的淵源。無論是從事大學教職或專賣局實務工作，青木繁都可以說是活躍在臺灣林業的前鋒，且他輾轉於各地，對於臺灣多處的山林亦相當熟稔。青木繁的隨筆作品，按照筆者目前的統計，從他1927年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林想漫筆」專欄開始，到日本戰敗前一年的1944年8月截止，約有120篇隨筆作品問世，其中大多數與

²⁸⁴李文良曾指出青木繁與奧田彥、田中長三郎三人分別是帝國大學中林業、農業與園藝部門的代表性人物。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頁271。

²⁸⁵關於青木繁生平，參考《臺灣經濟往來》第8年第11輯（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會，1939）；青木繁先生米壽紀念刊行會，《米寿と回想》（東京：榕畔會，1981）；榕畔會校史編集委員會，《榕畔會史——台灣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東京：榕畔會，1978），以及對於青木弘先生及劉愛珠女士的訪問成果。

臺灣的山林相關。²⁸⁶

在《森を顧みて》(回首森林)出版之時，青木繁曾經這樣表達了他對臺灣山林的想法：

臺灣的自然，特別是臺灣的山與森林對青年期的筆者來說，是十幾年以來，同時也將會是今後心靈的極大安慰……山或森林，是筆者教育、技術、思想的泉源，換言之，那正是筆者的職業、生活與興趣。也因此可以說回顧筆者的人生，是不曾一日沒有存在過山或森林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山、森林能讓筆者體驗到幸福。²⁸⁷

青木繁的知識專業與人生興趣在於森林，故其在臺灣發表的自然書寫多集中於臺灣的山林，我們可以藉由上述這段自述得知青木繁對於臺灣山林的喜愛以及熱忱。青木繁在九州的故鄉風景秀麗，水田遍佈，四周亦屢有丘陵，加上向西望去可見兩子、文珠二座山岳儼然聳立，這樣環境可以說是從小就培育了青木繁與山林自然的緣份。²⁸⁸而這緣份一路從日本延續到了臺灣。青木繁於 1916 年自札幌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之後，就透過鄉里前輩元田肇的介紹來到了臺灣專賣局工作，²⁸⁹故他在日本所學習的森林的專業知識，以及熱愛自然的那一顆心，都在臺灣得以發揮、實踐、體驗。每天的所知所感都是臺灣的山林，無論是回顧或是展望人生，臺灣的自然山林都是他心靈的極大安慰。青木繁直到日本戰敗後的 1946 年才歸國，也就是說他人生的青、壯、中年時期都奉獻給了臺灣的山林。返日之後，青木繁轉而致力於健康飲食的提倡，著作亦多與此相關，考其一生以山林為主題的自然

²⁸⁶青木繁隨筆主要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以及《臺灣山林會報》、《臺灣的山林》等雜誌上，120 篇左右的篇數是筆者在這三個資料庫的檢索成果，當中因為史料文獻的保存不易，以及青木繁在臺住家遭受空襲轟炸，著作因而毀盡等原因，合理推測其隨筆創作應當超過這個數字。

²⁸⁷未標著者，「新著案内森を顧みて青木繁著」，《臺灣山林會報》第 62 期（1931），頁 54。

²⁸⁸關於青木繁對於故鄉的描寫，可以參照其自傳散文〈自敘傳〉，收錄於青木繁先生米寿記念刊行會，《米寿と回想》，頁 31-33。

²⁸⁹青木繁先生米寿記念刊行會，《米寿と回想》，頁 26。

書寫仍是集中於在臺期間。²⁹⁰甚至在他已經高齡 86 歲之時，還曾經寫作一篇名為〈台湾の林業〉（臺灣的林業）的文章，論述臺灣林業概觀、森林帶、特徵等等，可知他一生念茲在茲的，就是臺灣的山林。²⁹¹這樣一位深切熱愛著臺灣山林的隨筆作者，確實令人對他如何書寫臺灣的自然充滿好奇。

二、青木繁自然書寫的隨筆創作意識及文字表現

在論述青木繁自然書寫相關主題內容之前，筆者想先藉由剖析其創作意識，彰顯其在日治時期日人隨筆作者群中的特殊位置，以及透過分析其行文，討論青木繁的隨筆作品雖映合了當時在語言形式、文字技巧上普遍素樸的隨筆創作現象，但亦具有一定程度文字表現的這一點。

（一）、創作意識

根據吉田精一的研究，日本的隨筆自昭和時代以降（1926~1989）開始蓬勃發展，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廣義的文藝趣味不再只限於狹窄的圈子而向社會展開，報紙、雜誌等傳播事業興盛，以及活字印刷變得自由等因素，使得專門的文士之外的社會人士的執筆機會增多。並且在邁入現代社會之後，社會的組織變得愈來愈複雜，於是對於各個領域人士的感覺、知識、經驗等也就有所需求。²⁹²對比臺灣日治時期日文隨筆，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形。事實上，檢索當時的報刊雜誌之後可以發現，日治時期日人在臺隨筆的一個特色即是作者身分的多元，非文

²⁹⁰事實上，根據青木繁本人的說法，戰後他其實已經被國民政府聘用為技師，可見即使戰敗，他仍繼續想要為臺灣山林奉獻的心意，然而半年後使他下定決心返日的主要原因是次子在臺病死對他的打擊。青木繁，〈隨筆えの執念〉，宮脇恒編輯兼發行，《シルバ》第 12 期（シルバ會、札幌林學會，1962），頁 41。

²⁹¹青木繁，〈台湾の林業〉，榕畔会校史編集委員会，《榕畔会史——台湾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東京：榕畔会，1978），頁 96-99。

²⁹²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頁 106。

學作者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只不過，這樣的現象也使得隨筆這個文類，與當時的小說、新詩相比之下，較不受到文藝界的重視，在文類經營方面，也缺乏致力於隨筆創作的作者；借用許達然的說法就是，日治時期的文學創作者，「執意」於小說，而「隨意」寫散文。²⁹³

青木繁自然也是這一群非文學專業的隨筆作者之一，在工作之餘，他對於帶予他幸福的臺灣山林以隨筆抒發個人的感觸。然而青木繁的特色在於，較之於當時「隨意」的隨筆經營心態，青木繁具有高度的隨筆創作意識。在此，不得不提及〈森林文藝に就て〉（關於森林文藝）這篇文章，以作為探知青木繁創作意識的入徑。〈森林文藝に就て〉寫成於青木繁第一本隨筆集《森林生活者の手記》（森林生活者的手記）出版之後，青木繁在當中提到了讀者或評論家對於此書的感想與批評，這些讀者反應不但呈現了青木繁的自然書寫在日治時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也連帶地引出青木繁的創作自剖：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我用我的筆，一字一字將我的心的跳動寫下，連綴成文，換言之，那即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將我的文章公正地予以批評的這件事，就等同於是將我，將我的心予以理解的行為。²⁹⁴

對青木繁來說，書寫這件事與生命息息相關，從上引可以清楚得知他對於隨筆創作的重視，也可看出其創作的自覺意識亦隨著讀者的迴響而增強。同樣的，雖然青木繁自述他寫下的是他心的跳動，然而他不將自己的創作完全視作私密的行為，而是在下筆之時便已經預設了讀者的存在：

截至目前為止雖然有書寫山林的書籍，但是由森林家本身所寫的此類著作

²⁹³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14。

²⁹⁴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3 版，1927.08.02。

卻相當缺乏。我作為一個將森林視為生活對象相處的森林生活者，對於樹與森林的感想、思緒、追懷等等的紀錄，以及向世間發表呈現的這件事，相信至少對於不關心森林的人、沒有體驗過森林生活的人，能夠提供一點什麼吧。²⁹⁵

青木繁認為，倘若有所謂的森林文藝，那麼森林文藝創作的使命就是要讓世間能更為了解森林。這段文字也讓我們看到青木繁明確的創作意識與目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是青木繁面對山林、面對讀者時一貫的態度，他曾經提到過臺灣島上擁有如此眾多的高山乃是天賜的恩惠，故而甚至認為臺灣一年只有幾百個登山者實在是對這天賜恩惠的冒瀆。²⁹⁶是故儘管自己的力量微薄，他都要藉由寫作來對推廣臺灣山林盡一份心力。²⁹⁷換言之，除了本身對臺灣山林的熱愛之外，藉由書寫傳遞、推廣臺灣山林之美好，更是支撐、構成青木繁創作意識的重要因素。

正由於這樣的創作意識，使得非文學專業的青木繁在臺期間的隨筆創作能夠長年持續而不間斷，從《森林生活者の手記》自序中可知，青木繁必須利用平日家人們入睡之後的深夜時分，或是於旅行投宿之時的這些零碎的業餘時間進行寫作。²⁹⁸可以看出縱使平日工作相當繁忙，但他對臺灣自然的熱愛以及對創作的重視使得他能夠保有這樣的寫作態度。返日多年之後，青木繁回首這一段臺灣經驗，在〈隨筆えの執念〉（對於隨筆的執著）一文中，他甚至表達了自己對於臺灣山林的隨筆書寫行為，是他個人的執著，他想要持續地寫作，直到生命消逝。²⁹⁹而除了高度的創作意識之外，也可藉由上述感受到作家個人（青木繁）、創作行為（隨筆作品）以及書寫對象（臺灣的自然山林）之間的緊密結合。

²⁹⁵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8.02。

²⁹⁶青木繁，〈新高山方面旅行所感〉，《臺灣山林會報》第33期（1928），頁45。

²⁹⁷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8.02。

²⁹⁸青木繁，《森林生活者の手記》，未標頁數。

²⁹⁹青木繁，〈隨筆えの執念〉，宮脇恒編輯兼發行，《シルバ》第12期，頁41。



(二)、文字表現

誠如前述，日治時期日人在臺隨筆作者大多是來自於各行各業的非文學專業者，其「隨意」的隨筆經營態度也使得當時的隨筆作品，在語言使用、字句修辭以及形式結構上，與臺灣戰後張秀亞、艾雯等人所承繼並發揚的美文傳統截然不同。³⁰⁰而這不僅是日人在臺隨筆的特徵，整個日治時期的臺灣現代散文創作，除了少數如賴和〈前進〉以十分精鍊的語言寫成之外，³⁰¹基本上在語言技巧及形式表現上，皆少有作者予以雕琢淬鍊；相較於戰後美文，可以說日治時期的散文隨筆的文字表現是較為素樸的。也因此，以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等人為例，他們的著作雖同為紀行調查報告，但論者以文學角度予以關注的，大多集中在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身上，其原因不外乎便是《山、雲與蕃人》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字表現技巧，鹿野善用擬人技法寫山，渲染富麗色彩，並能夠深入刻劃登山心理，使得此書因其文字表現而特出。³⁰²相較之下，青木繁的隨筆則是反映了日治散文創作「素樸」的整體時代特色，尤其是在臺日人隨筆，擁有大批非文學專業的作者，更使得其行文風格與戰後美文傳統大相逕庭。

只不過，這樣的創作現象並不代表日治散文讀來便是枯燥無味的，這一批作者以各自的專業領域作為創作背後的知識來源，提供不同於文學專業作者的生命體驗及創作視野，以青木繁為例，因其專業是森林學，山林在其筆下就非是美學的投射與想像，而是實際的生命體會。只是，青木繁特殊之處在於，其隨筆創作的養分除了專業的科學知識之外，文學素養也佔了一部份。如〈臺灣山旅斷想〉當中，青木繁書寫人與旅行之段落，開頭便引日本著名俳聖松尾芭蕉《奧之細道》名句：「日月者百代之過客，來往之年亦為旅人。有浮其生涯於舟上，執馬鞭以迎

³⁰⁰「戰後臺灣散文，基本上，沿續新文學抒情美文的路線，偏重語言和形式的雕砌。」陳萬益，〈隨風飄零的蒲公英——臺灣散文的老兵思維〉，《台灣文學論說與記憶》（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頁 277。

³⁰¹關於賴和散文〈前進〉的討論，可參考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81-82。

³⁰²以文學角度討論《山、雲與蕃人》的論文，應屬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為濫觴。

老者，日日行役而以旅次為家。古人亦多有死於羈旅者。不知始於何年，余亦為吹逐片雲之風所邀，飄泊之思緒難止。」³⁰³接著又引述近代日本詩人、隨筆家大町桂月的旅行十德說，³⁰⁴頗有比較二人對旅行的不同感觸之用意。由此可見，青木繁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學素養與閱讀習慣，使得他的隨筆雖然亦頗具「素樸」的時代特色，但當中卻又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字表現，以下試譯二段文字以略作說明：

到處可以看見藍天的小雨之日，但總之就是悶熱的一天。過了八堵之後，陽光照進了車廂。瑞芳一帶的相思樹林，其樹冠沐浴在陽光之中。緩慢行駛於山間的宜蘭線，乘客為悶熱所困。隧道為數甚多，雖已是十月下旬，但總之就是悶熱。草嶺的隧道，無論是對誰而言都是痛苦的存在，但一出隧道，就迎來了大里的廣闊海面，讓人鬆了一口氣。不是什麼特別了不起的景色，山緊鄰著海，海岸上散落著岩礁，海浪打上散成碎花，視線隨著海面擴展出去，可以看見龜山島，僅僅如此，但卻沒有人不欣賞這樣的景色，我想是因為方才經過隧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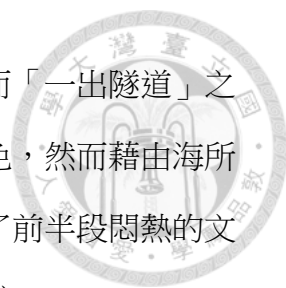
穿過幾座危險的橋樑之後已經過了六點了，這時我抬頭仰望澄澈的月。月光渡過木橋，讓我感到寒冷。路旁，傳來了幾許在都市絕對無法聽見的蟲聲，我聽見的蟲聲與月光、山路融合，美好地融合在一起。……我聽得見蕃人的歌聲。偶爾我停下腳步，感受秋天的興味。六點半，抵達了濁水。³⁰⁵

二段文字皆出自〈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垂直地行走臺灣）一文，整篇文章盡是白描手法，沒有使用特別的修辭，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上引第一段文字前半部描寫天氣之悶熱，以及火車車廂內部在通過隧道時的悶熱，甚至接連使用二

³⁰³芭蕉譯文部分參照鄭清茂譯本。

³⁰⁴青木繁，〈臺灣山旅斷想〉，《臺灣時報》，1933.09。

³⁰⁵青木繁，〈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



次「總之就是悶熱」來強調出一種絕對、壓倒性的悶熱感。然而「一出隧道」之後形成轉折，其後一句一句鋪陳出的雖然是海岸到處可見的景色，然而藉由海所帶來的寬闊感與前半段隧道的狹窄感形成的對比，卻因此舒緩了前半段悶熱的文字困境，不但轉危為安，而且段末更點出了安來自危的有趣思辨。


引文第二段則同樣是轉危為安的描寫，然而這段的重點卻不是在危安之間的對比或是因果關係，而是在於轉危為安之後，青木繁如何透過白描寫出秋夜的美好。青木繁使用三種感官，也就是視覺、膚覺、聽覺去感覺充斥在秋夜的月光、氣溫以及蟲聲，而聽覺感受到的蟲聲又與視覺感受到的月光與山路一同融合在秋夜之中。除了蟲聲，蕃人的歌聲再次點出了此處正是遠離都市塵囂之地，故儘管這段文字以時間開頭，又以時間結尾，除了帶出一種確切的臨場感之外，卻讓人感覺不到現代情境下時間的緊湊感，所以青木繁才能放慢腳步，在這遠離都市的自然之地，仔細感受季節的興味。

作家的專業文學訓練，能使得他們在作品的語言、形式上能夠精緻化並有所提煉，就青木繁或鹿野忠雄而言，他們的文字表現乃是直紆胸意的結果，如同吳福助所指出的，鹿野忠雄的文章意境與語言表現渾成自然，毫不雕琢做作，而鹿野忠雄渾之文體風格的形成，其最根本的催化動力則是來自於其熱愛臺灣高山世界的無盡熱情。³⁰⁶同樣的，青木繁在素樸的描寫中之所以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字表現，也是來自於他對臺灣自然環境的熱愛，將其所察所感化而為文，再加上他一定程度的文學素養，使其隨筆之行文不會僅受限於其科學專業之影響。

鹿野忠雄在《山、雲與蕃人》的書寫中展現了「他那令人驚豔的才華」，比較起來青木繁的文字則是多採白描，走淡樸的風格。只不過，鹿野忠雄採取的紀行文體反而侷限了他的描寫空間，³⁰⁷畢竟鹿野忠雄的文字縱然精采，但他基本上仍是遵循一般紀行文體的風格，也就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書寫，行文的推進受時間

³⁰⁶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81。

³⁰⁷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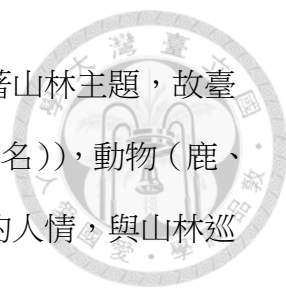
軸所支配。然而青木繁則是書寫一般的散文隨筆，行文相當自由，即便是書寫紀行文，青木繁的風格也與常態不同，以〈大武に登る〉（攀登大武）為例，這篇文章雖大致保有紀行文的樣貌，但寫法卻又常常逸出按照時間順序的紀錄，而採取接近主題式的書寫：每走到一個地方，引發思緒之時，青木繁就會針對每一個項目主題抒發己見；而青木繁寫著寫著常逸出紀行主線，故會出現如「話は戻る」（話說回來）等等將筆鋒拉回主線的用語，³⁰⁸寫法上較不受時間軸限制，能有充分的書寫空間，其作品是在慢慢品味慢慢思索之後，針對書寫主題進行整理過後的思維分享。也因此，〈大武に登る〉一文篇幅長達上百頁，直寫到青木繁覺得文章實在太長才就此擱筆。

三、青木繁自然書寫的內容與主題

本論文前述已經提及，目前所見青木繁在《臺灣日日新報》以及日治時期期刊發表上的隨筆作品約有 120 篇，特別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更有他個人專屬的隨筆專欄，如「林想漫筆」、「林間隨筆」、「林間漫筆」、「林窓に凭りて」、「林窓隨筆」等等。隨筆集方面，共出版《森林生活者の手記》、《山人放言》、《山・林・人》等書。至於《森を顧みて》、《植うる心》等等，則是兼有專業的林學論文以及隨筆作品的著作。

青木繁大多數的隨筆以描寫山岳與森林樹木為主，臺灣的新高山（玉山）、阿里山以及大武山，常會在青木繁的隨筆作品中出現，這或許與青木繁的登山習慣有關。以鹿野忠雄為例，完成首登、攻頂、大縱走之後，鹿野忠雄便會不斷挑戰新的山脈，但青木繁則是慣於爬同樣的幾座山，反覆體驗並書寫他臺灣山岳的各種思索與體會。森林樹木的部分，青木繁最常寫的是樟樹與相思樹，其他諸如茄苳、榕樹、松樹、銀杏樹、茶樹、以及各種的行道樹、保安林、防風林等等，更

³⁰⁸青木繁，〈大武に登る〉，《山・林・人》（臺北：辻本博晃社，1933），頁 195。



多時候則是山岳與森林樹木的綜論。且由於青木繁的隨筆環繞著山林主題，故臺灣的山林氣候，河川溪流（如大甲溪、宜蘭濁水溪（蘭陽溪之舊名）），動物（鹿、山羌、鳥類）等等都是青木繁的書寫關懷。此外，登山旅行時的人情，與山林巡查以及原住民的互動，亦是青木繁隨筆創作的重要一環。

本節則是試圖以「垂直臺灣」、「森林禮讚」、「蕃山印象」三大項目為論述的主要綱領，據此談出青木繁的隨筆特色。

（一）、垂直臺灣：以山認知臺灣的愛山人

雖然俗話說事不過三，然而愈累積上山的次數，一而再再而三地見到新高主山的雄姿的話，我們就愈會被山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於是就會感覺到發現自己身為自然之寵兒、森林生活者之一員的愉快。³⁰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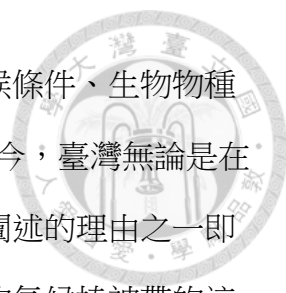
重複的事情久了就令人厭煩，然而對青木繁而言，登山、看山卻是件愈做愈讓人感到開心的事。「森林生活者」一直是青木繁自然書寫當中的關鍵詞，青木繁的第一本隨筆集便以之為名；山不是偶然想到才去親近的對象，與臺灣山林的長期接觸，青木繁實已「生活」在當中，故他能夠以山去認知臺灣，因而提出「垂直臺灣」的概念，希望住在臺灣的人民能夠進一步感受到臺灣高山的價值。

青木繁曾謂臺灣是名副其實的高山國：

臺灣是名副其實的高山國的這事不用我再多說。這個南北僅百里，東西只有四十里的高山國，以新高山為首，超過一萬尺的高峰大山，光是已經命名的就可以計算出有四十八座之多。³¹⁰

³⁰⁹青木繁，〈新高山方面旅行所感〉，《臺灣山林會報》第33期（1928）。

³¹⁰青木繁，〈臺灣山旅斷想〉，《臺灣時報》，1933.09。



臺灣面積雖小，但因為坐擁群山峻嶺，海拔的高度差異使得氣候條件、生物物種都相當多元而豐富，而當中代表性的山就是玉山（新高山）。當今，臺灣無論是在申請世界遺產或是新七大奇景，都是推出玉山作為代表，其中闡述的理由之一即是因為海拔高度變化大，進而造成氣候遞變，並形成豐富多樣的氣候植被帶的這一點。³¹¹早在日治時期，青木繁便已看出臺灣的這點特色，除了論述這樣的特色對研究而言是自然的寶庫之外，他更提倡一般民眾前往山地旅行，甚至建議臺灣島民能住到山上；他認為臺灣最值得感謝的便是山，但是島民絕大部分住在平地，也不進行垂直的旅行（登山），故尚且不知「垂直臺灣」的真正價值。³¹²

縱觀青木繁的隨筆作品，所謂「垂直臺灣」意指垂直地體驗臺灣。大多數人在平地生活居住，是水平地體驗臺灣，但以青木繁的想法來看，這樣的體驗畢竟是二次元的、平面的，沒有辦法體會到臺灣完整的價值。「垂直臺灣」的價值在於讓臺灣的生活「溫帶化」。³¹³亞熱帶臺灣的平地，幾乎可以說是一年皆夏，溫度、濕度皆高，故而悶熱。青木繁指出，往返臺灣平地山地之間只要數日，然而就在這數日之間，就等於是從熱帶走到了寒帶，³¹⁴若以阿里山為例，從平地上山，也就等於是從嘉義跨到了當時仍屬於統治日本的樺太區域（庫頁島）。故青木繁認為那些覺得臺灣氣候沒有變化，覺得沒有松樹真是寂寞的日本人，³¹⁵就是因為只知道平地的臺灣，不曉得「垂直臺灣」才會這麼想的。³¹⁶熱愛臺灣山林的青木繁，以「垂直臺灣」的概念，指出臺灣的春夏秋冬，以及白雪造訪的美景，不在臺灣的平地，而在臺灣的山中，倘若「垂直地」行走、體驗臺灣的話，便能感受得到。

³¹¹參考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worldheritage/twwhInfoDetailAction.do?method=doViewInfoDetail&twwh_ID=8&twwh_Info_ID=44 以及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099&Itemid=5 最後檢索日期皆為 2013/10/13。

³¹²青木繁，〈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

³¹³青木繁，〈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

³¹⁴青木繁，〈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

³¹⁵臺灣平地氣候不適松樹生長，而日本則到處可見松樹，對於日本人來說櫻花與松樹是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植物。

³¹⁶青木繁，〈臺灣山旅斷想〉，《臺灣時報》，1933.09。



(二)、森林禮讚：與人息息相關的森林與樹木

人類的生活與森林，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雖然這樣的關係的密切程度，會隨著時代、地方、人的差別而有不同，然而無論如何在現代，倘若沒有森林，人類是無法生活的。³¹⁷

這段引文代表了青木繁一直以來看待森林樹木的一種態度，就如同青木繁自然書寫的隨筆創作意識一部份來自於他想要推廣臺灣山林的用心一樣，青木繁會藉由各種例子再三強調森林樹木與人類的緊密關係，以此點出森林的重要性。以「林想漫筆」為例，這個青木繁專為書寫森林樹木而開闢的專欄，就有好幾篇隨筆涉及到這個層面。如〈林想漫筆（一〇）／新聞紙（上）〉、〈林想漫筆（一一）／新聞紙（中）〉、〈林想漫筆（一二）／新聞紙（下）〉三篇隨筆從文化的角度讚揚森林的重要性。青木繁認為報紙是現代人必須的精神食糧，是現代文化向上絕對重要的東西。而報紙、雜誌、書籍的來源即為樹木，木材的纖維就是製紙的材料。³¹⁸因此，在禮讚文化的泉源，也就是新聞、雜誌、書籍之時，對於真正的來源，也就是位處深山的樹，也應該奉上感謝的心。青木繁認為，一旦森林不茂盛，文化就不興盛，國家就無法發展，而人類的頭腦也就無法進步。³¹⁹而無論哪一種紙都是從樹而來，樹是文明的幕後推手，人類不可遺忘其功勞。因為遺忘而任意砍伐且未再植樹，文化的維持向上是不可能永續的。青木繁過去曾在北海道苦小牧的製紙工廠實習，看到從木到紙的製作過程他心頗有感觸，認為樹殺身以成仁，奉獻自己於人類的文化而粉碎自身。此處青木繁將樹擬人化，提高了情感、精神層面的共鳴高度，身而為人，我們應尊敬並感謝樹：

³¹⁷青木繁，〈林想漫筆（一六）家の中の木製品〉，《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5.14。

³¹⁸青木繁，〈林想漫筆（一〇）新聞紙（上）〉，《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5，夕刊3版。

³¹⁹青木繁，〈林想漫筆（一一）新聞紙（中）〉，《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6，夕刊3版。



看著我們生活中一日都不可缺乏的新聞、雜誌、書籍，我們都會想要向如此高貴之犧牲，向樹的靈魂與森的精靈，獻上感謝與尊敬的心意。³²⁰

「林想隨筆」之外，諸如〈たらひから棺桶まで〉（從澡盆到棺材）一文更是對樹木的禮讚，青木繁列舉了樹木與人類生活的各種關係，從兒童時期的玩具到步入老年的柺杖，從百姓坐的椅子到聖僧所敲的木魚，以及各種家具、電線杆、建築材料等等；樹木非但能夠結果以供食用，青木繁也以櫻與松為例，指出樹木的花或是樹木本身就能涵養人的性情。故青木繁認為，

人與樹木，實有深厚的因緣。活著的人能夠深入思考這樣的因緣，以及感謝樹木就太好了，並能至少因此愛上一棵樹就太好了。³²¹

因緣、感謝與愛，青木繁如此歌頌山林樹木。就猶如這篇文章的標題一般，從出生為嬰兒淨身的澡盆到死後裝殮的棺材，人們非但得之於樹木太多，澡盆與棺材的意象也象徵人的一生從誕生到死亡都被樹所承載包含。對青木繁來說，他的人生，他的世界，無一時無樹，亦無一處無樹，故他不禁吟嘆「失去了萬樹的美麗恩澤的人生就算不上是幸福的人生」³²²，而這一句話也正是青木繁在思考人與森林樹木的關係時，最深刻的寫照。

（三）、蕃山印象：殖民關係之外的純粹人情

看著數日內幫忙擔著行李的同行蕃人，如此純真而坦誠，我們也自然而然

³²⁰青木繁，〈林想漫筆（一二）新聞紙（下）〉，《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7，夕刊3版。

³²¹青木繁，〈たらひから棺桶まで〉，《森林生活者の手記》，頁13。

³²²青木繁，〈林想漫筆（六）／樹木の姿態（下）〉，《臺灣日日新報》，1927.04.29，夕刊3版。

地完全忘卻都市的塵囂，湧起一種遇見了數百年、數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的感覺。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們如此地樸實無華，如此地真誠不虛，又如此地心安氣和，如此地友好、和平與悠閒。縱使我們是都市人，然而我們也可以藉由他們感覺到自己也還擁有一顆真誠的人心。³²³




除了書寫山岳與森林之外，世代居住在臺灣山林之中的原住民亦常出現在青木繁的筆下，無論是上山研究或是旅行，青木繁常有機會遇到原住民。倘若我們以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或是貼近官方的帝國視角，來對比青木繁同樣以一介日人身分如何看待、書寫、敘述原住民時，青木繁的書寫原住民的意義就會更被彰顯。

瓦歷斯·諾幹曾經以日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理蕃常識」為例，指出當時原住民如何被定位成「猛惡蕃人」、「生民之害」，以至於成為應當「剷除」對象³²⁴的被殖民情境。同是日人，佐久間左馬太的「猛惡」與上引青木繁的「純真」成為了有趣的對比論述。這裡透顯出的是細部研究觀察的必要，誠如瓦歷斯·諾幹所指出的，佐久間左馬太是當時的一個觀點，青木繁自然也是觀點之一，只不過筆者藉以延伸思考的是，當前者理應加以批判時，我們又要如何來思考、評價青木繁的論述位置？青木繁是總督府專賣局的技師，亦是臺北帝大的教授，假設要把他與官方視角牽連或許也未嘗不可，又倘若截然二分為殖民／被殖民的話，青木繁自也會是在殖民的一邊。即便如此，「殖民」論述立場下各種細部的觀點理應獲得彰顯的論述機會，青木繁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青木繁也好，或甚至是鹿野忠雄也罷，他們與原住民的關係都無可避免地處在當時統治／被統治、殖民／被殖民的殖民結構之中。先以鹿野忠雄來說，原住民是他上山的嚮導也是登山的伙伴，但同時他們之間卻又因僱傭關係產生連結，因而殖民結構所體現的上下階級關係，又再度因為這層僱

³²³青木繁，〈臺灣山旅斷想〉，《臺灣時報》，1933.09。

³²⁴瓦歷斯·諾幹，〈從台灣原住民反思生態文化〉，林耀福主編，《生態人文主義：邁向一個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社會》（臺北：書林，2002），頁 186。



備關係而得到固化。然而這關乎論述時所採取的視角問題，「縱使是登山伙伴，他們仍是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與「縱使是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但他們仍是登山時的伙伴」的差別，不僅僅是調動論述順序，連帶更是轉換了論述者的位置與視角。同理，在上引青木繁的文字中，原住民同樣是「幫忙擔著行李」的受僱角色，而筆者認為，就臺灣日治時期的殖民情境而言，日人與原住民之間很難逃脫這一層已經固有的殖民結構之中，因此，倘若殖民結構是一個論述的潛在前提，那麼論述就取決於後世論述者的觀點。筆者既承認這一層殖民關係，也不打算為青木繁過度美化，但筆者認為重點是要談出更加細部的關係。「幫忙擔著行李」只是簡單一句，青木繁的描寫重心則是更放置在如何藉由觀看、體會原住民的純真與真誠，進一步去反觀共鳴出一種人的共性。與原住民相較，包含青木繁在內的「我們」都被劃分在「都市人」當中，而都市人的人心被塵囂所蔽，拂拭去這層塵囂的即是原住民所散發出的真誠，可以說，此刻原住民與青木繁之間不僅僅是臺灣蕃人與日本人的關係，更有了一層純真的人與一個重新找回真誠人心的人的關係。讓二種關係同時並存，就能使得文本的豐富度與論述的多元性都得到增強，也讓研究論述本身能更有意義。

在這層論述意義上，青木繁〈蕃山旅の印象〉（蕃山旅行的印象）就因此是一篇寫得極好的隨筆。青木繁認為走在蕃地最感謝的就是每每去到駐在所暫歇的時候總會受到很好的招待。如果請求留宿，主人就招呼一起吃飯，太太們就會親切地接待，處在這種情境下會讓人反省起平日忙碌的生活步調。山地駐在所亦種滿了花果，而美麗的樹草可以柔和高砂族³²⁵的殺伐之心，甚至認為這些美麗的樹草就是讓他們日本精神化的根源。而在有些駐在所，主人與太太與高砂族人與客人會一起唱歌到深夜或是跳起日本舞蹈，身為客人的青木繁為了回禮也會吹奏起尺八給高砂族人聽，所以無論是視覺或是聽覺，駐在所的主人與太太的行為都是在試圖讓高砂族日本精神化，青木繁自然也就參與在這樣的結構關係之中。然而，

³²⁵無論是高砂族或是蕃人，都是當時慣用的稱呼語言，本節僅是就原來文章的使用情形予以沿用。



上下結構關係並不是剝削與欺凌，雖然讓高砂族日本精神化的這件事情確實是殖民行為的表徵，但青木繁、日本警察夫婦與高砂族藉由音樂和樂融融的情景，筆者亦認為那當中並非只有殖民關係，而更有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友善關係與美好交流。尤其是青木繁熱愛吹奏尺八，³²⁶那是他自然而然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方式，並且從他上山隨身攜帶尺八的這一點來看，更可以感受到他對尺八的愛好與珍惜，因而他以尺八與原住民合奏的場景，就更顯出彼此之間不是作為殖民而與被殖民者而存在，而是透過音樂來達成一種純粹作為「人」的真誠情感交流。

四、以青木繁隨筆反思美文傳統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等問題

臺灣現代散文的研究多以戰後為主，日治時期往往缺席於論者的研究視野中，使得臺灣現代散文研究長期以來缺乏一個較為全面的觀照。而誠如陳萬益所言，「戰後臺灣散文，基本上，沿續新文學抒情美文的路線，偏重語言和形式的雕砌。」³²⁷造成臺灣散文的美文傳統斷代於 1950 年代張秀亞、艾雯等作家來臺之後。同樣的，按照現今研究者的定義，起先作為散文次文類之一支出現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也被限定在 1980 年之後。本節藉由青木繁的討論所想要延伸出去的，正是這二個研究對話點。

戰後「美文」作為一種「傳統」牽涉到的是書寫範式的問題，「美文」影響臺灣散文創作深遠，但倘若用一種較之從前宏觀的散文史的角度來看，應當耙梳出更多的書寫範式，畢竟「美文」並不能含攝所有散文創作的美學意義，近來亦已有研究者開始針對這點提出一些觀察。³²⁸本節前述已經提及，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在語言形式大抵具有素樸的傾向，就語言形式的表現上，確實較難納入戰後

³²⁶青木繁，〈尺八の話〉，《臺灣の山林》第 81 期，1932.12。

³²⁷陳萬益，〈隨風飄零的蒲公英——臺灣散文的老兵思維〉，《台灣文學論說與記憶》，頁 277。

³²⁸如彭玉萍，〈見證者的散文詩學——省籍作家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就以葉榮鐘、洪炎秋二人的散文為例，以歷史、懷人、生命哲思等層面確切指涉散文的美學層面，不同於以往限於語言形式雕砌的美文之散文美學定義。

「美文」的標準。然而日治散文理應使用「美文」之外的美學定義來談論其美學範式，以本論文所探討的青木繁來說，其隨筆之美學意義其實是落實在他個人的生命哲思，也就是體現於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這一個層面上。




在〈大武に登る〉當中，青木繁寫到山是自然的一部份，人也是自然的一部份，爬山就好比回到了自然。住在都會愈久，就會增加對自然的憧憬，而回到自然的自己，就好像被貓追趕的小雞，回到母雞翅膀的懷抱一樣。就算想吸到煤煙紅塵，山也沒有，山中的空氣是如此澄澈。而飲用大武山上的溪水就猶如小時候吸吮母親的乳房一樣，會除去所有不愉快。³²⁹在此，青木繁重複使用了二次母與子的比喻，象徵自然是原初的存在，孕育萬物的泉源，而人類作為自然之子，不是少壯中老，而是嬰孩。這樣的比喻設計，背後體現的是青木繁嚮往作為一個人的真淳的生命哲思，而大自然使得此真淳得以實現，因而回到自然就等同於反璞歸真的行為。在〈思ひ出深い山々〉（記憶深深的群山）這一篇隨筆中，青木繁寫到了他登上新高山（玉山）山頂後的生命感觸：

在一萬三千四十五尺的山頂上，我徹底忘記了疲倦以及呼吸的困難，我的心變得莊嚴而充滿敬意，我重返回一赤裸裸的人類，初次認知到自己的生命，並向生存與生活獻上最高的謝意。³³⁰

文學的表現不外乎是生命中的各種體會，文學亦始終環繞著人的生命而寫，青木繁雖非文學專業，然而他的隨筆卻體現出了一種人因為自然而重返生命原初體會的真實感受；在語言形式上或許素樸，然而在內涵精神上，青木繁亦寫出了一種可貴的散文美學範式，可以較之於當時的鹿野忠雄，也可以跨越日治，來與戰後的自然書寫做出比較。

³²⁹青木繁，〈大武に登る〉，氏著，《山・林・人》，頁 146-147。

³³⁰青木繁，〈思ひ出深い山々〉，《臺灣時報》，1932.07。



目前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研究範疇多限定在 1980 年代以後。臺灣在 1980 年代之後受到環保意識抬頭以及西方綠色思想啟蒙的影響，重視環境保護、生態倫理，開始反思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作家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書寫，而歷來對於臺灣自然文學／寫作／書寫，在方法論名詞上，在方法論義界上，也都產生過相當多的討論聲音。透過吳明益的整理可以發現，如洪素麗、王家祥、陳健一、陳映真、南方朔、簡義明、劉克襄、許尤美、李炫蒼等人都曾經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且觀點有同有異，各是一家之言。³³¹然而，大部分關於臺灣自然書寫的討論都是關於定義上的爭論，卻鮮少有人能夠質疑一個根本的認知，那就是臺灣自然書寫是始於 1980 年代的這一個普遍看法。不過晚近開始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出現，如瓦歷斯·諾幹就以臺灣原住民所發展出來的「本土技藝」為論述的切入角度，質疑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在一定程度上過於受到西方影響，整體為環境保護的抗爭意味也太過濃厚，³³²而這其實是受到以 1980 年代為研究斷代的概念所造成的可能問題。

日治時期的青木繁，相較於戰後，所謂的環境保護或是生態倫理的觀念在其思想或是作品之中當是相當缺乏的。然而，這並不表示青木繁就不能劃入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範疇之內。筆者認為，「現代」當以現代文學的發生，也就是日治時期為線索，故考察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理當從日治一直談到戰後。至於「自然書寫」也或許不應局限於西方 *Nature Writing* 的理論名詞翻譯所帶來的方法論定義上的限制，「自然書寫」也不應該是一個特殊情境之下所產生的方法論名詞，而應該是在「書寫自然」的文學作品在質量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之後，才以「自然書寫」為一研究上的統稱，進行討論之歸類與定位。從日治到戰後，「自然」的觀念本身會有所不同，對於自然的書寫也當然會有差異，故當以一條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之

³³¹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頁 18-59。

³³²瓦歷斯·諾幹，〈從台灣原住民反思生態文化〉，林耀福主編，《生態人文主義：邁向一個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社會》，頁 182。

流變史視之；³³³青木繁與鹿野忠雄等人日治時期自然書寫，自然會與戰後各個時期的自然書寫有所異同，其中 1980 年代以後，對人類造成的自然破壞所進行的反思，理應視作整體流變史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應以此作為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全貌。

本節以青木繁為研究對象，可以視作對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研究的一次嘗試，透過這個新個案的挖掘，同時也提醒筆者現今應當展開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研究工程。對於日治散文，臺文學界目前有待挖掘的面向仍然太多，青木繁或許只是冰山一角，然而他讓我們看到一個熱愛並獻身於臺灣山林的寫作者的真誠姿態，而透過這一個研究點，筆者也試圖拉出對於戰後散文，諸如美文傳統與自然書寫的研究對話線。至於點線要如何擴展到面，甚至是立體，以求對臺灣現代散文史能有一個較為宏觀的觀察與貢獻，則是筆者之後的研究階段所要努力的目標。

³³³就吳明益而言，他也認為臺灣自然書寫不可能憑空出現在 1980 年代，然而，他將 1980 年代之前的相關創作都歸於「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反而因此錯失了重新省視「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史』」的機會。吳明益，《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頁 177-186。此外，吳福助則是認為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可視作一個起跑點，藉此建構一完整的「臺灣自然生態文學史」，筆者相當同意此一看法。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82。

第五章 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非美文」傳統



前言

臺灣戰後散文書寫受到五〇年代確立起的「美文傳統」影響甚鉅，而「美文傳統」的承繼發揚者，則多為女性作家。張秀亞、艾雯等女性散文家，隨著國民政府遷臺之際，將五四散文火種帶來臺灣。然而，張秀亞等人所繼承的五四散文精神，卻帶有強烈的選擇性意味。五四散文當中，被傳進來臺灣的，只有軟性抒情的美文，以魯迅為代表的硬派戰鬥雜文，卻因為右翼政治氛圍的反魯論調而被屏除在外。可以說，是經過一番文學場域的作用、書寫範式的選擇性繼承，以及文學典律的重組過程之後，才形成以女性作家為代表的，並且溫柔婉約的「美文傳統」。

然而，「美文傳統」的成立，在散文研究內部當中卻是一個龐大的文學史遮蔽點。「美文」指涉的是某種特定的書寫範式，而隨著「美文」而來的「傳統」，則牽涉到臺灣散文史源流與典律的問題，因此倘若將「美文傳統」視作臺灣現代散文的「傳統」，那麼至少會產生下列二個主要的盲點，一是因此忽略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存在，二是排擠壓縮了「非美文」在散文中的典律位置。

其次，五〇年代女性作家與五四淵源甚深，故若證成「美文傳統」存在，等於就是承認臺灣散文史的發展是一條「戰前五四→戰後臺灣」的脈絡，然而這卻會與現今臺灣文學史的概念有所扞格。依照本地的文學史發展順序，臺灣文學史的「戰前」理應是日治時期的文學，「五四文學」則應該被處理成一個對照的階段，或是以「影響論」的方法與臺灣文學進行對話；但弔詭的是，「戰前五四→戰後臺灣」的脈絡卻長期主控了散文內部的研究史觀，³³⁴而筆者認為，這樣的脈絡與「美文傳統」的鞏固生成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早期鄭明嫻就曾經指出，張秀亞等

³³⁴可參考鄭明嫻，《現代散文》與楊牧，《失去的樂土》。

人的抒情美文莫不受到五四時期，尤其是所謂的「冰心體」的影響。³³⁵晚近，許珮馨則是將戰後自大陸遷移至臺灣的女性散文家的各個五四傳承給爬疏得相當清楚。³³⁶如此之論述使得臺灣散文史的脈絡顯得曲折而又弔詭，而這種曲折與弔詭又因為近年來臺文學界對於「五〇年代」的文學研究熱潮，得了更進一步的鞏固。

誠如王鈺婷所指出的，「晚近在學術圈中興起一股五〇年代女性散文研究的熱潮，使得一個集體的『五〇年代論述』已然衍生並散播」。³³⁷五〇年代女性文學的研究熱潮其實是針對於反共文學論述的反動，早先以男性官方霸權為史觀的文學史論述，使得五〇年代冠上濃厚的反共色彩，遮蔽了當時女性作家的文學表現。後來經過范銘如、梅家玲等學者提出反省，藉由抗拒性閱讀的論述策略來建構五〇年代女性文學甚至女性話語的探索。³³⁸而晚近許珮馨、張瑞芬等人的女性散文研究，則分別以共時性及歷時性的研究方式勾勒出五〇年代女性散文的重要性，前者考察五〇年代重要女性美文家的重要個案，後者則是在建構其「女性散文史」之時，使得五〇年代儼然成為女性散文的文學史濫觴，³³⁹換言之亦是「美文『傳統』」的發端。

因此，「臺灣散文史」的概念不免就是尷尬的，往上回溯，不是需經一條曲折的脈絡來到非臺灣本地歷史的「五四」，不然就是只能推到戰後「五〇年代」為止；而無論如何，「日治」的位置都是消失的。所謂的「美文傳統」，實則遮蔽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文學史位置，亦直指日治與戰後散文在文學史上的斷裂關係。是故，針對臺灣現代散文的「傳統」問題，勢必要加入日治時期才能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對話，本章即以日治時期散文當中與「美文傳統」較具有分辨差異性的「非

³³⁵「冰心的文藝腔影響於中國文壇，其優點是，提高青年閱讀與創作文學的興趣，使抒情散文成為日後臺灣散文界的主要導向，冰心體是散文市場主流。」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頁45。

³³⁶許珮馨，〈第三章移植五四美文傳統於台灣文藝新生地〉，《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頁78-123。

³³⁷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頁7。

³³⁸可參考王鈺婷的整理，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頁6-7。

³³⁹如張瑞芬的女性散文史即從五〇年代展開。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美文」傳統進行探討，以「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性格」、「書寫社會、關懷現實：《臺灣民報》散文」、「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文學史斷裂」三小節，彰顯建構出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非美文」性格。

第一節 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精神

整體說來，目前臺文學界對於周定山的討論並不熱烈，致力最深的研究者當推施懿琳，對於周定山的新舊文學作品，皆有專文予以研究。其中，〈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一文探討周定山小說中的文學思想與散文中呈現的創作觀，為周定山大致的創作走向打下了研究基礎。施懿琳提及，周定山認為創作應當「著眼於廣大的群眾」、「觀察大眾生活的面相」、「撫觸整個時代的脈息」、「傾聽生民百姓的心聲」，³⁴⁰而這樣的創作觀也落實在周定山散文的實際寫作上，加上他個性「傲岸悲鬱、嫉惡如仇」，對於社會黑暗面又有敏銳的感受，³⁴¹使他的散文風格足以類比魯迅雜文以及魯迅本身對於散文應當作為「匕首」、「投槍」的要求，³⁴²具有相當程度的戰鬥與批判精神，而這正是與以溫柔婉約的抒情為主「美文傳統」截然不同之處，由於周定山重視創作內容重於形式，並且「由於周氏由舊文學轉向新文學的歷程，是經由自己摸索而來；在實際的創作上，也多靠自己不斷努力而有所成。因此，文字的表達往往有流於艱澀拗口，句義難明的現象」。³⁴³而這亦恰恰正好與重視詞藻雕琢的「美文傳統」大相逕庭，在談論日治時期現代散文之特出之處時，周定山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而以下要處理的便是周定山散文的「戰鬥」與「批判」精神所落實的幾個層面。

³⁴⁰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高雄：春暉，2000），頁 17。

³⁴¹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頁 13。

³⁴²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96。

³⁴³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頁 28。



一、對於「階級」的批判

周定山自幼貧苦，嘗盡人情冷暖，擁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曾經進工廠學習木工，入布莊接觸商賈，之後又棄商從儒轉任教職，而後非但從軍前往上海，又有報紙編輯經驗，日治末期則又與友人經營中藥藥材行。³⁴⁴在不同的工作之間輾轉就任，在工、商、儒、軍等身分之間不斷轉換身分的周定山，對於社會百態、組成結構，非但有銳利的觀察，亦有深刻的親身體認。是故，綜觀周定山的散文創作，「階級」問題始終是他關心並且落實其批判精神之所在。從〈也是隨筆〉當中可以得知，自學苦讀的周定山，已經有接觸到克魯泡特金以及馬克思等人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然而，周定山並不直接以外國理論為工具，對臺灣社會進行批判與剖析，理論從不是他散文論述的依憑。並且，雖然周定山並沒有說明原因，但他甚至認為提出互助的克魯泡特金與提出階級性的馬克思，「都是人類落伍的驕人，沒出息民族的悲鳴」。³⁴⁵據此可知周定山在思索「階級」問題時多從他個人的生命體會出發，其論述乃是抒發個人體會認知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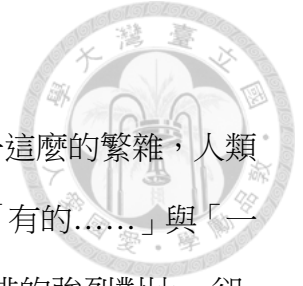
首先，透過〈草包 ABC〉一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周定山對於社會乃是由「分類疊嶂的階級」所組成的這一點，有清楚的認知：

分類疊嶂的階級，生活的確背道而馳……有的毛氈薰身，盼望著氣溫降低！俾得積雪堅凝，嘻皮笑臉的可以去遊戲，滑水。一方面也有連鶉衣蔽體都沒有，墜指裂膚和寒威在戰鬥！咬定牙關的埋怨老天不吊！有的希冀烈日煎熬的機會，才得攜酒登山，挾妓泛湖，去消受避暑的艷福。生驚雨師的惡作戲，敗他清興。一面也有耐著皮膚的紅腫，沒頭在灌救龜裂的田地，共命的枯禾！³⁴⁶

³⁴⁴有關周定山之生平，參考施懿琳，〈周定山新文學作品初探〉，《跨語、漂泊、釘根》，頁 14-15。

³⁴⁵周定山，〈也是隨筆（六）〉，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34。

³⁴⁶周定山，〈草包 ABC〉，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88-189。



雖然說，〈草包 ABC〉主要是要藉由各種例子來講述「社會分子這麼的繁雜，人類嗜好那樣的多岐，不能像教科書或講義的單純專一」³⁴⁷，因此「有的……」與「一方面……」僅是作為人類諸多面相之一。然而此處周定山所安排的強烈對比，卻亦透露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褒貶之意。在此，人的苦樂決定於貧富差距所導致的階級差異，以至於在面對同樣事物時會產生不同的反應與結果。人為了因應寒冷的天氣而增添衣物，但極富者卻是反過來為了穿著高級「毛氈」而期待天寒，而極貧者則連破爛的「鶉衣」都不得蔽體。又如為了對比極富者玩遊縱慾的享樂，以「共命的枯禾」一句點出了極貧者面對嚴峻氣候生死交關的厄境。周定山之所以走一種極端的筆法，便是要藉由貧富光譜二端強烈的對比來託寄褒貶。

然而，〈草包 ABC〉對於「階級」的批判仍是初步性的，畢竟文章用意是為了列舉人生百態。批判「階級」之可惡，除了列出上下生活處境之不同外，周定山更指謫出人們對於不同「階級」採取不同態度的百變嘴臉，以及「上」階級對於「下」階級所充滿的高傲不屑的醜態。在〈一吼居談屑〉第 11 則「社會的柱石」當中，周定山就以同鄉人「密斯忒 C」〔案：意即 Mr.C〕為例，說明此人如何將人的階級分成八等，且又是如何對待這八種階級的：

吾鄉密斯忒 C，曾在豪門的銀濤中沒命掙扎、鑽營、進取。可算聰明罷！她〔案：疑為「他」字誤〕最先就發見了所謂階級的原理。特創一種酬世的妙法，分八等，見了人們、笑嘻嘻、側身俯首的「唯唯」！排一等。握了手，道聲好罷！排二等。駐足脫帽子，排三等。按一按帽子，排四等。點了首，排五等。「哼」！排六等。「吊開眼」、「御會式」，排七等。全不聞見，

³⁴⁷周定山，〈草包 ABC〉，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89-190。

(實是不理睬)排八等。³⁴⁸



這位「密斯忒 C」宛如中國古代實行的「九品官人法」一般將人區分等第的行為，在周定山看來應非特殊的個案，因為段末周定山不無諷刺地表示這種人據說就是「社會的柱石」。更進一步地說，所謂的「八等」階級就是具體而微地彰顯了〈草包 ABC〉當中所描述的人生百態，而「階級」因何而生？透過「曾在豪門的銀濤中沒命掙扎、鑽營、進取」的「密斯忒 C」應可合理推測，造成「階級」原因之一即是金錢，〈草包 ABC〉中的階級差異亦是體現於人類貧富的差距之中。「密斯忒 C」最終也應是因為喪失了金錢而「降級」，對此，周定山亦語帶諷刺地予以形容：


當他對我露天演說的時候，穿著一套深灰的舊洋裝，沒有帽子可「按一按帽緣」！額上已深刻著生命的創痕，蓬勃的鬢毛，也表現著人生灰色的波紋！只有迫射的眼光，還留著復仇的悲哀！兩腳站得不像先前那麼傲視的穩固。³⁴⁹

「舊洋裝」、「沒有帽子」等等暗示了「密斯忒 C」在金錢上已不如以往，又由於金錢是主宰上下階級的關鍵，故「密斯忒 C」的「階級」勢必亦「不像先前」那樣了。然而，「密斯忒 C」卻仍然透出「復仇」的眼神，在此，周定山點出的是人即便隨著時間老去，仍受「階級」制約，「降級」之後仍欲望著「升級」的悲哀。

除了諷刺將人「分等」的行為之外，周定山亦批判「上層階級」對於「下層階級」的種種輕視。如〈一吼居談屑〉第 30 則「小事糊塗」就又談述了一位當上醫生的「C 先生」，面對村民時的高傲與不屑：

³⁴⁸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56。

³⁴⁹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56。



他從領著一個（聽診器）的權柄了後，幾乎厭惡了呆滯謹愿的全村民，用那高傲的視線，集中在眼鏡底下的睥睨眼前的全體。短窄的衣服，多是骯髒貧農所穿的，體裁上不太堂皇。於身分就怕有大的影響，也歸在厭惡的範圍裏去。³⁵⁰

「C先生」對於村民們的輕視可謂與他對身分的重視相輔相成，「睥睨」一詞亦點出「上」對「下」的觀看姿態，村民的「呆滯」與「骯髒」，不符合「上層階級」的「堂皇」標準，故「C先生」的輕視甚至連帶地從「人」牽連到「衣服」身上，可見「C先生」對於階級身分是如何之重視。而在該篇散文，周定山亦指出了當時社會除金錢之外，造成階級分化的重要因素：殖民現代化教育。拿著「聽診器」的醫生，與傳統的漢醫不同，乃是現代化知識體系下的產物。要成為這樣的醫生，就必須經歷日本殖民政府所帶來的現代化教育的洗禮，而接受現代化的同時，「C先生」亦向「殖民」靠攏，³⁵¹例如他不穿臺灣農民的短窄衫褲，而穿和服等等。³⁵²同樣的，依憑著殖民現代化教育進而「升級」，「升級」之後用高傲的眼光看待「下層階級」的例子，亦可在〈一吼居談屑〉第27則「眼」中尋獲：

尤其是青年，尤其是遺少，尤其是紳士候補，據說都受過臺灣所謂相當的教育。時常見他用「頑笨」的眼光，閱社會進化史……用「驕銳」觀飢餓階級……用「挺瞪」瞧社會運動家……³⁵³

「頑笨」莫過於是一種諷刺了，而「驕銳」則顯示「上」對「下」階級的高傲態度，至於「挺瞪」則是充滿敵意的表現。在周定山散文筆下，「上層階級」只容許

³⁵⁰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180。

³⁵¹關於「殖民現代性」的辯證，可參考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

³⁵²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181。

³⁵³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174。

自己去「睥睨」「下層階級」，而無法接受「下層階級」的反對聲音，甚至是要予以打擊的，針對這一點，周定山的〈血汗〉一文描寫得最為鮮明。

〈血汗〉是周定山頗為用心經營的一篇散文，他描寫小豬、小雞與小孩的玩耍，用白描的方式寫出村莊的安和與純樸，但卻在突然間，有「三個吃糕子長大的紈袴兒」出現，「說說笑笑，講的天花亂墜」。其中一個穿著洋裝的紈袴兒誇耀自己的父親去弄了一個紳章，另一個穿著和服與木屐的紈袴兒，則說道自己為了競爭專賣事業故而天天攀關係應酬，還有個穿上海服飾的紈袴兒，則亦開始高談闊論起來：

我近來的生活，比你們還有意義些。論現在人們的生活，不是「爭名利」，便是「迷花柳」。什麼吊膀子、猜酒籌，難道這些事，能夠算得勾當嗎？...不...不...不是...所以我們站這環境，怎麼好呢？老實要有些高尚的生活，纔不愧吾輩的人格罷。弄甚麼事，爭名謀利是不能的，穿花喝酒又不可的，到底有甚麼事情可幹呢？迫這四面楚歌的時候，就想個好法子，別開了生面來。我今思著，也莫名其妙。就是招集些同志，在很簡潔鎮靜的所在，坐藤椅。抽煙枝，喝香茗。鬪了撲克。打了麻雀，你爽快不爽快？我們的理想有高沒有？兩人聽罷，鼓掌喊道：「很妙很妙！」³⁵⁴

這一番高談闊論涉及「高尚的生活」、「人格」、「理想」，然而卻無一不是以享樂縱慾為前提的言論，周定山極盡諷刺之能事，譏嘲這三個分別受「洋」、「日」、「中」影響的「紈袴兒」——亦即以「金錢」為尊的「上層階級」——的「理想」就只是抽煙枝、喝香茗、鬥撲克與打麻雀。至此，周定山的諷刺與批判尚未結束，文中有一青年在三個紈袴兒高談闊論結束之後出現，並感慨「社會這麼悲慘，這麼惡毒！」卻遭逢了紈袴兒們的強烈反擊：

³⁵⁴周定山，〈血汗〉，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84。



你是什麼人？那一個的混沌蛋？在這弄甚麼壞話！我們這麼長大，看過世間的事事物物。也可算得多呢！在這光明正大的社會裏，要穿綾羅紡絲，一會兒就有的。要吃山珍海味，剎那間就便的。要往很繁華都市的玩耍，頭等車不外幾點鐘就到的。要嫖一個美妓，幾塊錢就來的。種種的生活，都是應有盡有的。我們從不聽見有什麼社會悲慘的事呢？簡直是你們要弄成恐怖的時代啊！這是何等可惱啊！³⁵⁵

此篇散文應是虛構故事，來予以寄託周定山對於「上層階級」的褒貶之意，所謂「簡直是你們要弄成恐怖的時代啊」如同「用「挺瞪」瞧社會運動家」一般，都是在強調「上層階級」面對批判時的不甘與反擊，這背後可能牽涉到的是嫉惡如仇的周定山所遭逢的批評，抑或是指涉整個日治時代「社會運動家」們的困境。然而，無論是否具有這樣一層實際指涉，光是就散文文本內部而言，這樣的描述就已飽含了對於「階級」的批評力道。上引言論實亦蘊含了周定山的多重批判，上述之外，還有對於「上層階級」亦自己的世界為世界，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的批判。此篇散文名為〈血汗〉，分別帶出了工農階級被工廠或是地主階級剝削的血汗辛酸，甚至在文末藉由紈袴兒們撞破農民用「無窮的血汗」換來的瓦飯盆，指涉「上層階級」對於「下層階級」的血汗的不堪一顧。亦由於喪失認知民間疾苦的同理心，故對「社會悲慘的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要予以否定。此外，亦揭露紈袴兒們錦衣玉食、遊車嫖妓的紙醉金迷，用以對比「血汗」農工的生活窘境。而「你是什麼人？那一個的混沌蛋？在這弄甚麼壞話！」的行文安排，則雖由紈袴兒口中說出，卻好似周定山對於紈袴兒們在前述高談「理想」時的批判，因此這就宛若「自打嘴巴」一般「反饋」，不妨視作周定山試圖要大快人心的精心設計。

³⁵⁵周定山，〈血汗〉，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84。

對於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上層階級」，周定山從不吝於諷刺，如〈一吼居談屑〉第 6 則「兩腳書櫥」，就提到「不論什麼階級，那有一種莫可抵抗的強有力者在的！就是食了物必要卸掉渣滓這出恭。俗而名之曰：『放屎』」³⁵⁶而在〈無聊春秋〉中，周定山亦云：

富豪、新時代的青年、小姨太、娼妓……這種人最深惡痛絕而不能倖免的，是他們堆積在腹裡的「屎尿」——在闊人的腹裡掉出來的爛污，包圍他的寄生蟲，那敢鄙薄他為惡臭呢？因闊人本是黃金為維持生命的莫大關鍵，而闊氣確也由黃金為轉移的，這些爛污又是闊人生命的一部分。這流液的顏色，也確和黃金一樣的炫耀。於是乎不約而同，美其名曰：「黃金汁」³⁵⁷

無論是「高級」抑或是「低級」，屎尿都是人所要生產排泄的穢物，在此，周定山一方面利用屎尿抹平了「階級」的上下高低之分，一方面將「上層階級」最為深惡痛絕的屎尿與最喜愛欲求的黃金兩相結合，對所謂的富豪或是闊人進行了一次大大的嘲諷。

最後，周定山亦批判了試圖利用「下層階級」得利，以及大喊「普羅主義」卻光說不練的這一類人。前者如〈一吼居談屑〉第 18 則「捻頭主義」，周定山認為「率了飢餓戰線的苦工，跪磕一些同情，煽動的首領，要捻掉！」，後者如〈一吼居談屑〉第 24 則「油炸燴」：

名士又從有閒階級談到「普羅」文學了！外頭的確有人在啜泣，接連號洵大哭！——一個童販……俯首忙著整理殘貨，獨自牽那破爛油膩的衣裾，揩淨眼淚，徐徐行不數步，又在高呼著：「燒……油炸燴…燒」！那名士還是

³⁵⁶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51。

³⁵⁷周定山，〈無聊春秋〉，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28-229。

抽菸喝茶，配「燒...」！從「清一色」談到白鶴酒，由「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談到「能說不行」的重心問題了！³⁵⁸



「名士」所談的問題上天下海、無所不包，然而在周定山看來那不過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空談。並且，周定山以「名士」間的談話對照外頭穿著破爛油膩的衣服，賣著「油炸燴」的童販，更顯諷刺。童販無非就是「名士」口中的「普羅」階級，然而，縱使活生生的「普羅」階級已經近在身邊，並且嚎啕大哭，「名士」們仍然繼續紙上談兵，用盡嘴上功夫。從周定山的立場來看，這些「名士」又有何資格談論「普羅」文學呢？這僅僅是「能說不行」、光說不練的表現。

二、對於「迷信」的批判

「階級」問題影響臺灣社會甚深，周定山散文的批判立場可以說是試圖為「下層階級」發聲，以諷刺的手法、批評的力道，抗議加諸人民百姓的「階級」枷鎖。除了「階級」之外，「迷信」亦是臺灣社會當中綑綁人民，根深蒂固的沈痾，故縱觀周定山的散文作品，亦充滿著對於迷信的批判，且帶有試圖帶領人民破除迷信的啟蒙意味。

對周定山而言，迷信極可能是他眼中臺灣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一吼居談屑〉第 13 則「殺人不見血」中，他提到：

呵！「殺人不見血」！這是怎麼一回事？古人都歸罪於「酒色」。現在「阿片、麻雀牌」，也是攻擊的焦點。但不若「迷信」之為已甚也。³⁵⁹

³⁵⁸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70。

³⁵⁹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57-158。



「酒色」、「鴉片」、「麻將」，沉迷於身體慾望、吸食毒品或是賭博，對人類來說都是極大的傷害與社會問題，然而，周定山認為這些都不若「迷信」所帶來的禍害，他接著下去舉例說明「迷信」的嚴重性：

提點老例罷，某君未入 G 大時，他已力倡「迷信滅種」論。不久，那母親病了！始則延個醫博，次則服赤腳先〔案：疑為「仙」字誤〕的草藥，繼則吃神明的爐丹，再則「一命嗚呼」了！是「鼓刀自刎」還是「殺人不見血」……³⁶⁰

「始則」、「次則」、「繼則」、「再則」的敘述，體現了「某君」自「力倡迷信滅種」至回歸草藥仙丹、民俗療法的「淪陷」過程，且最終令母親走向「一命嗚呼」的結局，而這無疑是一記沉痛的諷刺。故周定山才會在文末感嘆這究竟是「鼓刀自刎」還是「殺人不見血」？而「某君」之所以「淪陷」，不外乎是因為迷信對人已有根深蒂固之影響，即使在思想言論上可以反對迷信，一旦實際遭逢變故，人卻又不免重返迷信之途。這就是為何周定山稱迷信為「殺人不見血」，血腥總是令人害怕，但若「不見血」意謂著人們無法對迷信的危害真正感到恐懼，因此也就無法打從心裡反對、排除迷信之存在，而周定山之所以批判迷信，正是因為他深刻觀察到了迷信本身的危害之外，還有這危害已根深蒂固，難以為人徹底排除之可怕影響。

除了「某君」之外，〈也是隨筆（十）〉筆下的李緒生，也是在言論上反對迷信，但實際上卻深受迷信影響的例子：

以後人自居的李緒生，套著洋服，遙遙跑到廣州，大談他的無神論。在黃花節那天，由袴袋裡失掉什麼東西？很驚慌地大嚷不可誤踏的！到了找著，

³⁶⁰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58。

卻是個紅「香火」，上寫「伽監公」。人們大笑道「咬驢公」！³⁶¹

「驢」字為男性生殖器官之意，「伽監公」與「咬驢公」則是在閩南語發音上相近，雖然用此嘲諷李緒生的是周定山文中的「人們」，周定山看似僅寫下這一事件的發生，但書寫本身擇入何種內容，即可見作家的褒貶用意。比起「某君」，周定山對於李緒生表面上反對迷信，實際上卻深陷迷信之中的描寫實則更為滑稽生動，可說是不帶同情的諷刺。


上引之外，周定山批判迷信最力的散文莫過於〈我對建醮的幾句話〉與〈迷信與近代之思潮〉，而這二篇散文體現了周定山批判迷信時所採取的二類策略：文獻探究與科學實用，也就是利用傳統的文化資本進行辯證，再加上現代科學精神的引入，以求導向破除迷信的啟蒙意義。

古典漢學的浸養，使得周定山在思考現世的迷信問題時，會去考證迷信本身的歷史背景，進而削弱迷信被世間撐起的價值意義，達到批判現世迷信的意圖，例如在〈我對建醮的幾句話〉當中，周定山就考察了「醮」的原始意義：

這「醮」字據《禮》的裏面說：「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實是婚禮用的。《儀禮》也說：「若不醴，則醮用酒。」這是冠禮用的。尋不出有什麼建醮的痕跡，只有宋史說什麼：「設黃錄醮，仰祝聖壽。」是當專制君主的時代，奴隸的臣民，要巴吉〔案：疑為「巴結」之誤〕皇帝的。也看不出有什麼會替蒼生求平安謀幸福的事呢！其實是些奸獪的徒輩，利用愚民的心理，欲賺些金錢，就捏造了魔鬼邪神的學說泥塑木雕的偶像，瞞人有賞善罰惡的特權。³⁶²

³⁶¹周定山，〈也是隨筆（十）〉，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41-142。

³⁶²周定山，〈我對建醮的幾句話〉，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131。



周定山對於「醮」字的考察其實是不夠嚴謹的，例如《漢書·郊祀志》就曾記載「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³⁶³一事，易言之，在中國漢代的歷史記載中，「醮」，此一祭祀行為即被認為是有具有召喚「神」的作用，與超現實的信仰之間在意義上有所牽連。在證據不足以及存有反論的情況下，上引文字並不能算是嚴格的考證功夫。然而，周定山的重點是放置於「論述」(discourse)上，考證只是使得論述能夠更有說服力的手段、策略。「醮」是一種民間傳統文化，周定山的策略即是利用他熟知的文化資本(漢學素養)，上溯儒家文化的經典源流(禮記、儀禮)，從「傳統」中去「論述」醮是婚禮、冠禮的儀式，而即便是在歷史記載，「醮」體現出臣民用來巴結皇帝的上下關係，但「醮」從來就僅是與「人」相關而與「鬼神」無涉，據此將論述導向「鬼神」乃是因「人」而生的事實，揭開愚民瞞人的捏造假象，達至啟蒙的目的。

由於周定山戰鬥性散文，其背後的關懷皆在百姓民眾身上，再加上對於社會階級的敏銳觀察，故辯證「鬼神」之時，特別側重批判在上位者以「鬼神」之名行愚民之實的作為，如在〈迷信與近代之思潮〉中就引用大量文獻典籍如《管子》、《論衡》、《漢書》、《國語》、《史記》、《宋史》、《舊唐書》等等，論證以「鬼神」來愚民一事，以下節錄片段：

愚人之手段而彰明較著者，則宰我曰：「夏后民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慄，曰使民戰慄」……此種誕妄因習之虛儀飾非，民或慍厭而疵其謬則戮殺靡遺。《國語周語》言：「厲王虐，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者，已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衛巫者操神柄而掌生死之權也。以鬼治國，奚怪國人道路以目。³⁶⁴

³⁶³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ctext.org/han-shu/jiao-si-zhi-xia/zh?searchu=%E6%88%96%E8%A8%80%E7%9B%8A%E5%B7%9E%E6%9C%89%E9%87%91%E9%A6%AC%E7%A2%A7%E9%9B%9E%E4%B9%8B%E7%A5%9E&searchmode=showall#n63496>

最後檢索日期：2013/12/12。

³⁶⁴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1。



在周定山看來，「鬼神」不外乎就是鞏固在上位者統治權力的手段，「民或慍厭而疵其謬則戮殺靡遺」一句點出了民眾試圖反抗卻會遭逢鎮壓的情形，一方面反映周定山的「階級」批判意識，另一方面則顯出周定山對於在上位者藉由「鬼神」營造的「迷信」來蒙蔽民眾，並不容民眾質疑「迷信」的深惡痛絕，故倡言「舉凡鬼神之害物，悉數摧陷而廓清之」³⁶⁵，周定山如此徹底決絕的姿態，即折射出「迷信」對社會造成的禍害之巨大。

是故周定山在列舉文獻典籍中以「鬼神」禍民、愚民的例子之外，又以王充、管子、韓非子、劉安等人，甚至是佛教的觀點為例，建構一連串提倡無神論的論述體系，言之鑿鑿，試圖藉由古人的想法加強自己批判「迷信」的力道。而在歷代的反對意見之中，周定山特別標舉出的是王充的意見，因為周定山認為王充是從「物理上辨明無鬼觀」³⁶⁶，故而擷取《論衡·論死》中的幾個論點，如古往今來死者以億萬計，倘若人可以見到鬼，那應該會見到數百千萬的鬼才是。又如人死後衣服隨之朽去，為何鬼出現時仍然會穿著生前的衣服？無生命的衣服如何能夠自若為衣服之形？又如人之氣力來自於飲食，無飲食則無氣力，無氣力則聲音嘶困，甚至無法言語。而死造成一種困頓的極致，人死後又何能化為鬼而言語呢？³⁶⁷綜上種種，周定山認為王充的無鬼觀所體現的正是理信思辨的精神，而「理信」即是處在現代社會的周定山面對「迷信」最有力的思辨及批判武器：

社會之文野，國家之興衰，以國民識字多寡而別之。實亦視其持理信（科學）與迷信為判然，此世界之通論也……吾不知鬼神於宇宙間存在何處。顧今之迷信者，且堅認身體之外有靈魂。其實肉體之外有何靈魂而作怪？……生命是蛋白質體生存之方式，有機體之變化及性質者如此，故有

³⁶⁵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3。

³⁶⁶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3。

³⁶⁷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4。

機體有生死。昧於科學之人。以為靈魂（精神）是超越物質。從唯物論證之，精神作用，亦何不可思議。人之一舉一動，或是思想，或是情感不外肉體內分子（細胞）之作用。不是運動，便是化學之反應。³⁶⁸



周定山是將科學直接等同於理信，而將科學／理信作為相對於「迷信」／「鬼神」的判準。既然「迷信」以「靈魂」或是「鬼神」的方式昧愚人心，那麼周定山採取的策略就是將生物學、化學等科學知識作為武器，對「迷信」予以反擊。面對神奇或是不能理解之現象，人總是需要尋求解釋，周定山也很清楚原始世界中「迷信」的由來便是來自「為不敵自然界之壓迫，便易生恐怖之心理病態」³⁶⁹，而即便是人類開化之後，亦有可能受到神經過度刺激或是觀察認知錯誤等因素，而心生恐懼幻象或是迷信之解釋。³⁷⁰而周定山面對他筆下「奸獪的徒輩」所產生的批判，也不妨視作一種面對難解現象的解釋權之爭奪，長期以來，都是「迷信」主導著該解釋權，但「迷信」本身禍害甚大，亦常被利用為鞏固權力／權利的工具，故周定山才試圖重新將解釋權導向於科學／理信，徹底建構出「倡物靈二元論者，直與夢囈等。任他如何妖言強辯，亦逃不出物質科學之定律」³⁷¹的論述。

在〈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最後，周定山如此結尾：

倘無同胞甘為迷信之奴隸，則己否必起而撲滅以廓清之，以脫鬼域而就人界，始為真實之解放。是所厚望於吾臺之有志，蹶起為此渾茫之鬼域而革命……³⁷²

周定山並不全然以批判為要，其散文的戰鬥精神更是落實在他期待人民同胞能夠

³⁶⁸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4。

³⁶⁹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36。

³⁷⁰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39-239。

³⁷¹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8。

³⁷²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頁 248。

達成「真實之解放」的想望；而以「革命」為文作結，更顯示出周定山的決心以及其散文當中所蘊含的戰鬥與批判精神。



第二節 書寫社會、民眾之聲：《臺灣民報》「問題散文」

許達然在談論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時，援引了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的說法，指出日治散文無論是在語言使用抑或內容題材上都相當貼合時代氛圍，並反映了當時社會情境。³⁷³誠然，相較於注重描繪內心世界的戰後美文，日治時期的散文作者則多以臺灣社會為書寫關懷，前一節所討論的周定山便是當中的佼佼者。以周定山的散文作品來看，對於「階級」與「迷信」的批判，即是因為「階級」與「迷信」一以壓迫、一以愚惑，使得人民百姓受害，易言之，周定山散文的終極關懷在於為掌權力／權利的平民百姓，或是說處在社會底層的民眾。而周定山並非特殊的個案，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社會」關懷以及書寫的涉世意義，普遍都落在平民百姓身上，以人民為題材，彰顯出當時臺灣的社會問題。

此外，許達然並提出「問題散文」的概念：

散文最直接的表達是論述，都是作者執意影響聽者和讀者的。巴赫金認為至少有兩種論述：「權威論述」（authoritarian discourse）和「內涵說服論述」（internally persuasive discourse）。「權威論述」要人服從，沒有想像的空間，和政權及制度連在一起；人們不是全部肯定就是全部拒絕。「內涵說服論述」把自己的話跟別人的混合在一起，有時代和現時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台灣作家否定外來的殖民權威論述以及在本地的守舊權威論述，而從事內涵說服論述。在這些有時代性格的內涵說服論述中，探討最多的也是社會、

³⁷³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 33。

政治、思想的基本問題。我把這種散文叫做「問題散文」。³⁷⁴



本節所欲處理的部分，即是以《臺灣民報》為例，談討以臺灣社會為主題，且以論述為表達形式的「問題散文」。

《臺灣民報》以臺灣社會民眾為對象，具有濃厚的啟蒙性質，³⁷⁵針對臺灣的社會問題，承載了許多上述許達然所謂之「問題散文」。若要探究日治時期現代散文所體現出的當時社會的「感覺結構」，以及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對於社會問題的介入性格，《臺灣民報》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刊物。

賴和曾以懶雲為筆名，在《臺灣民報》成立十周年之際，曾書寫〈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眾的進行曲〉一文，指出《民報》成立的意義之一便在於「忠實實替被壓迫民眾去叫喊」³⁷⁶，而署名炳的作者，亦曾在《臺灣民報》成立之後，在第4號發表一篇〈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藉由「我們」、「我們的臺灣」的敘事呼喚，針對社會上「不自由不幸福」的境遇，希望預設讀者們（我們）能夠努力予以改變。³⁷⁷此外，亦有讀者以「不平的讀者」為筆名，談到「購讀民報的人、都是出於愛社會的精神、自發購讀的」³⁷⁸。綜上，就刊物性質、投稿作者、購閱讀者三方面來說，《臺灣民報》都是與臺灣社會息息相關的重要場域。本節即以《臺灣民報》上論述臺灣社會問題的「問題散文」為中心進行探討。

一、《臺灣民報》問題散文論述的社會問題

這樣酷熱的天氣、須得用冷藏庫來收減〔案：疑為「藏」字誤〕食物

不然、不過了一天就會腐臭。

³⁷⁴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頁4。

³⁷⁵如創刊詞就強調《臺灣民報》「助社會教育、並喚醒民心」的宗旨，慈舟，〈創刊詞〉，《臺灣民報》，第1號，1923.04.15。

³⁷⁶懶雲，〈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眾的進行曲〉，《臺灣新民報》第322號，1930.07.16。

³⁷⁷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臺灣民報》第4號，1923.07.15。

³⁷⁸不平的讀者，「不平鳴」，《臺灣民報》第83號，1925.12.13。

現在臺灣的社會、是一個酷熱的天氣、所以也須用一個冷藏庫來收藏一切
易腐臭的東西、以防社會的腐臭。³⁷⁹



該篇散文作者以「冷藏庫」做比喻，在這個比喻中，可將「易腐臭的東西」視作臺灣社會上的諸多問題，「冷藏」則是指涉預防或是中止問題發生的方法，只有防範社會上諸多問題，才能防止整個社會的腐臭。該篇文章即提出了數種當時臺灣社會的問題，一是「對於官廳則極力獻媚、對於人民則極力刻薄」的本島人，運用權勢反對文化講演進入桃園。二是提倡內臺融合的《經世新報》，卻每每記載離間內臺感情的言論。三則是反對文化運動並沉迷酒色的紳士。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社會問題由其他散文揭露，以下便舉例呈現之。


(一)、農民問題

倘若以「農」字檢索，《臺灣民報》中有將近千篇文章皆與「農」相關，³⁸⁰其中有大部分是關於農民問題的討論，以〈小農民十大苦況〉³⁸¹一文為例，該文針對虎尾郡崙背庄的蔗農，點出了無權無勢的小農民所遭逢的十大苦況。苦況一是甘蔗受製糖會社賤價買收，使蔗農收入微薄。苦況二是被迫徵收小作料，在經濟困難之際，仍須不惜高利借金而繳納。苦況三是部份甘蔗採收委員「孝敬原料係如生身父母。尊重會社員如前世祖宗。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於是面對有勢力者便先為之採取，無勢力者則須送禮賄賂，無勢力又無能力賄賂之人，則任其甘蔗枯竭，百般刁難一般窮民。苦況四是製糖會社所雇用的各種採收甘蔗的工人，亦要收取農民賄賂，否則亦處處刁難農民。苦況五是嘉南大圳所能提供給蔗農的利益遠低於因嘉南大圳所產生的稅收。苦況六是受嘉南大圳的強制輪作法，

³⁷⁹一記者，〈冷藏庫〉，《臺灣民報》第 62 號，1925.07.26。

³⁸⁰參考得泓資訊「臺灣民報線上資料庫」的檢索結果 <http://tm.lib.ntu.edu.tw/>

³⁸¹未標著者，〈小農民十大苦況〉，《臺灣民報》第 85 號，1925.12.27。



使得利益高的水稻三年只能播種一次，亦使農民告饑於豐年。苦況七是耕作成本提高、採收獲益變少，即便人民終年工作，亦不得飽暖。苦況八是嘉南大圳的興成導致固有水源的枯絕，讓原本的美田變成荒地。苦況九是嘉南大圳的水源不能有效為農民灌溉。苦況十是嘉南大圳的給水溝與排水溝設計不良，農民仍要開溝築堤，在上位的指導員又「酒囊飲袋、妄自指導」，讓農民的勞力白白耗損。

作者在論述「小農民十大苦況」之時，雖然一一梳理出造成農民困境的各種原因，但其論述口吻並非冷靜或是純然理性的，而是帶有一種人的溫度，痛者痛之，以同情理解的立場進行散文的書寫。故文中常會出現這樣的句子：

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

噫！蔗農之困難莫甚於此時也。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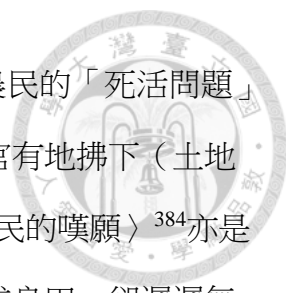
妻號寒於臘〔案：應為「臘」字誤〕月、子啼飢於豐年、告貸無門、坐受困迫。

嗚呼天道成仁、豈無拯救之策。

嗚呼無知小民、設此慘景、無殊啞子食黃連、苦在心頭、自恨口不能言耳！

文中屢用「嗚呼」這種帶有強烈悲憤質地的感嘆詞為農民喊冤訴苦，農民屢受政府及製糖會社剝削，在人世間已求助無門，故作者甚至呼喊「天」來發出不平之鳴。而為「抱屈難伸」、「苦在心頭」的農民，《臺灣民報》上這類「問題散文」，即是合乎了賴和所謂「忠忠實實替被壓迫民眾去叫喊」的精神。除了〈小農民十大苦況〉之外，其他諸如〈芭蕉農民的死活問題〉³⁸²，則是為臺南州斗六郡各地佔地一千餘甲左右芭蕉皆被官廳剷除的蔗農抱屈，這使得蔗農不但損失慘重，且無從還債，甚至弄得一家人為求謀生而離家散宅，真所謂「死活問題」也。而文章最後，作者亦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觀點，為蔗農請命，冀求官廳能夠

³⁸²未標著者，〈芭蕉農民的死活問題〉，《臺灣民報》第 107 號，1926.05.30。



允許蕉農栽種芭蕉。〈大肚農民的死活問題〉³⁸³則同樣是為了農民的「死活問題」向官廳請命，大肚庄的農民是因為官廳將大肚庄人民所開墾的官有地拂下（土地開墾權的批准）給退官者，而造成無地可耕的困境。〈東石郡農民的嘆願〉³⁸⁴亦是土地開墾權的問題，該文述東石郡農民用其血汗，將荒地開拓成良田，卻遲遲無法得到官廳的批准，而後來有一日人退官者貪圖現有的良田，憑藉著官廳及警察勢力來奪取該地。而其他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問題散文」亦多如牛毛，顯示《臺灣民報》對於農民問題的重視程度。

（二）、貧富問題

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生活，受貧困所苦的不只農民，而伴隨著貧困而來的不僅是農民問題，社會上的乞丐、遊民等問題亦是由此而生。

蔡復春曾於《臺灣民報》的前身《臺灣青年》發表〈研究救恤貧乏問題〉一文，試圖以社會主義的理論，思索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夫社會問題。發生於貧富不均。比資本家地主。因受法律之保護。貧者賴乎自己之能力。犧牲許多心神汗血。始能謀圖生計。於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³⁸⁵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確是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犧牲許多心神汗血。始能謀圖生計」一語亦所言不虛。如刊載於《臺灣新民報》上「社會寫真」SM生〈可憐的老車夫〉雖然並非以論述為主的「問題散文」，但運用小說對話筆法，將老車夫以血汗賺取微薄金錢的形象描繪得栩栩如生。文中描述老車夫等了半天終於等

³⁸³未標著者，〈大肚農民的死活問題〉，《臺灣民報》第 113 號，1926.07.11。

³⁸⁴未標著者，〈東石郡農民的嘆願〉，《臺灣民報》第 125 號，1926.10.03。

³⁸⁵蔡復春，〈研究救恤貧乏問題〉，《臺灣青年》，第 2 卷第 4 號，1921.05.15。



到「一個穿一套摩登式洋裝的青年潤客」，但該名潤客卻與老車夫討價還價：

「先生、多兩三分錢、在你們富戶的人算什麼」

老車夫這樣懇求着。然而青年潤客並不同頭一顧、開起步便一直跑去。³⁸⁶

SM 生寫出貧者向富者懇求，但卻遭到富者無情拒絕之一幕。而後，老車夫載到一個日本人，原本官定三角半的車錢，日本人卻只願意給一角，甚至威嚇老車夫「去！多講話就要打」。老車夫一天租車須四角銀，而這一天所賺取的車資連付租金都不夠用，充分展示了貧者的悲哀。SM 生的這篇散文，應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情節虛擬性。然而，現實甚至比故事更為殘酷。在《臺灣民報》「地方通信」專欄中，就有〈惡刑事毆打車夫〉、〈刑事乘車不給錢〉二文，寫下警察不願付足該付的車資，或甚至是完全不願支付車資，進而惱羞成怒毆打車夫的記事。³⁸⁷由此可知，貧者如車夫之生活困苦並不亞於農民，而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亦由此可見一斑。

在蔡復春的論述以及上述的例子當中，貧者尚能勉強「謀圖生計」，但貧者愈貧的情況下，就連「謀圖生計」的可能也會喪失，因而就會產生出「身中無一物的無產者」³⁸⁸，亦即乞丐的社會問題。

施乾的〈乞丐底問題〉是《臺灣民報》上有關乞丐的「問題散文」中最重要的一篇。施乾認為乞丐問題，「乃是今日底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而尤其是最第一緊急待解決的『今日底問題』」，亦即強調乞丐問題的重要性、現世性與急迫性。施乾並進一步指出，倘若正視乞丐問題，對於「臺灣的現狀」亦能夠有所把握。³⁸⁹一方面，乞丐是社會貧富差距下的產物，另一方面，社會對待乞丐的方式，也就

³⁸⁶ SM 生，〈可憐的老車夫〉，《臺灣新民報》，第 370 號，1931.06.27。

³⁸⁷ 未標著者，〈惡刑事毆打車夫〉，《臺灣民報》第 168 號，1927.08.07；未標著者，〈刑事乘車不給錢〉，《臺灣民報》第 202 號，1928.04.01。

³⁸⁸ 施乾，〈乞丐底問題〉，《臺灣民報》第 76 號，1925.08.26。

³⁸⁹ 施乾，〈乞丐底問題〉，《臺灣民報》第 76 號，1925.08.26。



是富者與貧者之間的關係亦是一嚴重的問題。菊仙的〈臺灣的社會事業〉一文，就曾經表示他對於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憂心：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商工業愈發達的地方、貧窮的人愈多、這是多麼遺憾的現象。倘使沒有講究善後策的時候、社會上的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結局貧富兩階級互相仇視、終至變成水火不相容的狀態。³⁹⁰

菊仙的憂心體現出貧與富之間因為經濟實力的差別加深產生出的界線也就愈加明顯，「仇視」與「水火不相容」鮮明地點出二者之間強烈的排斥性。然而，社會雖然大多由貧者組成，但主導權卻是落在富者手中的，因而貧者，尤其是乞丐，就成為了社會的邊緣存在。施乾也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

向來、世人一說到「乞丐」這二字、大都以為他們是被擯在人間外的東西、並且不論是誰、誰也不和他相接觸、即使偶爾把他賤侮輕蔑、也是如同飯餘茶後一樣，以為是無關痛癢的一回事。³⁹¹

菊仙僅點出了貧富之間的對立關係，而作為極貧者的乞丐，則甚至要被摒除在「人間」之外，僅能算是個「東西」。這其實非常接近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之中所提出來的概念。福柯認為在蠻荒社會之中是不存在所謂瘋子的，文明社會以文明、道德與理性等觀念，將瘋子排除在外。³⁹²而日治時期臺灣社會人們藉以區隔、排除乞丐的標準則是在於金錢，易言之，乞丐便是貧富問題之中，將「人」歸向「東西」的社會問題之一大表徵。

³⁹⁰菊仙，〈臺灣的社會事業〉，《臺灣民報》第 142 號，1927.01.30。

³⁹¹施乾，〈乞丐底問題〉，《臺灣民報》第 76 號，1925.08.26。

³⁹²福柯著、柳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但其實福柯與施乾的思路不盡相同，福柯批判收容瘋人的設施，施乾則是建立「愛愛寮」提供乞丐居住。



(三)、教育問題

除了上述農民問題與貧富問題之外，《臺灣民報》上的「問題散文」亦十分關心婦女解放問題與教育問題，而關於《臺灣民報》的婦女解放言論，已有楊翠以專著進行詳盡的整理與討論，³⁹³故本小節即僅針對教育問題發論。

《臺灣民報》於第 81 號與第 83 號分別都在頭版論述臺灣的教育問題，且將教育的問題提升到國家等級的問題：

自古至今、養成國民的基本工夫、是全靠教育之力的。教育的盛衰、和國力的消長、是大有關係的。教育愈發達的國家、其國民的幸福則愈增進、反是、其國民則不但不會有向上、還必定要陷於不幸的境遇、故可說教育是人才的基礎、國家的命脈。³⁹⁴

有好的教育、才會造就好的社會或健全的國家、這個原理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臺灣的社會、若從教育方面做起、即是給子弟們有好的教育、並且使內臺人受平等的教育、便容々易々的達到融洽、發達的地步、這是不消說的了。³⁹⁵

認為教育是「國家的命脈」，可見《臺灣民報》對於臺灣教育問題之重視。〈臺灣教育界的當面問題〉以實際的中學入學統計數據，突顯日本內地人與臺灣本島人學生入學比率之懸殊，故而希冀能夠成立私立中學，以確保本島人學生的入學人數與教育品質。〈教育界的一大問題〉亦採用了統計數據增加論述的說服力，其中中心主旨仍在呼籲促進內臺之間的平等教育，並指出實行共學制度之後，內臺學生

³⁹³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臺北：時報文化，1993）。

³⁹⁴未標著者，〈臺灣教育界的當面問題〉，《臺灣民報》第 81 號，1925.11.29。

³⁹⁵未標著者，〈教育界的一大問題〉，《臺灣民報》第 83 號，1925.12.13。

已逐漸平等，但卻亦以「不平等的平等、却是很大的不平等」之警句，指出平等之下的教育不平等之事實。

內臺學生教育不平等的問題，是《臺灣民報》有關教育的「問題散文」十分關注的重點項目。如〈宜速實行義務教育〉一文，亦是談論相關問題：

在臺日本人的兒童、個個都得入小學校、享受着和內地義務教育、一樣的利益、而臺人的兒童、只有一小部分得受公學校教育、其大部分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並且公學校教育也不能比少〔案：應為「小」字誤〕學校教育的完全、同是人類、怎樣就有這樣區別呢？³⁹⁶

除了點出內臺之間兒童的受教比率不均之外，該文亦強調在教育品質上，臺灣公學校亦比不上日本小學校，並且，文章回歸到「人」身上論說，希望藉由「人類」這一個不帶人種、民族標籤的概念，指出內臺學生教育不均的不合理性。這樣的問題，臺灣人一直從《臺灣民報》談到了《臺灣新民報》，李瑞雲在《臺灣新民報》創刊十周年之際，亦撰〈臺灣的教育問題〉一文，仍舊將論述重心放在訴求內臺教育平等上，³⁹⁷可見該問題對於臺灣教育影響之深遠。

除此內臺教育不均的問題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教育問題是伴隨著公學校初等教育而來的教職員問題。如〈教育界的大問題〉一文就涉及教師的失職：

公學校的先生在鄉村裏不消說是要拿他的全人格來感化他的學生和父兄們、才會達到教育本來的目的。我們最不可耐的就是一輩潦草的公學校長和教師們沒有認清他們的天職、一面殷勤地只管找視學和郡守的歡心、一面懶惰的過着日子、以致受了父兄們的排斥、失掉師弟的情誼、這是很大的問

³⁹⁶未標著者，〈宜速實行義務教育〉，《臺灣民報》第 98 號，1926.03.28。

³⁹⁷李瑞雲，〈臺灣的教育問題〉，《臺灣新民報》第 322 號，1930.07.16。

題呵！新營郡番社某公學校長和虎尾郡東勢石公學校某准訓導（為着戲弄女生起見）等是個腐敗到底的顯例。³⁹⁸



就「懶惰的過着日子」到「戲弄女生」看來，自教育最基本的知識傳授，到教師的人格身教，在該文所批判的對象當中，皆產生了問題。同時，該文亦強調老師與家長（父兄）之間的連繫關係，以及教師與學生（師弟）的情誼，可看出對於教師的「全人格」的要求與期許。當教師尸位素餐，並且於人格操守上出現重大問題時，莫過乎該文要以「腐敗到底」來批評之。

至於〈農村教育的改造問題〉一文同樣指出「大部分的教師、都是奉行故事的」問題，批評教師的虛應故事，如同前文批判教師未認清自己的天職。但此文的重點則是針對農村公學校的現狀提出指謫意見，認為農村公學校的教師未考量到城鄉差距所導致的知識程度的差異，逕自使用日語上課，讓學生無法理解吸收，造成六年教育下來，實力嚴重落後都市學生，所學既無法藉以考上上級學校，亦與家業無關，甚至連讀書看報的能力都沒有，「只好和派出所的巡查大人說幾句的口頭禪就算了」，以此表達對於教職員的諷刺與批判。³⁹⁹

二、《臺灣民報》「不平鳴」專欄的一般作者群

綜觀《臺灣民報》上以書寫社會為主的「問題散文」，大多皆符合賴和所謂「忠實實替被壓迫民眾去叫喊」的論述精神。然而，《臺灣民報》的意義尚不僅如此，「不平鳴」專欄的出現，使得「被壓迫民眾」自身，亦能有自行發聲的管道。

1924年10月11日，《臺灣民報》第2卷第20號開始增設「不平鳴」專欄，當期設置專欄的「敬告」如下：

³⁹⁸未標著者，〈教育界的大問題〉，《臺灣民報》第76號，1925.10.25。

³⁹⁹未標著者，〈農村教育的改造問題〉，《臺灣民報》第81號，1925.11.29。

本報自本號起增設「不平鳴」一欄以應一般惠稿之便，藉以審知各地之弊害，欲圖框救之方法，但希惠以短篇，勿過於冗長是幸。⁴⁰⁰



「不平鳴」專欄的設立，使得無論是文學家、知識份子，或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要掌握書寫能力，就能夠以散文這樣的文體，為人民百姓、為自己發出不平之鳴。而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投稿「不平鳴」專欄的文章皆符合該欄「短篇，勿過於冗長」的投稿規定，每一篇自數十字至數百字不等，如同周定山〈也是隨筆〉一樣是短小精簡的散文編制。再者，「不平鳴」專欄自 1924 開始於《臺灣民報》長期刊載，持續刊載至《民報》更名為《臺灣新民報》，進而發行日刊之後。根據臺文館資料庫的檢索結果，至少到 1933 年 11 月之前都仍有該欄的設立。⁴⁰¹而若在投稿踴躍的情況下，一期則甚至可以收刊約八篇左右的投稿，將近十年的時間下來，針對「各地之弊害」而設置的「不平鳴」專欄，便累積出了相當龐大且數量可觀的散文文本，其意義在於打造出眾多接近平民百姓立場，或甚至其身分就是一般民眾的散文作者。而這亦與散文的特質有關：

和小說、詩、戲劇等文類比較，散文沒有比較明晰的形式與技巧……是現代人表達思想和感情最常採用的文類，也是讀者親近文學最自然的門徑。⁴⁰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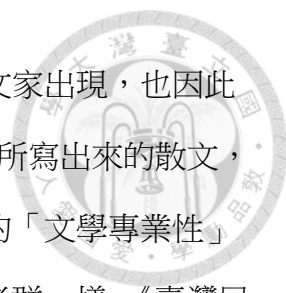
散文之為文類，其特色及誠如陳萬益所指出的，對於一般非文學專業的人來說，是接受度最高而排斥性最小的文類。然而，就戰後以「美文傳統」為主導的散文創作而言，一般民眾要能寫出具有文字密度、詞藻美感的散文而進入「傳統」之中，實非易事。而若就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來說，這一階段的現代散文較不重視語言形式的經營，作者經營散文的態度也相當「隨意」，此一現象，使得一般民眾

⁴⁰⁰《臺灣民報》第 2 卷第 20 號，1924.10.11。

⁴⁰¹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新民報檢索系統」

<http://sinmin.nmtl.gov.tw/opencms/sinmin/index.html?rdm=1387632038703>

⁴⁰²陳萬益，〈導讀〉，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頁 11。



更容易以散文來表情達意、抒議發論。日治時期並無專門的散文家出現，也因此小說家或是詩人等文學專門的作者，與一般文學外行的民眾之間所寫出來的散文，中間的差異就不如戰後來得巨大。易言之，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文學專業性」不高，就如同本論文第四章所指出的非文學專業的日文散文作者群一樣，《臺灣民報》「不平鳴」專欄亦產生出了大批非文學專業的中文散文作者。這些散文作品，理應納入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傳統」來考慮，而不會如同戰後因為注重文字形式雕琢的「美文」，而具有一種在創作範式以及文類「傳統」上的排斥性。

根據前引「不平鳴」的專欄增設佈告，便可知該專欄徵求的是「一般惠稿」，雖然同樣是關懷社會民眾的散文，但似有與前述施乾等知識份子的文章分別之意，訴求的是「一般」民眾的意見與投稿。綜觀「不平鳴」專欄，大部分的散文於文末處皆有註明投稿者，雖則幾乎都是以筆名投稿，但就陸續於該專欄旁出現的，像是投稿須知之類的佈告來看，每個筆名背後都可以推斷說有一個對應的真實作者存在：


此後凡欲投稿于本欄者、請須明示住址及真姓名於本社、記事又須確實、否則概不照登。特此謹告。⁴⁰³

凡欲投稿在不平鳴者、請寄到臺北支局、內容須要簡短確實。若不明示住址及真姓名者、概不登載、但報上不妨匿名。附此佈聞。⁴⁰⁴

由此可知，除了規範篇幅，並強調內容必須要確實之外，「不平鳴」對於投稿者的要求即是必須附上「住址及真姓名」，目的應是在於確認該論述意見的真實性，以及訴求投稿者對於發表文章的負責性。「但報上不妨匿名」，應是要保護投稿者的

⁴⁰³ 《臺灣民報》第 89 號，1926.01.24。

⁴⁰⁴ 《臺灣民報》第 121 號，1926.09.05。



實際身分，畢竟「不平鳴」專欄多以揭露地方弊害為主，勢必引起風波或是打亂人際之間的利害關係，發表者的抗議，亦可能會引起報復。因此，雖然無法從筆名確知該散文作者的真實身分，但《臺灣民報》作為一發表場域的提供者，則負責把關作者身分的真實性。因此，在無從得知筆名背後的真名的情況下，雖然一個投稿者可以用不同筆名，而某一個也可能不僅限定於單一作者使用，但是應可想像每一個筆名背後大致會有一個對應的實際作者。

觀察「不平鳴」專欄的投稿者筆名，可以發現「筆名」的設計亦是創作之一環，不同的筆名體現出的是各個思考方式、書寫風格各異的作者群，以下便大致試將「不平鳴」專欄中數量甚多的筆名予以分類：

(一)、庄民、村人、庄裡人、住民、農民、市民、人民……一類：此類即強調作者本身為「一般民眾」代言的立場，如第 205 號：

臺北市當局□於四月一日起、對使用公共墓地的市民、實行徵收公共墓地埋葬料、以致貧困的市民、都無不徒呼負負！如此人亡錢花、已是慘無可言、還要再繳納埋葬料！真是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市民之聲）⁴⁰⁵

淡水郡三芝庄後厝警察派出所、這番欲重新改築、故該地警吏強制庄民□出寄附金以充建築費用。為此該庄村民、莫不叫苦連天！盼望上司有加警戒、庄民幸甚。（叫苦庄民）⁴⁰⁶

作者對於當地的改變相當了解，也明白民眾的處境，故能聽見民眾的「徒呼負負」或是「叫苦連天」的心聲，代而抒發。或甚至是作者本身就是「市民」或是「庄

⁴⁰⁵市民之聲，「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5 號，1928.04.22。

⁴⁰⁶叫苦庄民，「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5 號，1928.04.22。

民」，而僅是採用一種客觀描述的方式書寫，這也是一種可能。



(二)、被害者、被辱女、受虧者、受害者、被欺者……一類：此類強調作者本身的自身經驗，如第 178 號：

楠梓郵便局集配人及事務員、平素為人狡猾、不盡郵務之職責、凡有批信或新聞雜誌到該局的時候、不特不從速配達、甚至連電報及書留等之重要通信、也是這樣做法、致使一般農民之急事被其所誤而不勘！嗚呼！如此非為亂作、豈不失墜臺灣郵政之信用乎……（一受害者）⁴⁰⁷

作者對於郵局之集配人及事務員，如何之「不盡郵務之職責」有清楚的了解，可推測該作者應屢有「受害」經驗，忍無可忍之際，便投書報章。

(三)、狂巴結、昧心主義者、大悖人倫、污吏、假公行私、濫用職權……一類：此類作者所使用的筆名並非代表自己的身分或是寫作狀態，而是筆名的方式，對於文章諷刺、批判的對象作一簡單的描述總結，如第 3 卷第 1 號：

助役鍾某者乃澎湖的人、本做巡查、善於巴結。自做了西嶼庄助役以來、經過四五年的久、逐日研究扶陰囊的方法、(拍馬屁吹牛皮的工夫)指甲當如何剪、奴顏又如何修、婢膝要如何跪、方能奉承當局的歡心、那有想到人民的死活……近來又巴結一內地人、尊他如同大世祖、拜跪鞠躬舐癰呪痔、無所不至……（狂巴結）⁴⁰⁸

⁴⁰⁷一受害者，「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178 號，1927.10.16。

⁴⁰⁸狂巴結，「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1 號，1925.01.01。



作者可謂極盡嘲諷之能事，寫出助役鍾某的趨炎附勢、巴結諂媚的嘴臉，真不愧為「狂巴結」。而此類筆名除了有總結概述之意，亦應有再度諷刺之意義，意即自內文至筆名，能寫能發表之處皆不放過。

(四)、當頭一棒、唾棄生、斥橫暴、準備攻擊、斥惡吏……一類：此類作者使用唾棄、斥、攻擊等動詞進入筆名，展現出作者強烈的戰鬥性格，如 206 號：

本月十七日田中庄第十二、十三、十四保之春季大清潔時、各保檢查官分頭巡視皆無事通過、惟有第十二保役場書記陳某、威風凜凜揮東指西、濫自告發、以致被其告發受罰者達至十餘人之多！似此恃勢凌人之書記、實在令人唾棄！（唾棄生）⁴⁰⁹

「唾棄」作為動詞在此除了表示一種極端不滿的情緒抒發，同時也是針對該名書記的恃勢凌人之姿予以強烈地反擊。

(五)、質問生、問責生、詰問生……一類：此類同樣體現出作者的戰鬥性格，只不過其「戰鬥」方式並非如同前一類直接進行反擊，而是採取反問、詰問的方式，如第 199 號：

中壢郡下某派出所本島人巡查、與新竹街商業被雇人黃天助妻、實行了自由亂愛、致使黃天助夫妻相反目、家庭間為之時常起了風波、將來或者因此弄到離婚也未可知、如此非為、豈是保護民眾的巡查、所當為的事嗎？
(詰問生)⁴¹⁰

⁴⁰⁹唾棄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6 號，1928.04.29。

⁴¹⁰詰問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199 號，1928.03.11。



作者以「自由亂愛」諷刺當時自由戀愛風潮所帶來的問題，而保護民眾的巡查卻破壞了民眾的家庭，是作者無法接受之事，故便採取「詰問」的強勢態度，批判該名巡查之胡作非為。

(六)、警告生、勸告生、直諍生、一誠生……一類：此類作者的批判手法又與前二類不同，是以警告或是諍言等強勢的語言，來達成訴求，如第 3 卷第 6 號：

大甲郡梧棲街人四名、將由清水歸梧棲、先在清水驛與清水街之距離之間、坐輕便車、途中遇內地人亦四名、島人因汽車時間已迫到、又以規則上內地人應當下車讓過、詎料內地人不但不肯下車、反責島人無理、開口就罵「清國奴」「不遜」種種惡言……聞此種內地人往往挾其威勢以傲島人、不自知其過、故致內臺人、感情相衝突似此狂態若不稍斂、必犯眾怒矣。(警告生)⁴¹¹

對於書記、巡查、內地人……這些掌握有權勢或是階級地位的人，臺灣的平民百姓屢受壓迫，然而卻總是不乏反擊的姿態、抗議的聲音，此類作者便是以「警告」的方式，帶有威脅意味地利用強勢語言進行反擊，以表達心中的憤怒與不滿。

(七)、嘆世生、憂世生、悲觀生……一類：對比於前一類，此類對人對事較為消極，以感嘆的方式、悲觀的態度進行書寫，如第 200 號：

魚池庄頭社校長某、對於教育不但全無關心、而且對待學童父兄極不親切！又於日前在陳宅宴會中、某君質問頭社公學畢業兒童及第上級學校者甚少、校長先生對此有何打算？殊不知該校長竟揚言答說：「兒童之及第不及第、

⁴¹¹警告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3 卷第 6 號，1925.02.21。



與我何干！...」云々。噫！為一校之長尚且如此輕忽教育職責、於我地教育之前途、何堪設想歟？（悲觀生）⁴¹²

該名校長如此回答，可見對於學童是漠不關心，不過作者並無斥責校長之語，亦無詰問校長之文字，而是將論述重心放在「教育之前途」，表現出作者的悲觀態度。

（八）、親見生、見者、實知生、目擊者.....一類：此類作者著重所描述之事件的敘事者在場性，並藉由親自目睹的方式，強調文章的真實性，如第 2 卷第 24 號

十月廿八日夜、神社祭、京合會餘興場、場前有多數的內臺兒童。於幕間牽幕〔案：應為「幕」字誤〕偷看、時有消防組小頭進入、時內地兒童、都不敢打、只打臺灣兒童、打得叫若連天.....現出一個慘狀的活地獄一般哩、那亭邊雖有很多的內地人、沒有一個、肯替我們兒童出力、那時我恨身軀太小、我的腕力太弱。（親見生）⁴¹³

「那時我恨身軀太小、我的腕力太弱」後面添上一句「不能幫得上忙」，文句應當會更加完整。但無論如何，該名「親見生」不但在筆名當中強調「親見」，亦於文中透露「作者我」本身的在場，使得文字更有真實性與說服力。

（九）、一乘客、一使用者、一顧客、一旅客.....之類：此類強調在臺灣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人作為一個「客」對於服務業的要求，如第 254 號：

去十九日赴高雄、投宿高雄旅館、該館設備周至、衛生亦頗注重。但是下

⁴¹²悲觀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0 號，1928.03.18。

⁴¹³親見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 卷第 24 號，1924.11.21。



女、待一般旅客頗不親切、聞說因多是密淫賣之輩、故令一般旅客不滿。(一
旅客投)⁴¹⁴

「不平鳴」專欄並非只收涉及到國族、社會、教育等重大問題，或是較為沉重面相的投稿，諸如上引之力，亦是一般民眾在生活中會遭遇到的問題之一，作為一個實際接受服務的「客」，並且在筆名中強調自己的客人身分，應有試圖藉由實際經驗來強化論述的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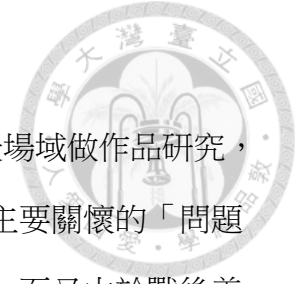
(十)、不平生、實不平、替不平、不平民、不平者……一類：此類合於專欄名「不平鳴」的命名方式，反倒較為欠缺形成一類的特色，使用此類筆名的作者較無固定的風格，純粹以發出不平之鳴為原則，是較多作者使用的筆名，不再特別舉例。

以上十類，大致勾勒投稿「不平鳴」專欄的作者群樣態，顯示臺灣民眾在面對當時的社會處境時如何以散文這個文體進行肆應。除此之外，亦尚有許多較為分散零碎的筆名命名，顯出投稿《臺灣民報》龐大作者群，這些作者最大共同處即是其生活立場、社會處境、書寫視角與位置等等，相當接近民眾百姓，或甚至就是人民自己的聲音；「不平鳴」專欄的出現，讓「民眾」不僅是「被發聲」，本身也擁有書寫發表的管道，讓當時的被書寫在散文中的社會問題與觀察的面相能更為豐富，也使得這一批在《臺灣民報》上書寫社會的「問題散文」，具有更大的研究意義。

第三節 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⁴¹⁵

⁴¹⁴—旅客，「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54 號，1929.0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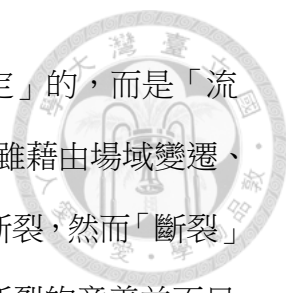
⁴¹⁵本節曾作為一工作坊論文〈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論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文學史斷裂〉發表於橫濱國立大學主辦之「台湾文学における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および日本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工作坊（2014.01.24）當中，感謝大妻女子大學赤松美和子老師諸多相當切中且寶貴的評論意見。



本章前二節以周定山做作家個案研究，《臺灣民報》之為發表場域做作品研究，試圖提出具有戰鬥與批判精神的作家散文，以及以書寫社會為主要關懷的「問題散文」來呈現日治時期的散文傳統與戰後「美文傳統」的分疏。而又由於戰後美文作家多為女性，是故在相互對照之時，「女性散文」亦是重要的研究所線索，因而本節及試圖以此線索牽連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成為一條研究脈絡，處理二造之間的文學史關係，藉此還原臺灣散文史與散文傳統的一個側面。

誠如本章前言中所提及的，「美文」「傳統」實是創作「範式」與文學史「典律」的問題，而根據王鈺婷的分析，「美文傳統」之所以能夠形成，又與戰後文學「場域」的作用具有相當大的關係。本文是以「美文傳統」作為問題意識的起源，而將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當作與之思考對話的作用點，在思索二者的文學史關係之際，「場域」、「範式」與「典律」就是重要的思考入徑與路徑。之所以能形成「美文傳統」，與日本戰敗退出臺灣，國民政府強勢引進大陸來臺的作家與文藝思潮，進而造成臺灣文壇生態環境遽變，創作範式轉移，文學典律重構息息相關。以創作抒情美文的女性作家為例，她們大部分都加入了「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作品也多集中在如《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副刊》等官方主導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學場域的限制性與同質性均高，因而創作範式與文學典律的生成也就顯得「單調」，「美文」成了「反共」之外另一種被允許的特定創作聲調。在這一點上，將日治時期女性散文放置回思索臺灣散文傳統的研究視野當中就深具意義。就文學場域而言，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主要集中在《民俗臺灣》、《臺灣民報》等處，也因各個場域性質不同，而產生出不同的創作範式，最重要的是，因為《臺灣民報》的存在，使得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能有在「非官方」場域發表的機會與空間，這是與戰後女性散文極大的差異之處。

於是，整體說來，相對於戰後「美文傳統」，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在場域與範式上的異質性較高，具有形塑出多元而豐富的散文「傳統」之能量，理當重新獲得



重視與關注。所有的「傳統」都是「被發明」的，⁴¹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美文傳統」的固著性理應得到後設的認知與清理。本文雖藉由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處理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斷裂，然而「斷裂」一方面象徵二造關係，另一方面卻亦意味著二造之存有，因而斷裂的意義並不只在斷裂。筆者透過斷裂，試圖彰顯出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之文學史位置，將臺灣現代散文的「傳統」拉回至日治時期，擺脫「美文」所造成的文類源流之尷尬性，並讓多元而豐富的創作範式回歸臺灣散文史，使得「傳統」重新獲得較為全面而完整的「發明」。


一、從日治到戰後女性散文的文學場域差異與變遷

在分析五〇年代這一批創作抒情美文的女性作家時，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 所提出的「文化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的概念經常被作為論文援引的理論架構，**Pierre Bourdieu** 的貢獻在於提供了一文學研究的新參照點，使人擺脫文學內部本身的研究，而去思考文學的外部關係，也就是文學是如何在場域 (field) 當中，以及是在怎樣的場域條件、權力結構關係下被「生產」出來。⁴¹⁷ 對此，許珮馨與王鈺婷所著重的二條思路很值得做為參考。透過許珮馨的研究，可以得知五〇年代自大陸遷臺的女性散文家，她們多半都加入了「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副刊》發表散文，並參與了由林海音所主持的，具有文學沙龍性質的「女作家慶生會」。⁴¹⁸ 據此，許珮馨欲以指出的是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與當時文學文化環境的各種場域 (婦女寫作協會、報紙副刊、文學沙龍) 「顯在」的互動與作用關係。王鈺婷則是更進一步，挖掘出場域與文學創作之間

⁴¹⁶關於「被發明的傳統」，可參考霍布斯邦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

⁴¹⁷關於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可參考布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⁴¹⁸許珮馨，〈第三章移植五四美文傳統於台灣文藝新生地〉，《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頁 73-77。




的「潛在」動力結構。王鈺婷認為，國民政府在當時所大肆提倡宣揚的是充滿男性陽剛氣息的「反共文藝」，那為何女性婉約的「抒情美文」亦會大量出現，甚至發揮其影響力，成為後來臺灣現代散文的創作主流？她指出，這一批女性作家的美文創作現象，背後其實是存在著與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以及讀者市場品味之間潛在的協力關係。⁴¹⁹換言之，美文作家其實沒有太大的能動性，必須暗合官方標準與市場機制，「美文傳統」才有辦法延續香火。而無論美文作家與文學場域之間的關係是顯在或是潛在的，這二者都體現了「美文」看似擁有相當龐大的作者群與作品數量，實則在書寫範式上，受到了當時由官方一手掌握的文學文化場域的巨大限制，因此，數量雖「多」，性質卻很「單一」。相較之下，日治時期的場域性質則較為多元。

日本殖民政府與戰後國民黨政府都有嚴格的言論及出版限制，官方對於臺灣文學場域的箝制作用可說如出一轍。然而，就女性散文與文學場域之間的作用關係而言，二者之間的場域條件仍是有所不同的。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臺灣於日治時期並沒有成立女性作家的寫作協會，在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官報《臺灣日日新報》上亦沒有婦女寫作的專欄或是副刊，因此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並不像戰後女性散文那樣受到鋪天蓋地般的限制與塑形。

然而，「官方」的力量仍然潛在地對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產生作用，根據呂明純的研究與整理，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創作多集中於《民俗臺灣》與《臺灣民報》二個發表場域上，⁴²⁰其中，《民俗臺灣》雖非官辦刊物，但整個刊物性質充滿了「殖民」元素，在所謂殖民地民俗研究的主導之下，《民俗臺灣》產生了為數不少的女性散文作者，並創作了一批以臺灣民俗、傳說為主題的「民俗散文」，是證成文學

⁴¹⁹王鈺婷，〈第三章「政治駕馭」與「市場主導」下女性抒情散文之生產機制〉，《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頁 87-137。

⁴²⁰呂明純，「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散文創作一覽表」、「日據時期女性雜文創作一覽表」，《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然而，需要辨明的是，根據池田麻奈的統計，《民俗臺灣》上游氏阿蘭、徐氏碧玉、黃氏瓊華、賴氏金花、陳氏照子、李氏杏花、吳氏嫦娥、林氏幸子等看似帶有「氏」字的「女性作者」，其實都是其父池田敏雄的筆名。池田麻奈〈「民俗臺灣」執筆作者別作品一覽表〉，收於《民俗臺灣》第五卷，（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 2-3。



場域與文學創作互動關連性的絕佳例子。然而，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的特出之處就在於另外有《臺灣民報》這一個發表場域。號稱「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臺灣民報》，⁴²¹長期以來都被認為具有「臺灣」／「民間」的發聲位置。於是，在場域條件的比較下，戰後女性散文可說是都被收編至由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官方」場域之內，而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則具有「官方」（殖民）與「非官方」二類之場域空間，相對來說因文學場域具有異質性的存在，文學創作受到施加的限度較小，因而自由度也就較大。因此，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的作家作品雖都比不上戰後女性美文的為數眾「多」，但卻有「多元」的發展機會與可能。而以下便分別就《民俗臺灣》與《臺灣民報》，論述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發表場域的場域性質。

就《民俗臺灣》來說，其場域巨大的控制與影響力，甚至讓這個刊物的編輯者池田敏雄捧紅了一位「台灣天才少女作家」⁴²²黃鳳姿，讓她僅僅十二歲就出版了第一本民俗散文集《七娘媽生》，走紅的過程更曾獲得當時西川滿、佐藤春夫、菊池寬等日人名家加持，其《臺灣の少女》一書還甚至成為了日本文部省的推薦圖書。可以說，黃鳳姿是一個由日本／殖民／男性／官方場域所打造出的女性散文作家。《民俗臺灣》本身究竟有多靠近「官方」？其實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三尾裕子的研究，對於這樣的「灰色地帶」，有頗為清楚的梳理。大抵來說，「協助殖民統治的傾向」與「以『民俗』為武器作抵抗的傾向」⁴²³共存於《民俗臺灣》之中，使得這問題不能非黑即白。然而，「灰色地帶」的定義亦表示無法拂拭《民俗臺灣》與殖民統治之間的共犯關係。再者，「官方」始終是一種籠統的概念，即便是「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抑或是《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副刊》，也並不能說全然、百分之百地與國民黨政府的「官方」立場貼合，「官方與否」只能就「靠近與否」去談，而「靠近與否」亦要看相關場域的作家作品表現。

⁴²¹《臺灣民報》自第 60 號改成週刊後，開始便在封面頁上印上「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字樣。

⁴²²張季琳，〈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概述〉，林瑞明總編輯，《2006 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7），頁 170。

⁴²³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的「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台灣文獻》第 55 卷第 3 期（2004.09），頁 51。

單就黃鳳姿的例子來說，若強調《民俗臺灣》的抵抗性格，將極難解釋「台灣天才少女作家」的誕生。這是因為，之所以能夠造就「台灣天才少女作家」，「官方」的支持力量極其重要，上述來自日本文部省的獎勵即是其一。此外更重要的是，黃鳳姿的作品是被視作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實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獲得高度成功的證明而被大力彰顯吹捧的，⁴²⁴易言之，「官方」不但是成立「台灣天才少女作家」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亦是《民俗臺灣》在推銷作家時最好的保證。倘若要思考「灰色」的《民俗臺灣》究竟是「靠近」「黑色」或是「白色」一些，黃鳳姿即是不可或缺的參照例。

雖然黃鳳姿並非將所有的散文作品都投稿到《民俗臺灣》，但她確實是由《民俗臺灣》「一手帶大」的（黃鳳姿出道時還是個小學生），而無論是《七娘媽生》，或是後來的《七爺八爺》、《臺灣の少女》，黃鳳姿絕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臺灣民俗為主的「民俗散文」，可見《民俗臺灣》作為一文學場域，對於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代表人物之一的黃鳳姿之影響。而除了黃鳳姿之外，《民俗臺灣》上尚有其他書寫「民俗散文」的女性作者，而除了少數如長谷川美惠（張美惠）〈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⁴²⁵（環繞著祖母之死）書寫親情之外，諸如福田百合子〈臺灣婦人の髮飾〉書寫臺灣婦人的頭髮樣式、結髮方法、髮型歷史、頭髮飾品等等⁴²⁶；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對於臺灣的房屋構造、樣式、擺設等等有詳盡的描寫⁴²⁷；徐氏青絹〈漬豆乳〉則是書寫豆腐乳的製作方法、擲筊習俗與臺灣人發誓的慣習⁴²⁸；劉氏淑慎〈臺南の迎春〉則詳細寫下了臺南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至隔年一月十五日一系列的迎春活動與過年儀式⁴²⁹；陳氏董霞〈香香〉（香包）書寫端午節包粽子、

⁴²⁴佐藤春夫，〈「臺灣の少女」叙〉，黃氏鳳姿，《臺灣の少女》（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未標頁數。

⁴²⁵長谷川美惠，〈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民俗臺灣》第2卷第12期（1942.12）。

⁴²⁶福田百合子，〈臺灣婦人の髮飾〉，《民俗臺灣》第2卷第4期（1942.04）。

⁴²⁷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上）〉，《民俗臺灣》第2卷第4期（1942.04）。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中）〉，《民俗臺灣》第2卷第5期（1942.05）。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下）〉，《民俗臺灣》第2卷第6期（1942.06）。

⁴²⁸徐氏青絹，〈漬豆乳〉，《民俗臺灣》第2卷第4期（1942.04）。

⁴²⁹劉氏淑慎，〈臺南の迎春〉，《民俗臺灣》第3卷第3期（1943.03）。

掛香包等習俗，並詳述各種不同樣式香包的製作方法，甚至附上了手繪圖片⁴³⁰；陳氏董霞〈陰匙〉書寫臺灣食物豆豉及相關的料理方法⁴³¹；余氏李英〈死人のお産〉（死人產嬰）則寫下了產婆為鬼接生的民間傳說故事⁴³²。這些女性散文，都是以臺灣民俗作為題材，理所當然地符合「民俗臺灣」的刊物定位，同時也可以說是受到該場域「民俗」性質的限制。而《民俗臺灣》的「民俗」卻又是「灰色」的，部分「協力」的，因此表面上與這些女性散文作用的場域動力來自於「民俗」，但究論其潛在場域性質，此「民俗」又與「官方」脫離不了關係。

《民俗臺灣》之外，日治時期另一個重要的女性散文發表場域為《臺灣民報》，而相對於《民俗臺灣》，《臺灣民報》毋寧是一個較不靠近「官方」的「非官方」場域。

《臺灣民報》的前身為《臺灣青年》與《臺灣》，這一個系列報的設立，本身的政治意味相當濃厚。《臺灣青年》是臺灣留日知識份子組織成立的「新民會」、「臺灣青年會」的機關誌，《臺灣民報》則亦是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於臺北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的發聲窗口。「新民會」的成立，被日本當局認為是「實踐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在實行島民的啟蒙運動同時，謀求合法地伸展民權為不爭的事實」⁴³³而「臺灣文化協會」表面上是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但誠如河原功所指出，其真正的訴求卻是「要求台灣特別議會的設置、促使台灣人的民族性自覺、及最終要達到以政治運動解放台灣等主要主張」。⁴³⁴臺灣作為當時日本之殖民地，以「官方」日本的立場視之，無論是「解放臺灣」之主張，或是試圖標榜「臺灣」、彰顯「臺灣」意義的言論，皆具有相當程度的「非官方」色彩，而這種「非官方」的色彩，亦是自《臺灣青年》而至《臺灣民報》一路以來的重要場域性質。這樣的「非官方」性質亦可從《臺灣民報》上的「臺灣」言論得到佐證，如蔡孝乾〈轉

⁴³⁰陳氏董霞，〈香香〉，《民俗臺灣》第3卷第8期（1943.08）。

⁴³¹陳氏董霞，〈陰匙〉，《民俗臺灣》第4卷第8期（1944.08）。

⁴³²余氏李英，〈死人のお産〉，《民俗臺灣》第4卷第11期（1944.11）。

⁴³³原出自《台灣總督府沿革誌》，此處轉引自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臺北：全華科技圖書，2003），頁124。

⁴³⁴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頁128。

換期的文化運動（二）：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七月『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見著『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才發見了『臺灣人的臺灣』，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⁴³⁵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強調了「臺灣」的「臺灣」調性，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因此可說是「不是日本人」的臺灣，對於「臺灣」的強調，在在顯示出《臺灣民報》十分往「非官方」的那一端光譜靠近。

如此「臺灣」／「非官方」的一份報刊，自然會受到日本官方的箝制與阻撓，故而「在臺灣遭到查禁並不罕見」。⁴³⁶然而，《臺灣民報》並不是一份早夭的刊物，發行量亦相當可觀，且作為一份當時唯一由臺灣人所發行報紙，⁴³⁷《臺灣民報》的「非官方」位置就顯得相當突出，同時，就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而言，《臺灣民報》即是一份難得可以較為「暢所欲言」，甚至可以「高聲疾呼」「親愛的姊妹們呀、奮起！努力！」⁴³⁸的發表場域。反觀戰後女性作者的「美文」，在官方場域的箝制下，無論書寫題材為何，可以說其聲調都被統一到「溫柔婉約」的頻率，而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則因為有這麼一個「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之《臺灣民報》，而有了昂揚高亢的女聲。

小結以上，比較日治與戰後女性散文的發表場域，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擁有「官方」與「非官方」二種文學場域可供發表，後者卻只能在「官方」場域的土壤中孕育。換言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在數量上與戰後相較之下雖然是「少」的，但在發表場域方面，相對來說卻是較為「多元」，而這樣的「多元」的場域隨著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來臺，進而造成「臺灣文學」秩序重組之後產生

⁴³⁵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臺灣民報》第143號，1927.02.06。

⁴³⁶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頁129。

⁴³⁷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頁129。

⁴³⁸張麗雲，〈親愛的姊妹們呀、奮起！努力！〉，《臺灣民報》第3卷第18號，1925.06.21。

了變遷：失去了「非官方」的場域，「多元」的場域性格遭逢斷裂。縱使戰後刊物名目眾多，⁴³⁹但就場域性質而言皆屬「單一」的「官方」調性。這樣的現象，也使得日治與戰後女性散文的創作範式有所差異，體現出來的同樣是自「多元」至「單一」的轉移情形。

二、從日治到戰後女性散文的書寫範式轉移

從日治到戰後，女性散文的場域變遷與範式轉移的情形足以相互參照並相互映合，二者皆具有一種自「多元」至「單一」的轉變情形。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在官方場域的主導下，基本上維持的是「美文」之單一書寫範式，不若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因同時具有「官方」與「非官方」之異質性場域，使其散文書寫能開創出較為多元的範式。

究竟何者為「美文」？其實並無一詳細固定之「美學」或是「理論」規範，梁啟超撰論《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雖言之「美文」，但亦述「詩詞」。⁴⁴⁰而周作人著名之〈美文〉一文亦所言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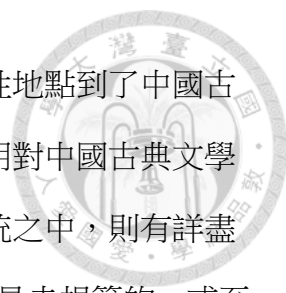
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裡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中國古文裡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⁴⁴¹

在這篇簡短的文字中，「美文」只有簡單的「敘事」與「抒情」之定義，其實並不

⁴³⁹根據許珮馨的研究，五〇年代女性作者除了《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副刊》之外，另外亦有許多的發表空間，有些甚至亦身兼多種刊物的編輯者，然而這僅是「數量」之多。許珮馨，〈第三章移植五四美文傳統於台灣文藝新生地〉，《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頁 69-73。

⁴⁴⁰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臺北：臺灣中華，1968）。

⁴⁴¹周作人，〈美文〉，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頁 23。



足以成為一種文類的規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初步性地點到了中國古典文學中「說」這一文類與「美文」之間的關係，而晚近柯慶明對中國古典文學中「論」、「說」及其他論述散文的類型，如何納入「美文」系統之中，則有詳盡的討論與說明。⁴⁴²筆者藉此想指出的是，「美文」本身的定義尚是未規範的，或至少可以說是流動的。其次，「美文」並非全然是「抒情」的，可以是「敘事」，也可以是「說理」。最後，無論是梁啟超、周作人抑或是柯慶明，這些論者所討論的「美文」，與臺灣戰後由艾雯、張秀亞等人所書寫的「美文」並不在同一意義層次上，至少可以說戰後「美文」大致落在「抒情」的範疇之中，與前述包含其它不同意義與性質的「美文」有一基本的分疏。對於「美文」本身的思辨，將有待日後詳論，本文是將戰後臺灣的「美文」視作一種特定的書寫現象與範式予以論述，並強調「美文」作為一種「傳統」所造成的範式單一性。

對於戰後女性作者所書寫的「美文」，歷來不乏評述，如彭瑞金認為「她們只是以豐滿的情去看所有的事物」⁴⁴³，陳萬益則認為「戰後臺灣散文，基本上，沿續新文學抒情美文的路線，偏重語言和形式的雕砌。」⁴⁴⁴而劉心皇亦曾經指出：

自由中國文壇上寫散文的，女性作家佔很大的比例。她們的長處是充滿抒情的調子，明淨柔婉；短處在汲取寫作素材的範圍太狹，大多以辭藻華美見長，還未暇顧及到內容的擴大。⁴⁴⁵

根據現有的論述，戰後「美文」蘊含的二十大特性即是重視抒情與語言表現，若就五〇年代女性美文作者的創作自述而言，亦可類比出相同的看法，艾雯的說法便與

⁴⁴²柯慶明，〈「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中文系「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輯，《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 5-62。

⁴⁴³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頁 103。

⁴⁴⁴陳萬益，〈隨風飄零的蒲公英——臺灣散文的老兵思維〉，《台灣文學論說與記憶》（臺南：臺南縣政府，2010），頁 277。

⁴⁴⁵劉心皇，〈自由中國五十年代的散文〉，《文訊》第 9 期（1984.03），頁 73。



此相當貼切：

我說過，偏愛散文，因為它能創造崇高的意境，那種內蘊的美的氣氛，是別的文藝形式所缺少的……意境是一種美的感覺到美的感動。它能渲染得讀者的感情，也能把讀者的感情帶入作品的氣氛裡……散文的形式內容精巧而又含蓄，它的字句應該是從字句中提煉出來的精確的字句，它的語言應該是從語言中提煉出來的活的語言，一字一句，要恰到好處。詞藻豐美而有光彩、有活力。⁴⁴⁶

「美」是一種文字氣氛，目的是為了讓讀者動「情」，也因而需要語言形式上的「美」的配合。然而，所謂形式上的「美」，主要並不是在句式上的雕琢要求，如艾雯〈門裡門外〉的例子是少數中的少數，該篇散文在一開頭就刻意安排了一「對仗」句：

門外淒迷地飄著雨，颳著風，我緊緊關上了門。門內安逸溫馨。

門外紛沓著市塵聲，囂嘩聲，我輕輕掩上了門。門內闐疾恬靜。⁴⁴⁷

就聲韻與詞性來說，此二句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對仗」，但排比與類疊的手法，以及二句的長度、每一標點前的字數都相同的句式，非但製造出了「門」的意象，亦將「門裡門外」的對比以形式展現出來。然而，像這樣的例子畢竟相當稀少，即便是「美文」，多數情況下，其句式仍是相當鬆「散」。思考「美文」的形式要求，仍應該將重點放置在「辭藻」與所謂的「文字氣氛」上。鄭明嫻曾經歸結「美文」的「最佳題材」共有「花、草、山、海、風、雨、露、日、月、星、辰、悲、喜、夢幻等等」⁴⁴⁸，這一些「美文」的相關題材，亦正是「美文」中常出現的關

⁴⁴⁶艾雯，〈一分熱，一分光——寫作瑣談〉，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頁 288。

⁴⁴⁷艾雯，〈門裡門外〉，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1》，頁 82。

⁴⁴⁸鄭明嫻，〈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 44-45。

鍵詞彙，「美文」作者亦藉由這些關鍵詞彙來經營華美辭藻與文字氣氛，形成了名之為「美文」的特定書寫範式，鄭明嫻將之稱作「文藝腔」或是「文藝腔調」：

所謂「文藝腔」是指常用的、因襲的寫作方式，有的是作家在自我形成的體系中慢慢塑成一己的固定模式，有的則在文壇間長期流行，成為一股眾人因襲的風氣……散文被視為美文後，就存在著它特有的文藝氣質與裝飾調門。⁴⁴⁹

「美文」之「文藝腔調」確實是在戰後臺灣的文壇間長期流行的一股眾人因襲的寫作風氣，而許珮馨對於「文藝腔調」的形成與演變之討論，則能夠成為思辨從日治到戰後女性散文範式轉移的重要借鏡：

文藝腔調的形成與演化雖有其消長流變的內在因素，然而政治的改朝換代、社會思潮的變遷、外來文化的移植介入，都是文藝腔調升迭曲折的外在誘因……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女作家們擁有許多可以盡情揮灑的文藝版面，也給予她們足夠的練習機會，日漸琢磨出精緻的美文。⁴⁵⁰

許珮馨點出隨著時間推演所造成的文學外部變化對於文藝腔調改變的影響，「光復」或是「遷台」作為一關鍵歷史點，也造成了自日治至戰後散文寫作場域與範式之變化，「美文」之生成實與場域變遷息息相關。

日治時期相對性多元的文學場域，使得女性散文的書寫範式亦有不同於戰後單一「美文」範式的多重面貌。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的範式分疏，可以從《民俗臺灣》與《臺灣民報》上所發表的作品來進行觀察。前者可以以楊千鶴〈待嫁女兒

⁴⁴⁹鄭明嫻，〈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 42。

⁴⁵⁰許珮馨，〈第六章結論〉，《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頁 276。



心〉為代表，這篇散文不僅含有民俗元素，亦寫出了女性待嫁的心緒，風格較為柔和。後者則有黃璞君〈男女差別撤廢〉等多篇作品，以女性解放為主要書寫關懷，風格偏向剛強。

楊千鶴〈待嫁女兒心〉雖然「寫出待嫁女兒心裡的掙扎、矛盾、複雜，酸甜滋味在心中翻騰」⁴⁵¹，然而卻不盡是全然抒情，亦無「美文」之文藝腔調，將〈待嫁女兒心〉與張秀亞〈結婚十年——為盈與青寫〉二篇散文做一對比的話，就能突顯此中之差異：

小病初遇，晨起推窗，驚喜的看到春花滿庭，卻暗傷心頭葳蕤獨自憔悴！

……

那時，我真如一隻年輕的麋鹿，在陌生的深山荒林，踟躕亂闖，憧憬著園林春初，花繁葉滿的境界，而終於驚悸的看到，一座峭壁，冰覆雪埋！黯然的舉起輕蹄，茫然失所依歸！⁴⁵²

我說要到南部去住一段時間是隨便說說的。而嫂子們聽到了，卻都好像有說不出的寂寞表情。我每次碰到不如意的事，或者是心煩的時候，就會嚮往紅磚的赤崁樓、孔子廟或是未曾去過的那湖水涵碧的日月潭，其實我是很少很少出門旅行的。茫茫然地想了想之後，又會猝然回到現實來了。⁴⁵³

〈結婚十年——為盈與青寫〉書寫婚後十年心境，並回首當年新婚之喜悅，以及得知丈夫背叛之時的震驚與心痛，〈待嫁女兒心〉則書寫婚前之種種心緒，二者雖於內容心境上有所差異，但在此處，本文想探討的是二者抒情方式的不同。張秀亞

⁴⁵¹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散文卷1》（臺北：玉山社，2004），頁343。

⁴⁵²張秀亞，〈結婚十年——為盈與青寫〉，張秀亞著、封德屏主編，《張秀亞全集2【散文卷·一】》（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頁201、202。

⁴⁵³楊千鶴，〈嫁〈心〉〉，《民俗臺灣》第2卷第1號（1942.01）。中譯版本引自楊千鶴，〈待嫁女兒心〉，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散文卷1》，頁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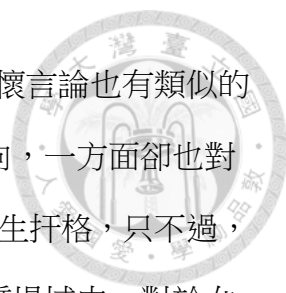
採取情景交融手法，見景生情、因情傷景，非但情景交錯而生，而且亦善用譬喻，想像自己為麋鹿，進入「深山荒林」的景中，以景物變化強烈暗示心情轉折。而透過「花繁葉滿」的喜悅之美，以及「冰覆雪埋」的悲傷之美，讓「景」、「情」與「美」相輔相成，正是戰後「抒情美文」本色。

楊千鶴無疑亦是在抒發一種待嫁女兒的寂寞之「情」，而此「情」如何得遣？楊千鶴亦想到透過「景」來散發。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赤崁樓、孔子廟、日月潭等「景」，皆是一種「嚮往」。倘若是張秀亞，那她就會運用卓越的想像力與文字譬喻能力，將這種「嚮往」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並介入其中，將「情」融入於「景」。但楊千鶴的行文卻沒有這種「美」的導向，而是在「茫茫然地想了想之後，又會猝然回到現實來了」。因而，「情」與「景」之間本來具有的交融可能，就被作者予以化解了。張秀亞藉由「景」來抒「情」，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情」也因為得到了「景」而愈發增強，整篇文章便不斷地圍繞著「情」，一面抒發，一面增生。然而，對於楊千鶴來說，「情」雖不藉由「景」來排解，但也因此不會得到「景」的增強而產生「濫情」。易言之，〈待嫁女兒心〉雖然「抒」一待嫁女人之「情」，整體來說是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較為接近五〇年代女性「美文」的一篇作品，但二者之「抒情」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待嫁女兒心〉環繞著婚姻，另外還觸及了臺灣婚姻的民俗層面，以及日治臺灣女性結婚所會遇到的時代問題：

他擁有我所企求的一切條件……後來因為民族的差異使我痛苦的掙扎，在
我能解開這個結之前，我們就因某原因而分手。倒並不是我缺少同化其他
事物的寬容，實在是沒有勇氣超越民族的藩籬，想到我自己又想到台灣
的女性同胞，我常會覺得一股無奈。⁴⁵⁴

⁴⁵⁴楊千鶴，〈待嫁女兒心〉，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散文卷1》，頁341。



《民俗臺灣》是一份「灰色的」刊物，〈待嫁女兒心〉的女性關懷言論也有類似的性質。楊千鶴一方面再現了臺灣婚俗的幾個側面，符合刊物走向，一方面卻也對女性的婚姻問題提出反思，略與《民俗臺灣》的「官方」性質產生扞格，只不過，這種反思畢竟只是「無奈」的消極作用，在具有「官方」的性質場域中，對於女性所遭逢的社會問題，女性散文只能處在一「灰色」的言論地帶，並無法運用強硬的聲調予以抗議，這必須在「非官方」的《臺灣民報》才得以實現。而《臺灣民報》上的女性散文，更是體現出了與戰後「美文」截然不同的書寫範式。

《臺灣民報》上女性散文強烈體現了當時女性作者入世、介世的意圖與精神，而以女性之命運、教育條件、社會處境為主要關懷。同樣是思考女性處境，但〈待嫁女兒心〉中的「無奈」心聲，與《臺灣民報》上女性散文積極反抗與啟蒙呼籲的高亢之聲形成了大幅度的對比。倘若借用中國五四散文的情況來說，魯迅、周作人兄弟正好將現代散文的書寫引向二條主要道路，戰後女性「美文」作者無疑是承繼周作人路線，寫出的散文質地偏向軟派、柔性，而日治時期女性散文則可以說是「軟硬兼施」，雖然本文之目的不在證成魯迅是否對日治時期女性散文產生影響，但《臺灣民報》上的女性散文確實與魯迅對散文應當成為「匕首」、「投槍」⁴⁵⁵的看法相當類似，散文的抗議精神、高亢聲調與剛硬質地，因此有相當程度的體現。如黃璞君在《臺灣民報》前身之《臺灣青年》所發表之〈男女差別撤廢〉一文就相當典型：

孔子說男女七歲。就不可同席。噯！稱為聖人的孔子、不知怎麼這麼樣、把那時候的男女當作下等的動物看呢！……有說女子的天分不如男子的好、所以教育不能同等、此不過是男子的偏見絕非真理。願我賢明的當局者、將那墨守古時候的惡習慣惡風俗的父兄觀念打破、而施女子的完全教育、養成完全的女子、而參與國家的各權利各義務、此不但為我們女界的幸福。

⁴⁵⁵魯迅，〈小品文的危機〉，楊澤編，《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出版社，1995），頁388。

實在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幸福。男女差別撤廢！男女差別撤廢！⁴⁵⁶

前述所謂戰後「美文」的「文藝腔調」，與黃璞君所高喊的「男女差別撤廢！」自是相當不同的女聲；這種高喊的聲調，在戰後女性「美文」中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極少出現，如艾雯〈婦女衛國數今朝——記婦聯會空軍屏東支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就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婦女們的手——操縱家務的手，撫育兒女的手，執筆桿的手，塗寇丹的手，
在反極權反侵略的大轟下緊緊攜起。這力量，足以摧毀一切暴力，完成戡
亂建國的偉大使命！⁴⁵⁷

這樣的散文寫法，在戰後「美文」作家的作品中是絕對的少數也是異數，是例外中的例外。相反的，《臺灣民報》上的女性散文，則皆以此種筆調為主。然而，更重要的是「婦女衛國」代表此種聲調是為了符合「反共」的國家政策而發的，雖然高亢，卻未免是一種順從之聲。反觀〈男女差別撤廢〉，其站在女性立場的婦女解放言論，除了針對「男性」而發之外，同時也反思以孔子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傳統，並且不避諱地對「當局者」提出建言，如此之女聲便擴及到了性別、文化與政治層面，不是擺飾的花朵，而可以說就是「匕首」與「投槍」了。

《臺灣民報》上的女性散文，「匕首」與「投槍」比比皆是，例如發表〈親愛的姊妹們呀、奮起！努力！〉的張麗雲，就被當時擔任《臺灣民報》編輯的一郎（張我軍）稱為「勇士」，⁴⁵⁸楊翠也認為張麗雲〈我所希望於台灣女界者〉一文是臺灣婦解言論史上相當重要的經典作之一。⁴⁵⁹除此之外，亦有「最活躍的婦解言

⁴⁵⁶黃璞君，〈男女差別撤廢〉，《臺灣青年》第2卷第1號，1921.01.15。

⁴⁵⁷艾雯，〈婦女衛國數今朝——記婦聯會空軍屏東支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5》，頁215。

⁴⁵⁸張麗雲，〈親愛的姊妹們呀、奮起！努力！〉後記，《臺灣民報》第3卷第18號，1925.06.21。

⁴⁵⁹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頁

論喇叭手」⁴⁶⁰玉鶻，而比起黃璞君，玉鶻更是一高亢之女聲：



我們若不能達到這樣的希望、恐怕永久都是男性的奴隸吧！努力吧！臺灣的女同胞！自由的戀愛、自由的結婚、一切和男子同樣的權利、都得我們努力去取回呢。我們的時機已到了！我失丟了的地位正在面前等我們伸手去取回了！現在已是我們伸手的時候了。我們只怕不猛醒、伸手、只怕不猛醒團結、那怕（真々の）自由、平等得不到！猛醒吧！黑甜鄉裏的女青年呀！姊妹們！不要長在夢裡了！醒吧！醒吧！姊妹們！⁴⁶¹

內容方面，關心婦女解放；筆調方面，高亢激昂；精神方面，充滿抗議與批判，這是《臺灣民報》上女性散文所開創出來的書寫範式，與戰後「美文傳統」截然不同。其實，若就艾雯而言，她在來臺之前，亦非全然的「美文」作家，如 1943 年的〈婦女需要職業！〉⁴⁶²、1944 年的〈不平則鳴〉⁴⁶³等文，都是針對婦女在職場上的不平等而予以抗議的散文，與《臺灣民報》上的女性散文質地頗為相似，然而自 1949 年來臺之後，這樣的聲音便驟然消失。從艾雯的創作歷程觀之，來臺之前「美文」是一種選擇，但卻不是唯一之選擇，但來臺之後除了偶爾呼應反共文藝之外，大致上即以足以暗合官方立場的「美文」進行創作。而若以臺灣本地的散文史流變來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軟硬兼施」的不同創作範式，則是遭逢戰後之文學史斷裂，未能有所傳承。從日治到戰後，非但女性散文作者的「抒情」程度急遽加增，連《臺灣民報》上女性作者所開展出來的，宛若「匕首」與「投槍」的散文範式亦不再出現，「美文」成為了女性作者主動或是被動去遵循的單一「傳統」。如此之範式轉移情形，正證成了日治與戰後女性散文之間無所傳承的斷

467。

⁴⁶⁰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頁 472。

⁴⁶¹玉鶻，〈猛醒吧！黑甜鄉裏的女青年（續）〉，《臺灣民報》第 93 號，1926.02.21。

⁴⁶²艾雯，〈婦女需要職業！〉，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頁 17-19。

⁴⁶³艾雯，〈不平則鳴〉，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頁 50-52。

裂關係。



小結

戰後國府接收臺灣，無論是「殖民地文學」或是「臺灣文學」，都必須成為「中國文學」，臺灣文壇生態與文學秩序歷經的是強勢而劇烈的重整，日治時期的散文典律因而被迫中斷，改由溫柔敦厚的抒情「美文」大行其道，甚至形成「美文傳統」，當中體現的無疑是典律重構的過程。然而，在思考臺灣現代散文源流與傳統之時，由於「美文傳統」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遮蔽性，顯然是一個缺乏完整說服力的「傳統」。除了周定山的戰鬥性散文與《臺灣民報》上的「問題散文」之外，本章第三節以女性散文為線索，試圖拉出一條重建臺灣現代散文「傳統」的討論線。藉由場域變遷與範式轉移的考察，可以發現從日治到戰後的現代散文具有相當大的差異，大抵呈現自「多元」而「單一」的變換模式，而在文學史傳承上則是呈現出日治傳統無所承繼的「斷裂」關係。然而，「斷裂」一方面象徵二造關係，另一方面卻亦意味著二造之存有，因而斷裂的意義並不只在斷裂。筆者透過斷裂，試圖彰顯出的是本文嘗試建構日治時期女性散文之文學史位置的潛在意。就散文源流而言，日治時期才是臺灣現代文學的發端，理應讓散文源流回歸日治，而非繼續重蹈因「美文傳統」而獲得鞏固的五四源流論。而就散文傳統而言，日治時期軟式抒情與硬派論述的散文兼具，非但文學史時間順序較五〇年代女性散文為早，其場域與範式亦相對多元而豐富，日治「傳統」的重新構築與回歸有其必要。是故，於戰後遭逢過一次重組的臺灣現代散文典律，實有再次重構之必要。日治時期是臺灣現代散文的發端，也是現今於重新評價、思辨臺灣現代散文史時，不可或缺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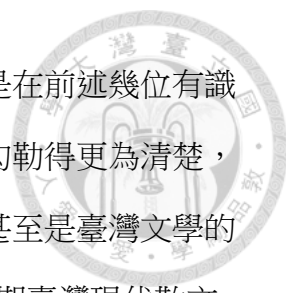
第六章 結論



環繞著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題，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與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迄今仍是最重要的研究篇章，前者以類型論為主軸，爬梳大量文獻資料後，綜談日治時期的臺灣現代散文，讓後世的研究者對於當時散文的面貌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與了解，為後世的日治散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後者在概述日治散文狀況之後，即以賴和這個個案為例，進行了一次深入的作家作品論研究，並結合了「時代感」這個議題，將散文與時代的脈動予以連結。該論文並且強調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自身傳統，讓日治散文不被中國古典或是五四新文學的思考框架所限，呈顯出主體位置的重要性。而〈日據時期台灣散文〉於 1994 年發表，相隔十年之後，〈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出現，到如今又是另一個十年過去，這二個十年之間幾乎沒有再度出現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專論，實是憾事。有鑑於此，筆者便首度嘗試以一本學位論文的規模，以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題，進行該領域研究的建構工程。

事實上，現代散文的研究遭逢了許多問題，最明顯的問題是，在其它詩歌、小說領域已然豐碩的情況下，研究者擁有許多巨人的肩膀，因此愈爬愈高、愈挖愈深、愈探愈廣，因而豐碩引來的是更加豐碩，但缺乏者所導致的則是研究的停滯與研究者的卻步，因而年年相較之下，更加缺乏。以「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為例，對於大部分的研究者來說，幾乎可以說就是一個未知的概念。幸好除了許達然與陳建忠的研究之外，尚有陳萬益、向陽等學者的選本，以及范宜如在《文學@台灣：11 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您認識台灣文學》一書中的專文介紹。⁴⁶⁴這使得筆者在進入這個領域時，已有前行研究者們的帶領。進到這個領域之後，筆者才發現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是真正的研究荒野莽原，然而草萊未開的研究現

⁴⁶⁴ 范宜如，〈編織與重繪台灣圖像——現代台灣報導文學與散文〉，須文蔚主編，《文學@台灣：11 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您認識台灣文學》（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況，也代表了這個研究區塊誠然極其豐厚的研究潛力。本論文是在前述幾位有識之士的開拓成果之上，再試圖將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面貌勾勒得更為清楚，並將關注的範疇再予以擴大，若說本論文對現代散文研究，或甚至是臺灣文學的研究能有什麼貢獻的話，那或許會是在於促進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的了解與認知，鞏固基礎的研究知識，讓後世願意投身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縱使沒有巨人，也能有一個小小的階梯，可以一步一步慢慢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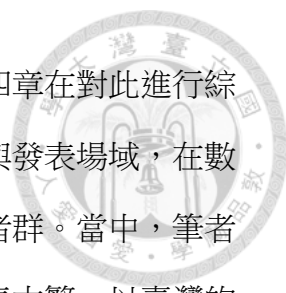
本論文首先關注的是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散文觀，在以後世的角度認知日治散文時，筆者更加好奇的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對於當時現代散文的觀念與認知。只不過，由於現代散文在日治時期便處在一種與其它文類相較之下，頗不受到重視的文類處境，在批評與論述成果方面相當缺乏，收集相關資料頗有難度。然而在有限的文獻資料當中，仍是可以梳理出幾個重要的線索。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自然不會憑空出現，現代散文觀念亦然，則在現有的材料中至少可以梳理出三個主要的可能影響脈絡，一是臺灣本地的古典文學脈絡。由於日治時期古典與現代文學並非截然二分的存在，古典散文觀在遭逢現代之後的肆變與轉化，可能會成為當時新文學的養分與資源，因此古典散文觀轉化生成所帶來的影響性實不容忽視。當然，縱使不是唯一，但五四自是臺灣現代散文的重要脈絡之一。徐坤泉對於周作人所提倡的小品文觀念，幾乎是採取原文抄用的方式直接將相關的散文觀念引進臺灣，加上他有一段時期主編《臺灣新民報》與《風月報》，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新文學、雅文學、古典文學、通俗文學等領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而周定山與魯迅的散文之間雖沒有確切的繼承關係，但從他推崇魯迅，並重視社會問題、排斥個人主義的散文觀，與魯迅確實有呼應之處。因此，由周作人與魯迅所開創的五四現代散文觀念的二大路線，分別在臺灣有所傳播與引介。而日本近現代隨筆觀的影響亦不能忽略，以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散文觀為例，自然不會是受到臺灣古典以及五四現代散文的影響，且與臺灣古典與五四新文學重視散文的文類觀不同，日治時期不重視散文的文類觀，很大一部份是受日本近現代文學文



類觀的影響。上述三個脈絡中對於散文應當側重個人性或社會性的討論，也為日治時期的現代散文指引出了方向。

其次，考察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對於現代散文的認識尚有另一個方法，也就是對於當時散文類型論的探討。可以這樣說，當時為散文分出多少類型，就表示當時就有多少對於散文的思考與認知方式。於是接續在處理散文觀念的第二章之後，第三章所處理的便是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的問題。上述許達然與陳建忠二人的論文，對於日治散文類型論的建置頗為貢獻，於是第三章先處理在前行研究者的論文當中所體現的日治散文類型，共可以整理出「語言類型」、「功能類型」、「內容類型」、「表現類型」、「作者類型」以及「篇幅類型」。這些類型是許達然與陳建忠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指出的可能思路，也是散文之為散文，在其文類特質上所表現出來的幾個重要面相，因此除了類型論之外，亦可以視作是增進了日治散文認識論的研究成果。只不過如果要將對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的認識輪廓予以勾勒得更為清楚的話，當時的散文作者、雜誌編輯等等是如何為散文分類的這一點亦相當重要。故第三章除了討論現有研究分類之外，並側重於回歸文學史現場，觀察日治時期雜誌刊物相關的散文欄位，共整理出隨筆、隨想、感想、漫錄、漫筆、小品、散文、紀行、漫語、日記、雜錄、短文、隨感、書簡、漫言、放言、漫文、雜談、偶感、雜筆、放話、偶語、筆に任せて、雜感、雜記、手記、雜文等二十七種類型，呈顯出相當豐富且細緻的類型及認識論，但一方面也有其混雜的層面，但無論是豐富或混雜，都顯示出了日治時期現代散文類型論日後的研究潛力與發展可能。

除了散文觀與類型論之外，實際的文本分析與討論則亦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基礎工程，只不過，限於時間、精力與篇幅，本論文勢必無法對於龐大的日治散文文本進行面面俱到的文本分析，而是根據現有的成果，並採取特定的問題意識，揀選出最具有論述必要與研究效能的討論文本。所謂的論述必要主要指的是第四章對於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的討論，由於現有的日治散文研究較少涉及這



塊領域，使得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日文隨筆更是荒野一片，故第四章在對此進行綜述之後，發現無論是在臺日人日文作者的作者身分、書寫主題與發表場域，在數量與性質上皆相當豐富而龐多，且形成了非文學專業的隨筆作者群。當中，筆者特別針對青木繁這名作者進行討論，具有高度隨筆創作意識的青木繁，以臺灣的山林自然為主題，創作了為數可觀的隨筆作品，並可以與鹿野忠雄、鳥居龍藏等人的自然紀行文體，以及其它諸多散文作者的自然書寫來做牽連，使得日治時期臺灣散文的自然書寫創作更為可觀，若考慮到學界對於臺灣 1980 年代以後自然書寫的討論，則筆者認為不妨以一條臺灣自然書寫的流變史觀之，建立起日治與戰後的現代散文連結，讓日治散文的文學史位置能夠更加彰顯。至於所謂「研究效能」的部分，則是指筆者側重於日治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之間的對比差異，讓日治散文的「非美文」特色能夠突出，故第五章特別論述充滿戰鬥與批判精神的周定山散文，以書寫臺灣社會、關懷社會問題的《臺灣民報》散文，以及同樣為女性作者，但卻兼具柔軟與剛強書寫範式的女性散文為該章主要的討論對象，用意在於藉此突顯日治時期現代散文「傳統」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散文傳統差異性，「美文傳統」所意指的範式單一性以及典律獨佔性，時至今日已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若要探究臺灣現代散文的真正「傳統」，那麼日治時期現代散文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研究——觀念、類型與文類源流的探討〉嘗試對臺灣文學史與臺灣現代散文史加入重要的對話者——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然而由於該領域充滿未知的部分仍然太多，再加上本論文係根據現有研究成果以及與「美文傳統」的對話所產生出的特定研究框架，在摸索的過程之中，遺漏及未能盡善之處想必在所難免，有待後續研究予以補足與修正。筆者並且盼望在本文之後，學界對於散文領域的重視能有所提升，並希冀藉由本文對若干現代散文問題的發掘能引起後續研究者的研究興趣，讓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散文得到其應有的學術地位與影響力。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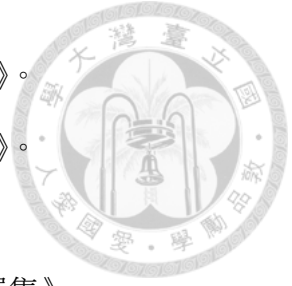
一、 討論文本

- SM 生，〈可憐的老車夫〉，《臺灣新民報》，第 370 號，1931.06.27。
- 一受害者，「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178 號，1927.10.16。
- 一旅客，「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54 號，1929.03.31。
- 一記者，〈冷藏庫〉，《臺灣民報》第 62 號，1925.07.26。
- 山石正文，〈方圓漫筆〉，《五十會》第 12 期，1935.12.25。
- 不平的讀者，「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83 號，1925.12.13。
- 中村櫻溪，〈自題文卷〉，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十四冊。
- 心水，〈臺灣文藝叢誌發刊序〉，《臺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2 號，1919.02.10。
- 火牛子，〈隨感隨筆〉，《臺灣鐵道》第 86 期，1919.08.01。
- 王臥松，〈崇文社百期文集序（三）〉，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王則修，〈詩與文孰重論〉，《臺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12 號，1919.12.30。
- 王學潛，〈崇文社文集序（三）〉，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叫苦庄民，「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5 號，1928.04.22。
- 市民之聲，「不平鳴」，《臺灣民報》第 205 號，1928.04.22。
- 未標著者，〈大肚農民的死活問題〉，《臺灣民報》第 113 號，1926.07.11。
- 未標著者，〈小農民十大苦況〉，《臺灣民報》第 85 號，1925.12.27。
- 未標著者，〈刑事乘車不給錢〉，《臺灣民報》第 202 號，1928.04.01。
- 未標著者，〈宜速實行義務教育〉，《臺灣民報》第 98 號，1926.03.28。
- 未標著者，〈東石郡農民的嘆願〉，《臺灣民報》第 125 號，1926.10.03。
- 未標著者，〈芭蕉農民的死活問題〉，《臺灣民報》第 107 號，1926.05.30。

- 
- 未標著者，〈教育界的一大問題〉，《臺灣民報》第 83 號，1925.12.13。
- 未標著者，〈教育界的大問題〉，《臺灣民報》第 76 號，1925.10.25。
- 未標著者，〈惡刑事毆打車夫〉，《臺灣民報》第 168 號，1927.08.07。
- 未標著者，〈農村教育的改造問題〉，《臺灣民報》第 81 號，1925.11.29。
- 未標著者，〈臺灣教育界的當面問題〉，《臺灣民報》第 81 號，1925.11.29。
- 未標著者，〈論散文與自由詩（一）〉，《臺灣民報》第 329 號，1930.09.06。
- 未標著者，〈論散文與自由詩（二）〉，《臺灣民報》第 331 號，1930.09.20。
- 未標著者「新著案內森を顧みて青木繁著」，《臺灣山林會報》第 62 期(1931)。
- 未標著者，「圖書紹介 青木繁「山人放言」」，《臺灣山岳彙報》第 1 卷第 5 期（臺北：臺灣山岳會，1929）。
- 永溪生，〈隨感雜錄〉，《第一教育》第 3 卷第 6 期，1924.06.30。
- 玉鶻，〈猛醒吧！黑甜鄉裏的女青年(續)〉，《臺灣民報》第 93 號，1926.02.21。
- 宇津木智等，〈臺灣文學界總檢討座談會〉，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臺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
- 寺井春夫，〈隨筆〉，《臺灣建築會誌》，第 3 輯第 1 號，1931.01。
- 朱自清，〈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臺北：蘭亭書店，1986）。
- 老徐，〈再談「小品文」〉，《風月報》第 60 期，1938.03.01。
- 艾雯，〈一分熱，一分光——寫作瑣談〉，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臺北：朱恬恬，2012）。
- 艾雯，〈不平則鳴〉，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
- 艾雯，〈門裡門外〉，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1》。
- 艾雯，〈婦女需要職業！〉，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
- 艾雯，〈婦女衛國數今朝——記婦聯會空軍屏東支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 5》。



- 伯翰，〈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佐藤春夫，〈「臺灣の少女」叙〉，黃氏鳳姿，《臺灣の少女》（東京：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
- 余氏李英，〈死人のお産〉，《民俗臺灣》第4卷第11期（1944.11）。
- 冷飯小僧，〈小僧放言〉，《五十會》第12期，1935.12.25。
- 吳子光，〈附論文數則〉，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
- 吳子光，〈書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冊。
- 吳德功，〈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十七冊。
- 志賀直哉，〈動物小品〉、芥川竜之介〈東京小品〉，川端康成編《日本隨筆・隨想集》（東京：平凡社，1971，18版）。
- 李瑞雲，〈臺灣的教育問題〉，《臺灣新民報》第322號，1930.07.16。
- 狂巴結，「不平鳴」，《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1925.01.01。
-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周作人，〈志摩紀念〉，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6（1932-1935）》。
- 周作人，〈美文〉，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周作人，〈雜文的路〉，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9（1944-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周定山，〈一吼居談屑〉，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也是隨筆（一）〉，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 周定山，〈也是隨筆（十）〉，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也是隨筆（三）〉，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也是隨筆（六）〉，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也是隨筆（四）〉，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血汗〉，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我對建醮的幾句話〉，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草包 ABC〉，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迷信與近代之思潮〉，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周定山，〈無聊春秋〉，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
- 林定，〈山中隨筆〉，《久須乃木》，第 10 期，1939.08.05。
- 林慧文，〈現代散文的道路〉，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長谷川美惠〈祖母の死をめぐつて〉，《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12 期(1942.12)。
- 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上)〉，《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4 期(1942.04)。
- 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下)〉，《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6 期(1942.06)。
- 長谷川美惠〈臺灣の家庭生活(中)〉，《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5 期(1942.05)。
- 青木繁，〈大武に登る〉，《山・林・人》(臺北：辻本博晃社，1933)。
- 青木繁，〈尺八の話〉，《臺灣の山林》第 81 期，1932.12。
- 青木繁，〈台湾の林業〉，榕畔会校史編集委員会，《榕畔会史——台湾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東京：榕畔会，1978)。
- 青木繁，〈林想漫筆（一〇）新聞紙（上）〉，《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5，夕刊 3 版。
- 青木繁，〈林想漫筆（一一）新聞紙（中）〉，《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6，夕刊 3 版。
- 青木繁，〈林想漫筆（一二）新聞紙（下）〉，《臺灣日日新報》，1927.05.07，夕刊 3 版。
- 青木繁，〈林想漫筆（一六）家の中の木製品〉，《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3 版，1927.05.14。



青木繁，〈林想漫筆（六）／樹木の姿態（下）〉，《臺灣日日新報》，1927.04.29，夕刊3版。

青木繁，〈思ひ出深い山々〉，《臺灣時報》，1932.07。

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8.02。

青木繁，〈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1927.08.02。

青木繁，〈新高山方面旅行所感〉，《臺灣山林會報》第33期（1928）。

青木繁，〈新高山方面旅行所感〉，《臺灣山林會報》第33期（1928）。

青木繁，〈隨筆えの執念〉，宮脇恒編輯兼發行，《シルバ》第12期（シルバ會、札幌林學會，1962）。

青木繁，〈臺灣を垂直に歩くこと〉，《臺灣時報》，1934.11。

青木繁，〈臺灣山旅斷想〉，《臺灣時報》，1933.09。

青陵，〈蘭陽三郡紀行記〉，《臺灣之產業組合》第21期，出版年不詳。

施乾，〈乞丐底問題〉，《臺灣民報》第76號，1925.08.26。

柳川浪花，〈寂寥的昭和十二年之本島文藝界〉，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

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臺灣民報》第4號，1923.07.15。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夏目漱石，〈永日小品〉，夏目漱石著、小森陽一編，《作家の隨想5 夏目漱石》（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

徐氏青絹，〈漬豆乳〉，《民俗臺灣》第2卷第4期（1942.04）。

張我軍，〈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臺灣民報》第3卷第6號，1925.02.21。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第2卷第7號，1924.04.21。



- 張我軍，〈詩體的解放〉，《臺灣民報》第3卷第7號，1925.03.01。
-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3卷第2號，1925.01.11。
- 張秀亞，〈結婚十年——為盈與青寫〉，張秀亞著、封德屏主編，《張秀亞全集2【散文卷·一】》（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
-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臺灣民報》第2卷第17號，1924.09.11。
- 張麗雲，〈親愛的姊妹們呀、奮起！努力！〉，《臺灣民報》第3卷第18號，1925.06.21。
- 許子文，〈崇文社文集序（二）〉，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連橫，〈詩薈餘墨〉，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十八冊。
- 陳氏董霞，〈香香〉，《民俗臺灣》第3卷第8期（1943.08）。
- 陳氏董霞，〈陰匙〉，《民俗臺灣》第4卷第8期（1944.08）。
- 陳景初，〈崇文社文集序（六）〉，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陳錫如，〈崇文社文集序（一）〉，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傅東華，〈為小品文祝福〉，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唾棄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206號，1928.04.29。
- 悲觀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200號，1928.03.18。
- 菊仙，〈臺灣的社會事業〉，《臺灣民報》第142號，1927.01.30。
- 黃溥造，〈崇文社文集序（四）〉，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十二冊。
- 黃璞君，〈男女差別撤廢〉，《臺灣青年》第2卷第1號，1921.01.15。
- 楊千鶴，〈待嫁女兒心〉，陳萬益主編，《國民文選·散文卷1》。



- 楊千鶴，〈嫁ぐ心〉，《民俗臺灣》第2卷第1號（1942.01）
- 葉聖陶、朱自清、唐弢，〈關於散文寫作——答《文藝知識》編者問八題〉，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詰問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199號，1928.03.11。
- 對山樓，〈偶語〉，《臺關》第3期，1906.07.01。
- 福田百合子，〈臺灣婦人の髮飾〉，《民俗臺灣》第2卷第4期（1942.04）。
- 蝸生，〈鸞鳩漫筆〉，《財海》第29期，1908.10.05。
- 劉氏淑慎，〈臺南の迎春〉，《民俗臺灣》第3卷第3期（1943.03）。
-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臺灣民報》第143號，1927.02.06。
- 蔡復春，〈研究救恤貧乏問題〉，《臺灣青年》，第2卷第4號，1921.05.15。
- 鄭兼才，〈宜居集自序〉，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三冊。
- 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魯迅，〈做“雜文”也不易〉，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
- 黎笳，〈論雜文〉，《閩台日報》，1948.10.01 第四版。
- 盧芳型，〈文論〉，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
- 親見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2卷第24號，1924.11.21。
-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 雜卷》（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 靜濤生，〈日記の一節〉，《臺灣鐵道》第43期，1916.01.01。
- 磯部茂雄，〈隨筆〉，《樂友》第2期，1938.12.26。
- 謝金鑾，〈官志齋文鈔序〉，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二冊（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7）。
- 齋藤勇等，〈吾輩的主張〉，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
- 聶紺弩，〈我對於小品文的意見〉，王景科編著，《中國現代散文小品理論研究

十六講》(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9)。

警告生，「不平鳴」，《臺灣民報》第3卷第6號，1925.02.21。



二、 單篇論文

三木清，〈隨筆時代〉，《讀賣新聞》夕刊「一日一題」，1935.09.03。

三尾裕子，〈以殖民統治下的「灰色地帶」做為異質化之談論的可能性——以《民俗臺灣》為例——〉，《台灣文獻》第55卷第3期(2004.09)。

小林敏郎，〈田莊隨筆〉，《海響》第3卷第9期，1935.09.30。

中野重治，〈隨筆厭惡〉，《雜記帳》第2卷第7號，1937.08。

瓦歷斯·諾幹，〈從台灣原住民反思生態文化〉，林耀福主編，《生態人文主義：邁向一個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社會》(臺北：書林，2002)。

朱雙一，〈魯迅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散文創作的影響〉，《魯迅研究》1991第3期，1991.10.26。

池田麻奈〈「民俗臺灣」執筆者別作品一覽表〉，收於《民俗臺灣》第五卷，(臺北：南天書局，1998)。

西川滿，「文藝雜誌的戰鬥配置」，西川滿等著，〈吾輩的主張〉，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山自然生態描寫〉，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和田利夫，〈近代の隨筆と隨筆の「近代」 轉換期における隨筆流行現象と批評への希求〉，日本文學協會編，《日本文學講座7 日記・隨筆・記錄》(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

岡村繁，〈讀目加田誠著《洛神賦——中國文學論文與隨筆》〉，岡村繁著、俞慰慈、俞慰剛、盛勤譯，《岡村繁全集，第拾卷，隨想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岳凱華、盧付林，〈日本隨筆與中國現代散文的走向〉，《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年6月第2期。

林瑞明，〈魯迅與賴和〉，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9）。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臺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11卷12期（1995）。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鑰——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第11卷第12期，1995.10。

柯慶明，〈「論」、「說」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的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中文系「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輯，《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4）。

范宜如，〈編織與重繪台灣圖像——現代台灣報導文學與散文〉，須文蔚主編，《文學@台灣：11位新銳台灣文學研究者帶您認識台灣文學》（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關於在臺灣的文學〉，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

張季琳，〈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概述〉，林瑞明總編輯，《2006台灣文學年鑑》（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7）。

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清華大學中文系，1994.11.25-27）。

陳芳明，〈以擦亮每一顆文字刷新歷史——《九十三年散文選》序〉，陳芳明主編《九十三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5）。

陳芳明，〈艾雯和戰後台灣散文長流〉，艾雯著、封德屏主編，《艾雯全集1》（臺北：朱恬恬，2012）。



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時代與世代：臺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臺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6）。

楊南郡，〈特約討論〉，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楊雲萍，〈臺灣文藝界這一年〉，黃英哲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

楊錦郁紀錄，〈「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之五〉，《文訊》第32期（1987.10），頁148。

痲弦，〈張秀亞，臺灣婦女寫作的燃燈人——從早期學思生活的發軔到「美文」創作版圖的完成〉，張秀亞著、封德屏主編，《張秀亞全集2【散文卷·一】》（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

趙偵宇，〈垂直臺灣、森林禮讚與蕃山印象：青木繁（1893-1985）自然書寫研究〉，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第十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09.29）。後收於許素蘭主編，《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第十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

趙偵宇，〈場域變遷、範式轉移與典律重構：論日治時期女性散文與戰後美文傳統的文學史斷裂〉，台湾文学における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および日本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工作坊宣讀論文（橫濱國立大學，2014.01.24）。

趙偵宇，〈選本、論述、文學史：日治時期現代散文戰後典律的待形成〉，第五屆臺大、清大臺文所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宣讀論文（臺灣大學臺文所主辦、清華大學臺文所協辦，2012.05.26-27）。

齊邦媛，〈四十年來台灣文學〉，邵玉銘、張寶琴、痲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5）。

劉心皇，〈自由中國五十年代的散文〉，《文訊》第9期（1984.03）。

蘇碩斌，〈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新聞學研究》第109期（2011）。

三、 書籍著作

三好行雄、山本健吉、吉田精一編，《日本文学史辞典・近現代編》（東京：角川書店，1987）。

工藤貴正，《中国語における厨川白村現象》（京都：思文閣出版，2010）。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散文》（台北：巨人，1972）。

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布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吉田精一，《隨筆の世界》（東京：桜楓社，1989，二刷）。

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第一部）》（臺北：聯合文學，2006）。

米歇爾·德·蒙田著、馬振聘譯，《蒙田隨筆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臺北：正中書局，1993）。

吳永華，《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7）。

吳興人，《中國雜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周作人，《藥堂雜文》（北京：新民印書館，1944）。



- 周麗麗，《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
- 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學生書局，2009）。
-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 河原功編，《台灣隨筆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
- 阿部正路、上坂信男、神作光一、寺本直彥編，《日本文學概論》（東京：右文書院，1995，第九版）。
- 青木繁，《山人放言》（東京：三浦書店，1929）。
- 青木繁，《森林生活者の手記》（臺北：文明堂書店，1926）。
- 青木繁，《森林生活者の手記》（臺北：船橋寬一，1926）。
- 青木繁先生米寿記念刊行會，《米寿と回想》（東京：榕畔會，1981）。
- 施懿琳，《跨語、漂泊、釘根》（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東京：講談社，1980）。
-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二版）。
-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二版）。
- 柯慶明、蕭馳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 徐坤泉，《暗礁》（高雄：慶芳書局，1954）。
- 翁聖峯著、國立編譯館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 張瑞芬，《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 張曉風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 1989～2003 散文卷（一）》，（臺



北：九歌出版社，2003)。

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臺北：臺灣中華，1968)。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陳芳明，《典範的追求》(臺北：聯合文學，1994)。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陳培豐，《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陳萬益選編，《國民文選·散文卷 I》(臺北：玉山社，2004)。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游喚、徐華中編著，《現代散文精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黃得時作、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楊牧，《失去的樂土》(臺北：洪範書店，2002)。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〇—一九三二)》(臺北：時報文化，1993)。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榕畔会校史編集委員会，《榕畔会史——台湾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東京：榕畔会，1978)。

福柯著、柳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齊邦媛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台北：爾雅，1984)。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 13 卷·出了



象牙之塔》(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鄭明嫻，《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

鄭明嫻，《現代散文欣賞》(臺北：東大圖書，2007)。

鄭明嫻，《現代散文現象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霍布斯邦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

鍾怡雯，《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臺北：聯合文學，2004)。

鶴見祐輔著、魯迅譯、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13卷·思想·山水·人物》。

四、學位論文

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江明慧，《觀光·凝視·阿里山：以日治時期臺灣漢詩文與圖像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吳明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之研究(1921-1939)：以研究事業及其系譜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5)。

呂明純，《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臺北：全華科技圖書，2003)。

徐意裁，《現代文明的交混性格——徐坤泉及其小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5）。

張雅錦，《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許珮馨，《五〇年代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陳德仁，《臺灣大學實驗林沙里仙區楠櫛林帶臺灣赤楊林族群結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研究所，2005）。

彭玉萍，《見證者的散文詩學——省籍作家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曾台甫，《日治時期文山郡保安林之經營》（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2010）。

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楊騏駿，《日治前期臺灣樟腦業的發展-以產銷為中心的觀察(1895-1918)》（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五、 網路資源

《日本大百科全書》，Shogakukan Inc.，JapanKnowledge 資料庫，

<htt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国語大辞典」，Shogakukan Inc.，JapanKnowledge 資料庫，<http://www.jkn21.com/top/corpdisplay>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中國基本古籍庫」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099&Itemid=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worldheritage/twwhInfoDetailAction.do?method=doViewInfoDetail&twwh_ID=8&twwh_Info_ID=44

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新民報檢索系統」

<http://sinmin.nmtl.gov.tw/opencms/sinmin/index.html?rdm=1387632038703>

得泓資訊「臺灣民報線上資料庫」<http://tm.lib.ntu.edu.tw/>



附錄一



日文隨筆（以關鍵字「隨筆」進行題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⁴⁶⁵	收錄筆數
1	あらたま	以刊載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1
2	まこと	由臺灣三成協會出版，為戰爭時期刊物，強調愛國思想。	1
3	ゆうかり	以刊載俳句為主的文藝雜誌。	3
4	わかくさ	若草會的同人刊物，每號訂有課題，以數字為題向會員徵稿，內容主要為該會會員的俚謠的研究與創作。	6
5	久須乃木	為久須乃木會之機關刊物，設立於總督府專賣局鹽腦課內，主要與樟腦事業相關之機關團體，內容與樟腦有關。久須乃木即指樟樹。	1
6	交通時代	內容主要為關於鐵路、汽車、船舶、電信電話、電力事業之文章，以及其他與交通有關之論文、感想、雜錄等。	3
7	南の十字星	南の十字星社之同人刊物，以俳句、短歌、詩等為內容。	1
8	南巷	刊物內容包含小說、漢詩、童謠、隨筆等文學創作。	6
9	南溟會會報	臺北市臺北醫院南溟會機關刊物，有自由投稿及會	3

⁴⁶⁵ 這一部分主要參考「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的整理與介紹。

		務相關報導。	
10	台灣海務協會報	臺灣海務協會之機關刊物，內容包含水產資料、海事報告及其他與海務有關之文章。	1
11	國語の臺灣	旨在向臺灣人推行日語教育之雜誌。	2
12	圓通	由臨濟護國禪寺圓通婦人會發行，旨在普及觀音信仰，內容包括佛經解釋、佛教界動態、臺日佛教界消息、圓通婦人會活動情形等。	4
13	大タロコ	主要內容為短歌、俳句、漢詩等之文藝雜誌。	1
14	大湖郡教育雜誌	由大湖郡教育會發行，內容包括教師投稿、教育消息、教學法研究等。	1
15	安平	由安平稅關員俱樂部發行，內容包含稅關各種例規、論說、調查、統計、文藝創作與俱樂部等等。	1
16	實業之臺灣	內容主要為臺灣及其他國外經濟方面之文章。	2
17	專賣通信	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介紹專賣相關事業，亦有其他與文藝、歷史相關之投稿。	1
18	敬慎	由臺灣神職會發刊，主要刊載宣揚日本神道教文化的文章。	1
19	文藝台灣	由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為戰爭期主要文藝刊物，刊載臺日籍作家作品。	1
20	新竹州時報	由新竹州政府發行，刊載內容多數為了配合戰爭期間所宣揚之政策，並涵蓋產業、社會發展、文化、藝文等內容。	9
21	新臺灣	前身為《南國青年》。由南國青年協會發刊，屬於社會教育雜誌。	1
22	新高阿里山	由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發行，刊載關於新高阿里山	1

		的文章。	
23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6
24	映畫往來	內容主要以電影為主的刊物。	2
25	晨の光	由基隆日本基督教會發行，內容刊載教會行事、教義闡釋等文章。	1
26	樂友	基隆音樂協會之機關誌，內容為合唱、創作、雜論等與音樂相關之文章。	1
27	民衆法律	由臺中民衆法律新報社發行，內容為法律介紹及消息。	1
28	海響	刊載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6
29	理蕃の友	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之機關誌。內容有理蕃政策大綱、蕃童教育、蕃地利用、各地蕃情、蕃族習慣調查等。	5
30	社會事業の友	為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1
31	第一教育	刊物內容主要為關於教育之文章，多由學校教師投稿。	19
32	紅樹	紅樹社同人刊物，以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1
33	翔風	由臺北高等學校文藝部創辦，以文學討論與發表為主的學校刊物。	3
34	臺中州教育	臺中州教育會之機關雜誌，內容為一般教育常識的普及化及推廣。	9
35	臺南州自動車協會會報	由臺南州自動車協會發行，內容介紹臺灣汽車界之消息、勞資協調等。	3

36	臺法月報	刊載以法律相關為主的文章，偶有俳句、隨筆等文學類文章。	8
37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發行，以照片記錄官方活動，並加以文字說明。	1
38	臺灣	由臺灣雜誌社發行，以政經產業為主要內容，亦收錄少部分文藝性文章。	1
39	臺灣の專賣		2
40	臺灣の山林	刊載日治臺灣林相分布、樹木運用、林木保護等相關林業文章。	2
41	臺灣の水利	臺灣水利協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日治時期公共埤圳建設等相關水利設施之相關文章。	2
42	臺灣之專賣		1
43	臺灣之產業組合	此刊物主要介紹臺灣各地產業組合之現況與發展。	9
44	臺灣公論	臺灣公論社發刊，為刊載輿論文章之刊物，內容亦包含音樂、電影、婦人與家庭等消息。	3
45	臺灣刑務月報	臺灣刑務協會之機關誌，內容主要為法令及行刑刑務之參考事項。	17
46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為臺灣博物學會出版的機關刊物，該會為臺灣第一個研究本土博物物的學術性團體。	1
47	臺灣司廚士協會會報	為臺灣司廚士協會機關刊物，內容主要是料理的介紹，及司廚士（廚師）的相關報導。	1
48	臺灣地方行政	由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發行，內容主要為臺灣地方行政文章及法規介紹。	48
49	臺灣婦人界	臺灣日治時期唯一發行的女性雜誌，介紹日治時期	16

		臺灣有名及事業成功之女子。	
20	臺灣山岳	臺灣山岳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登山活動、臺灣山岳和相關知識的介紹。	1
51	臺灣建築會誌	為臺灣建築會之機關刊物，收錄日治時期建築界人士重要文章、建築界動態等等。	2
52	臺灣教育	前身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為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物，主要刊載臺灣教育界紀事、教育資料、實驗調查及文藝論說等。	26
53	臺灣畜產會會報	原刊名為臺灣之畜產，內容包含臺灣畜產的相關統計、家畜的防疫、養育、飼料等。	9
54	臺灣稅務月報	由稅務職員共慰會發行，主要提供稅務職員共慰會會員的稅務知識。內容有稅務法規、實務經驗談、地方稅務狀況等。	1
55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1
56	臺灣藝術	創刊以提高本島的文化精神為目的，因此，採取廣泛的文化路線為編輯原則，網羅本島所有有關藝術之文章，並設有漢文欄為其最大特點。	1
57	臺灣警察時報	前身為《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18
58	臺灣財務	由臺灣財務研究會發行。刊載財政經濟統計論文、國內外經濟情勢、財經相關法規等。	1
59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為臺灣通信協會之機關刊物，刊載當時郵政、電信事業等相關訊息。	19
60	臺灣鐵道	臺灣鐵道協會發行，協會設於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內，但為財團法人組織，非官方機構為月刊，不過	19

		只限鐵道協會會員閱讀，內容為與鐵路方面有關的文章及消息。	
61	臺關	《臺關》是由合併安平海關發行的雜誌《安平》及淡水海關發行的雜誌《五十會》而來。以海關人員為讀者群，兼具實用和娛樂的雜誌。	1
62	萬壽果	由新莊樂生院發行，內容包含院內消息、癩病防治、院友感想及文學創作等。	1
63	諸羅	為羅山鄉友會同人刊物，會員主要與醫界有關，內容為會報及小品文等。	1
64	銀鈴	由臺南銀鈴俱樂部發行，收錄俳句、短歌、詩、俚謠、隨筆、川柳、漫文、漫畫、長短篇故事，小說等類型之日文作品為主的會員刊物，發表者以在臺日人為多。	1
65	陽光	臺北煙草工場內的向陽會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與菸草事業有關文章及會員消息。	2

日文隨筆（以關鍵字「漫筆」進行題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收錄筆數
1	Molinoon	由臺北郵券俱樂部發行，介紹各種郵務消息及郵票。	3
2	あらたま	以刊載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3
3	ゆうかり	以刊載俳句為主的文藝雜誌。	6
4	モリヌーン	由臺北郵券俱樂部發行，介紹各種郵務消息及郵票。	1
5	五十會	由淡水稅關五十會發行，該會為稅關官員的聯誼團體，其內容包含論說、文藝創作、雜纂、匯報等等。	13
6	凡聖	為佛教文化研究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有關佛教之文章。	1
7	南巷	刊物內容包含小說、漢詩、童謠、隨筆等文學創作。	15
8	臺灣刑務月報	臺灣刑務協會之機關誌，內容主要為法令及行刑刑務之參考事項。	1
9	安平	由安平稅關員俱樂部發行，內容包含稅關各種例規、論說、調查、統計、文藝創作與俱樂部等等。	2
10	實業之臺灣	內容主要為臺灣及其他國外經濟方面之文章。	3
11	專賣通信	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介紹專賣相關事業，亦有其他與文藝、歷史相關之投稿。	2
12	愛書	主要刊載書誌學之相關文章，臺灣書誌之外亦論及日本方面的版本學，	1
13	新竹州時報	由新竹州政府發行，刊載內容多數為了配合戰爭期間所宣揚之政策，並涵蓋產業、社會發展、文化、藝文等內容。	4

14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7
15	殘夢	殘夢吟社之機關誌 XXXX	1
16	水利協會報	臺中州水利會相關刊物，報導水利組合相關問題。	1
17	海響	刊載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1
18	演藝とキネマ	由臺灣演藝娛樂社發行，內容以電影、娛樂、音樂為主。	2
19	相思樹	以刊載詩歌為主的文藝雜誌。	1
20	短歌雜誌原生林	由短歌社團原生林社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社員短歌之創作。	1
21	社會事業の友	臺灣社會事業協會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1
22	第一教育	刊物內容主要為關於教育之文章，多由學校教師投稿。	6
23	糖業	由臺灣糖業研究會發行，內容包括國內外糖界、甘蔗的栽培改良等等。	7
24	臺法月報	刊載以法律相關為主的文章，偶有俳句、隨筆等文學類文章。	23
25	台灣米報	臺灣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發行的月刊，主要收錄稻作狀況、出口、品種等資料。	2
26	臺灣の山林	刊載日治臺灣林相分布、樹木運用、林木保護等相關林業文章。	2
27	臺灣の水利	臺灣水利協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日治時期公共埤圳建設等相關水利設施之相關文章。	3

28	臺灣之專賣	XXXXXX	1
29	臺灣之產業組合	此刊物主要介紹臺灣各地產業組合之現況與發展。	4
30	臺灣地方行政	由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發行，內容主要為臺灣地方行政文章及法規介紹。	5
31	臺灣山岳彙報	由臺灣山岳會發行，主要刊載該會會報、會員消息，以及介紹臺灣各地山岳之文章。	2
32	臺灣建築會誌	為臺灣建築會之機關刊物，收錄日治時期建築界人士重要文章、建築界動態等等。	1
33	臺灣教育	前身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為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物，記載臺灣教育界紀事、教育資料、實驗調查及文藝論說等。	7
34	臺灣教育會雜誌	為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物，記載臺灣教育界紀事、教育資料、實驗調查及文藝論說等，自 117 期之後改刊名為《臺灣教育》。	9
35	臺灣文藝	為文學性期刊，內容包含評論、散文、閒談、小說等文章。	1
36	臺灣水產雜誌	前身為《臺灣水產協會雜誌》，由臺灣水產協會發行，內容主要為臺灣水產事業及水族相關報導。	1
37	臺灣消防	臺灣消防協會機關刊物，主要為消防相關文章，兼論時局及消防業界訊息。	1
38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81
39	臺灣自治評論	刊物主要內容包含地方自治問題、政治、經濟等社會諸相。	2
40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灣警察協會發行，其內容共有論說、演講、投稿、	7

		研究資料、判例、法令、雜錄、雜報、任免升遷、協會報導等事項。	
41	臺灣警察時報	前身為《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8
42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為臺灣通信協會之機關刊物，刊載當時郵政、電信事業等相關訊息。	5
43	臺灣鐵道	臺灣鐵道協會發行，協會設於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內，但為財團法人組織，非官方機構為月刊，不過只限鐵道協會會員閱讀，內容為與鐵路方面有關的文章及消息。	12
44	臺灣鑛業會報	臺灣鑛業會之機關雜誌，主要刊載臺灣鑛業發展，及相關調查研究性文章。	3
45	臺關	《臺關》是由合併安平海關發行的雜誌《安平》及淡水海關發行的雜誌《五十會》而來。以海關人員為讀者群，兼具實用和娛樂的雜誌。	5
46	蘭友	士林公學校內士林青年團出版，內容有日文文章、漢詩及會務消息等等。	1
47	警察語學講習資料	前身為《語苑》，主要為推廣閩南語之刊物。	1
48	財海	由臺灣財務研究會發行。刊載財政經濟統計論文、國內外經濟情勢、財經相關法規等。	3
49	趣味の臺灣	趣味の臺灣社發行，收錄會員的詩歌作品、散文等。	2
50	霸王樹	由幸榮俱樂部發行，為其機關刊物，該俱樂部分為麻雀（麻將）部、野球（棒球）部、卓球（桌球）部、文藝部、撞球部、圍棋將棋部等組織，除刊載各部活動情形外，亦刊載各式雜文。	5

日文小說（以關鍵字「小說」進行題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收錄筆數
1	凡聖	為佛教文化研究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有關佛教之文章。	1
2	南巷	刊物內容包含小說、漢詩、童謠、隨筆等文學創作。	3
3	婦人と家庭	刊載有短歌、小說、詩等文藝作品。	18
4	學友	臺灣第一份兒童雜誌。	19
5	實業之臺灣	內容主要為臺灣及其他國外經濟方面之文章。	3
6	專賣通信	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介紹專賣相關事業，亦有其他與文藝、歷史相關之投稿。	13
7	新臺灣	前身為《南國青年》。由南國青年協會發刊，屬於社會教育雜誌。	11
8	新高新報	為基隆地區所發行之報紙。	1
9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1
10	木瓜	木瓜社同人刊物，為文藝雜誌。	5
11	未完成	為未完成之同人刊物，內容以公學教育為主。	1
12	民衆法律	由臺中民衆法律新報社發行，內容為法律介紹及消息。	2
13	短歌雜誌原生林	由短歌社團原生林社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社員短歌之創作。	1
14	研究資料	北警察署研究會發行，收錄各種與警務工作相	1

		關的文章。	
15	社會事業の友	為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1
16	第一教育	刊物內容主要為關於教育之文章，多由學校教師投稿。	1
17	糖業	由臺灣糖業研究會發行，內容包括國內外糖界、甘蔗的栽培改良等等。	4
18	臺日グラフ	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內容有文學作品、人物描述等。	2
19	臺灣之產業組合	介紹臺灣各地產業組合的現況與發展。	2
20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發行，以照片記錄官方活動，並加以文字說明。	11
21	臺灣	由臺灣雜誌社發行，以政經產業為主要內容，亦收錄少部分文藝性文章。	16
22	臺灣地方行政	由臺灣地方自治協會發行，內容主要為臺灣地方行政文章及法規介紹。	1
23	臺灣婦人界	臺灣日治時期唯一發行的女性雜誌，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有名及事業成功之女子。	23
24	臺灣愛國婦人	主要報導愛國婦人會之活動，亦刊載大量日本文學作品。	38
25	臺灣教育	前身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為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物，主要刊載臺灣教育界紀事、教育資料、實驗調查及文藝論說等。	7
26	臺灣文藝叢誌	臺灣文社之同人刊物，以漢詩為主，兼有漢文小說及相關漢文作家報導。	7

27	臺灣消防	臺灣消防協會機關刊物，主要為消防相關文章，兼論時局及消防業界訊息。	1
28	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校友會雜誌	該雜誌主要刊載校友意見，並有記載各地風俗習慣即教化狀況之相關文章。	1
29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12
30	臺灣藝術	創刊以提高本島的文化精神為目的，因此，採取廣泛的文化路線為編輯原則，網羅本島所有有關藝術之文章，並設有漢文欄為其最大特點。	1
31	臺灣語學研究會 會報	臺灣話的語言研究雜誌，內容主要以臺灣話刊登。	2
32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灣警察協會發行，其內容共有論說、演講、投稿、研究資料、判例、法令、雜錄、雜報、任免升遷、協會報導等事項。	36
33	臺灣警察時報	前身為《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40
3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為臺灣通信協會之機關刊物，刊載當時郵政、電信事業等相關訊息。	5
35	臺灣鐵道	臺灣鐵道協會發行，協會設於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內，但為財團法人組織，非官方機構為月刊，不過只限鐵道協會會員閱讀，內容為與鐵路方面有關的文章及消息。	5
36	臺關	《臺關》是由合併安平海關發行的雜誌《安平》及淡水海關發行的雜誌《五十會》而來。以海關人員為讀者群，兼具實用和娛樂的雜誌。	3
37	華光	內容以全台各地衣食文化為主的流行性雜誌。	1

38	運動と趣味	主要刊載體育相關訊息，以及文學、音樂、美術、體育等相關文章。	1
39	陽光	臺北煙草工場內的向陽會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與菸草事業有關文章及會員消息。	3
40	高山國	主要為宣揚日本精神之雜誌。	1

日文隨筆（以關鍵字「隨筆」進行專欄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收錄筆數
1	POTABIN	刊載小說、隨筆、短歌雜詠等創作之文藝雜誌。	4
2	THE FORMOSA	此刊物包含藝術、哲學、社會、歷史相關之文章。	1
3	UTOPIA	ユートパリア會同人刊物，內容有評論、隨筆、電影評及會員消息等。	5
4	凡聖	為佛教文化研究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有關佛教之文章。	3
5	南の十字星	南の十字星社之同人刊物，以俳句、短歌、詩等為內容。	1
6	厚生事業の友	《社會事業の友》之前身。	2
7	台灣佛化	為臺灣佛化青年會之機關刊物，內容為佛教文章及青年會消息。	1
8	台灣刑務月報	主要內容為法令及行刑刑務參考事項。	108
9	專賣通信	由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發行，介紹專賣相關事業，亦有其他與文藝、歷史相關之投稿。	1
10	文藝台灣	由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為戰爭期主要文藝刊物，刊載臺日籍作家作品。	3
11	新竹州時報	由新竹州政府發行，刊載內容多數為了配合戰爭期間所宣揚之政策，並涵蓋產業、社會發展、文化、藝文等內容。	20
12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50

13	星座	基隆嫩草會發行，內容有論說、隨筆、詩、和歌、俳句、紀行文等。	11
14	未完成	為未完成之同人刊物，內容以公學教育為主。	1
15	民衆法律	由臺中民衆法律新報社發行，內容為法律介紹及消息。	5
16	水利協會報	臺中州水利會相關刊物，報導水利組合相關問題。	2
17	理蕃の友	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之機關誌。內容有理蕃政策大綱、蕃童教育、蕃地利用、各地蕃情、蕃族習慣調查等。	1
18	社會事業の友	為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3
19	臺南州自動車協會會報	由臺南州自動車協會發行，內容介紹臺灣汽車界之消息、勞資協調等。	2
20	臺日グラフ	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內容有文學作品、人物描述等。	5
21	臺法月報	刊載以法律相關為主的文章，偶有俳句、隨筆等文學類文章。	20
22	臺灣之產業組合	此刊物主要介紹臺灣各地產業組合之現況與發展。	5
23	臺灣公論	臺灣公論社發刊，為刊載輿論文章之刊物，內容亦包含音樂、電影、婦人與家庭等消息。	35
24	臺灣刑務月報	臺灣刑務協會之機關誌，內容主要為法令及行刑刑務之參考事項。	55
25	臺灣婦人界	臺灣日治時期唯一發行的女性雜誌，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有名及事業成功之女子。	3
26	臺灣教育	前身為《臺灣教育會雜誌》，為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	84

		物，記載臺灣教育界紀事、教育資料、實驗調查及 文藝論說等。	
27	臺灣產業組合時報	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之機關誌，刊載該會動態及產 業之相關文章。	20
28	臺灣畜產會會報	原刊名為臺灣之畜產，內容包含臺灣畜產的相關統 計、家畜的防疫、養育、飼料等。	11
29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 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2
30	臺灣藝術	創刊以提高本島的文化精神為目的，因此，採取廣 泛的文化路線為編輯原則，網羅本島所有有關藝術 之文章，並設有漢文欄為其最大特點。	3
31	臺灣警察時報	前身為《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16
32	臺灣運輸月報		1
33	諸羅	為羅山鄉友會同人刊物，會員主要與醫界有關，內 容為會報及小品文等。	10
34	諸羅城趾	諸羅城趾同人刊物，創作、自由詩、小品文。	2
35	陽光	臺北煙草工場內的向陽會之機關刊物，內容主要為 與菸草事業有關文章及會員消息。	4
36	高雄州時報	由高雄州內務部地方課發刊，依政治、經濟、學術、 技藝、道德、宗教等事項作報導評論。	72
37	高雄時報		7

日文隨筆（以關鍵字「漫筆」進行專欄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收錄筆數
1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20
2	演藝とキネマ	由臺灣演藝娛樂社發行，內容以電影、娛樂、音樂為主。	1
3	社會事業の友	為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1
4	糖業	由臺灣糖業研究會發行，內容包括國內外糖界、甘蔗的栽培改良等等。	114
5	臺灣刑務月報	臺灣刑務協會之機關誌，內容主要為法令及行刑刑務之參考事項。	1
6	臺灣水產雜誌	前身為《臺灣水產協會雜誌》，由臺灣水產協會發行，內容主要為臺灣水產事業及水族相關報導。	2
7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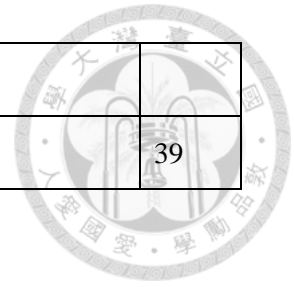
日文小說（以關鍵字「小說」進行專欄名搜索）：



編號	刊物名稱	刊物簡述	收錄筆數
1	THE FORMOSA	此刊物包含藝術、哲學、社會、歷史相關之文章。	1
2	なみき	なみき社同人刊物，內容為俳句、短歌、詩。	5
3	五十會	由淡水稅關五十會發行，該會為稅關官員的聯誼團體，其內容包含論說、文藝創作、雜纂、匯報等等。	9
4	人形	詩歌雜誌。	6
5	凡聖	為佛教文化研究會之機關刊物，刊載有關佛教之文章。	2
6	南の十字星	南の十字星社之同人刊物，以俳句、短歌、詩等為內容。	1
7	厚生事業の友	《社會事業の友》之前身。	1
8	台新		17
9	台灣之茶業		2
10	婦人と家庭	刊載有短歌、小說、詩等文藝作品。	5
11	旅と運輸	由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發行，內容為履行、一般運輸、運送等交通消息。	7
12	民衆法律	由臺中民衆法律新報社發行，內容為法律介紹及消息。	4
13	社會事業の友	為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的機關刊物，內容為有關社會事業的報導。	1
14	紅塵	臺灣文藝同志會之機關誌，文藝雜誌。	10

15	臺日グラフ	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內容有文學作品、人物描述等。	4
16	臺灣日日寫真画報	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發行，以照片記錄官方活動，並加以文字說明。	3
17	臺灣	由臺灣雜誌社發行，以政經產業為主要內容，亦收錄少部分文藝性文章。	1
18	臺灣公論	臺灣公論社發刊，為刊載輿論文章之刊物，內容亦包含音樂、電影、婦人與家庭等消息。	8
19	臺灣婦人界	臺灣日治時期唯一發行的女性雜誌，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有名及事業成功之女子。	28
20	臺灣愛國婦人	主要報導愛國婦人會之活動，亦刊載大量日本文學作品。	3
21	臺灣文藝	為文學性期刊，內容包含評論、散文、閒談、小說等文章。	3
22	臺灣文藝叢誌	臺灣文社之同人刊物，以漢詩為主，兼有漢文小說及相關漢文作家報導。	9
23	臺灣經濟雜誌	介紹經濟動態與金融活動。	8
24	臺灣自動車界	由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介紹汽車界動態、駕駛考照試題、交通界人士等。	5
25	臺灣藝術	創刊以提高本島的文化精神為目的，因此，採取廣泛的文化路線為編輯原則，網羅本島所有有關藝術之文章，並設有漢文欄為其最大特點。	2
26	臺灣藝術新報	介紹臺灣演劇、電影、音樂等演藝消息。	1
27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臺灣警察協會發行，其內容共有論說、演講、投稿、研究資料、判例、法令、雜錄、雜報、任免升遷、	9

		協會報導等事項。
28	臺灣警察時報	前身為《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附錄二



青木繁隨筆著作目錄：

編號	篇名	發表時間	發表場域
1	林想漫筆（一）花のトンネル（上）	1927.04.2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	林想漫筆（二）花のトンネル（下）	1927.04.25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3	林想漫筆（三）動けぬ生物（上）	1927.04.2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4	林想漫筆（四）動けぬ生物（下）	1927.04.27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	林想漫筆（五）樹木の姿態（上）	1927.04.2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	林想漫筆（六）樹木の姿態（下）	1927.04.2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7	林想漫筆（七）山に登る心	1927.04.3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	林想漫筆（八）水牛追のギナ	1927.05.03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9	林想漫筆（九）黄金の游撃戦	1927.05.0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0	林想漫筆（一〇）新聞紙（上）	1927.05.05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1	林想漫筆(一一)新聞紙(中)	1927.05.0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2	林想漫筆(一二)新聞紙(下)	1927.05.07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3	林想漫筆(一三)枕	1927.05.0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4	林想漫筆(一四)キューピー(上)	1927.05.0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5	林想漫筆(一五)キューピー(下)	1927.05.1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6	林想漫筆(一五)かまぼこの板	1927.05.12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7	林想漫筆(一六)家の中の木製品	1927.05.1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8	林想漫筆(一七)家の中の木製品(下)	1927.05.15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19	林想漫筆(一八)落葉	1927.05.1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0	植樹日(一)	1927.06.2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1	植樹日(二)	1927.06.2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2	植樹日(三)	1927.06.3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3	植樹日（四）	1927.07.0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4	森林文藝に就て（一）	1927.07.3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5	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二）	1927.07.3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6	森林文藝に就て 人と人（三）	1927.08.02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7	林間隨筆	1927.09.1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8	林間隨筆	1927.09.1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29	林間隨筆	1927.09.2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30	林間隨筆	1927.09.2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31	林間隨筆	1927.09.3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32	林間隨筆	1927.10.0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33	伐る者の自由	1927.11.01	《臺灣山林會報》 n28
34	墓地に立ちて	1928.01.01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n127
35	大武に登る（一）	1928.02	《臺灣時報》

36	墓地に立ちて	1928.02.01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n128
37	大武に登る（二）	1928.03	《臺灣時報》
38	林間漫筆（一）静かなる田園の破壊者	1928.03.08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39	林間漫筆 二、都市の膨脹／三、大なる矛盾	1928.03.09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0	林間漫筆四、自轉車醫院（上）	1928.03.11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1	林間漫筆五、自轉車醫院（下）	1928.03.14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2	林間漫筆六、山の高い低いと云ふ事	1928.03.15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3	林間漫筆阿蕊の國語（上）	1928.03.23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4	林間漫筆阿蕊の國語（下）	1928.03.24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5	林間漫筆小鳥を想ふ（上）	1928.03.26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6	林間漫筆小鳥を想ふ（下）	1928.03.27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7	鹿の樂園	1928.04.01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n130
48	林窓に凭りて一、菜の花	1928.04.16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3版

49	林窓に凭りて(二)とりもち地獄(上)	1928.04.17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0	林窓に凭りて(三)とりもち地獄(下)	1928.04.1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1	林窓に凭りて(四)芽生えの運命	1928.04.1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2	林窓に凭りて(五)造物の妙味	1928.04.2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3	林窓に凭りて(六)日本人の歐米人	1928.04.22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4	林窓に凭りて(七)山の魅力	1928.04.2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5	林窓に凭りて(八)「人生と地理」 から	1928.04.25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6	林窓に凭りて(九)マラリヤ日記(上)	1928.04.2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7	林窓に凭りて(十)マラリヤ日記(下)	1928.04.27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8	林窓に凭りて(十一)煙突	1928.04.28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59	林窓に凭りて(十二)俸給袋	1928.04.30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0	大武に登る(三)	1928.05	《臺灣時報》
61	林窓に凭りて(十三)鹿の樂園(上)	1928.05.02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2	林窓に凭りて(十四)鹿の樂園(下)	1928.05.0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3	大武に登る(四・完)	1928.07	《臺灣時報》
64	森の手記安心な山の中(上)	1928.07.1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5	森の手記安心な山の中(下)	1928.07.15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66	森の手記親を探しに(上)	1928.07.18	《臺灣日日新報》6 版
67	森の手記親を探しに(中)	1928.07.19	《臺灣日日新報》6 版
68	森の手記親を探しに(下)	1928.07.20	《臺灣日日新報》6 版
69	林窓小品	1928.09.01	《臺灣山林會報》 n33
70	首を吊らせた戀(1)	1928.09.07	《臺灣日日新報》8 版
71	首を吊らせた戀(2)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08	《臺灣日日新報》8 版
72	首を吊らせた戀(3)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09	《臺灣日日新報》8 版
73	首を吊らせた戀(4)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12	《臺灣日日新報》8 版
74	首を吊らせた戀(5)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14	《臺灣日日新報》8 版

75	首を吊らせた戀(6)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15	《臺灣日日新報》8版
76	首を吊らせた戀(6)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16	《臺灣日日新報》8版
77	首を吊らせた戀(7) 蕃界日記から	1928.09.18	《臺灣日日新報》8版
78	林窓小品	1928.11.01 (無版權 頁)	《臺灣山林會報》 n34
79	首を吊らせた戀(蕃界日記より)	1928.12.01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n138
80	林窓隨筆(一) 日本一の風景地世界一の風景地	1928.12.02	《臺灣日日新報》6版
81	林窓隨筆(一)	1928.12.0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2	林窓隨筆(二)	1928.12.0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3	林窓隨筆(三)	1928.12.0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4	林窓隨筆(四)	1928.12.07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5	林窓隨筆(五) 有言實行(上)	1928.12.0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6	林窓隨筆(六) 有言實行(下)	1928.12.11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7	林窓隨筆（七）俊寬、紅葉（上）	1928.12.12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8	林窓隨筆（八）俊寬紅葉（下）	1928.12.14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89	林窓隨筆（九）山林都市	1928.12.19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90	新高山方面旅行所感	1928.XX.XX	《臺灣山林會報》 n33
91	林窓隨筆（十）	1929.01.14	《臺灣日日新報》5 版
92	林窓隨筆（一一）	1929.01.16	《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3版
93	林窓隨筆（一二）	1929.01.17	《臺灣日日新報》6 版
94	林窓隨筆（一三）	1929.01.18	《臺灣日日新報》6 版
95	腕を折つた蕃人の話	1929.02.01	《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n140
96	蕃人恩を知る	1929.08.01	《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n146
97	山林と人生を尋ねて－基隆水道水源 林の卷－	1929.08.01	《臺灣山林會報》 n40
98	山林と人生を尋ねて（二）－基隆水 道水源林の卷－	1929.10.01	《臺灣山林會報》 n42
99	或山林放火事件	1930.04.01	《臺灣警察時報》

			n156
100	山・林・人ところところ	1931.12.01	《臺灣山林會報》 n68
101	時局と内省	1932.01.01	《臺灣山林會報》 n69
102	山・林・人ところところ（二）	1932.01.01	《臺灣山林會報》 n69
103	山・林・人ところところ（三）	1932.03.05	《臺灣山林會報》 n71
104	思ひ出深い山々	1932.07	《臺灣時報》
105	謝外交總長との 會見印象記（上） 今夏の鮮滿旅行を追憶して	1932.10.01	《臺灣日日新報》4 版
106	謝外交總長との 會見印象記（下） 今夏の鮮滿旅行を追憶して	1932.10.03	《臺灣日日新報》5 版
107	尺八の話	1932.12.18	《臺灣の山林》n81
108	臺灣山旅斷想	1933.08.07	《臺灣の山林》n88
109	臺灣山旅斷想	1933.09	《臺灣時報》
110	觀光の地	1934.06.XX (由内文推測)	《新高阿里山》n1
111	臺灣を垂直的に歩くこと	1934.11	《臺灣時報》
112	林窓漫筆	1935.06.07	《臺灣の山林》 n110
113	「文人雅客隨筆」〈捨石〉	1936.01.01	《臺灣》n53

114	新高山の風景	1936.07.02	《臺灣の山林》 n123
115	樟を尋ねて	1938.01.01	《臺灣の専賣》 v17n1
116	樟を尋ねて（二）	1938.02.05	《臺灣の専賣》 v17n2
117	樟を尋ねて（三）	1938.03.15	《臺灣の専賣》 v17n3
118	樟を尋ねて（四）	1938.04.12 （版權頁疑 有誤）	《臺灣の専賣》 v17n4
119	樟を尋ねて（五）	1938.06.15	《臺灣の専賣》 v17n6
120	樟を尋ねて（六）	1938.08.15	《臺灣の専賣》 v17n8
121	蕃山旅の印象	1938.10.01	《理蕃の友》 y1938m10
123	山岳講座	1939.03.10	《臺灣山岳》 n10
124	北丹大山・東郡大山に登る	1940.04.05	《臺灣山岳彙報》 v12n4
125	相思樹に祈る	1944.05.01	《臺灣公論》 y1944m05
126	人なきに非ず	1944.08.01	《臺灣公論》 y1944m08